

目 录

| | |
|------------------------------|-----|
| 序 | 黄淑婷 |
| 作者中文版前言 | 1 |
| 鸣 谢 | 1 |
| 引 言 | 1 |
| 第一部 人类学业绩长存 | 1 |
| 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 | 3 |
| 第一章 十年的变化 | 5 |
| 复 苏 | 5 |
| 在中大再生 | 12 |
| 第二个人类学系 | 19 |
| 第二部 引进的学科 (1898~1949) | 25 |
| 第二章 引介外国学说 | 27 |
| 早期的样本 | 27 |
| 外国奠基者 | 34 |
| 诸多学科之父：蔡元培 | 38 |

| | |
|--------------------------|----|
| 焦点之二 林惠祥：梁钊韬的良师益友 | 46 |
|--------------------------|----|

| | |
|------------------|----|
| 第三章 外国来访者 | 50 |
| 功能主义来到中国 | 50 |
| 在华的外国人 | 57 |
| 学术领域之外的发展 | 62 |
| 抗日战争前夕 | 63 |

| | |
|----------------------|----|
| 焦点之三 中山大学与杨成志 | 65 |
|----------------------|----|

| | |
|------------------------------|----|
| 第四章 中国西式人类学的成熟 | 74 |
| 抗战年月 | 74 |
| 更多的外国训练：效法美国、法国和英国的 人类学模式 | 81 |
| 抗战以后的繁荣 | 90 |
| 对解放前人类学的一个评价 | 94 |

| | |
|----------------------|-----|
| 焦点之四 解放期间的梁钊韬 | 101 |
|----------------------|-----|

| | |
|--|-----|
| 第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 苏联模式（1949~1960） | 103 |
|--|-----|

| | |
|-----------------|-----|
| 第五章 过渡时期 | 105 |
| 新社会 | 109 |
| 人类学思想的转变 | 114 |
| 第六章 重新定向 | 122 |
| 新模式 | 122 |
| 学术界的调整 | 124 |
| 重组人类学 | 127 |

| | |
|--|-----|
| 少数民族识别 | 140 |
| 第七章 学习老大哥 | 145 |
| 俄国人来了 | 145 |
| 苏联访问者 | 149 |
| 苏联思想 | 157 |
| 兄弟反目 | 166 |
| 第八章 田野工作 | 175 |
| 语言调查和语言改革 | 175 |
| 社会历史调查 | 181 |
| 田野工作留下的财富 | 189 |
| | |
| 第四部 “毛泽东化” 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1957~1978) | 195 |
| | |
| 第九章 以毛泽东化为中国化的标志 | 197 |
| 反右派运动前夕的学科体系 | 197 |
| 反右派运动和知识分子 | 201 |
| 学术批判 | 205 |
| 大跃进时期的人类学 | 213 |
| 60年代初期“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 222 |
| | |
| 焦点之五 梁钊韬和新中国 (1949~1964) | 232 |
| | |
| 第十章 人类学学科的解体——文化大革命 | 245 |
| 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对象 | 246 |
| “取消”民族学 | 250 |
| 冲击 | 254 |
| 无产阶级教育 | 263 |
| 政治遗留问题 | 270 |

| | |
|--------------------------------------|------------|
| 焦点之六 梁钊韬：下放和平反 | 272 |
| 人类学界的人民之敌 | 272 |
| 重振考古学 | 276 |
| 第五部 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 中国模式？ | 283 |
| 第十一章 外国人类学又回来了吗？ | 285 |
| 久违之后 | 287 |
| 西方人类学再次来到中国 | 297 |
| 普世性科学还是民族国家科学 | 298 |
| 第十二章 人类学中国化 | 311 |
| 本土化 | 311 |
| 以马列主义为基础 | 314 |
| 中国人类学的“特色” | 320 |
| 学科体系中国化：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 | 322 |
| 再度毛泽东化？ | 326 |
| 中国化了的中国人人类学 | 328 |
| 第十三章 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 | 329 |
| | |
| 焦点之七 梁钊韬：墓志铭 | 338 |
| | |
| 跋 | 341 |
| | |
| 参考文献 | 342 |
| | |
| 译后记 | 367 |

第一部

人类学业绩长存



焦点之一 梁钊韬的七十寿辰

中央会客厅内人声鼎沸、教职员工以及他从前和现在的学生济济一堂。在沙发和椅子摆成的 U 形区的一隅坐着接受祝贺的寿星——人类学系的创始人梁钊韬教授。这天是他的七十寿辰。一张红底黑字的大横幅上印着颜色鲜艳的“寿”字。人类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从横幅底下站起来，向到场的 100 多人致意。这位书记列举了梁先生一生的成就：建立人类学系，发现史前的马坝人头盖骨，并且培养出一批批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学子。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从中间的席位上站起来，转达了中山大学党委会对梁教授的祝贺。然后他问校长是否要发言，校长谢绝了，表示赞同前面几位的发言。

此后，庆贺仪式的主持人，语言学教授庄益群就请我——人类学系该年度的访问教授发言。由于庄教授事先已经让我做好准备，因此我就老老实实在地站了起来。我赞扬了梁教授全身心地致力于他的学科的复兴工作的精神，并告诉所有的在场的人，国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梁教授的成就。最后，梁教授自己站起来发言。

起初梁钊韬先生的声音很小，后来就越来越活跃。梁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类学的看法。他表示，在和其他人一起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

了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内在的联系，而在考古学、语言研究与民族学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相互联系。他总结道，和美国一样，社会主义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四个学科”的体系，但它同时还必须包含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

梁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愿意为这一学科、为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服务，他手舞足蹈地说道：“无论学校让我去哪儿，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发言中梁教授表达了对中大党委书记的谢意，并自豪地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学系的博士，其中包括两三个在中国取得学位的——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开端——和由系里派到国外去深造的研究生。

此时，来宾们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到了允许来宾们自由发言的时间，底下的嘈杂声就更大了。梁教授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集这两个身份于一身）朗诵献给教授的诗或是说一些感谢教授这些年的教导和鼓励的话。庄教授送给梁先生一本他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写给他的小集子。最后，大家分享了一块生日大蛋糕，此时，中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向来宾们道别后离开了。

1986年6月26日，在中大校园内的一个餐厅里又举行生日宴会。摆了十来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十几个赴宴的人。简短的祝辞和梁先生的发言都淹没在了来宾们的闲聊声中。看起来除了我和我夫人，其他人对此都没有意见，他们或许认为，这个夜晚的意义不在语言中，而在于庆贺活动本身。中大的前任校长、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在首席就座，他们向梁钊韬教授敬酒，对梁教授在人类学这个时常遭到攻击的领域内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共同的敬意。而仅仅十年前，他们的前任中没有一个人会在公开场合和梁打招呼。

第一章 十年的变化

复 苏

1976年，梁钊韬还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祝贺，更不要说是他所在单位中山大学的领导们的祝贺了。被从广东省北部的“五七干校”召回来之后，他在家里仅呆了4年时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反知识分子的热浪也有所减退。国家文物局的当权派们决定，中山大学应当有一个考古学专业，而像梁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他们的帮助对完成学校的重建工作却是不可或缺的。

全国许多院校和博物馆都恢复了考古学。古人类学也得到恢复。然而，民族学、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仍然受到禁锢：政府指责它们是“资产阶级学科”。这些体系尽管在名称的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实际上，它们经常假借“少数民族研究”或“民族工作”之名出现。

在各大学，“工农兵学员”坐在刚刚重新敞开大门的教室里，专门监视那些从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回来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几年内，社会科学依然落后于自然科学，但是又试着开始出版学术刊物了。环境有所改善——实际上，仅仅是重新开放各大学就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人们内心却还忐忑不安，担心这种好景不会长久。

事实很快打消了人们的顾虑。1978年12月中旬，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全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阶级斗争不再是重点，农民的收入与农业产值挂钩，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大权，他的一些支持者们又回到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岗位上（Rosen 1984：6；Rozman 1987：637）。

前一年，同样的党的会议上确定了到公元2000年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这已经预示了随后这些举措的出台。华国锋主席强调群众在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而邓小平却强调要依靠与政治无关的专家们的力量。到1978年后期，华国锋要被邓小平取代的趋向已经很明显，而政策的改变也开始昭示这一权力更迭的到来。到11月，剩下的所有“右派”都官复原职，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还取消了对进行“自我教育”——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要求他们洗刷自己的罪行——的从前的剥削者的阶级成分的划分。看起来转变真的就在眼前，而在12月的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证实（Rosen 1984：6~7）。

这种新的转向强调技术专长，于是就要求教育系统作根本性的改变——从以前的重视正确的政治思想与行为到现在的重视学术与教育水平。中学，甚至是小学，都在努力促使学生攀登教育的阶梯（Rosen 1985：817）。在所有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为业已恢复的全国高考作准备。有潜力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入学的前两年就不再被要求参加劳动了。30年来，过去的剥削者家庭的子女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报考大学（Pepper 1984：3）。

同一时期，社会科学也开始更新。外国和华侨学者长期以来建议，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应该发展社会科学——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现代化的社会，这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和他的高级顾问之一胡乔木被说服了。

胡乔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部门的一名核心人物，他签署了指名要求恢复一些学科的命令。1977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提出重建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及其研究、法律研究、人口学、政治学，最后甚至于连民族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也包括在重建之列。^①

不过，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期望只有到了1978年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也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能在1956~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些学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影响。这两大学科中，首先重建的是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一年前才从中国科学院内部分化出来的机构的倡导下，1979年3月召开了“社会学重建大会”，胡乔木亲自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该会有50名成员，年高德韶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选为会长。^②1982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年会，并在会上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Chu 1983：4；刘延寿和冯志毅1986：562~563；阎鹏1990：14；袁辑辉1983：21）。社会学界的前辈吴文藻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被这个关于“社会学和现代化”的会议深深打动，并表示，从今以后又可以公开谈论社会学问题了（吴文藻1986：93）。

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被取消，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被指责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学科，因而只有得到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明确的支持后才可以重建，而胡乔木在

① 据Petzold称，截止1980年，全国有600~800人参与了发展、教育和儿童问题的心理研究（Petzold 1980：5）。

② 同年，费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领导职务（黄树民1986：4）。

1979年社会学重建大会上正好表达了对其重建的支持(Chu 1983: 8)。社会学很快就得到了费孝通的支持和政府的许可,这表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重新获得了尊重,同时也使得社会学系和研究所的重建及刊物的重办工作容易多了。^①1980年,复旦大学率先成立社会学系,随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也相继成立社会学系。1981年10月,《社会》杂志出版了创刊号,它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第一本社会学期刊(Chu 1983: 9; 黄树民 1986: 4; 袁辑辉 1983: 20)。

然而,在转变阶段的早期,学者们的情感与职业忍耐力也受到了考验,因为政治风总是一时刮向这边,一时又刮向那边。例如,费孝通起先受了重建社会学所取得的进展的鼓励,于是邀请匹兹堡大学的杨庆堃(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中山大学)到中国来举办一个社会学研讨会。然而,费孝通被指责为“将资本主义带回到中国”。研讨会被迫取消,杨教授又等了几年才有机会到中国来举办一个这样的研讨会。

“民族研究”再度成为人们的话题,被提及的次数也日益频繁,于是民族学也于1978年开始复苏。之后不久,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北京及各省区分别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像杨堃和吴文藻这样的资深学者又开始招收学生和讲授民族学课程。在几所新近恢复的民族院校里出现了民族学专业或民族学系,这使得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很快就得到了承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民族学室正式成立之后,民族学

^① 费孝通当时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主席,费通常是知识分子的代
表(巴博德 1988: 637)。80年代中期,他陪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出国访问,享受了相当高的待遇。

被中年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①

然而，年纪大些的民族学家们在改革的头几年都谨小慎微。甚至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成立之后，老学者们还建议人们“不要使用这三个字眼”，即“民族学”这三个汉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仍然将民族学称为“资产阶级的学科”，因此，很多人都害怕与这个前身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学会”的机构有太密切的关联。民族学这个长期以来被社会遗弃的学科只能慢慢地在社会上立足。

与那些曾经被禁锢的学科相比，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在改革前没有遭受如此重创，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过程相对而言也不像它们那样富有戏剧性。随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建立和考古学组在近十个单位的历史系的成立，考古学进入各大学。博物馆、文物局和文物队录用的大多还是考古学方面的工作人员。

在中国一些重要的中心里还保留着体质人类学，其中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最为引人注目。昆明动物研究所1981年最先建立了生物学组，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灵长类学领域。同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体质人类学教研室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继续进行人体测量学和其他生物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医学院也因其培养和录用从事与医学和生物人类学最接近的专业领域的人员而显得尤为突出。

语言学是美国人定义的四大学科中的最后一个，它在中国的处境和体质人类学相仿。当时它在中国的大学里不

^① 只是要求禁止使用“民族学”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这种说法，实质上，在这20年的争论过程中，民族学一直存在着（第12章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系存在。北京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语言学专业，其他许多学校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设置了语言学的课程。在改革后期，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重新出现在中国，但其进程相对比较缓慢。

人类学作为一个连贯和独立的学科领域，其经历略为复杂。1978年，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并开始建立一系列的研究所时，许多学者就建议恢复人类学。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国家民族研究规划会议上，又有许多专家呼吁让人类学回到社会科学中来，为民族工作的“六五规划”效力。

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设立一门他们不甚了解的学科。他们知道民族学就是对民族的研究^①，但是，准确地说来，民族学的范畴是什么？人类学研究又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还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创立另外一门类似的学科吗？

费孝通在1979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到了1980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到了反对重建人类学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有人解释说，费之所以反对，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不无关系，较诸南方学者赞同的美国模式文化人类学来说，他更偏向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另外一些人推测说，费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地位刚刚稳固，没有必要耗费精力再去重建另外一门有争议的学科（黄树民1983：4~5）。

① 如何翻译“民族”一词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可以将“民族”含糊地译成英语的“nationalities”，但没有表达出它用法里的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含义。现在有些中国人赞成译作“ethnic group”，但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译作“nationalities”。

不管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到了1980年，费已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否决所有他不喜欢的学术活动了，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不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明确反对他将人类学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观点。譬如，民族学家秋浦和中山大学的梁钊韬都坚持说，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行得通的，对中国未来的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

争论还在继续，人类学的倡导者们也在寻求他人的支持，特别是著名学者的支持。在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领域，这个问题无论是对于学者个人还是他们所在的机构来说都很复杂，因为在这些领域都存在独立的组织和机构，且都有一定的声望。这些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著名的学者加入到了支持重建人类学的队伍之中（如，体质人类学家刘咸、考古学家安志敏和民族学家杨成志），还有一些同样著名的人物却没有加入。

198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中国人类学筹委会”，10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对早期的人类学重建活动给予过支持的机构主要有上海自然博物馆、复旦大学体质人类学教研室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厦门大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活动的中心，它还是中国人类学学会最初的筹备会议及第一次年会的主办单位。1981年5月召开第一次大会，主题是“人类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黄树民1983：1；Rossi 1985：42）。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国强当选为学会的秘书长。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两省，福建和广东，高校里重建人类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梁钊韬的支持下，中山大学首先行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各大学70年代初开始恢复教学，考古学已成为历史系的一个专业，那些

年里工农兵学员可以主修历史专业或考古专业。而且，考古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择民族考古研究方向，它包括一些划归在其他学科名下的民族学和语言学课程。然而，民族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仍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不能算作一门专业或名正言顺的学科。

在中大再生

当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大辩论延伸到中大的时候，康乐园（中大校园——译者注）正在经历改革带来的转变，^①这对它无疑也是一次震荡。在诸如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期间，包括历史系在内的许多系的教师戴上了右派帽子，并被强制劳动，他们在“拨乱反正”时得到平反昭雪。仅仅过了三年，这些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教师中的一个，容观复就升到了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的副主任的位置上。另一个重大转变是恢复了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取消了的学术制度。

随着学术制度的恢复，梁钊韬当上了正教授。他在 1964 年就已经被批准为正教授，可是决定一直没有生效。^② 1978 年，升任正教授给了梁扬眉吐气的感觉，他于是着手为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做些铺垫工作，为实现这一重建，他付出了大量汗水和毕生的精力。同一年，他将陈启新和杨鹤书两位民族学家调到中大，他们一到那里就开始

① 1979 年 2 月召开的党代会传达了会议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李修宏和周鹤鸣 1988：91~92）。

② 梁钊韬前一次晋升职称是在 30 年前。解放前，他被擢升为人类学副教授 [此处顾著用的是 associate professor，但是后文中又使用了“助理教授”一词 (assistant professor)，此职位介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类似高级讲师。参见“焦点之四”——译者注]。

编写民族学教材。梁还说服中大一位在该校学过语言学的中文系教授，他答应，只要人类学系一成立他就调到该系去。梁绕过了正常的录取程序，把他一名最聪明的学生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两年后该生毕业回到中大担任助教。梁一砖一瓦地筹集起了建成人类学大厦所需的师资力量。

不久梁向中大的领导提出要讨论恢复独立的人类学系；他们为他的筹备工作开了绿灯，同意他拟定一个恢复民族学专业、成立人类学系的计划。^①梁主要是想申请成立一个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两大专业的独立的人类学系。等到以后这个系成熟了，再加上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专业。招进一些合适的教员，并得到财政支持，以收集图书和研究资料。这个计划首先要提请中大的领导通过，这还只是整个复兴过程的第一步；最后还要由北京的教育部来作决定。

尽管中大自己就可以决定成立一个人类学系，但是只有教育部才有权批准学校设立新的专业。如果教育部反对，中大未来的人类学系将只能有一个从历史系分出来的考古学专业，那么人类学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因此，梁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将成立新系和设立民族学专业都考虑了进去。这个提案引发了好多方面人士的兴趣，他们发表了种种意见和看法。

梁和人类学都很幸运，中大当时的一任校长（曾担任过党委书记）黄焕秋本人也研究人类学，他很赞同这一提案。梁还设法利用外界的支持意见来影响中大的领导小组

^① 1978年以后，已经恢复了包含民族学内容和方法的课程，被称作“民族研究”。只是到了1981年该系成立以后，才重新使用“人类学”这个名词。

成员；著名的民族学家、共产党员林耀华在直接提交给中大党委的一封信里所作的陈述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双方在行政机构上下的功夫终于取得了效果，1980年，中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领导同意了梁的计划。关于成立人类学系获得批准的原因，梁自己归纳为3点：(1)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科学开始复苏，人类学的重建正是包含在这个大潮流之中；(2)中山大学以前有过人类学系，所以它只是恢复自己在这一领域原有的地位；(3)中大已经有民族学和考古学所需的师资力量。“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人力和政治条件都有利”，在解释他和其他领导的决定的时候，黄校长是这样说的。另外也有人指出，梁可能并没有向中大的领导们讲清楚人类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没有告诉他们人类学的重建在中国的北方遭到了怎样强烈的反对。

就这样，中大同意了建立人类学这一“新学科”，而是否在新成立的系里开设民族学专业则将由北京来做决定。对于整个计划，学者与行政官员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因此梁在复兴过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北京，他要亲自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建据理力争。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大多数学者进行了接触，他们是：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和林耀华。他还联络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些专家学者，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少说服他们不正面反对该项计划。

梁钊韬终于见到了教育部的主管领导，用了一晚上时间和他谈自己的计划、过去做的工作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人类学。梁回忆道，自己对那位领导说：“别的国家都有这门学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我们有这么辉煌的文

化，这样众多的人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类学？我们中国人必须自己研究十亿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要让人类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就这样，北京批准恢复民族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并且在中大成立人类学系。在1981年的农历除夕，梁收到通知说他可以成立自己的人类学系，多年努力终于成为现实。那一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梁先生遴选为中国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博士生培养方案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等课程。

在这个时期，梁先生为重建人类学忘我地工作，他的学生们都敬重他不知疲倦的敬业精神。但是梁先生也为他辛苦的劳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北京传来好消息后没有几周，新系的成立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却患了轻微的心脏病。

随着梁先生的康复，其他一些人也渐渐加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新系里的关键人物。5月人类学系正式成立，7月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从考古学或民族学专业延调到新成立的人类学系，但是新单位是白手起家，必须自己想办法收集图书、杂志和学术资料——历史系控制着所有自己的资料。9月第一个本科班开课，即81级。然而，刚刚成立的系课程设置还不全面，以至于历史系79级考古专业的学生到1982年才转到人类学系来。

第一年任教的老师有一些是梁先生前些年安排到历史系的，还有一些是特别为新成立的系任用的。梁教授始终相信他年轻时所学的四个学科的人类学体系的正确性，他也鼓励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加入到新成立的学科体系中。听到他的呼吁的人当中有很多是他以前的学

生，这使得他们不会对他的要求充耳不闻。陈启新和杨鹤书是1981年前从北京调入中大历史系的民族学家，他们俩都是梁教授以前的学生；考古学家李松生和语言学家庄益群也是梁教授的学生，他们自60年代初从中大毕业之后一直留校任教，现在也调到新成立的系里。

被选出来担任系里重要的领导职务的也是梁教授以前的学生。两个副系主任，其中一个李松生（主管教学），而另一个是容观复，他是1942年梁先生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从北京调过来，负责系里的科研活动和学术资料收集工作。以后几年里进入该系的教员似乎都与梁先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是张寿祺，他是梁教授解放前的学生^①），可以说，到1984年为止，集结在中大的人类学教员都是梁钊韬一手操办的。

1983年，中大人类学系开始以梁钊韬的名义招收硕士研究生，但是等到考入中大，他们不一定都跟梁教授，有些就被派去跟另一些资深教员学习。要这种小诡计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只有梁一个人获得了副教授以上的职位，因此也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5年，另外两名教员升为副教授，他们正式承担起了所有硕士生的教学工作，让梁全身心地投入对博士生的指导。

七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中大主办了一次国际人类学大会，显然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没有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梁努力使“人类学”这一名词的使用合

^① 1949年以后，中国习惯于将社会主义力量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的国家和社会称作“解放”（Liberation）。“解放”指的是中国人民摆脱了革命前的“封建”社会及其阶级制度，以及干涉中国事务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解放前”和“解放后”是中国一个时代历史的分水岭；受我的调查对象的影响，我也经常使用这几个名词。

法化，人类学在学术界已经有了明显的立足之地。我出席了1984年12月的那个国际大会，会上，中大和广东省的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学的支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东省副省长致开幕辞，他表示，对一个像中国这样有着复杂的多民族文化的国家来说，人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它可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大的党委书记也热情赞扬了人类学可能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并为中大解放前悠久的人类学教学历史感到自豪。梁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梁对该系有突出贡献，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会大度地接受或容忍他独断的领导。最初的几年过去后，矛盾开始激化。系里分成了小派系，开始听到对梁的管理方式不满的言辞。1985年，中大的领导机构开始实施国家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即年纪大的领导（55岁以上的）要让位给年轻人。起初由于人类学系情况特殊（它刚成立不久），条件可以稍稍放宽，现在它也在经历明显的权力交接。以国家政策为由，中大巧妙地解决了人类学系内部的矛盾和管理上的问题。冯家骏，是一名学习过古人类学、后来又从事法医工作的医生，从广西调来担任系主任。两名新的副系主任都是梁以前的学生，是从系里资格较老的教员中选拔出来的。

然而，梁并没有退休。尽管他在系里的威信已经明显地开始下降，但他仍然相当有实力。他继续掌管教育部批准中大设立的人类学博士点，因此在培养未来的人类学家方面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① 1986年6月，梁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授予格勒，他也是第一个获得中国博士

^① 在学术单位设立博士点或硕士点后，这些院校就有权授予学生博士或硕士学位。同时，每个“点”都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认可的导师；梁钊韬是中国惟一一位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人类学博士生导师。

学位的藏族人。出席格勒答辩会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高级学者：严学窘，著名的语言学家，武汉中南民族学院院长；李有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家；王辅仁，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主任；江应樑，云南大学杰出的人类学家；曾昭璇，位于广州市另一隅的华南师范学院的地理学家；中大历史系的蔡鸿生，以及梁钊韬本人。在答辩会次日该系成立五周年的特殊庆贺会上，李有义和严学窘对全系发表了演讲。

那一年年底，该系获准成立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室，进行人类学研究和著书工作。这个系的下属单位在次年春季正式成立。系里以后又举行过3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会（译者按：这是指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前的情况），同时也有学生继续被派到国外去攻读博士学位。^①正式规定研究生可以申请人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都有一个确定的研究方向，即民族考古学。实际上，这意味着研究生必须在毕业论文中反映出掌握了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

到20世纪90年代初，系里的领导又换届了。这次的系主任是中国人类学教学工作中首屈一指的女性、民族学家黄淑娉。她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口碑极好的一流学者，调到中大时，她怀着这样的愿望，即加强教学工作的力度使系里的博士点能保留下去。于是，她增大了人类学方面课程的比重，制订了一个更全面的综合性教学计划。被教员们选出来协助她工作的是考古学家曾骐和乔晓勤。在研究青铜时代的专家商志禛领导下的中大人类学博物馆同样也扩大规模，开始陈列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展品。人类学系自身也增设了面向干部和文物工作者的培训课程。

^① 1981~1992年期间，该系被授予硕士学位的达33人之多（周大鸣1992：138）。

第二个人类学系

在梁先生获准于广州重建人类学系后短短几年，中国的第二个人类学系又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厦门市成立了。厦门大学解放前也曾有过人类学系，这个学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同样被取消了。1973年，中大恢复考古学，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设在历史系，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也作了同样的变革。

早在1951年，厦大就有一所由林惠祥建立的人类博物馆，人类学也正是在这个单位发展起来的，因为在学校里任何系开设的课程中都没有人类学这门科目。这所博物馆1981年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也正是它首先提出了在厦大恢复人类学的计划。林惠祥的学生陈国强以博物馆馆长的身份领导了重建工作。

陈国强的第一步是要获准成立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所，在那里，20多人可以致力于人类学问题的研究和发展。1984年2月计划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紧接着，部里又同意厦大成立人类学系。由获准建系到建所前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表明，和仅仅几年前梁钊韬为恢复人类学学科所付出的艰辛相比，1984年时人类学的地位已经确立，不再那么有争议了。

在厦大，成立人类学系的计划同样意味着考古学专业要从历史系分出来。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并没有焦虑不安，因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一个研究器物，一个研究历史文献。既然支持人类学的人都赞同一种四大分支的人类学，那么把考古学放到人类学

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①

1984年10月，厦大人类学系正式成立，但是这与系领导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1985年，教育部批准在人类学系分设考古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陈国强体验了十年梦想终成真的满足感，这和梁钊韬几年前的感受不相上下。

尽管两个系的成立相隔不过3年时间，但是它们在中国建立人类学系的战略却大不相同。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厦大的人类学专业一直自觉地教授包括美国式的四大学科在内的人类学课程。该系考虑不设考古专业（让它留在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系里），这样，人类学系就只需培养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同时（到1987年为止）还可以设立文化人类学的硕士学位点（学习“四大学科”）。^②

在厦门，这种建系方针被认为是更可取的，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分支学科（民族学、考古学等）的研究者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学在这些领域的宗主地位，这些学者也很少考虑让人类学家来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培养人才。故而系领导认为他们最好是设置有明显的本系特点的专业课，这才不会和开设相同专业的大学或单位发生冲突。

直到1990年，中大人人都认为这种说法论据不足。在他们看来，被称作“人类学家”的那些人缺少就业机会；与深奥的“研究人类”的学科的毕业生相比，“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找个工作单位要容易得多。

后来，中大人类学系的新一任领导决定本系也设立人类学专业。第一届是在1991年秋季，招收了19名学生。

① 教研室是系下属的重要行政机构。它们将负责某个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教研室”不能与只从事研究的“研究室”混为一谈。

② 该系开设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还包括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为东南民族史）和考古学（主要研究宋元时期和新石器时代）。

教员们提出两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系为什么会改变立场。一是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很难找到工作。“广东省是一个汉族地区，一听到‘民族学’，人们就会想到‘少数民族’，就不想录用我们的毕业生。而‘人类学’听起来更顺耳些”。二是学生自己不愿意学习民族学，因为他们担心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大汉族主义”，一位讲师说道），这种不喜欢去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大概也反映出了他们想在中国较富裕的城市里生活的愿望。中大人类学系以后可以依照厦大的模式，只招收人类学和考古学专业的学生。

从情理上讲，厦门大学还是挺尊重中山大学这位中国人类学的“老大哥”的，不过厦大人很是为他们自己创建的中国人人类学中心感到自豪。尽管中大和厦大都是中国人类学界的先锋，厦大却是惟一一所可以自夸的学校——它同时拥有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和人类博物馆，并且还是中国人人类学学会的挂靠单位。厦大的确是老二，但可以说，它为人类学地位的确立付出了更辛勤的劳动，使以后几代年轻学者受益匪浅。

两个系在方针上还有很多不同之处，使得它们各具特色。例如，梁钊韬从中大其他系和全国各地调人到中大人类学系，组建了该系的师资。陈国强却缺少同样庞大的学生和同事网；陈国强不像梁钊韬在中大那样将一些与人类学相关的老教授收罗到自己系里，他宁愿直接训练年轻人，让他们掌握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人类学的方式、方法、理论及分支领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外国人类学家为他培养学生，因为他和厦大的其他人对这些分支领域都不是特别精通。

厦大让该系在教学上依靠资历较浅的教员反而成了一项长处。缺少资深教员在短期内的确是该系的一个弱点，

但从长远看来却是一种优势。即便是老教授们能够也愿意调到人类学系（对老学者们来说，这种工作调动通常很难办，制度也还不健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年后也要退休。相反，训练年轻人要容易得多，因此系里分配给每位年轻的助教或讲师一个需要掌握的人类学分支（如，都市人类学或医学人类学）。系里要求他们掌握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翻译该学科的外国资料，在中国进行该分支学科的田野调查，然后写出学术论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开设他们所研究的分支学科的课程，以此来培养“新一代人类学家”。

厦大人说中大的“人类学化”是一个时断时续又时有发展的过程。中大的教员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学科体系重新定位的过程，并且需要一再地告诉学生不能把自己只当作是考古学或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我们看一看系里的毕业生——而且多半是会成为系里的教员或领导的那些学生——我们就会发现，和厦大的情况一样，这一代学生都把自己看作是人类学家，并开始顺应全球的人类学潮流。当1991年系里举办十周年系庆的时候，教员们回忆起这个中国30多年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取得的成就，都引以为荣。

在这第一个10年行将结束之际，变革时期人类学的后起之秀出现了。1988年，云南大学同时借鉴了中大和厦大这两所大学各有千秋的人类学教程安排，在云大历史系开设了人类学专业，成立了人类学教研室。云南长期以来是民族学家们关注与研究的中心。在云南大学的江应樑的领导下（直至1988年他逝世之前），人类学的训练与教学恢复到了一定水平，以至于昆明成为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人类学中心。

因为它们是在70年代与80年代中期不同的政治和学术氛围的产物；梁钊韬在1978年或1979年初次提议（开设人类学专业）受到了阻碍，仅仅5年后陈国强（以及9年后江应樑）一经提出就获同意，这多少也是由于梁钊韬早年努力的结果。1978年改革以来的10年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变化，这必然也决定了中国人类学的进程。毫无疑问，已经取得的和今后其他地方还会取得的人类学方面的进展都将折射出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大趋势。^①

^① 童恩正领导下的四川大学历史系也积极参与了将人类学课程纳入系的活动。如果不是由于童1989年夏离开了中国，川大应该也能在几年之后开设自己的人类学专业或成立人类学系。

第二册

引进的学科(1898~1949)

第二章 引介外国学说

人类学，是欧美人将相关的西方科学综合在一起产生的，它是在 19 世纪欧洲进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是这一扩张过程的受害者，因此其民族文化并没有主动地为这一学科体系发展中进行的民族地理、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研究做出贡献。然而，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当这门新兴科学的有关原则、假设、方法和目标随着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区的技术、管理方式和意识形态一道传入中国时，中国同样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早期的样本

第一股人类学学说的潮流涌入中国是在本世纪初，不过是日本模式而非欧美模式。本世纪第一个 20 年里其实一直是遵循这一模式，其时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社会科学并将其传入东亚邻国。在人类学方面，日本是早期人类学的各种理论——进化论思想、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最早的传播者。人类学的古典著作，特别是进化论方面的，首先译成日文，然后才被译成中文。尽管 1920 年以后欧美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但早些年，人类学大多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传入中国的。

同时，日本也最早了解到中国人想要学习西方科学和

教育方法，而不是陈旧的儒家经典的道德准绳和学说的愿望。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后，中国的学子开始寻找新的导向；早期的留学生把目光投向了东面的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日语和日文要比陌生的欧洲语言和文字容易理解得多。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之后，其军事实力在充满改良思想的学子们心目中也有着巨大的威慑力。相对低廉的交通费也使学子们更倾向选择日本作为留学的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一批志趣相投的留日中国学生组成的东洋团（黄绍伦 1979：5）。在诸如孙中山、李大钊和李达这样的改革家之前，有一批中国学生横渡黄海去学习经济学、历史学和其他 20 世纪的新知识。在日本，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科学，并且很快就将此类著作译成了中文。

伴随着早期的工业化，日本自己也正在经历西化过程，因此可以充当中国知识领域西化的媒介。同时，该时期的日本对中国语言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量借用日语词汇来表述新概念；据估计，现代汉语全部的外来语中有一半来自日本（黄绍伦 1979：5），其中包括社会学、民族学和进化论的术语。

然而，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中第一个出现在中国的却并不是经由东京传入的。1892年，一位不知名的译者将英国学者 John Fryer 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古典进化理论第一次来到中国。“人分五类说”（*On the Five Classifications of mankind*）反映了当时西方将人类划分为假定的五个基本人种类型的观点（张寿祺 1992：319~320）。在早期传入中国的人类学著作中，体质人类学的主题占据了主导地位。

后来在中国出现的人类学著作的确是首先经过东京传入的，因为那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例

如，中国第一篇关于灵长类学的文章“猿语研究谈”是在 P. L. Garner 1900 年的著作《猿与猴：它们的生活和语言》（*Apes and Monkeys : Their Life and Language*）简译本的基础上写成的，而该书就是 1902 年由日本传入中国的。1901 年，随着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学肄言》（*Principles of Sociology*）和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为基础的有贺长雄的《家庭制度进化论》（*Evolution of the Family System*）的中译本的出版，中国出现了第一本有关人类学进化理论的著作（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1；秋浦 1984：12）。上海，这个中国的“外国人的首都”，理所当然地成了这本经日本学者之手融合英国杰出社会学家和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思想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地。

此后，民族学也经过这样的间接渠道传入了中国。曾在英国留学的魏易与著名中国古典文学家林纾一道将一本英文著作《民族学》译成了中文，它是 1900 年由德文原著翻译过来的（李绍明 1986：28～29）。^① 由于林纾对外语一窍不通，他只能让魏易先进行不正规的口头翻译，然后再改写成恰当的古文；他俩用这种方式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的文章。那时候，“民族学”（ethnology）被译作“民种学”（Raceology），而不是现在所使用的“民族学”（粗略地译作民族研究[nationality-study]），因此 1903 年由京师大学堂书局^② 出版的这本书，书名就叫作《民种学》。该文中明确地强调了民种，这反映了种族思想和种族分类在本世纪初的进化学派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

在 1903 年这个创新的一年，西方考古学理论也进入了

① 原作者是 Michael Haberlandt，英译者是 J. H. Loewe。

②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中国。同样也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人类谈》(*On Humanity*)一书,讨论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史前时代。通过同样的方式,留学日本的湖南籍学子们将早期考古学家汤姆逊(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和拉伯克(John Lubbock)爵士的理论传入了中国(张寿祺 1992:322)。

张寿祺建议,了解一下当时的政治局势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海外学子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将这些西方人类学著作引入中国(1992:320,324~325)。譬如他提到,那些湖南籍的学生中有一些是革命者,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助手黄兴和后来的同盟会活动家陈天华。他们认为,中译本的人类学著作讨论进化论理论和考古学的证据,一定能支持他们的革命论断:君权并非神授,中国陈旧的传统不能达到人类知识的顶峰。因此,1902年至1903年冬,他们将威尔逊爵士1885年出版的《人类学》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他们翻译的文章和著作,连同魏易、林纾和严复之类更具保守性的译者的译著,继续将人类学科学引入中国,但是直到1916年,孙学悟才将“anthropology”译作“人类学”(陈国强 1985b:10)。①之后不久(1918年),陈映璜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真正的人类学著作,并恰当地定名为《人类学》。

因此,进化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个外国样本,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今后的发展。民族学和人类学最初被了解的时候也是假借了进化论之名:直到几十年后,德奥的传播论、美国的历史特殊论、法国民族学以及英国的功能主义才登上中国舞台。除了功能主义,这些理

① 据中大的张寿祺从湖南省1902年的清朝史料中发现,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使用这个名词了。

论中没有的一个的影响力比进化理论更持久。功能学派的观点是，所有的文化或是服务于社会中个人的需要，或是维护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这对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科学舞台上的支配地位的确是一个挑战。这一挑战之所以巨大，其中的原因可以直接归结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功能学派思想被系统地引入了中国最有名的学术中心（王康 1981：271）。1949 年之前，中国民族学受功能学派的影响远远大于进化学派；1949 年革命之后，恩格斯的民族学中所凝聚的进化论思想又重新成功地取代了功能主义。

就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陈映璜的《人类学》面世了；这本探讨政治文化问题的著作冲破了文学和社会的障碍，中国社会和学术界开始全面地汲取新的、激进的外来思想。中国的媒体上和校园里开始讨论新的学科体系。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都开始大发展。心理学也随着杜威和他的教育理论进入中国；在努力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在理论上着重强调行为主义（Petzold 1980：3）。北京大学 20 年代带头进行人类学研究，1925 年，陈映璜开始在历史系讲授有关“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课程（梁柱 1988：199，227）。

与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最早进入中国并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社会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903 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① 早期的一些事件还有，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4 年最先引入社会学课程；^②

① 通过翻译诸如赫胥黎、亚当·史密斯、孟德斯鸠和穆勒等人的专著，严复将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经典作品引入中国。有关此中西学术津梁的更详尽情况请参看黄绍伦（1979：6~10）。

② 阿古什（1981：25）提出最早是 1905 年由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而黄绍伦（1979：11）则称是 1913 年由上海大学首次开设了社会学课程。

不久，清华大学成了第一所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国立学校（王康 1981：7）。这些早期活动表明，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比民族学要大，因为当 10 年后民族学进入中国的时候，进化论思想在西方“已成为‘落后’的派别”（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5）。尽管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早，它在院校里却没有自成一系，总是被设在历史、教育、经济、哲学或心理学系里（费孝通 1979：24）。

在此期间，日本还是中国人了解人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到了 20 年代，在所有的学科中，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比去欧洲或美国的要多得多（Lutz 1988：40）。日本人继续探究进化论理论，1925 年出版的《民族》期刊创刊号对民族学和进化论的前景做了乐观的估计。

20 世纪 20 年代，还有其他的民族学思想流派进入中国，向进化论的至尊地位宣战。随着 20 年代中期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法国民族学派传入了中国；法国学派——包括莫斯（Marcel Mauss）和雷布儒（Lucien Lévy - Bruhl）——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学方面（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1）。德奥的传播论同样也是在 20 世纪被引入中国的，但它的影响范围不广。

20 年代的 10 年间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带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 1920 年写了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章；瞿秋白 1924 年写的《社会科学概论》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讨论了民族学问题。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同样出版于 1924 年，该书在唤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方面超越了其他人，书中赞扬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接着宣称：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将摩

尔根的进化论的民族学与卡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最终结合到了一起(秋浦 1984: 12)。1929年发行《起源》一书的中译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学者,如杨贤江的努力,都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作用。^①

同年,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试图通过将恩格斯的观点运用于中国社会,从而将《起源》开创的工作继续下去。郭沫若又把古代中国社会当作一个例证,作为对恩格斯和摩尔根从美国土著社会和希腊、罗马等欧洲古代文明中提炼出来的范式的补充。郭沫若还主张,中国的学者应该对原始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知识作更多的补充。例如,中国人早就知道原始时期的人们不能确定一个孩子的生父是谁,而这一点西方人是在近代运用进化论对那一时期进行复原后才发现的(秋浦 1984: 14)。因此,是中国人首先确定了史前的原始社会存在着“群婚”阶段。

这一论述表明,尽管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从20世纪早期的活动开始的,中国的学者同样可以拿出和西方学者一样多的理由来证实这些科学存在于古代的学科渊源(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 271; 胡坦 1986b)。譬如,语言学家追溯2000年前的历史,发现当时的语言习惯;民族学家们也这样做,则是为了记录古代的民族差异。

然而,只是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现代语言学

^① 秋浦(1984: 12)指出,在所有这些译作面世之前《起源》一书的英文版(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但他也承认,由于极少有人懂得外语,使这些早期引入中国的专著影响有限。甚至连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都是到了1935年才在中国出现,而泰勒(E. B. Tylor)的《人类学》直到1926年才被引入中国。人类学各流派的大多数著作直到30年代或更晚些时候才在中国出版(李绍明 1986: 29~32)。

和民族学研究方才诞生。^① 同样地，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北大）才第一次开设考古学的课程，北大新组建的“考古学会”（1923 年）也才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当时由于缺乏考古学证据，使得人们断定中国没有经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安志敏 1988：754）。“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运动促成的新知识氛围激励年轻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调查和探索中国的过去，从而使现存的历史著作得以更新和丰富（Olsen 1988：2~3）。

外国奠基者

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一大半时间里，中国都是以占支配地位的外国人类学科学和其他诸多学科领域作为自己的标准。在“义和团运动”和外国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头上之后的一些年里，外国人在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和代之而起的软弱无能的共和国里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外国学者、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可以进入他们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寻求本国政府的保护。日本占据了东北，俄罗斯强占了新疆和东北的其他地区，法国盘踞在云南和西南，英美瓜分了西藏；所有的外国人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都享有特权（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94）。

紧随帝国主义分子而来的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研究并出版了他们的调查成果。在民族学方面，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特别活跃，来自沙俄皇家科学院的

^① 这是指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进行此类调查研究。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头 10 年里，中国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是由少数西方人搞的，最著名的有格罗特（J. J. M. de Groot），葛兰言（Marcel Granet），甘博（Sydney Gamble），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和葛学溥（D. H. Kulp II）（黄绍伦 1979：4~5，11~14）。

“中亚东亚探查队”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察。1912至1913年，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goroff）担任领队，后来又在中国最东端的3个省（和西伯利亚）进行民族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生物学家也在全中国进行广泛的生物学考察，在1949年以前惟一的一次灵长类学研究工作中，他们捕获了不少滇金丝猴。日本学者早在1902年就相当活跃。而随着192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调查团”在蒙古族和回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和生物研究，中美合作达到一个高峰。其他国家的人员同样也在中国从事研究和教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94~295）。

古人类学方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葛利普（A. William Grabau）曾在北大教授古生物学，奥斯朋（H. F. Osborne）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的理论也影响过许多人。同时，1922年的自然历史考察不仅调查民族“习俗”、搜集文物，而且还努力寻找化石遗存。他们发现了一些恐龙和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可惜没有发现人类遗迹。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写出了很多的报告和专著，也有很多外国人参与到其中。像这样由外国人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在那一阶段颇具典型性（贾兰坡和黄慰文1984：4；吴汝康和林圣龙1985：3~4）。

实际上，外国人在与中国古人类学密切相关的领域——包括地质学、古哺乳动物及古人类学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11年前，中国人不论在国内或海外都很少有学地质学的，辛亥革命之后，新政府的农矿部成立了一个地质所，工作人员有中国人、也有欧洲人（Freeman 1977：80~81）。然而，现代古生物学却能够确认更久远时代的文化遗产。

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哈勃尔（K. A. Herberer）来

到中国，给慕尼黑著名的恐龙专家施洛塞尔（Max Schlosser）带回了许多古生物（主要是上新纪和更新纪的）化石。有一次回国的时候，哈勃尔带回了一些他在一家中药店里发现的“龙骨”。施洛塞尔判断其中的一件是人科生物的牙齿（a hominoid tooth）。在此后近20年里，这一块化石一直是惟一得到承认的中国古代原人（proto-humans）存在的证据（Freeman 1977：82；Schlosser 1903；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1）。

中国最早的古生物学工作是由瑞典人完成的。他们中最早的一位是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他于1914年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农商部（后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农矿部”等不同的名称——译者注）工作；几年后，他参与了周口店的初次发掘工作（贾兰坡和黄慰文 1984：8~9）。耶稣会的桑志华（Emile Licent）于1914年来到中国，随后，1923年耶稣会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也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一直呆到1946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合作进行了很多研究项目。正是他们（1924年）在桑志华在甘肃省收集到的4件石器碎片的基础上，写出了1920年在华北发现旧石器工业的报告，也正是他们的地质调查使人们了解了华北另外3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①（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1）。

1921年，从北京近郊周口店传来的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2）。两颗牙齿——首次在中国的遗址里发现的原始人遗迹——证实了更新纪

^① 这其中的一处，内蒙古的大沟湾〔即通常所称的萨拉乌苏遗址——译者注〕后来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化石，包括被判定为“河套人”的门齿。

中期人类的居住地，似乎预示着更丰富的沉积和更大的发现。这是许多古生物学家孜孜以求的证据。出现在周口店的是中国当时原始人类化石寻找者中的一些佼佼者：安特生，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葛兰阶（Walter Granger），美国古生物学家，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近期刚刚派他去负责其“中亚古生物学考察团”；斯丹斯基，这位年轻的奥地利原始生物学家刚刚被安特生带到中国开创中国的考古学。在以后的两年多里，内蒙古的大沟湾和周口店发现了更多的牙齿，最终确认更新纪时期东亚古人类的遗留物的存在（Freeman 1977：84；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2）。

192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成立了一个中西混合团，主要寻找其他的原始人类遗址。加拿大籍的步达生（Davison Black），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负责人，获得了该基金会对这一项目的支持。因此，在周口店的深入发掘工作中，协和医学院的人员占有很大的比例。尽管这项工作是在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一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进行的，但调查队大多数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是由外国人担任。实际上，是步达生第一个根据发掘出来的文物中的一颗较靠前的臼齿命名了一种古人类：“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现在被称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

两年后，裴文中和杨钟健先后加入到了1928年的周口店考察队中，并发现了第一块完整的头盖骨，至此确定了北京猿人作为原始人类始祖的地位（贾兰坡和黄慰文 1984：35；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2）。这一发现对当时的中国古人类学家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开端”（张森水 1990：127）。当然，在此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研究旧石器时代了，但是他们只是辅助外国人进行工作。因此，选

择 1929 年 12 月 2 日，完整的头盖骨被发现的这一天作为周口店的纪念日，标志着在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史上中国人地位的提高和外国人地位的降低。^①

外国人继续在遗址上工作，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由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公布，而杨钟健和裴文中则逐渐接管了田野发掘工作。其他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仍在继续，1935 年，荷兰人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swald)在香港中药店的“龙骨”中发现了灵长类的牙齿化石。然而，直到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周口店一直是研究工作的中心地带。^②

诸多学科之父：蔡元培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民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1923 年，李济在哈佛大学撰写了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博士论文，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引入抽象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论讨论中。1926 年，在上海的刊物《一般》的 12 月号上，著名教育家和知识界的带头人蔡元培发表了一篇题为

① 此类纪念活动包括：1979 年，举行纪念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 50 周年大会；1984 年，张森水发表文章《纪念第一个直立人头盖骨发现 55 周年》(张森水，1990)。

② 关于发现与发掘工作的故事写出来只是为了招揽读者。有很多故事讲述 1941 年 12 月日本袭击英美期间，北京猿人头盖骨失踪的经过，却极少有故事描述同样有价值的头盖骨的发现经过。在 1984 年贾兰坡和黄慰文的专著出版之前，半个世纪前裴文中和安特生的文章是有关周口店的唯一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条件不甚理想的情况下，贾一直致力于该书的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贾兰坡和黄慰文 1984:2~3)。贾兰坡和黄慰文著作的英文版正在筹备之中。[英文本较中文本更为详细，已于 1990 年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书名 *The Story of Peking Man*——译者注]

《说民族学》的文章，中国人才算是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

这位北京大学的前任领导可能是中国当时的头号学者，他的这篇文章直接公开地倡导民族学，因此极具影响力。蔡元培称，民族学是一种范围很广的科学，它涵盖民种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而且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和文学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胡起望 1981：252～255）。《说民族学》反映了欧洲的文化“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之间的分野，为全面、整体论的“民族学”（或者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提供了基本原理。

由于这篇文章，当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把蔡元培看做是他们的学科领域的中国奠基者（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3）。民族学家这样认为，是由于蔡正式引入了“民族学”这一名词，而人类学家作如是说则是因为，蔡从自己对体质人类学和人体测量学以及其他人类学学科的研究中找到了研究人类学的整体论的基本方法。还没有一个学者像蔡一样，得到过像林耀华、杨堃和梁钊韬这样的人类学家的崇敬和钦佩。1930年和1934年发表的关于社会学、民族学和进化论的文章使蔡作为社会文化调查的倡导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蔡元培本人在1907年曾被派到西方去学习。当时已经年近四旬的他，到德国的莱比锡学习了3年哲学、文学、心理学和民族学。受进化学派及其研究社会惯例（practices）与风俗起源的影响，蔡回国后就倡导在“未开化”民族中探究当代文化惯例的起源。作为一门科学的民族学可以引导这种寻找“遗存”（survivals）的活动（胡起望 1981：252）。因此，蔡是尝试把中国的民族学应用于研究（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的第一个（龙平平

结合，创立了“中国语言学派”，从而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先锋。^① 由于在国外曾从事过严谨的研究工作，这些语言学家很快就投入到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

试以其时刚回国的李方桂为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李在萨丕尔门下学习语言人类学，又师从古典文学学者伯克（Carl Darling Buck）研究印欧语言学，并跟随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学习过比较语言学。他在美国求学3年获得了3个学位——1926年获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该大学博士学位^②（丁邦新1985：1~2；丁邦新1988：168；傅懋勛1986a：240）。李后来回忆说，尽管他是布龙菲尔德的得意门生，并且他的求学生涯里始终拿着布龙菲尔德奖学金，但对他的影响最大的是萨丕尔。“萨丕尔教会了他语音学、田野工作方法和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La Polla 1987：2）。回国之后，李急切地想使自己的技艺在祖国得到应用，于是先后在海南和广西龙州地区（靠近中越边境）进行了广西壮语的研究，收集到了中国首批科学的壮语研究材料（李方桂1940）。不久，年轻的学者们——像方国瑜，一位毕业于北大的纳西族青年——到了南京，加入到了李和他同事的研究行列之中。

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下设一个考古学组，由李济任组长，到30年代中期，这个组以拥有一支考古队而自豪。在1949年前的中国，这个组进行了一些最重要的考古工

① 丁邦新（1985：7）认为，在中国语言学的奠基者当中，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和林语堂可以与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并驾齐驱。

② 关于李方桂的更详细的情况，请参看丁邦新1985，1988；傅懋勛1986；La Polla 1987。还可以参考伯克利加州大学 Bancroft 图书馆“地区口述史料室”对赵元任和李方桂进行系列采访的录音带。

作，其中包括 1927 至 1938 年期间，河南省安阳商后期都城的发掘工作（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309；臧振华 1989：160）。在此后一些年里，安阳和李济在训练中国的几代考古学家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早期另外两个考古学中心分别是北平政府的另一个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其实，从 20 年代末开始，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学或“人类学”领域）和新石器时代及史前时代（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之间就有了一个明显的分野。当时这三个领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各有自己的研究组（周天度 1984：290）。

独立的旧石器时代研究体系是蔡元培于 1934 年首创的，他创立了人类学组，设想专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古生物学和人类进化研究。吴定良（他后来成了吴汝康的老师）从浙江大学调到该组担任第一任组长。吴定良自己的体质人类学知识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及解剖学家凯思爵士（Sir Arthur Keith）对吴影响极深。胡顿（Ernest A. Hooton）也是如此，1951 年林耀华的一本中文专著《从猿到人的研究》（参见本书第 5 章）就是从胡顿的著作《从猿上升》中获得灵感写成的。

相对而言，1949 年之前中国人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还相当粗略。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的工作逐渐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个时代展现在世人面前，首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继而又在东南部发现了“印纹陶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安志敏 1988：754）。

蔡元培还计划建立一个中华民族博物馆，并邀请他的朋友但采尔从汉堡来中国指导这个项目的建设。但是，和

当初计划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时的情形一样，不具备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但采尔到访的费用和完成博物馆建设，他只得退而求其次，成立了一个民族学陈列室^①（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3；李绍明 1986：29）。尽管如此，蔡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人类学科学的正式创立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在他的中央研究院里，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与考古学（以及历史学和民俗学）都得到了公众团体的鼎力支持和极大帮助，从而在中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中央研究院培养出了整整一代人类学科学未来的领导人。这些学者——例如，林惠祥、吴定良和罗常培——自己后来也培养出了几代学者，他们在蔡的基础上将人类学发展到了台湾、香港乃至全中国。现在存在于中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在台湾的相应机构，都被认为是继承了蔡元培的衣钵。

海峡两岸对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蔡对中国所作的贡献。中国学者怀念蔡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民族学家陈永龄这样诉说学者们的心声：

我们中国学术界人士赞扬蔡元培，因为他是学术活动的带头人。作为北大校长，他令学术关系民主化；他强调所有的学者和流派都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并且都应该受到尊重。^②

① 又经历了半个世纪才建成一所国家民族博物馆；到 1987 年，民族博物馆才在北京落成。

② 据 1986 年 11 月在北京对陈永龄进行的采访。并参看萧超然（1988：65，192）以及后文有关蔡元培和北大的章节。

了解了中国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执政者对待这份遗产的不同态度，了解了中国学者所经历的困扰与压抑，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蔡元培怀着无尽的景仰之情了。

焦点之二

林惠祥：梁钊韬的良师益友

在蔡元培把中国的各门科学组织成为一个有机体的同时，未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创始人也在广州走向成熟。六年的中学生活结束之后，19岁的梁钊韬于1939年秋来到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求学。他不久就遇到了仅比他年长15岁的教授林惠祥，林将梁带入他后来倾注了毕生精力的专业领域。林唤起了梁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梁从导师那里懂得，人类在新、旧石器时代生活了几十万年之久，人类正是从这些早期的阶段缓慢而又准确无误地发展过来的。“从那时起”，梁对我说，“我就成了他的学生，尽我所能选修了他开的所有课程。”^①

在进入大学之前，梁钊韬曾想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他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煤矿主，拥有一支60艘船的运煤队。梁钊韬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三位妻子，她与他订婚的时候才刚刚17岁，而他当时已经年过半百。梁钊韬是他父亲最小的孩子，排行第十四。父亲想让这个最小的孩子——他的第八个儿子经商，因此他让梁学习基本的经商技巧，比如使用算盘等。梁钊韬不久就对算盘和经商感到厌倦，

^① 1986年7月21日，广州的采访。在1986年期间，我对梁钊韬进行了一番详细的系列采访。

这令父亲很感失望；他认为梁和他的哥哥们不一样^①，不擅经商之道，于是允许他去求学。梁钊韬决定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帮助自己的父亲，所以决定学习采矿技术。

然而，梁钊韬没有想到两位老师的说服力会令他难以抗拒，在他的一生中，他们都在不断地激励着他。民族学家林惠祥和考古学家郑德坤激发了梁钊韬新的兴趣爱好，在厦大的一、二年级期间，他的精力都消耗在这新的兴趣爱好上（庄益群 1991：2）。在老师的指导下，梁开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同时，他本人也被人类进化理论强烈地吸引住了。50年后，梁钊韬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从那时起就一直影响着他的两本书：《化石人类学》（一本日本著作的中译名）和奥斯朋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对人类学的狂热，激起了梁系统研究史前社会和社会进化的欲望。

林惠祥本人是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留学期间喜欢上人类学的。在新创立的厦门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之后——他是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届毕业生，林来到这个美国殖民地的首都攻读人类学硕士。他在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始人拜耶（Henry Otley Beyer）门下学习。本世纪初，拜耶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人类学和考古学。他在菲律宾大学讲授当时美国人类学的理论、实践和准则，特别将重点放在人体测量学方面。因此，林学到的课程也是美国学派的，带有美国特色。

今天我们赞誉林惠祥，是因为他系统地引进了西方人类学，特别是美国人类学，并且编撰了包含该学派传统的

^① 他的一个哥哥后来对中大也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使梁在80年代获得了他当时的职务，并帮助中大在校园里盖起了一座礼堂。[即指梁铨珺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大礼堂——译者注]

教材。1928年从菲律宾大学回国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专著《文化人类学》，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与克鲁伯（Kroeber）的《人类学》差不多。《文化人类学》成了传统教材（陈国强 1985a：1），直到现在，学者们仍然觉得它有实用价值。林同时还积极地倡导给四大学科应有的地位，他是美国模式人类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①

厦门大学成了他进行研究、施展影响的地方，因为林惠祥在蔡元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结束之后就回到了厦大。他 1928 年回国后就加入这个研究所，可是不久之后，他又接到一个任务，让他回母校的社会学系（当时已成历史社会学系；陈国强 1985a：1）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在一段时间里，（如果工作日程允许的话）林就在南京和厦门两地之间奔波，但是，他与故乡福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南京实际上没有吸引力。他的根据地在福建，厦门于是成了中国的美式人类学的中心。

林惠祥对福建畬族、台湾高山族和西南彝族进行过研究，对华南和东南亚的联系有着强烈的兴趣，这导致了他 30 年代早、中期出版了大量重要作品；这是他最多产的时期。1929 年和 1935 年，他两次赴台湾，只是去日占区进行田野调查遇到了一些阻碍，除此以外一切都很顺利。在赴台期间他收集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和高山族的材料（陈国强和林嘉煌 1988：2）。考古学和民族学并重是他典型的工作方式，由此产生的他的重要学术著作，如《中国民族

① 为了强调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学家们 1986 年 11 月向我展示，林惠祥著作中大多数的参考书目都来自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认为四大学科指的是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志——在一、两代前的 1892 年，美国人类学界的先驱 Daniel G. Brinton 也作如是说（Brinton 1892；蒋炳钊 1987：279）。

史》^①，也为他的学生创立了一种能动的、整体论的人类学模式。

早在 1934 年，林惠祥就开始着手他毕生为之努力的项目——建立一所人类学博物馆（蔡元培和他不一样，他的兴趣在于建立民族学博物馆）。他构思了一个以四大学科为框架的博物馆，为此他成立了厦门市人类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将他自己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收藏品拿出来作展品。1949 年这所成熟的人类学博物馆终于竣工了，此后它继续实践着四大学科一体化的方法；在一代多的时间里，它是中国惟一的一所人类学博物馆。

直到他 1958 年逝世前的近 30 年间，林惠祥一直是厦门人类学界的焦点，他影响了两代人类学工作者。他的两位最杰出的弟子，厦大的陈国强和广州中大的梁钊韬，是中国 1950 年以后率先成立的两个人类学系的创始人。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林的一些学生也深受他的影响，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也很少有人成为这些领域的重要人物。

林惠祥在 1937 至 1945 年战争的紧要关头离开过中国，这使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1937 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林没有和厦大的其他教职员工一起去往内地，相反地，他带着自己收藏的大量文物去了东南亚，以防止它们遭到日本人的掠夺。战争结束，加上东南亚限制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林又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回到了厦大。

不过，梁钊韬却没能在厦门迎接他。1937 年抗日战争刚开始，林惠祥就亲自带着梁回了广州，把他介绍给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并推荐梁到中大的历史系学习。杨同意了。是年 9 月，梁进入中大学习。

^① 这本著作（以及他的《文化人类学》）最近刚在中国大陆重版，而在台湾却很容易读到。

第三章 外国来访者

功能主义来到中国

再回过头来看看北京，与此同时，功能主义正在进入中国。到30年代中，大学里的人类学指的是社会人类学，北京、同济、金陵、中央、清华和燕京等各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功能学派在云南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已经有了牢固的阵地，不过，这一新兴的思想流派在燕京大学表现最为突出（李绍明 1986：32）。

燕京大学一向乐于接受外国思想。它与哈佛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由美国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管理和投资的（黄绍伦 1979：15）。燕京大学有一半的教员是外国人，1919年该校成立社会学系，创始人是步济时（J. S. Burgess），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人。步济时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很引人注目，他曾与甘博（S. Gamble）合作，在北京进行综合性的社会调查（阿古什 1981：28；黄绍伦 1979：12~13）。30年代初，在早期的3个社会学系里，中国教员开始取代外国教员（黄绍伦 1979：20）。这种教职人员的中国化并不表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已经中国化了。正好相反，这些系里的教员中有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忠实地将其外国

老师的思想和方法照搬到了中国。黄绍伦告诉我们，美国取向是当时中国教会学校的典型方式，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学系都是如此。黄将这一时期称作“传教士社会学”阶段，他指出，传教士引入中国的社会学很少考虑中国的国情：

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用美国教材授课，几乎不作什么改动来适应中国的国情。因此，交给教师们的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中国学生要克服用英语阅读的语言障碍已经够难的了……更糟糕的是，美国的课本是在外国事例和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老师们还得带学生去走这些外国事例和经验组成的迷宫。

费孝通在他与张之毅合著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的引言中回忆了他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特别提到那里始终原封不动地采用美国的模式：“我们从讲述芝加哥的团伙和美国的俄罗斯移民的书本中学习知识，却对中国城镇的士绅或乡村的农民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因为书本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①（费孝通和张之毅 1945；viii）。

留学海外越发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因为回国的人抱定

^① 有关费的文章和书籍有很多，他可能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社会科学家。1981年，阿古什（Arkush）写了一部全面的费孝通传；1988年，《现代人类学》发表了对费的一次详细的采访报道（巴博德 [Parsternak]）。还可以参看下列资料：Mcgough 1979a，再次发表的关于费的文章以及他本人的文章，黄绍伦 1979，以及 Sanchez 和 Wong 1974。

决心要在中国传播他们在海外学到的教育之道。^① 只要想一想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体制背景，就不奇怪何以清华和燕京之类的学校会成为西方社会科学思想流派的传播中心。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在国外跟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厄斯等人学习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他回国后先后任燕京大学讲师和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向这些学科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同时，吴文藻还在发展燕京大学乃至全中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吴在校友潘光旦的劝说下出国去达特默思（Dartmouth）求学。吴在达特默思学习的生物、化学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予以他的影响颇深，他后来也让他的学生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研究。进化论思想也从中起了作用（吴文藻 1986：79）。

1925年，吴离开达特默思去哥伦比亚深造。那时，人类学已经开始对他产生影响。他选修了博厄斯的人类学概论，还记得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常替她的教授去上课。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他聆听了戈登威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关于“早期文明”的演讲，并结识了这位极富口才和鼓动性的导师本人。吴参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讨论和讲座，丰富了他的人类学知识；他开始意识到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应用的必要性（吴文藻 1986：80）。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1929年2月，他完成了博士研究

^① Clausen (1989: 10) 叙述了一位曾经留学海外的学生对“归国留学生”与老一代儒家学者们的教学所作的辛辣对比，“大学里的老师们美国长、美国短的。他们吹捧美国的口气和老学究们赞美尧、舜、禹之类圣君没有什么两样”。

生的课程，载誉回国^①（吴文藻 1986：81）。

不久吴文藻就在燕京大学担任了社会学系的主任，该系有两个教研组：分别研究社会理论和社会工作，不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这两个组里得到应用。尽管在系里的花名册上没有中国籍的人类学正教授，却有外国教授不定期地到那里讲课。芝加哥大学多年来向该系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的访问学者，包括派克（Robert Park，1931～1932年度访华）^②和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948年访华）以及在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Briton Archibal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1935年访华；赵卫邦 1979：103）。

1935年是“将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系统地引入中国”的第一年（赵卫邦 1979：100）。在吴的邀请下，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束了他在日本的短暂停留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几个月的访问教授。^③他为学生和教员举办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讲座，并讨论它们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他倡议在中国农村进行为期一至两年的实地研究^④（乔健 1987a）。

-
- ① 在哥伦比亚，吴文藻还在著名的社会学家季廷史（F. H. Giddings）和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的门下学习过（阿古什 1981：30）。
- ② 社会学系出版了一个刊登派克的演讲和论文的专号以纪念他的访华。据 Sanchez 和 Wong 说（1974：776），费孝通从那时起开始知道派克，而阿古什则告诉我们，费自己承认，他“崇拜”派克，并且对他有相当深刻的印象（阿古什 1981：32）。
- ③ 许烺光称，燕京大学当时拥有全中国最多的社会学的教师和学生（许烺光 1944：13）。
- ④ 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这类研究可以使社会人类学家全面地了解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情况错综复杂的国家（黄绍伦 1979：29）。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功能学派的学者都没能解释如何运用一个地区的个例来说明整个国家的状况。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到访对与他接触过的师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文藻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林耀华和李有义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林耀华还担任过这位优秀的外国学者的助教。后来林在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一个父系村庄里进行田野调查，就是运用了这位导师传授给他的方法，用“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料（乔健 1987b）。

在那一年底，吴文藻写了一篇关于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的论文（1935年），称功能主义是人类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代表着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流派（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9）。吴自己详细地分析过西方人类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理论，并将它们排除在外，因为这些理论不是不能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是不实用。他认为有了功能主义，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才最终获得了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龙平平 1988：203）。吴希望功能主义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中国青年人选择的理论构架^①（黄绍伦 1979：30）。

次年，在吴的指导下出版了几本欢迎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和赞扬功能主义的专刊、著作和论文。这位英国人刚被派到燕京大学后不久，吴的系刊《社会学界》就发行了一个专号以纪念布朗访华，其中包括一篇介绍功能主义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对该领域贡献的长文。^② 受英国功能

① 在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吴文藻的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中，国民政府对左派及左翼主义的压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退出了大学校园（黄绍伦 1979：36）。

② 这本刊物是 30 年代将功能主义引入中国的主要出版物（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8）；该刊物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吴文藻负责主持。

学派的影响，吴不久后声称“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的一分部，应用到原始部落上的一分部”（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6）。

1936年，吴文藻访问欧洲和美国，继续建立与外国的联系。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得到到美国和西欧去考察 1936～1937 学年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情况。吴文藻同时还安排自己以燕京大学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哈佛大学 300 周年校庆。同一年，吴还到巴黎去了一趟，在这次顺道旅行中，他会见了法国汉学家莫斯（M. Mauss）和民族学家布尔（Charles Bougle）（吴文藻 1986：88）。在哈佛大学 300 周年校庆会上，吴遇到了另一位功能学派的同行马林诺斯基（阿古什 1981：41）。在回国之前，他与马林诺斯基会面，邀请他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样到中国去举办讲座。然而，次年战争爆发，马林诺斯基未能成行。吴还邀请了耶鲁大学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青年学者阿伦斯伯格（C. Arensberg），也因为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而未能实现（吴文藻 1986：83）。

回国后，吴积极地倡导“社区研究”，使之成为功能主义在中国应用的途径。早在 1931～1932 年，派克在燕京大学访问时就针对为什么要进行以及怎样进行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作过指导^①，那时燕京大学新成立的社会

^① 派克激励了很多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去探求与他的城市社会学流派相类似的领域。他希望学生到户外的大街上去研究北京的城市生活，因为“他在意的并不是社会考察的数量”（阿古什 1981：36）；他热衷于参与观察形式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这启发了像吴文藻、费孝通之类的学者去致力于这一学科（阿古什 1981：31～36；巴博德 1988：639）。

学系就开始考虑进行田野研究的问题了^①（赵卫邦 1979：101）。到 1937 年，吴文藻相信功能主义能适应中国社区研究的需要，因为功能主义是整体论的，它也不存在博厄斯派和美国的历史特殊论由于过分强调文化上的细枝末节而削弱了自身的影响力的问题——罗维描述文化的名言（也是常常被误解的）：“破碎补缀的文化”使吴对这两个学派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吴文藻 1986：86~87）。吴将美国人类学学科视作是英国人类学与美国社会学的混合体，他将其抛到一边，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未来与功能主义联结在一起。

于是，吴文藻竭尽全力说服他的同事和学生加入到进行实地社区研究的田野工作队伍中。林耀华和费孝通都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前后只相隔一年，都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1935 年林耀华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一直极为活跃——他为《社会学界》和《社会研究》一类刊物撰写或翻译文章，并担任助教，自己培养学生。吴还派林耀华到福州地区去研究那里的宗族结构，直到 1937 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之前，林一直在进行田工作。

吴文藻派费孝通到广西和江苏去从事田野调查，并指导他将功能学派的重要专著，如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On Cultures*）和弗思（R. Firth）的《人文类型》（*Human Types*）等译成中文。正当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为学生们举办讲座的时候，费孝通与他的同事、妻子王同惠一道动身去广西省研究那里的瑶族。这次田

^① 推进田野调查的更早的动力是葛学溥进行的具有农村社会学传统的先驱性工作。葛学溥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副教授，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和教授（黄绍伦 1979：28）。

野调查以悲剧告终——王在费受伤后去求援，结果遇难身亡。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这次田野调查的专著（由吴文藻撰写前言），总算使他们的努力没有白废（王同惠 1936）。费接下来的一次田野工作是在他的家乡江苏省的一个汉族村庄里进行的。他最著名的著作《江村经济》（亦即《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根据那里的情况写成的，该书英文版于 1939 年出版。^①

在华的外国人

到了 1936 至 1937 年，仍然有外国人到中国来进行田野调查，其中包括奥古德（Cornelius Osgood，参阅他的《旧中国的农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1963）和霍真（Reo B. Fortune），——他“率领一群人去调查粤西北的八排瑶地区”（乔健 1987b：8）。国际知名的传播论的创始人施密特（Wilhelm Schmidt）也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学，却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王恩庆和李毅夫 1986：397）。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一样，施密特在辅仁大学也用他那流派的理论影响了当地的学生和学者们，不过，这一次施展的是传

^① 吴文藻还忙于给其他人分派田野调查任务，比如，他将李有义派往山西研究那里的农村社会组织（吴文藻 1986：85）。同时，其他的社区研究工作报导也面世了，如杨懋春对台头村的报导（1945）和许烺光的西镇（West Town）报导（1949）。吴文藻后来写道，当时他认为这些研究对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半个世纪后再回顾一下，他意识到强调文化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很多基本点，如阶级结构等（吴文藻 1986：86）。

播论。^①

很自然，外国学者们的访华由于 1937 年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但是从 1949 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起，他们又陆续来到中国。其实，早在 1948 年秋，就有外国人类学家以访问教授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大学里。雷德菲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于 1948 年秋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住在拉德克利夫-布朗 13 年前曾经住过的校长公寓里。他在北平逗留期间，由陈永龄担任其助手，陈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在中国时的情形。雷德菲尔德 12 月染上了疾病，陈负责安排送这位美国教授、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全部离开北平。几天后，攻入北平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就解放了燕京大学。

然而，民族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并不是这些 30 年代或 40 年代在中国作短暂停留的来访者，而是一位以中国为家的外国人——史禄国。^② 史曾于 1912~1913 年率领过“沙皇中国东北考察团”。在俄国 1917 年革命后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几十年里，他成了影响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体系形成的重要力量。作为一名通古斯和满族问题的专家，他留下了大量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资料，除了民族学方面的，还有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方面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十多本他的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语言人类学的著作，包括《华东及广东省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1925）

① 这一时期在中国短暂停留的人还有：C. G. Seligman, Eliot Smith, Richard H. Tawney, Karl Wittfogel 和 Leslie White (许烺光 1944: 13; 黄绍伦 1979: 20)。

② 在中国长期居住、影响过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其他外国人有“英国学者 H. R. Davies, 法国传教士 F. Schram 和丹麦研究者 Jacobsen” (黄绍伦 1979: 80)。

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1929)。

史禄国最初在中山大学任教，后来到了蔡的中央研究院，接着又于1929年来到当时刚刚建立的国立清华大学，并协助成立了社会学系。清华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是第一所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国立大学（王康 1981：7）。由于得到部分“庚子赔款”的资助，再加上学校有美国教授任教，还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清华与燕京大学一样，在教育上受西方标准的影响颇深。^①

随着史禄国的到来，社会学系在自己的正式名称中加上了“人类学”的字眼，并开设了人类学的课程；这个社会人类学系是中国第一个在名称中加入“人类学”的系。不过后来系名又改成了“社会学系”，其组织形式也变成了3个组：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史禄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惟一的一名人类学教授（卞僧慧 1986：7）。

人类学是该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田野工作中，史禄国都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将人类学看作是一个充分整合了民族学与语言学及体质人类学的学科。杨成志在中大的时候从史禄国那里接受了这种教育，又将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半个多世纪以后，杨又在我面前重复了这一课。史禄国在20多年里始终唱着同一曲调，直到他1954年在北京逝世。（原文如此，据查另外的资料，史禄国的卒年为1939年——译者注）

费孝通与史禄国的关系远远出乎许多人的想象。费自

^① 1908年美国作出决定设立“庚款基金”，将中国赔偿美国政府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所受损失的款项余额用来设立一个中国留美人员学术基金（Spence 1990：283）。

己坚持说，尽管有关他的宣传都说他是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从事研究的，但是，他的俄国导师而非波兰导师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他教会了我怎样成为一名学者；他对我的影响力最大”（费孝通 1989）。甚至连由马林诺斯基撰写前言，并且经他督促在伦敦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也是费在赴英国之前完成的，史禄国的意见于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能是想作一个公正的叙述，或是稍稍平衡一下，费又强调说，马林诺斯基只是他的老师之一，派克、雷德菲尔德、史禄国以及马林诺斯基都对他产生过影响。史禄国是费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费坚称自己是史禄国惟一的衣钵传人。作为这位老师昔日的弟子，费用相当夸张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导师：

他是一个强硬、专制的人。极端地强硬和具有威慑力。知识渊博；他的知识极其丰富，我无法完全理解他所告诉我的东西。他无所不知：人类学、生物、体质人类学、代数和语言学。整体观对他来说只是普通常识。他知识渊博，思维敏锐，超乎我的想象；像一本百科全书。我太年轻了，理解不了他；我只有 23 岁。史禄国是在德国受的教育，他的标准相当高。他对我的训练很严格。（1989 年 12 月的采访）

史禄国为费制订了一个长期研究计划：两年的体质人类学训练，两年的语言学训练和两年的“心智 [psychomental]”（文化）训练。费事实上只完成了第一个两年研究计划，他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清华通过的第一篇人类学方面的论文（阿古什 1981：40），实际上是关于体质人类学的，其中运用了大量的人体测量材料。费对我说：“我每天必须处理大量的资料，却不能借助任何现代化的

设备，如计算机等。”但是他有自己的实验室。“每天晚上史禄国都会去我的实验室。我们俩每人都有一把实验室的钥匙，当我不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自己开门进去检查我的工作情况。他总是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重做’，却不指出我的错误。他只告诉我要重做。”

许烺光是当时认识史禄国的另一位中国学生，但他对史的看法中没有像费孝通那样多的溢美之辞。在辅仁大学担任助教期间，许也选修了史在清华的课程。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没有太深的印象；许对我说，

（史禄国）对通古斯很着迷，对别的却是一无所知。他是一个相当专断的老师，也很有威慑力。有一天，我甚至与他起了争执。一次课后，我走到他面前去请教一个问题，我一开始就称他为“史禄国先生”，而不是“史教授”或“史博士”。史对我的提问置之不理，只是很傲慢地问道：“谁告诉你可以称我为‘史先生’的？”

然而，对那些与之相处融洽的人来说，史对他们的帮助相当大；正是史安排了费跟随包括马林诺斯基在内的其他学者学习。他十分爽快地派费去跟着马林诺斯基学习，因为史尊重他；而其他人类学家却没有被他放在眼里。^① 1936年，费孝通漂洋渡海去了伦敦。

^① 费孝通对我说，他这位过去的老师对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鲁伯评价不高，史禄国认为他总是在讲“废话”。史与其他两位当时闻名中国的欧洲人施密特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关系也不甚融洽。1935年底，这几位都在北京，“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这3个人聚上一会”（许烺光 1944：13~14）。

学术领域之外的发展

中国学术界人士希望，费孝通等中国人出洋去学来的社会科学能够有助于中国的强盛和“现代化”。蔡元培极力主张，将民族学引入中国并不是要在学术领域内增添一门新学科，而是要运用它来制订更完善的社会政策。许多具有这种革新思想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中央和地方机关任职。博厄斯派的孙本文 1930~1932 年期间任教育部长，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许仕廉在 30 年代中期担任了大量的社会职务，包括“银价与物价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Silver Values and Commodity Prices）的主席一职（黄绍伦 1979：23）。

许多社会学系都协助政府拟定规划（赵卫邦 1979：101），也有不少人类学家在政府各部委供职。例如，1936 年，这个国民党统治的国家的国内事务部决定进行一次民俗考察，就将制订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民族学家卫惠林、凌纯声和徐益棠。1937 年夏，调查表格准备就绪，调查工作也即将开始，可是抗日战争爆发，研究工作被永久性地搁置了。假如它没有被取消的话，法国民族学派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可能会大得多，因为这 3 名制订计划的人都是该学派理论的主要拥戴者（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5）。

上述这些就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成立的背景。在西方的同类组织成立了一个世纪之后（法国 1839 年，美国 1842 年，英国 1843 年）的 1934 年 12 月 16 日，中国才首次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成立了正式的民族学会，到场的首批成员还不足 50 人（陈梓权 1989：5；李绍明 1986：32~33）。该学会两名重要的奠基人孙本文和黄文山来自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是博厄斯从前的学生（龙平平 1988：

197~199)。

南京是中央研究院下属的许多重要研究所的所在地。蔡元培和吴文藻是新成立的学会的主要支持者。中央大学(后更名为南京大学)当年秋季首次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学课程,对新任务的热情很高。支持这些新的组织安排与吴等人的设想分不开,吴等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理应成为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金天明和龙平平 1986: 29)。

他们打算出版一种杂志《民族学报》,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只得放弃这一计划,不过,还是出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刊物。1937年的战争使得学会的活动突然中断,其成员不久也各奔东西。尽管战争期间分散在各地的成员设法编过几本社会学的刊物——首先是在昆明,然后是在成都,但是从那时候起,这个学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 296; 李绍明: 1986: 33)。

抗日战争前夕

到了1939年,人类学科学已经趋于成熟。古生物学和民族学的培训及田野调查正在蓬勃发展,中国的课堂里充斥着外国教师和外国思想。到处都在使用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一词,那时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人类学”最初在大学里使用的时候指的是社会人类学,而在地质调查所及其新生代研究室里,“人类学”一词明确的含义是古人类学及对人类起源的探索。

上述地方都有外国教师的足迹,在他们的监督下培养出了整整一代中国学者。先是步达生,然后是魏敦瑞(他是在步达生1934年犯心脏病后来中国的),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而在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方

面，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史禄国开创了学术讨论的风气。作为他们的学生，林、费和杨不仅吸收了自己导师的知识，而且还超过了他们。魏敦瑞的学生们也一样，如魏的助手贾兰坡，他们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并成为该领域的大师。^①

然而，是年夏季的对日战争戏剧性地改变了学术界的状况。大多数外国人回国去了，留下中国人去面对更多痛苦的转变。中国学术界的自我陶醉在日本炮弹的轰炸下烟消云散，当年盛景已然面目全非。

① 中国人对知识领域的帝国主义和文化上的自大等问题的敏感性也反映在贾兰坡传的用辞上。传记提到贾曾在周口店任裴文中的助手，却矢口不提他也给魏敦瑞当过助手的事（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653）。[不过，在 1999 年上海出版的《德日进集》中，有贾的题词，饱含深情地称这位外国人为“我的老师”——译者注]

焦点之三 中山大学与杨成志

暑假期间中日战争爆发，梁钊韬的家人决定，下一个学年不要让梁和厦门大学一起疏散到内地。为了离他在香港的家人近些，梁钊韬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林惠祥亲自将他推荐给了人类学部主任杨成志。后来林离开中国去了东南亚，梁还是杨的忠实弟子。

杨一刻也没有耽搁就让这位从厦大转来的大三学生开始了工作。梁和杨一起开始对“蛋家”（也叫“船民”）^①进行田野调查。梁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那年年底，他着手调查广州的佛教寺庙——斋堂，从而开始了对佛教和道教的研究。^②

在那个学年末，日本的进攻使中山大学的大部分人员都撤离到云南。这一次梁与师生们一起行动，于1938年夏到达了云南澄江县。然而，梁的学习进程并未中断，次年春季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写了一篇4万字的毕业论文，分析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在此期间，他父亲在广州的

① 后来更名为“水上人家”，以避免使用含有蔑视口气的“蛋家”一词。

② 梁将这种斋堂视作是一种“未婚女子的组织”（个人交流），因此，他可能是最早调查广东抗婚形式的社会结构的人之一。

家中去世，兄弟分家。从那时起，梁就随寡母生活（庄益群 1991：1）。

尽管杨成志并不是中大惟一一位影响了梁钊韬的老师（比如，梁还跟随罗香林研究过民族史），然而，他却是梁重要的良师益友。因此，当梁那年秋季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杨继续担任他的导师。杨计划让梁与他一道研究云南本地的少数民族，以此作为他硕士论文的选题。

然而，梁患上疾病，错失良机。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转而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撰写论文，并于 1940 年秋随学校其他人员一起搬往粤北的坪石。梁的学士论文重在分析外国理论家的思想，硕士论文则是在运用国外宗教理论来分析古代中国的资料（包括神话）的基础上完成的。“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中国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是梁在其学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 15 次修改完成的。^① 张寿祺当时还是个本科生，他记得作为研究生的梁“总是在学习”，并将他描绘成“一个相当沉静的书呆子”。1941 年 2 月，梁将自己的论文交给了指导教授。

杨成志当时仍然是中大研究院人类学部主任及研究院的秘书长。他是几年前到中山大学的，此时他已经树立起了自己作为人类学主要倡导者的形象。杨是广东省海丰县人士，他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彭湃是小学同学，从 1911 年起他去往广州，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和中学，1927 年毕业于岭南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投身到当时伟大的政治斗争中，参加了 1925 年的香港海员反英大罢工和香港及全国的联合抵抗运动（杨成志和田晓岫 1986：1~2）。

^① 这部手稿在 1989 年梁逝世后才发表。由于此书参考了进化学派、博厄斯派、涂尔干社会学派和传播论等多种理论，故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梁钊韬 1989）。

毕业后，杨成为刚成立3年的中山大学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不久，他就响应中大和蔡元培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的联合号召，和史禄国教授夫妇一道去云南彝族地区从事民族志及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在中大的时候，杨就已经被派去担任史禄国的助教，这位俄国人很快就表示了对他的学徒在民族志方面的才能的赞赏。他们在云南逗留了一个多月，然后史和杨去了四川省大凉山地区，对彝族作进一步的研究（杨成志和田晓岫 1986：2）。

然而，这一次彝族的奴隶社会及其原始状况似乎令史禄国感到恐惧（至少杨对我是这么讲的）。^① 杨却没有被吓倒，当其他人返回广州之后，他还独自一人留在那里。杨和彝族人共同生活两年，学会了讲他们的语言，还能阅读和书写复杂的彝族文字。他们很快就“接纳”了他，甚至连他的精神也被看作是从彝族承袭来的。后来，杨在自己对不同的彝族群体的宗教习俗、“迷信”、社会历史、语言及社会组织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三部专著。^② 现在人们认为，杨在当地的长期逗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罗致平 1986：488）。

杨成志返回中大后不久，邹鲁校长就安排他去法国深造。1931～1935年间，杨周游了世界，除了活动的中心巴黎外，他还到过南洋群岛、英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1934年，他作为中国仅有的3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

① 1986年11月在北京的采访。

②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和《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

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及民族科学大会”成立会议。^① 杨能够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并能阅读德文；他用法语写成了关于彝族语言的分类及文字体系的论文。这篇论文批评了西方人对彝族的错误看法，后来于1935年发表在《人类》(Man)杂志上。

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外甥莫斯是杨在巴黎时的老师和顾问。和杨早先的师傅史禄国一样，莫斯对杨强调史前史、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对全面理解民族学的必要性。经过一段时间在法国民族学派的发源地吸收了该学派的规则和观点之后，杨于1934年获得人类学院(l' Ecole d' Anthpologie)的高等文凭，又于1935年获得巴黎大学的民族学博士学位(民族研究委员会编1940: 437)。尽管杨承认自己受到过克鲁伯和其他博厄斯派思想的影响，后来还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但总的来说，早些年在法国的求学生涯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直到1991年5月逝世之前，他一直把在法国获得的毕业证书挂在客厅的墙上。

经过6年的田野工作和留学生活之后，杨最终又回到了中山大学，他从前呆过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已经不在那里了——蔡元培将其转到了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名下。杨这次进了历史社会学系，并在教学大纲中正式添入人类学。杨担任研究院的秘书长，他在该院成立了一个人类学部，旋即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学生。他很快就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整体论的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1936年12月，研究

^① 另外两名代表是吴定良和欧阳翥(陈国强1990b: 6)。许烺光也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不幸的是，只有三个人会见了这位资历甚浅的学者：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他的导师弗思，和“一位曾在沈阳居住过的欧洲女士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她只是想再见到一张中国面孔！会议过后她带我去共进晚餐”(许烺光，个人交流)。

生江应樑和王兴瑞与他一起在粤北的瑶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此期间他们搜集到了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的资料（周大鸣 1985：137）。

杨认为，在他 1935~1949 年期间培养的十来个学生当中，梁钊韬和江应樑是最出色的。江比梁早两年进入研究院，是该院第一届毕业生；与梁对广东人类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一样，江应樑后来在云南人类学的发展中也起了带头作用。^① 杨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在广东进行田野调查，战争期间，他又在云南、粤北和其他地方进行瑶、彝、苗和黎族研究。

甚至在杨不能和学生一起进行研究了以后，他还是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田野研究工作。江应樑被派往海南岛研究那里的黎族和苗族，还到云南西部去研究傣族。他 1938 年春回到中大，在历史系教中国民族史（江应樑 1986：71；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153）。梁同样也被派到粤北研究瑶族，另一名研究生王兴瑞到海南岛去对黎族进行长期研究。

教育部给了杨成志一份到美国去担任访问教授的美差。他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其他的少数民族；他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与赫斯科维茨、克鲁伯、罗维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有了接触。在纽约期间，他与当时仍然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韦斯勒（Clark Wissler）的关系尤其融洽。韦斯勒让杨在博物馆呆了 3 个月，让杨随意使用他个人的办公室和资料，并满足杨的每

^① 作为一名年轻人，江应樑完全知道如何创造有利于该领域发展的合适的条件。在昆明的学者告诉我说（1991 年 1 月），江从中大毕业回到云南后，娶了一位有钱的官僚资本家的女儿。他得到了一大宅房子和服侍他生活的仆人，当上了县长，还让他的岳父支付他在整个云南调查的全部费用！

一项研究请求和需要。杨被韦斯勒的友好感动了，后来韦去世后，杨还发了一篇中文的讣告。

杨成志 1946 年回到中大后立即开始说服中大成立人类学系，自己出任系主任。杨在美国的逗留使他汲取了一种动态的人类学模式；他承认受罗维（尤其是他的《文明与野蛮》）和韦斯勒的影响特别深。当我 1986 年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书架上摆着 100 多本罗维、林顿、雷丁、施密特、博厄斯、戈登威瑟、克鲁伯等人的人类学经典著作，从中不难看出他 40 年代所受的影响。如果说他最初在中国代表了法国的民族学派（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2），那么到了 40 年代末影响他的则是博厄斯学派和美国学派。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系统地发展法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①

杨成志同时还是影响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指引了整整一代学者在探索人类学的道路上前进，他的年轻的同行们继续他的工作，在华南建立了人类学及民族学中心。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的系主任王辅仁总结道：“他是南方最优秀的。”^②

当然，杨成志也影响了他年轻的研究生梁钊韬。梁还清晰地记得他的老师是如何介绍各种学派的——从达尔文、泰勒和进化论学者的理论，到传播论者、功能学派及历史特殊论者的理论——他总是要着重强调涂尔干和莫斯。梁回忆道，杨不承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学派；他只是想“客观地介绍所有的学派——实际上，我认为他多半是个

① 此外，杨成志在中国的民俗研究方面也有建树（周大鸣 1985）。杨和林惠祥、钟敬文一道提高了民间文学、神话和传说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这些可以赋予古代和现代文化想象力。

② 在其他人看来（如，周星 1989），可能还包括云南的杨堃，对杨堃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博厄斯派。他和费孝通不一样，费公开宣称自己是个功能主义者”。

梁钊韬上研究生期间最感兴趣是他所称的“三大学派”：美国的博厄斯、克鲁伯和戈登威瑟学派，强调历史学和心理学；泰勒、摩尔根和斯宾塞所代表的进化学派；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学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梁认为这三个学派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一个人谈及历史发展，进化理论或许就有用；如果讨论当代的问题，也可以运用历史特殊论严谨的方法论的观点；如果分析特定的当代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各种习俗的社会功能。这种折衷主义在他的同学当中十分普遍，在梁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也有所反映。^①

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梁接受了教授的建议，到粤北的6个县从事瑶族的田野调查。迫于日本军队的压力，学校已于1940年迁到了坪石，距离瑶族居住区很近。梁在瑶族地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全面的民族学调查，研究那里的宗教、经济、领导结构和生态状况。学校设法让省政府从中协助该项目，为梁提供了向导和翻译。省政府领导和当地的军事长官本人都对研究感兴趣，他们都为梁的工作提供方便。梁称，瑶族人对他也很有友好，因为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一名没有恶意的学者。

梁主要研究八排瑶。为了对该地区进行普查，他住进不同的排的村子里。每到一个排，他都由不同的一名翻译

① 四十五年之后梁钊韬重新列出了一张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他指出了下列重要作者及其作品：(1)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2) 泰勒的《原始文化》和《人类学》；(3) 克鲁伯的《人类学》；(4) 戈登威瑟的《历史、心理和文化》；(5) 博厄斯的《普通人类学》；(6) 英国大百科全书中马林诺斯基的文章“文化”；(7) 弗雷泽的《金枝》和《巫术》。

和一名向导陪同，3个人和当地的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往往是睡在地板上。在广东北部各县的活动使梁对土地、经济和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了大量的结论。这类分析中，有一篇论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村庄的居民超过300人。了解了瑶族当时的技术和生计策略之后，梁发现：要保证人们可以在住处与劳动地点之间往返自如，此地区所能容纳的人口便不能超过这个数目。

梁钊韬还注意到了汉瑶之间的互动。政治方面，他发现了当时瑶族中流行的两种领导方式。一种他称作“瑶老”，是本地原有的、以氏族为基础的民主领导方式；它对婚姻安排、土地纠纷、用水权等都有调整作用。另一种他称之为“瑶长”，是清初向外面汉人学习并引入的领导方式；这种方式代表的是政府利益，瑶长充当的是“排群体”与外界当局联系的中间人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瑶族语言，也可以从专门词汇的内容上看出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对当地宗教的研究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对梁来说当地宗教似乎是瑶族的有灵崇拜、妖物崇拜与汉族的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的混合体。

他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经过与汉族几百年的接触，到40年代初，八排瑶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研究的所谓瑶文化与从前没有被汉化的瑶文化两者差异甚大。1943~1944年间，日本军队攻打粤汉铁路沿线，使战火蔓延到了粤北，田野调查被迫中断，不过梁还是设法在1943年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田野工作的文章。由于轰炸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再加上敌人在这一地区进行扫荡，致使梁所有这些年来在瑶族地区千辛万苦收集到的资料都丢失殆尽。

日本军队在战争末期进行反扑，使得很多学校和学者不得不再度转移。梁搬到了位于内地的四川成都（1941

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梁的母亲和部分家人也迁到了四川)。中大的其他人都分散到广东各地及邻近的省份。在成都，梁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职，这是一所美国新教差会办的学校。大学的博物馆里分设有各自独立的考古学部和民族学部，梁被任命为民族学部主任。

在那里梁遇到了他从前在厦大时的一位教授郑德坤^①，他当时是博物馆的馆长。梁做了他从前的历史老师的研究助手，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他和郑编纂了一本关于西南各民族的原始资料集——《西南民族志》，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体质特征。梁在成都还遇到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学者、中国民俗学的先驱之一顾颉刚。20年代顾是中大的教授，后来北上去了北京的燕京大学，战争爆发又使他西行到了四川。梁与顾合编了一本合刊《文史集志》，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面世。

^① 郑德坤也从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49年后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考古学中心主任。

第四章 中国西式人类学的成熟

抗战年月

经常的颠沛流离，间或也有相对的平静并能进行学术研究——梁钊韬的经历代表了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中国学者的经历。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明显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及其附近地区——北京、南京、广东、上海和厦门，但是到了1937年，中国的学术中心开始西移。由于教职员都迁往战火还没有蔓延到的地区，因此开始在内地的大山里建立起人类学中心。有时候整个机构都要连根拔起向西迁移，中央研究院李济领导的考古学组就经历了这种命运^①（刘延寿和冯志毅1986：309）。

吴文藻在1938年迁往西部，不久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当费孝通该年年底从英国回来之后，在吴的

^① 一些教会大学和外国人管理的院校可以在华东立足是因为他们享有治外法权。燕京大学的大门口悬挂着美国国旗，加之它不介入政治，使它得以在北平办到1941年12月；辅仁大学是1927年由美国本笃会（American Benedictine order）创办的，1933年转受德国福音会（German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控制，因此受到纳粹—日本协约国的保护。珍珠港事件之后，在中国的日本人占领区保持相对独立的私立大学主要是圣约翰和辅仁（Hayhoe 1988：56，58；Lutz 1988：46）。

主持下由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组成一个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隶属于云南大学，于是，像费和江应樑这样的学者就可以和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了^①（阿古什 1981：80；吴文藻 1986：89）。吴还帮助建立了一个云南人类学学会，但是随着战线的不断往内地推进，使得刚刚成立的学会的成员不久又分散开来（吴文藻 1986：89）。

燕京大学的许多教员最后也设法到了成都，参与华西协和大学与金陵、齐鲁合并成立的联合大学的工作。^②许多研究人员集体撤退到位于陕北延安的共产党根据地，在中央学院这所小学校里任职。甚至连蔡元培也费尽周折到了延安，直到 1940 年逝世前，他一直在那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参加座谈会。（原文如此——译者注）

一些民族学家指出，当时延安所进行的研究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真正开端^③（秋浦 1984：14）。他们对当地蒙古族和回族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林耀华曾撰文叙述这些历史社会调查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来分析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的（林耀华 1990：142）。《回回民族问题》是他们对“回族的起源、名称、分布、社会经济发展及现状等”进行辛勤研究的成果。尽管《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中并没有使用“民族学”一词，但林耀华相信其中运用了民族学的观点。而且，这部著作

① 由于 1939 至 1943 年间在该工作站主持田野作业，费收集到了他写作第二本专著《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资料，该书是他与张之毅合著的（Sanchez & Wong 1974：776）。

② 这三所学校都与教会有密切的关联，燕京大学也是如此。

③ 黄绍伦（1979：30~33）和其他人认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和他的《兴国调查》（1931）同样标志着详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田野调查的最早尝试。

对于确定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指引回族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民族学研究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林耀华 1990：142）

一些民族学家也开始在云南工作。秋浦——他后来担任了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团成员和重建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1938年到云南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参加了革命。他当上了一名战地记者，并任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和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副院长。早在为中国命运而战的内战时期，秋浦就和其他民族学家一起选择革命的道路，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他便成为一名领导人（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491）。

然而，到达成都、云南或其他地方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如从事田野工作或报道等，并不能保证生活安定。许多大学不得不多次搬迁，每次迁移都有一部分资料 and 人员损失。例如，1938年日本袭击广州以后，中山大学搬到了云南的澄江县，接着又在1940年秋迁往广东坪石附近的乐昌县。除去在原校址里毁掉的那些，每一次迁移，学校都要丢失一些最初从广州撤离时带来的图书资料，迁徙不定的学校不时在损失资料 and 人员。

然而，返回广东却并非出于军事上的谋算，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学校各派别之间带有民族和政治色彩的争斗已经无法控制。客家派胜利了，于是学校迁往广东一个日本人还没到过的客家地区。后来，当日本人在1944年打到该地区之后，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和巨大的骚乱；学者们至今还能生动地讲述往日大批部队集结在道路两旁的情形。

在日军袭击之前，中大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充分

利用新环境的有利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学校坐落在广东省北部的山区，这正是田野工作者们进行田野调查的好场所。1940年中大迁回粤北以后，杨成志就带领他的学生去调查附近的瑶族；在他的指导下，他们写出了《粤北乳源瑶山调查报告》，1942年由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梁钊韬和其他人一起迁移，并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运用了在那里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日本军队的侵扰使他们后来不得不西迁广西，他们又对那里的苗、瑶、侗和壮等少数民族作了研究（周大鸣 1985：137）。民族学家张寿祺当时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在回忆那些年的艰苦岁月时说道：

和当时许多师生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参军，只想继续自己的研究。当日本军队 1944 年 10 月推进到了广东北部之后，我们都疏散了。我去了广西桂林的西部地区，但日本人在那里的活动也很猖獗。我们听说了很多有关日本军队暴行的可怕故事，因此我决定尽可能地离日本人远一点。我翻山越岭，趟过了数不清的河流，步行了将近 40 天。我停下来希望找一天活干、挣些钱，或者能够找到一个我学校里的熟人。最后我到了山里一个没有路、日本人也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老校友。不久我开始讲课，甚至还当上了一个中学的校长。我呆在那里直到 1948 年秋天，然后回到中大，成了人类学系的第一位研究生。（张寿祺 1992）

有些学生甚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躲避战争。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人类学家之一的陈永龄，在日军逼近的时候正就读于燕京大学。他和其他许多人一起逃到了四川。然而，吴

文藻认为需要陈到新疆去教书并从事田野工作，于是把他派往那里。一年半之后，他被当地的军阀政府逮捕，关了几个月。获释之后，陈立即返回四川，继续他的教学与研究。在新疆的逗留唤起了他毕生对西部民族的兴趣，陈目前是中国一流的新疆和青海民族问题专家之一。另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藏学家李有义被吴派往拉萨研究那里的政教合一制度（吴文藻 1986：90）。

与此相同，中大也在 1940 年派江应樑去四川，交给他多项任务：到重庆去为“边民培训班”讲授民族史，到大凉山去调查彝族，（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去云南研究西双版纳的傣族。在彝族中间进行调查被认为“有被掳作奴隶的危险”（江应樑 1986：72），但杨成志认为江应樑是继续他十多年前首开先河的田野调查工作的最佳人选。

有些学生呆在海外，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死在日本军队的枪弹和炸弹之下。迁移到乡下去的一些人染了上传染病，健康受到损害；陶云逵从德国回来后在云南死于伤寒（临终时许烺光陪伴着他），致使云南民族学史上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就此夭折。为躲避日本军队他们不停地转移、四处流亡，而 40 年代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使得他们一贫如洗，有些人在绝望之中死去（阿古什 1981：99）。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转移到内地为激发他们智慧的灵感提供了安静的环境；比如，随着像李方桂、罗常培之类的学者和他们的学生马学良、傅懋勣等首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从事当地前所未有的实地语言分析，语言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傅懋勣 1986b：556）。

这种战争期间的四处迁徙和曲折发展也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到这一领域。1937 年之前，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姊妹学科在中国的分工情况和西方一样。社会学研究汉族，而让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落后地区”或边疆的

少数民族。日本人迫使所有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到了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人人都投身民族志研究，打破了30、40年代遵循的学科界限（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99；李绍明1986：33）。

在这种背景下，就不奇怪为什么1949年前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是错误的了。“社会学”不仅仅指外国所定义的社会学，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史学，这些学科都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有关。许烺光写道（1944：12）：

“社会学”是和社会人类学同义的。今天，即使严格的中国社会学家也很少注意这些曾经独立的学科之间的区别。在我们大学里，社会学家教人类学是很自然的，就像明显有着人类学背景的学者们也举办社会学讲座一样。

战争期间各院校的关闭、迁移和合并（比如，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也意味着学者们被随意裁撤和改派到别的学校去。^①如果说战前各学校分别代表不同的理论学派，那么到1937年之后，这种封闭的学派、理论和学者分化已经不可能存在了（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92）。也不可能再有偏爱某种理论的人集中在一处的情况了；由于师生们吸收了多种理论和学科的方法，中国大学不得不打破各自为政的传统——包括录用本校的毕业生。

战时的合作还反映在《民族学研究集刊》——当时主

^① 学者们主要迁到战时三个中心地区：隶属于教会的学校去了成都地区；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地区；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的大部分都在昆明地区建了校舍（许烺光1944：18）。

要的杂志之一——等刊物的出版上。1940年各期《民族学研究集刊》的扉页上写明主编是黄文山，副主编是林惠祥；他俩都是倾向于美国学派的，因为黄曾就读于美国并接受过博厄斯的指导，林在菲律宾求学期间同样吸收了美国的观点。然而其他的编辑却分属于明显不同的学派：卫惠林、杨堃和杨成志偏向法国民族学派，吴定良信奉英国体质与文化人类学方法。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和理论背景，却同在一个编委会工作，这说明当时社会科学家之间已经打破了隔阂。

战争期间，像云南这样的地方成了深入有效的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中心。比如，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译者按：当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主任方国瑜为一大批诸如费孝通、闻宥和吴晗之类的学者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方便，他自己的文化研究室也发表了10部民族志报告。西南联大的其他人，如罗常培、田汝康、潘光旦（社会学系主任）同样也利用云南民族分支众多的优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中央政府同样撤离到了更接近少数民族的内地，这就增强了国民政府想要将其行政范围扩展到这些“边疆地区”的愿望。国民党需要掌握更多有关这些地区的知识，因此地方和中央的研究院所开始搜集民族学的信息，以协助政府官员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响应了政府的号召（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99），许多人在政府任职；例如，凌纯声就担任了设于重庆的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的司长。

吴文藻也于1940年到了战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和清华的师生一起为国防部从事边疆民族社区研究（吴文藻1986：89）。1942年以前，吴一直在国防部主持这类研究，他利用政府对西南和西北局势的关心来支持民族学研

究。通过建立“边政学”(即掺合了政治科学的文化人类学),吴获得了战时国民党对许多内迁的民族学家的训练及研究活动的支持(金天明和龙平平 1986: 32)。实际上,早在“应用人类学”一词在西方流行之前,中国的研究者就开始进行这类研究了,他们的方法和大多数美国人40年代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借助战争这一条件。因此,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年,中国学术界人士由政府督导和支持的研究和田野工作就已不觉陌生。

更多的外国训练：效法美国、 法国和英国的人类学模式

尽管战争迫使许多中国学者到了内地,却并没有切断外国学派对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对外国理论的偏好。战争前后和战争期间,都有中国人出国留学,回国后他们都努力传播他们在海外学来的观点。一些人回国后成了自己那一领域的带头人,之后就将他们对外国理论的偏好传给了自己的学生。譬如吴文藻曾写道:在国外的時候他吸收了所在国的社会政治观并将这些概念和倾向性带回了中国(吴文藻 1986: 79)。在当时,这一过程对中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授予博士学位;在国外研究却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

30、40年代,美国、法国和英国成了海外求学者的3个主要目的地,而美国可算是这三者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地方。^①李济和冯汉骥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又都发展了

^① Clausen (1988: 432) 指出,“美国并不是大多数中央研究院等院校的中国学者留学的惟一国家,但是在1920~1949年期间,留学美国回来的学生在各高校占了支配地位”(1989: 8)。

考古学和人类学课程。李济学习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民族的起源，后来他在中国成为体质人类学的先驱（原文如此——译者注）。冯汉骥跟随狄克森（R. B. Dixon）学习文化进化论，接着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吸收了哈洛韦尔（A. J. Hallowell）的“文化与人格”的思想，并师从布朗（N. Brown）和斯派塞尔（E. A. Speiser）学习了亚洲与近东考古学。他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在四川发展了人类学（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309，111）。美国西海岸同样也吸引了中国学生：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先首先于 30 年代去了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李在美国西部新墨西哥的祖尼人（Zuni）中进行田野工作，然后在耶鲁大学整理资料写成文章（黄绍伦 1979：23）。在甘肃进行过田野工作并在华西大学执教 6 年之后，李安宅于 1947 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重返耶鲁大学。最后他又回到中国，成为专门研究西藏喇嘛教及汉族社会的著名民族学家。^①

语言学方面，赵元任跟随 20 年前到过安阿伯（Ann Arbor，密执安大学所在地——译者注）的李方桂的脚步（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618），在 1939～1941 年间到了耶鲁大学并于 1946～1947 年访问了密执安大学。1937 年耶鲁大学邀请李回去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他利用这一机会和萨丕尔进行田野方法的实践并与其他美国语言学家一起工作。回到中国之后，他在战时的学术中心昆明和成都

① 李安宅对中国的民族学也产生过重要作用，他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如马林诺斯基的《巫术、科学与宗教》（原著于 1925 年，1936 年中译本）。李还对一位选他的“社会学概论”课的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央民族学院的陈永龄回忆说，在听过李安宅的课之后他马上决定改学社会学专业，这对一位中国的本科生来讲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壮举，对一位大三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容易。

呆了一段时间。和同行们一样，他也利用接近少数民族的机会研究非汉族语言。

另一位早期重要的语言学家王力也曾到国外留过学，但不是在美国。20年代的语言学家们先是选择去日本接受外国训练，但到了20年代末，法国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①因此，王力是到法国去学习语音学的，他于1931年获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清华、燕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又到长沙、昆明和河内任教。罗常培、王力和赵元任等一代人是语言学奠基者，他们深受美国的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了英国的帕西 [Paul Passy] 和琼斯 [Daniel Jones] 的影响）。^②

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也对中国有着明显的影响，因为到过美国的学生们回国之后翻译并传播了博厄斯、罗维和其他人的著作。^③拿孙本文来说吧，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跟随一位方法论、理论及学系都深受博厄斯的民族学影响的“文化科学”的传播者学习归来后，就在社会学家们中间宣传历史特殊论者们的言论（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9）。作为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孙在解放前的几年里地位日益

① 30年代，德国和英国超过法国成为留学的首选之地，直至欧洲战争爆发后，它们的地位才被美国所取代。

② 通过大量地翻译其作品，罗常培、赵元任和李方桂还将斯堪的那维亚语言学家高本汉（K. B. J. Karlgren）的学说介绍到了中国（Austerlitz 1989：468）。

③ 罗维的《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原著初版于1920年），韦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原著初版于1929年）和罗维的《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原著初版于1929年）都是1935年首次翻译成中文的，而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原著初版于1928年）直到1945年才出了第一个中文版（40多年后这部著作又再版了。李绍明 1986：30）。

突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博厄斯派人物之一。

黄文山^①、吴泽霖、戴裔煊和潘光旦是另外几位留学海外的学生，他们回到中国后在中山大学和其他地方倡导博厄斯派的人类学。早在 3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类学教科书已经采用美国的人类学划分方法了，其中包括了对人类体质及文化遗产的研究。吴泽霖（应为戴裔煊——译者注）还受韦斯勒的启发，寻找中国的各支“文化圈”，他发现了一个包括东南亚沿海地区在内的“文化圈”，范围从中国西南到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80；蒋炳钊 1987：276；李绍明 1986：30~31）。甚至像在其他西方国家呆过的学者，如吴文藻和杨成志，也受了他们在美国逗留时的影响，向类似的方向引导学生。^②

林耀华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随着 1937 年战争的爆发，他结束了在家乡福建古田为期两年的田野研究工作，到哈佛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③ 林坦率地表示，对他

① 黄担任中山大学重要的民族学杂志《民族学研究季刊》的编辑——战争年代远离广州的时候他也任过这本期刊的编辑，这增强了他的影响力。

② 吴文藻并非对所有遇到的学生都加以鼓励。许烺光对我讲，他在燕京大学和吴谈研究生的研究问题时，吴没有给过他什么帮助。“他说我有些问题。首先，我的级别太低。然后他说我不是‘真的对研究感兴趣；否则你不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打工。’他不了解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日本占领了我的家乡中国的东北），我身无分文——这和他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但是我击败了他最优秀的学生，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去了，就这样报复了他。1945 年他来到了纽约，说要给我提供一份工作（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明确地叫他滚开”（许烺光 1990）。

③ 1938 年 10 月日本占领广东省的首府之前，林耀华的老朋友阿伦斯伯格夫妇让他上了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最后一架飞机中的一架，从而帮助他逃脱了日本人的魔爪（Arensenberg，个人交流）。

影响最大的教授是美国人类学四大学科的代表人物：

胡顿教授教我体质人类学，托泽 (Alfred Tozzer) 教授教我考古学，克拉克洪教授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还有孔恩 (Carleton Coon) 教授也是一名体质人类学家，在他的“欧洲的种族” (Races of Europe) 课上我学到了很多。也正是在那时，我和阿伦斯伯格 (Conrad Arensberg) 共度了很多时光，我们成了好朋友。时隔多年我们才再度会面，那时已经是1982年了。

林认为他在那些年里吸收的西方人类学有优点也有缺点。他特别感谢教师和同行们传授给他的整体论的人类知识，并且“因此而对我的老师和同事，如克拉克洪和阿伦斯伯格等人心怀感激。因为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我后来才能理解并用批判的观点评价苏联的资料。”但是西方的人类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林批评说，殖民主义的背景滋长了欧洲人毫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隐晦的种族主义观念。这其中也包括了过去的老师胡顿。他解释说，“胡顿并没有明确地鼓励种族主义，但他有相当多的资料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尽管林在1940年以一篇关于贵州省苗族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和妻子仍然呆在美国，以便她能够在史密斯学院攻读学位。然而，她不久就病了，林在护理她期间开始将自己在古田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书，该书主要讲述了两个家族的兴衰史。书稿于1948年付梓，英文书名是 *The Golden Wing: A Family Chronicle* (《金翅：一个家族的编年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中文版

直到1977年才出版。^①

林耀华1944年返回中国时，他发现日本人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华北和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学者都已远离北京。林从香港直奔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建立新校之后，林又在吴文藻的推荐下去那儿主持社会学系的工作（吴文藻1986：90）。在此期间，林还在当地的国防委员会任职，同时还指导学生并从事田野工作。林对我说，他从1943年起就一直对彝族进行田野工作，早期他在凉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依据这些资料，他写出了3部书稿，最著名的是1947年出版的《凉山夷家》（*The Lolo of Liangshan*）；^②第二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付排就被红卫兵们毁掉了。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林继续任社会学系主任和《燕京社会科学》的主编。

到了40年代末，林耀华成了中国人类学界的关键人物，也获得了吴文藻的充分信任。吴的另外一名优秀的学生费孝通也是如此。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使他与马林诺斯基有了密切的联系，世界著名学者之间的交往由此开始。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费已与史禄国早有师生关系；听费对他的两位老师进行比较十分有趣，也让人深受启发。

① 但是这是台湾发行的版本，未经林耀华的许可。他认为这样处理他的作品不恰当。该书的另一部中文版得到了林的支持，目前正在修订之中。林的一位学生，民族学家庄孔韶对同一个村庄进行了追踪调查，有关作品也即将出版（暂定名为《银翅》）。[此书已于1996年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全名为《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一部社会人类学的文本撰述》——译者注]

② 1961年出版了未经授权的英文版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受到了批判，理由是在国外出版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坚决表示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

首先，史禄国对费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并在英国发表的博士论文评价不高（阿古什 1981：79）。我于 1989 年 12 月去拜访费的时候，他对我讲述了史禄国对《江村经济》是如何地不满意：

这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史禄国对我说。他的意见是，“你不能以一个村庄为基础来写有关中国的作品”。比较他们两位，我不得不说，作为思想家，马林诺斯基不如史禄国深邃，史的培养方法更深刻，眼界更开阔。但是，史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的英语很糟糕。^①这与马林诺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林诺斯基更能言善辩，更善修辞。他能让一件很简单的事看起来非常深奥。比如说文化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一笑]我对自己的老师不太友好吧！[对此我俩都大笑了]

马林诺斯基的强项在田野作业，他将田野研究的方法引进到人类学之中。史禄国也在西伯利亚等地做过田野工作。我是个功能主义者，但和马林诺斯基不同；我不喜欢他的生物学解释。马林诺斯基起先学习生物学，后来才改学人类学，所以他的理论是生物学的理论。

不过，费还是时时流露出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告诉我，80 年代中期他在东欧期间特意去波兰拜访克拉科夫，以便可以去看看克拉科夫医学院所属的大学——马林诺斯基以前就读的学校。

^① 很显然，史禄国的汉语更糟糕（阿古什 1981：41）。

在伦敦跟随马林诺斯基学习过之后，费孝通重新开始将功能学派的观点运用到中国的社区研究中，在云南进行了更多的田野调查。战时他在昆明呆了几年，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社会人类学教授，并主持云大一燕京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接下来他又出国了，这次是去美国。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1943~1944学年度费孝通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太平洋关系学院（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讲学并从事研究工作。他在哥伦比亚遇到了林顿（Ralph Linton），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雷德菲尔德和奥格本，并与一大批美国学术界人士有了交往（阿古什1981：106~107）。在国外为期一年的逗留结束后，他接受英国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倡议，于1946年赴英访问。1947年他从英国回来后，重新在母校清华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Sanchez and Wong 1974：777）。

当然，林和费的老师吴文藻也代表了这些年对中国学术界影响重大的另一股力量——英国。吴在中国倡导功能主义对这一学派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派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去英国跟随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夫利克-布朗学习。南京的金陵大学是英国人管理的，其社会学系同样也派学者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们也吸收了功能学派的思想。^①

被有些人称作是中国第一位体质人类学家的吴定良，他的经历体现了在伦敦师从凯思爵士（Arthur Keith）时所受的巨大影响。刘咸，另一位中国体质人类学方面未来的领导人，同样也在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等院校跟随凯思等人学习过。他们按照英国的传统学会了如何对自己

^① 然而，并非所有金陵大学的学者都去英国。民族志学家徐益棠被派往法国，回国后他对广西的瑶族进行过大量研究。

国家的国民进行体质和文化的综合研究，并在回到中国后将这类项目付诸实践；刘就是因其对海南岛黎族的出色研究而引人注目的。

杨堃对法国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作用最大。在从里昂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前，他用了10年时间在法国研究原始宗教、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史前考古学和社会学。作为莫斯的学生，杨堃强调社会法则和辩证法的思想，当时法国的社会学也有同样的倾向。他相信法国社会学学派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和经典进化论的伟大传统，并将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综合（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82；周星1989：1~2）。

一回国，杨就发起了一个传播法国知识的运动。根据自己的理解，他1930到1949年间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评价法国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30、40年代，杨在中法、河北、北京、清华和燕京等大学教书育人。40年代末，杨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培养出大批学生，他成了组织云大民族学的关键人物。是他把雷布儒、葛兰言、涂尔干和莫斯的作品译成中文，将法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带到了中国读者面前（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82；周星1989：5）。

法国民族学派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接受法国教育的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功能学派的学者集中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那里他们很有威信（李绍明1986：32）。尽管杨堃经常到处走动，凌纯声却一直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而杨成志和卫惠林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广州度过的。同时，除了杨堃，其他人都满足于从事少数民族田野工作，并没有专门去宣传法国民族学派理论（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82）。

德语国家的影响力就更加微弱。德奥传播论对中国学

术界从未产生过巨大影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到德国和奥地利去留学。^①但还是存在着牢固的联系，特别是以在中国的天主教学校，如北平的辅仁大学，为媒介产生的联系。例如作为辅仁大学的领导之一的雷冕是传播论学者施密特的学生；雷冕在辅仁大学历史系讲授以传播论理论为基础的民族学课程。施密特本人 1935 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他的传播论的追随者们发行了自己的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和《民俗学志》（*Folklore Studies*），其中包括许多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的资料（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6；李绍明 1986：30）。

陶云逵可能是这一学派最突出的一位，他抗战前曾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求学。然而，尽管陶将理论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但他对自己的日耳曼族老师们的文化圈理论体系并没有作更大的改进。陶在战争期间病逝，此后先是由林耀华接任了一年多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一职，几年后的 1947 年又由亲法国学派的杨堃担任了这一职务。陶研究过云南的少数民族，他因不畏艰险地研究过彝族的鸡骨占卜及其传布而名垂史册^②（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76）。

抗战以后的繁荣

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当年被迫迁往内地和其他地

① 据李绍明称，英国传播学派对中国的影响更小（李绍明 1986：31）。

② 此文名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发表于《边疆人文》，1 卷，2 期（无日期），这是陶云逵所发表的倡导“文化圈”方法的最有名的作品。

方的大学和学者们回到了原地。尽管民族学在战后还在继续发展，但战争造成的中断已经使其深受影响。留在国内和去了国外的学者们在各种理论及田野工作条件下丰富了自身，他们带着拓宽自己的眼界的想法回到学校。

40年代末，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繁荣起来。在这一时期，人类学的主要含义是指民族学和考古学，在这两个学科体系中，民族学的地位明显地突出一些。尽管并没有否认四大学科也包含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但实际上它们在大多数人类学教学大纲和研究计划中都被置于边缘位置。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事实上，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47年体质人类学家刘咸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了这样一个系，教学大纲侧重于文化人类学，而刘咸却明确表示不能轻视体质人类学。甚至还有一个例外，就是杭州的浙江大学规定要以民族学为重点，吴定良在该校教授的人类学课程却强调体质人类学。

然而在其他地方，大多数的人类学教学大纲不重视体质人类学。例如，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只要求学生修8个学分的语言学课程和9个学分的体质人类学课程，而4年的本科学习中必修的总学分共是111个（也可以选择27个学分的选修课程，其中6个学分是体质人类学，可以不选语言学；卞僧慧1986：7~8）。（译者按：经查卞僧慧原文，意思与顾的英文有出入。）

这反映出从总体上说来，当时中国的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发展还很不充分。1949年以前进行的惟一一次系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是在周口店，在水洞沟和大沟湾等地还进行了几次零星的发掘。仅有少数人从事这类研究；这就难怪为什么在华北以外的其他地方有关更新世的

史料还完全是一片空白（吴汝康 1982：476；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4）。

1948年清华、中山和浙江大学都成立了独立的人类学系所，一连串的系都创办起来了。这些系的特点是：它们设在大学的文学院里，与历史学和哲学为伍，而不是归属自然科学院或开设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法学院。由于强调的重点不是体质人类学，而是历史学和语言学（通过史前史和语言学的学习），人类学看起来明显地是一门侧重于民族史、“习俗”和少数民族研究的猎奇的学科。

清华大学的人类学系在1948年春季成立，当时学校将社会人类学系分成两个系。吴泽霖任人类学系主任，李有义和费孝通也是该系的创始人。当年招收了4名学生，并设置了4个学科的课程。是年年底，红色军队进入现在更名为北京的首都，这意味着学校不再招收学生了。

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是1948年夏从研究院的人类学部发展来的。日本投降后的几年里该部招收了一些研究生，有一、两个毕业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杨成志刚从纽约回国后就立即着手为新系的成立作准备，并成为该系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系主任。卫惠林、黄文山、戴裔煊以及梁钊韬也和杨一起参加过系里的工作。梁曾在社会学系和中大的师范学院教民俗学和其他人类学课程，因此很容易就作了调动。

除了对人类学发展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中大还是语言学领域的先锋，它成立的语言学中心是战后学术界繁荣时期中国为数不多的语言学中心中的一个。1946年，在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的安排下，将现有的中文系分成中国语言文学系和语言学系，于是诞生了一个语言学系（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50）。过去的中文系的大部分人都调到新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因此出现了新

的语言学系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

王力委任岑麒祥负责新系的工作，他与王力密切协作，在当地发现了一些像严学窘之类的可以在新的语言学系任教的学者。严学窘自己专门研究汉语，系里的其他人却是研究外国语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

因此到了40年代晚期，中国新一代的语言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将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语言学的带头人。马学良1938年在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来又帮助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胡坦1986a：264）。在中央研究院，年轻的马学良第一个受到研究所里一名研究员的影响，此人就是后来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李方桂（原文如此，李似未担任过院长之职——译者注）。李还对另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中大的高华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考古学继续归在历史系里，这种情况反映了史前史在学术界的地位仍然很低。^① 尽管各大学开设了考古学课程，研究者们个人也进行考古发掘，却没有全国性的考古学联合体或考古学会，仅有几个重要的考古学中心，最早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考古队。这两个政府的研究所是30年代成立的，1949年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地方上也作了一些分散性的工作，如，1937年燕京大学成立考古学会，该学会发行过几本刊物，北大也于40年代开设了博物馆培训课程。

与之相反，民族学却在全国蓬勃发展。大多数的民族

^① 例如，从40年代末起，在清华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大纲中，对考古学课程没有作要求，只需要修8个学分的古文字分析。在选修课中，修6个学分的考古学，再修3个学分的古文字课就可以了（卞僧慧1986：7~8）。

学课程设置在社会学系中，并分别被冠以“民族学”、“民族志”、“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边疆社会”、“比较社会制度”或“初民社会”之名。尽管名称不一，内容却大体相似，都是介绍外国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同时也融入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方面的材料（陈永龄和王晓义 1981：299）。尽管有许多人类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民族学方面的，但是，解放前大学里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学系。

在北方，最重要的民族学中心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南开、辅仁、中法等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东部，中央、金陵和复旦大学起了关键作用；而南方则是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和云南大学是西南部的重镇。^① 这些并不是惟一的探索民族学的地方，但它们是 1949 年前民族学地位比较牢固的重要地点。^② 到了 70 年代末起的改革十年间，南方和东南部的这些地方又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复兴的中心。

对解放前人类学的一个评价

在革命力量日趋强大的同时，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也在蓬勃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科学都是如此。正如

① 江应樑于 1947 年初返回广州，在中山大学和珠海大学执教，并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但是，次年，云南大学聘江回昆明在社会学系教文化人类学（江应樑 1986：73）。他在那里一呆就是近 40 年，1988 年逝世之前，他在负责中国第二个本科人类学专业的创建工作。

② 解放前最后几年里重要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心以及有代表性的研究人员的名录参看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91～293），陈国强（1985b：11）。

我们所看到的，在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领域，机构设置、研究和人员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古人类学方面，甚至到 40 年代晚期它仍然是一个受西方人支配的领域。关于解放前这一学科的情况，小弗里德曼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9 年之前有这样一种倾向：西方人垄断了对已发现的重要标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把中国同行视为田野发掘的监工和研究助手，尽管他们受过全面的训练，可以独立在科学单位中充当专职合作伙伴。这种做法使中国人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Freeman, L. G., Jr. 1977: 8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样，中国的研究者现在还是毫不含糊地承认他们曾经受惠于外国学者，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和林圣龙就曾这样直言不讳 (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

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这些西方的学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了自己的东西。诚然，40 年代有关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出版物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极大的提高，重要的外国学派在中国当时都有其追随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归国后宣传他们外国老师的学科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功能学派、进化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分支流派”。

举秋浦为例。他强烈地批评这一时期只是一味地照抄外国理论，却不用中国的实际去检验它们，也不管这些外国理论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他还指出，中国的政治状况与各种外国学术流派在中国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

总起来说，上述这些学派（德奥播化学派、美国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引者）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有关。一般说来，哪一个国家在中国势力大，流行于那一国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影响也就较大。而每一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又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因之在某一国留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一国流行的学术思想的传播者。（秋浦 1984：13）

然而，中山大学的容观复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海外的学生总的来说并不是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外国教师，无论他们是施密特、博厄斯还是马林诺斯基（容观复 1986）。他指出，陶云逵，尽管他在德国确实是学习过传播论，回到中国后他主要是从事民族史的研究，这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单纯地遵循传播论的轨迹。^① 容同样还说，声称中国在 1949 年前就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功能学派是不准确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学派的中国学者并不是反历史的，他们也对自己调查过的社会进行整体论研究。费和其他人或许也运用过功能学派的方法，但当他们用民族史去为当代的发展服务的时候，从理论和形式上来讲，他们都不是功能主义者。他们从事社区研究，但在理论上并不拘于一家之言；他们不属于任何“学派”。尽管持容观复这种意见的人在今天是少数，但它却很恰当地提醒了我们，不要随心所欲地假设每一种外国知识都能在本地适用。

然而，很显然 1949 年前的中国人类学是以西方为楷模的。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追随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

^① 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276）同意容的意见；他们以陶云逵的鸡骨卜研究作为中国文化历史学派研究的代表。

诺斯基，燕京、清华和云南大学成了中国功能主义分析和传播的中心。林惠祥、杨成志和他们的学生在南方代表更美国化的观点——尽管法国的影响力也不小。^①这种美国、英国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法国的影响稍弱、居第三的情形在所有的人类学科学领域——从民族学到古人类学——都存在。^②

接着出现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问题，吴文藻本人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用英国的功能主义来理解中国的各种社会形态——从少数民族的边疆社区到汉族的农村再到东部的城市。林耀华认为吴的想法公允地表述了1949年前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真正含义。^③外国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被用来研究中国社会；可以认为这是本土化的一种形式，因为西方人研究的是殖民地民族，中国人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要研究的是自己的社会，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是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④

吴文藻并不是1949年前惟一一个倡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学者。李济、岑家梧和黄文山等人都倡导用

① 台湾民族学家黄应贵赞成并引用唐美君的说法，将1949年前的民族学/社会学归为两大派系：以燕京大学为根据地的北方功能学派和以中央研究院为根据地的南方历史学派（黄应贵1983：106）。

② 在整个革命前的时期里，社会学也是偏向美国流派的。阿古什指出，“1947年，全中国有143名大学教员教社会学，其中有71名是在美国留过学的，27名曾留学西欧，还有12名是美国人”（阿古什1981：26）。

③ 个人交流。

④ Stephen Murry指出，宣称由汉族民族学家研究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就是“中国人研究中国人”是不坦率的说法，就像把欧美人到美国的保留地去研究美洲土著称作是“美洲人研究美洲人”一样是不诚恳的。

更具批判性的方法对待欧美的民族学。黄文山认为，不仅要像吴建议的那样用中国研究人员研究中国，而且还要系统地剔除外国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糟粕，提炼出其精华，为中国人所用（龙平平 1988：197；200～201）。蔡元培认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关键是遵照博厄斯学派的方法，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这显然也是黄文山和其他历史特殊论者遵循的研究样式。

然而，即使是吴文藻也承认，由于 1937 年战争爆发后师生们经常迁移，很难实现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 1986：86）。学生们到国外去攻读更高一级的学位，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研究基地。因此，当时的人类学客观上讲还是有较多的西方色彩，而缺少中国特色。地理学家曾昭璇对我讲：

总之，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国外出版的英文书，提交论文既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写作，所有的图表和地图都是外国人绘制的或是在其影响下绘制的。^①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国外引入的；甚至连我自己 1947 年在中山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是以澳大利亚人泰勒（Graves Taylor）的观点为基础的。尽管中大研究院人类学部所有的教员都是中国人，他们受外国人的影响却不小。

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人类学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在国外受的教育，他们都偏向外国理论。而且正如

^① 当谈到在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时，吴文藻同样也这么说。他说，所有课程的教材一律是国外出版的英文本，通常只有补充资料是中文的（吴文藻 1986：83）。

我们所知，在一些领域，外国人本身经常处在舞台的中心位置。^①

然而，假如有一些科学还未从外国学派的支配下脱颖而出，那也可能只是因为当1949年之前的发展轨迹被革命完全破坏掉的时候，它们刚刚才形成自己的体系。可以确定这些轨迹形成于20世纪的头10年间，即在人类学思想最初被翻译出来并传入中国的时候。早期阶段的传播是逐渐升级的，最初在20年代末缓慢发展，到1937年前的几年里就迅速些了，接下来到了各学科纷纷成立研究院的时期。大学里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分配了人类学的任务，制定了人类学教学方案；在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成立了研究中心；学术界在更大范围内成立了专门的学会，所有这些都为人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奠定了组织基础。^②

可以将抗日战争的爆发理解为业已形成的第三个阶段的巩固，在此阶段，人类学开始在中国舞台上应用。一旦成立机构的阶段结束，并且可以在国内外培养足够多的掌握人类学理论和技巧的人员了，中国人就着手进行本国的田野调查，从而可以将吴文藻的发展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设想付诸实施。当然，制度化在第三阶段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像在成立机构的第二阶段，外国理论和资料的

-
- ① 在描述社会学在中国的第一个十年的时候，费孝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社会学这门学科是“进口”的，并声称直到40年代末，“大部分仍然不完备。在讨论中，教授们引用的大部分是从西方社会学里得出来的事实和理论”（费孝通1979：19）。费从前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同学许烺光同样也将1949年前的中国人类学称作是“西方舶来品”（许烺光1990）。
-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作品是“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后来表示，中国的社会学是世界上除了欧美学术界之外最先进的社会学（转引自黄绍伦，1979：36）。

引进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样。^①

因此，当1949年中国人类学舞台的大幕落下的时候，上演过的几幕是“介绍西方”、“成立机构”和“应用于中国”。“本土化”的一幕还没有上演（也有人怀疑还没有写出来），尽管有人衷心地希望见到这样一个电影脚本。由于人类学系仅仅存在了一两年，人类学科学也不可能取得迅速有效的进展，不可能由机构成立阶段和应用阶段完全转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以及建立理论体系的阶段。

^① 阎鹏将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类似的三个阶段：1895~1913年，异化阶段；1913~1930年，奠基阶段；1930~1949年，发展阶段（阎鹏1990：12）。

焦点之四 解放期间的梁钊韬


1948年秋季，在杨成志、梁钊韬和其他的人类学教员的主持下，中大进行了人类学专业第一个本科班的录取工作，招收了30多名学生，还授予一名研究生人类学硕士学位。该学年末即1949年夏，这届学生放假的时候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毕业还遥遥无期，他们却遇上了中国的内战。

梁加入该系的时候职称相当于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译者按：此说与本书第一章注有出入），此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跋涉到过西部，后来又在社会学系当了两年讲师。他希望献身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一个在不久将来很可能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的中国——的发展事业。梁对当时正在中国崛起并向南方推进的革命力量持欢迎态度。他许多年里一直与各种地下革命力量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他相信按照红色军队的路线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定会将革新的、进步的人类学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家道殷实的兄弟不断地要求他移居香港，却像是对牛弹琴；梁认为留在广州是自己作为一名爱国者的义务。他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

之后不久，所有的人类学门类都被取消。第一幕——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结束了。接下来是苏联的一幕。

第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
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
(1949~1960)





第五章 过渡时期

1948~1949年红色军队节节取胜，大多数观察家都很明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及混乱的秩序即将结束。随着国民党1946年反共大举进攻的失败，战局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力量，最初是东北的解放，随后，中国的其他城市也相继解放。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年大陆（除了香港和澳门两个殖民地）就统一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旗帜之下。

国内外的中国学者也不得不顺应这席卷他们祖国和生活的变化狂潮。对许多人来说，没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问题，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一崩溃他们就逃跑了。那些家人和亲友在海外的人发现离开是最容易的；因此不奇怪为什么与海外关系密切的南方人离开中国大陆的要比北方人多。^①

南方大学里的人材外流情况尤其严重。其中包括1948年离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到中大去任教的卫惠林，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的芮逸夫和凌纯声。事实上，整个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撤离南京，到中国台湾重组并一直保持至今。

^① 在中华帝国的晚期，南方与国外的联系比北方紧密，南方的港口使得中国通过海洋与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联结在一起。

一到台湾，凌和芮立即于 1949 年夏在国立台湾大学成立了考古人类学系。1952 年卫惠林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直到 1971 年退休前，他一直在该系从事非汉族群的田野研究。^① 凌和芮还忙于在台湾本土重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凌成了该研究所的所长。通过这些学术基地，凌、芮和其他一些移居到台湾的人类学学者影响了整整一代台湾学子，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创立者和系主任乔健以及他的同事谢剑。

移居台湾的著名民族学家还有黄文山。黄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先是在中大倡导民族学，后来又到了南京，在中山科学院的中山文化中心工作。他于 1949 年离开中国去了美国，但最终设法到了台湾教书。一到台湾，他就与来自包括语言学与考古学在内的广大范围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同行们重新聚到一起。

考古学领域许多重要的工作人员和组织也迁到了国民党的据点。政府的北平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考古学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组都随着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一起迁往台湾。后者还带走了大量的考古收藏品。直到 80 年代，该研究所的主要任务还是分析这些从大陆带过去的资料（臧振华 1989：160）。

并非所有的研究院及其工作人员都逃走了。新生代研究室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个关键性的古人类学机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因此 1949 年的人员及机构流失对中国古人类学发展的影响比对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影响要小得多。新生代研究室的大多数人员决定

^① 该系其他创始人还有：李济、陈绍馨和傅斯年。关于人类学和考古学在台湾的发展，请参阅陈梓权（1989）、黄应贵（1983）和臧振华（1989）。

留在中国经历“解放”和新社会，这更能体现学术界的主流的态度。很多知识分子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想为饱经战争磨难的“落后”的祖国效力，甘愿放弃到国外自己挣大钱的机会。冯汉骥就是这类学者中的一个，他拒绝了外国朋友让他到美国去的建议，扎根祖国，为发展中国的博物馆研究和人类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110）。

革命胜利之际刚好在国外的那些人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加入到新的政权和社会，还是逃离。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 40 年代末在美国，1946 年在哈佛大学任访问教授，后来又于 1948 年到了耶鲁大学。他 1949 年开始起程回国，但是在西雅图作中途停留时，华盛顿大学有人劝说他不要回去，因为“当政的是共产党”（La Polla 1987：2）。李留在了西雅图，在该大学任教，直到 1969 年“退休”后，他又到台湾继续任教并担任顾问。这些年里，李在美国和台湾语言学界的地位日益突出（丁邦新 1985：2；La Polla 1987：2；Mark 1987）。考古学家郑德坤同样也结束了在剑桥和牛津大学的访问起程回国，在香港作中途停留后就再也没有继续他的旅程；他回到英国，接着又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讲学并从事研究工作。“退休”后，他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考古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任职（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539～540）。

当时其他学者也或是留在国外或是离开了中国。其中有一些，像李方桂，在中国台湾作出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名声传回了祖国大陆。有一些移居美国之类的西方国家；李的同行，语言学家赵元任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作，而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继续呆在美国，在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担任了一个有权力、受尊敬的职务。

然而，回国事件在另一些海外中国学者中激起了不同的反响。这些学者的爱国激情压倒了对共产主义的反感情绪，他们迫切地想回国，尽管家人和朋友竭力劝说他们留在海外，他们还是回国去了。容观笈就是其中之一。他1946年中大本科毕业，随即进入了研究院的人类学部。容不久就获得了一个去国外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其他许多来自广东中山地区的人一样，他的家庭有许多海外关系；容的直系亲属已经在哥斯达黎加定居了。1948年底，容也成为其父亲、长兄和妻子在美国中部的家庭的一员；6个月后的1949年夏，他离开他们进入了奥斯丁的得克萨斯大学，到那里的人类学研究院“学习种族主义”。

伴随着国内传来的激动人心的“解放”的消息，容也听到了中国的同行和朋友请求他回国的呼声。长他七岁的梁钊韬也恳请他回国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然而，容的父亲坚持认为，容必须先获得一个美国博士学位才能有最好的前途。这种情况令他左右为难，容为之苦恼了几个月之后最终决定与新中国共命运。1950年11月，就在彭德怀率领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去支援北朝鲜之后的几个星期，容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就离开了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辗转旅行，容回到了广州投入国家的重建事业。

与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更加剧了国外宣传机构对新中国政权的中伤。然而，并非所有在国外的人都相信这些反面报导。吴文藻当时还在东京，是同盟国对日委员会的中国成员之一。他就怀疑新闻的准确性，于是决定回中国去亲眼看一看。他拒绝了耶鲁大学要他去讲学的邀请，于1951年回国（黄绍伦1979：37）。据云南大学的江应樑称（1986：91）（应为吴文藻在自传中称——译者注），吴回国后的头两年是学习“新思想”和了解新情况，为在新社会接受新工作做准备。

新 社 会

正在建设中的新社会领着学术界走向了封闭。不再鼓励学生到国外去留学；他们的才能和爱好都要服务于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迫切需要。一直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得不放弃出国的梦想，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自己不乏参加实践活动的机会，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许多师生加入早些年的土改队，参与了改造农村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仅一年后，1951年的头四个月，（除了几名教师）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全体人员都走向田野，去协助土改工作。师生的精力突然间要投入到另一项工作中去，然而，革命后留在中国的人中只有一部分有留学经历，有一部分则没有——这一差异对个人的未来举足轻重。

由于没有了留学国外的机会，而且，1949年后中国也不再授予高等学位，旧有的、主要从西方派生出来的学术目标和偏好就开始受到质疑。不久就出现了遵照革命后的教学大纲的新的教育体系。1950年10月，教育部提出教育要以反帝、土改和“五热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基础，以培养年轻人的社会主义意识（高清海 1985：71～72；Price 1987：177）。在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旧的学术结构和学科体系再次受到检验。用反帝的标准去审视，许多西方引入的学科体系受到怀疑（阎鹏 1990：14）。就连老博厄斯派的孙本文都写文章批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社会学”对革命前中国的不良影响（孙本文 1956）。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法律学因其资产阶级

的立场和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人类学科学同样也遭到批判。没有对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下反面的评语，但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却没能幸免于难，受到了强烈的口头攻击。1949~1950学年度之后，人类学和语言学学科不再招收新生。这一政策是以对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是如何为全世界的殖民主义服务并帮助其欺凌中国的分析为开端的。进化理论、文化圈、传播论、功能主义和“心理学学派”都对殖民主义秩序的建立起了作用，使被压迫的民族饱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压（江应樑 1981：249；施正一 1981：173）。民族学家江应樑 30 年后翻然醒悟，在解释当时对民族学的这种观点时说：

16 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寻找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也进行民族调查。19 世纪以后，一些探险家、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为着效劳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他们尽量利用民族学这门学科，来达到统治、剥削殖民地人民的罪恶目的。这样，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民族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只能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科学。这是误解。（江应樑 1981：250）

江应樑也承认，民族学确实有过肮脏的历史，但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一学科用于实现积极的目标，借此为它恢复名誉（江应樑 1981：250）。

秋浦也鞭笞了解放前许多民族学家的大汉族主义（1984：13），他引用过其中一个人的话，这个人要求满、蒙古、藏和回族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李寰的观点更具侮辱性，他否认了不同民族的存在，坚持“只有一个国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秋浦称

这些学者为“所谓的民族学家”，以表示他对这些人的蔑视；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李寰的这一套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Ein Volk, Ein Vaterland, Ein Fuehrer! (一个民族、一个祖国、一个领袖)”有着明显的、让人不愉快的共通之处。

尽管江应樑认为50年代初否定人类学的评判是不正确的，但对社会科学普遍的批判立即就起了作用。人类学系和课题组停止招收新学员，一些系还被取消了。人类学科学成为诸多退却的学科中的第一个，因此师生和课程都转到了其他系。

1948~1949学年度开始的时候，也是清华大学四大学科的人类学系羽翼刚刚丰满的第一年。9月，该系招收了首批4名本科生，然而，3个月后革命力量到了清华，这意味着这第一批的4个也成了最后的4个；该系就此不再招生。这一年，该系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被取消，师生们转到其他的系，主要是社会学系。^①几年后，这些师生中的许多人彻底调离了清华。

北京另一个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中心是燕京大学；早些年里，它也曾经历过巨大的变化。从1946年起，林耀华一直担任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可是到1951年，该系重组，分成两个单位。系里的社会工作组成了劳动学院；系里的另一半，社会/文化人类学组改为民族学系，林继续任系主任。此后不久，林作为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的一员出发去西藏，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由陈永龄1951~1952学年代理他的职务。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

^① Sanchez and Wong 称，1950年的高教会议上接受了费孝通等人的意见，他们表示可以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以满足新中国的需要，于是社会学才暂时得以保留（1974：783）。

的制服,^①林开始研究西藏的习俗、气候、语言和社会结构,作为革命部队的一员,^②他也抽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田野调查。当他1952年10月回到北京的时候,全国正在进行院系调整,他被派到了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

年轻的学者和学生被大到全国、小到学术领域的迅速转变弄得晕头转向。目前主持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工作的王辅仁回忆说,和当时许多的学生一样,他认为凡是涉及到政治的学科风险都太大,不能学。经济学的风险小一些,但是很枯燥,于是王决定到燕京大学去学社会学。毕竟,用社会学为社会服务不会错吧,难道不是吗?结果却不尽然。几年后,这一领域也被打上了“反动学科”的烙印,社会学系被解散了。随着院系机构的调整,1952年他从新成立的民族学系提前毕业。不久就随他的老师李有义等人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西藏研究室。

在广州,类似的发展进程要稍稍松缓一些。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也在1948年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系,但是红色军队用了一段时间才攻下南方的主要城市,因此新的人类学系有时间开1949~1950学年度的课。前一年进校的30多名本科生和一名研究生(张寿祺)没能毕业,但其中有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坚持人类学工作。现在任中大

① 成都华西大学的李安宅1951年也以顾问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了拉萨。有人对这类身穿制服、隶属于军队的学者们是否能与被调查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表示怀疑,Stephen Murry(1990)将这种田野调查比作美国军队的“亚历山大·莱顿中校。二战期间在亚利桑那州的集中营里对日裔美国人进行的表面研究(ostensibly studying)”。

② 1951年,小组里还有两名学生和他一起去了拉萨:燕京大学的王晓义和华西大学的宋蜀华。40年后,这二人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供职。

重建的人类学系名誉教授的张寿祺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当年他是被中大的研究院而不是人类学系录取的，所以，就在人类学系被取消之后，他还能够继续人类学的研究生课程。本科生中也至少有一个人还在继续学习这门学科，35年后，他成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仍然从事着少数民族研究。

1949~1950学年度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前一年，1949年夏季学校放假的时候，广州就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观望内战局势的下一轮变化。炎热的月份里，夏季学期没有开课，但校园里气氛却相当紧张，一些教员害怕国民党在最后一刻进行报复，而另一些则害怕共产党的清算，因此都逃往香港。9月，1949~1950学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放弃了广州；10月7日，红色军队解放了广州。所有的学生还和以前一样继续上课，但是时隔不久课程表上就新添了一门必修课——辩证唯物主义入门。

出现没多久的人类学系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人类学被学校党小组的组长刘渠判定为不重要的、反动的学科。刘解放前曾是中大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学校众多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他也是由于害怕国民党报复而逃到香港的人中的一个，但是红色军队一到广州他就回来了。他从心底里赞同北京领导人对人类学的否定态度，因而事先计划要废掉这个不讨他们喜欢的学科。他对校内长期倡导人类学的杨成志的私人成见更加剧了这种激情。杨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中寻求出路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提倡西方教育，讲法语和英语，还被与国民党有关联的校长派到法国去受训。刘并不把杨当作是革命的朋友。

1949年11月7日签署了撤消人类学系的命令。系里

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都转到历史系；^①大多数的人类学课程也转到该系，还有一些最终转到了社会学系。1948年那一届的人类学专业本科生（从9月份的15人）减少到12人，他们改学传统的历史专业。那一届惟一的研究生张寿祺主要研究考古学而不是民族学，剩下来的教员在历史系新的“民族组”的领导下自行选择教学方向。

人类学系最初有6名教员，但随着内战逼近广州，其中的3个逃走了。在1949年7月的转折关头，卫惠林去了台湾，黄文山（临时从南京到了广州）去了美国，罗香林则去了香港。而杨成志、梁钊韬和岑中勉这3个人则做出了留下的选择。杨不久被调往北京，岑去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梁只得担负起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两个系的人类学课程的教学任务。

人类学思想的转变

新政权立即开始在教育领域进行调整。现在教育的目标是要学习如何“为人民服务”。学者们通过重点招收工农学员来扩大学生的招生面，并着手制订全面的助学金计划。共产党在所有的学校都确立了领导地位，并努力削弱“反动”的反党集团和个人的影响（李修宏和周鹤鸣1988：3）。

学生（和不少教员）们逐渐在学习安排中加入了“生产劳动”这一项，并开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大多数是志

^① 1990年中大副校长胡守维向我解释说，是历史系，而不是社会学系成了中大人人类学的避难所，其原因有二：杨最初是历史系的教授；按照中大的管理体系，历史学和人类学在文学院，而社会学归属独立的法学院，这种学院内部的调动更容易些。

愿者；那些受了极大鼓舞的和最清闲的人都参与到了“清洁灵魂运动”中。同时也想进行更彻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革命后的头几年里，党在各高校的工作重点是让每个人打好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之后，尤其强调与美国有联系的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Thurston 1987：57）。一位学者回忆说，那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精神创伤；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来临，人人都想学习马列主义。甚至连老学者都高兴地加入到思想改造的行列，“珍惜成为新人的机会”（Thurston 1987：57）。

林耀华是热烈地欢迎这种变化的人中的一个。解放后不久他就出版了专著《从猿到人的研究》，尽管是在他过去的老师胡顿的《从猿上升》的启发下写成的，却不是该书的简单翻译。相反，林将他过去受的教育和新的观念结合起来，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胡顿的进化论框架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为该书写了序。^①

现在70到90岁的人都说，当时党的政策是尊重支持知识分子，这在50年代初的一句口号“尊师爱生”中有所体现。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全国上下都笼罩着学术气氛；一位老学者回忆道，当时“人人学习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人。”尽管一些学者发现一些忏悔过去错误、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一些令人反感的表现，如风派（即随着政治风向转的人；Thurston 1987：57），但是，大

^① 林耀华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身份邀请翦到该系教“中国社会史”之后，翦逐渐显露出左派的立场；甚至在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燕京大学历史系还有教员对左派的翦在该校教书持有异议；也不满意林让翦教授社会学。

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愿意试着接受新社会和新思想。

新思想没有遭到太多反对，其中的一个原因是，1949年之后，许多最强硬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逃到了国外或是根本就没有从外国回来。留在中国的人过去并没有真正地吸收过马列主义思想，他们愿意探索这一思想。尽管大多数人最终没有完全信服马列主义分析的合理性，他们仍然敞开心灵接纳了这一思想。拿费孝通来说吧。他公开地谈论自己的“转变”并将其诉诸文字，他承认自己从前的分析是错误的（Sanchez and Wong 1974：783）。1988年他对巴博德解释说，他和他的同事“认为我们是旧中国的产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要改变……新观念，新政府似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事实上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费孝通 1988：649）。

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积极的，但也有少数人却被揪出来成了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靶子。党对知识界几位重要的杰出人士——他们在海外受训，并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们受到审查。毕竟，在解放前，只有富有的或是有较好的海外关系的人才能出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①他们认定，国内有外国学位、外语技巧和海外关系的一流学者最有可能怀有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因此也最需要思想改造。

在广州，这类人被送到南方革命大学（后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进行一个时期的思想改造。一位人类学家被送到那里学习批判三类思想。

^① Edwin Clausen 指出，“到 30 年代，80% 多的大学生来自商人、官员、教师等职业的家庭……即使是在收费相对不太昂贵的官办大学里，（大学）平均的学费也相当于上海一位纺织工人 5 个月的工资，普通中国人对此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如果这位工人想要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四年学，那将会花去他 5 年半的工资”（1988：434）。

第一种是“崇拜西方思想”。西方理论和教育是否都是好的，都值得盲目模仿？不！第二种“崇拜封建主义思想”。旧文化值得完全保护吗？绝不！最后一种遭到批判的思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思想”，这是以上两种错误思想发展的产物。

特别是人类学，它来源于殖民主义，又在殖民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因此成了主要的批判目标。全天都进行思想改造。一位广州的学者描述说：

我们只有周日才能回家，一周其余的时间都用在自我反省和小组讨论上了。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批判“崇拜西方思想”，你就得写文章讲自己如何认为从西方理论中可以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又是如何轻视中国的。然后你要当着另几个也在搞思想改造人的面把它读出来。他们接着就一起来批判你的思想和你的文章。然后，你要表态说自己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你要详细地列举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给出令人信服的事例说明思想改造前后你的思想变化。

青年党员工作组还要到你工作的地方去，向你的朋友和同事询问有关你的问题。你有机会反驳对你的批评，甚至还可以让调查者去找出确实替你说话的证人。如果没人肯帮你，你就注定要倒霉了。

1952~1953年，思想改造运动的目标由最初几个人扩大到了所有的大学教员。一个城市要挑选出几个思想改造的重点——例如，在广州就是在中大和华南师范大学，——并持续5至8个月，人们要上自我批评“课”、

革命“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经典著作“课”^①（Spence 1990：564；Vogel 1969：85）。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事还算是轻的，他们并没有为此感到过于不安。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段难捱的经历。学者不得不一再重复自己的过去，剖析自己的“阶级偏见”，同时还担心有人向调查者讲自己1949年前说过的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等等的看法。老学者的日子更艰难，18岁的学生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些学生的批判，有些人甚至以自杀来寻求解脱。

然而，有些年轻的学者却躲过了这些严重的问题。有一位学者坦率地对批判小组的成员承认，他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从亲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的東西外，他对别的一无所知；他将自己缺乏进步观点的原因归罪于反动的环境。这些年轻学者就是这样逃避麻烦的。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些人热烈地欢迎思想改造，他们尽力在改造中有良好的表现。也有一些人严厉地批判自己和他人，并希望能够加入党组织。

毫无疑问，尽管并不完全相信其合理性，大多数人还是声称，通过政治学习，自己对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世界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改造让学者们认识了新中国的政治风格：它既不全盘否定一种给定的理论或模式，但也不完全赞同。大部分的学术工作者从前认为西方文科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是人类知识无可比拟的典范，如今批判人文学科无助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成了一种时髦。或许思想改造更持久的意义在于，它给学者们上了有价值的一课：无论

^① 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总部1952年5月正式在中大设立。其主要目标是岭南大学，因为这所大学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年夏，那里的运动达到了高峰（Vogel 1969：86）。

是公开地还是私下发表意见，日后都会招来麻烦。许多顽固的知识分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早些时候的运动中被点名批判的老学者中有一个就是杨成志。由于有海外关系而且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杨在中大的领导地位已经出现了问题，他眼看着自己的人类系被取消，而他自己的学科体系也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杨过去在中大的同事也反对他；中大新的领导人对一个 1949 年前压制过左派的学校高级行政领导（秘书长）是不会太客气的。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广州解放、中大人类学系被取消之后，杨成志还一再降职。最开始是不让杨成志在学校教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中大的领导发现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就把他派到南方革命大学去反省自己反动思想的根源。据杨自己说，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严肃地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改造”过后，杨又能够参加系里的活动了。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加入了 1950~1951 年首次组建的民族访问团（详后）。

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杨成志是个急性子，好与人争辩。但他的朋友说，思想改造之后，他变了。在南方革命大学受到压制以后，杨不大愿意讲自己心里的想法了，发表意见时也更为谨慎。被调往北京之后，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影响；他的专长是凉山彝族和华南、西南的其他少数民族，新家距离田野工作的地点太遥远，这意味着他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尽管由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文物室挑头，1958 年他在北京友谊宾馆为 100 多位苏联专家作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报告，他也写了一些有关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报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这与他 1949 年前发表的著作的数量相比，不过是个零头。当新的领导占据了舞台的中间位置之后，杨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杨成志的密友杨庆堃对早些年变化又有不同的反

应。解放前夕，杨庆堃刚刚去了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他很快就回国了。和杨成志一样，新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在中大。当时他在学校里的一位朋友，中国通费斯乐（Loren Fessler）记得杨庆堃说过，他可能与新政权共事是因为他赞成新政权的观点，认为外国理论支配中国的情形应该结束了。杨得以继续进行田野研究，与他的一群学生一起调查广州附近农村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①此外，他还与人合作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英语。然而，1951年初，政治气氛对杨而言也不那么适宜了；他受到警告，要么离开，否则就有可能被抓起来。杨庆堃和他的妻子一起去了香港，因为当时过境到这个英国殖民地相对容易一些。而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过的，25年之后中大又邀请杨庆堃回来，指导中大和中国的社会学系的重建。

早些年里，民族学在新社会的成型期相当活跃，它起了新的作用。1950年8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词，倡议到少数民族中去^②，全国迅速成立了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一年里，访问团到了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第二年，访问团的足迹就延伸到了中南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南等省。

学者、政府官员、医务工作者和当地干部都在访问团工作。政府为访问团制订的目标是：通过民间的联系，与新解放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确定少数民族的物质需求，以适当地为其提供药品、必需的工具之类的援

① 杨庆堃后来在这次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向早期共产主义转变的中国农村》（*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9）。但是，由于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无法带走笔记，因此这本书是他1952年凭记忆写出来的（黄绍伦1979: 42）。

② 题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助；访问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促进各民族内部团结与民族之间团结的工作”（鲍尔汉 1986：623）。

尽管在短暂的访问期间，没有进行多少田野调查，许多社会科学家仍然热情洋溢地参与了访问团的工作。^①对少数民族在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学者们都十分清楚，新的人民政府的行动打动了学者们，他们赞成深入到少数民族中去，让他们享受与汉人同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在云南，1950~1951年，江应樑带领一个访问团工作期间对共产党人及其政策形成了很好的印象；1951年他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辟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工作领域（江应樑，1986：74）。

1951年夏，容观夔刚从美国回来就加入了“广东省第二批民族访问团”。在海南和粤北他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给少数民族输送商品：布匹、针线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在云南访问团，也有熟悉该地区和民族情况的省和地区的领导与江应樑他们一起工作。人类学家、南方民族专家岑家梧主持广东省的访问团，费孝通则在自己早先从事过田野调查的广西省主持工作，同时也访问过邻省贵州。但是，一回到自己原来的学校，容、江、岑和费将不得不去适应急剧变化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

① 据肖家成称，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特别提到林耀华的《西藏社会概况》，李有义的《今日的西藏》和费孝通的《兄弟民族在贵州》（Shaw 1989：43）。

第六章 重新定向

新 模 式

赢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农民军队和干部队伍最初不得不依靠各个城市里的大批国民党官员来管理国家。这些遗留人员过了几年才被替换下来，而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者迫切地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指导路线。

人们受到苏联这一榜样的启发 (White 1983: 30)。毛将这种向苏联学习的过程称作“一边倒”；他强烈要求中国人按照苏联路线建设国家 (Teiwes 1988: 11)，向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学习。全国上下都以苏维埃制度为“仿效的基本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全盘照抄” (White 1983: 30)。

然而，中国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不作变动地直接照搬苏联的形式和风格，并由于两国制度的相似而导致相似的目标和境况，却还是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普赖斯 (Ronald Price) 对这种所有类似的事物都依靠直接“借用”的作法提出质疑 (Price 1987: 159)。他断言，这两个国家虽然有着惊人的相似点，但是总的行政机构设置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相似点，并不是通过“拷贝”得来的 (Price 1987: 166)。

尽管在中国学术界苏联的影响很大，但根深蒂固的儒

家教育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教育历来被看作是“保持正确的行为和必要的道德观”所必不可少的(Price 1987: 16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点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正好相反，党的领导以实用为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原则，确保向苏联和中国的教育界及社会灌输正确的道德准则。因此，难怪扮演这一角色的各主要机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宣传部和党校系统、以及学校里的共青团和少先队——都是以苏联为模式的(Price 1987: 176)。这两个社会都遵循二元领导的政策，因而，“从理论上说，一方面，政治领导与政策制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权力——之间应该有区别；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与政策落实之间也应该有区别”。但实践中，在这两个社会里都可发现，上述区别的界限十分模糊(White 1983: 39)。

总的说来，中国从苏联接受了大量有关学校组织结构、教学方法、甚至有关具体的课程内容的信息(Taylor 1981: 13~15)。苏联的教科书和其他资料通常一齐传入中国，又被中国的同行所采用(Price 1987: 162~163)。另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社会都强调教育与生产(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Price 1987: 171)。苏联这个模式还向中国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样的学系是应该维护的，而什么样的学系是应该消灭的。今天有许多中国人将大量社会科学的取消归罪于苏联。一位民族志学者表示：“1952年把它们取消，是因为苏联人认为它们没有用。因此我们也取消了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管理学。”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苏联的这种诋毁是替自己国家的领导干部推卸责任，但是在50年代初，这两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当局都对人类学和社会学表现出极大的怀疑。^①比较而言，民族学和考古学与其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姊妹学科不一样，它们被看作是可以直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看到，民族学和考古学成了中国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避难所，这两个学系的苏联理论、方法论和组织结构变得相当有影响力。一位中年研究员描述道，苏联的民族学被“囫圇吞枣地咽下去”，因为“在 50 年代初，我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因此我们跟着苏联走”。

学术界的调整

除了在人类学科学方面的影响之外，苏联模式还被应用到了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中。50 年代初，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体系，这戏剧化地改变了中国学术界的面貌。1951~1953 年的“院系调整”用苏联模式取代了杜威等人建立的美国模式。新中国需要新的课程、新的教学大纲、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体系为其服务。1952 年 12 月，从教育部里又分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部，监督第三级教育^② (Orleans 1987: 188)。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校和学院被调整或被撤消，而另外一些却受到了重视或鼓励。最早的变动之一就是取消了外国人资助的学校。1949 年，中国 200 多所高校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私立学校，其中有许多与教会关系密切。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不久以后的 1956 年，苏联又在其社会科学院内恢复了社会学所，但这次中国却没有跟着苏联走。

② 新的高教部只持续到 1956 年，就又与原来的教育部合并了 (Orleans 1987: 188)。

中国的解放和冷战封锁政策切断了它们与国外的联系，因此这些学校或是与其他院校合并或是进行了重新调整。

同样重要的是专业学校及其教学大纲也向苏联模式转化。人文学科不再受重视，许多文科类大学被取消，文理工大学转成了专业面更窄的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和医学院都成了独立的院校，剩下的十几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组合到了一起。^①按照设想，这种专业人员、设备和研究资料的集中会产生更高的工作效率。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标是要纠正高等教育的教学设施过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调整后的教学中心来实现^② (Orleans 1987: 186~187)。

教学大纲和课程安排同样也专业化了。革命前，着重强调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现在重视自然科学和工科；许多新的院校甚至不设文科。新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在自己系修完几乎所有的课程，这与1949年前的学生不同，当时的学生有四分之一的学分不是从自己的专业课上得到的。现在学生被录取到具体的系，并期望他们一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就可以投入工作。

-
- ① 1953年6月，200多所高校重新组合成了十几所综合性大学、39所工学院、31所师范学院、29所农学院、29所医学院、4所政法学院和6所财经学院。另外还建立了8所语言学院、15所艺术学院、5所体育学院和2所国家少数民族学院 (Orleans 1987: 186~187)。中山大学取消了农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教育学院之后，成为广东惟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李修宏和周鹤鸣 1988: 3)。
- ② 在强调应用研究和强调基础理论的高校之间也有了基本的区别。中大之类的大型学校集中发展理论，而其他的院校则强调普及教育和科研发现的实际应用。这些学校 (除了中大，还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 成了两级体系中的上一级，中国其他大学的许多讲师都是由它们输送去的；为数不多的毕业生留在本地院校教书或是去了工厂。这种体系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路线分门别类的。

同时，对每个专业的范围，甚至是该专业的学生人数都有限定。1949年前，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让他们所学东西的范围尽可能地宽一些，以使他们在大范围的职业领域里都可以被录用。现在的目标则是缩短培养学生所需的时间，以使他们可以尽快分配到工作，为新社会的建设发挥作用（Orleans 1987：187）。

在行政管理上，学校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在院系调整前，中央行政机构在学校拥有大量的权力，但随着大学里权力的分散，各所学校的权力都转移到了各系。甚至在系里，权力也是分散的。1953年之前，系下属的单位是小组，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权力的非正式组织。在教育采用苏联模式之后，教研室（李修宏和周鹤鸣 1988：89）就取代了小组。这些教研室的组织更正式一些，其领导比小组的领导权力稍大些。现在，课程设置和升职问题都由教研室主任来决定。

关键性的变化是共产党在大学里地位的提高。安妮·瑟斯顿（Anne Thurston）声称，整个教育界进行调整的目的显然是要加强党对各大学的控制（Thurston 1987：59）。尽管我们可以说院系调整是解决具体问题（如，为关键领域培养更多毕业生、缩短教育时间以及合理分配国家有限的教学物资和师资等诸多方面的迫切需要）所必需的改革，然而，通过将已经在全国确立的党和行政二元领导制应用到各大学，院系调整确实有助于共产党直接进入学术界。

党员在学校担任关键性的领导职务，各系都有自己的党支部和党的书记。起先许多党组织成员是知识分子，不过后来他们逐渐被非知识分子的干部所取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多半是农民，这是不足为奇的。当“党领导的原则战胜了大学应该由教授管理的想法”之后（Tang

1983: 85), 非知识分子确立了对大学的领导权, 这清楚地象征学术界的权力从知识分子手中转到了党的手中 (Thurston 1987: 61)。

对于这种权力转移, 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教员们刚刚经历过思想改造, 每个人要么是赞成学术界进行改革, 要么是受到管制, 学会了忍受当局的一切决定。现在, 学术界所有的因素都要用新的标准来衡量了 (Vogel 1969: 87)。

重组人类学

现在, 人类学科学的命运越发取决于政治对其价值的评估了。随着教育界的院系调整, 所有的社会学系也和人类学一起从校园里消失, 从而被人遗忘了。社会学强调社会病理学,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不受欢迎; 社会学及其改革社会的倾向适合于需要消除冲突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不存在社会问题的新社会里没有一席之地。而且,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被称作是“伪科学”, 因此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被彻底禁止。^① 他们的拥护者分散到了中国科学院及其各地的分院、少数民族学院或是大学里其他的系, 特别是历史系 (李有义 1980: 54; Rossi 1985: 39)。

民族学也成为很多这样的学者的天堂。尽管 50 年代初, 在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劳动分工, 但社会学家绝大多数从事汉族研究, 而民族学家则研究全国的少数民族。民族学家黄淑娉认为 (1988), 在任何时

^① 禁止这些社会科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 当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科学, 而社会学等其他科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伪学科 (严学窘 1990: 14)。

候都不能禁止汉族研究，而事实上在解放初期，这类工作一直在进行着（黄淑娉 1988）。她说，对民族学的强烈需求是从政府、党和国家的需要出发的，因此，为数不多的民族工作者都去了民族访问团或去完成其他一些类似的任务。事实上，在 50 年代初，针对汉族的起源、汉族一少数民族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这些早先的例子后来再次被用来为开展汉族研究作辩护。

随着斯大林对语言学这门学科提出批评，中国新的政府当局也对中国的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1950 年，新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语言研究所，由罗常培任所长（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523），而到了 1954 年，所有的语言学课程都中止了，个人都被重新分配到新的工作单位，语言学教师和学者们被迫去寻找新的工作和研究场所。一位中年语言学家说道，不管是否愿意，他被从南方调往北京学习历史学，后来又教授历史。只有到近 30 年后，他才被允许公开地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那些年里，我被派到全国各地，却没有一次让我实践一下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是多大的浪费啊。”和文化人类学家一样，其他许多语言学家也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分支学科领域找到了职业避难所。

无论在解放前考古学与其他人类学科学的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1949 年后就不再赞成加强考古学与其他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了。一位考古学家回忆说，那些时候“据说人类学和社会学一样带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我们都对被称作人类学的东西敬而远之。只有体质人类学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所以，即使我们愿意，也不能把考古学当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考古学开始被看作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对象是古代，即过去的时代里某个具体的

时期”(夏鼐 1990: 61)。在这种学术背景下, 50 年代的后几年里, 考古学还保留在历史系或研究所里, 在一些地方, 它被更名为“金石学”。^①

1949 年之前, 全中国都没有单独的中国考古学中心或协作机构, 因此人们必须在 1950 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经历再造。中科院的考古研究所成了中国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培训和理论发展中心, 而且在此后也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虽然 1949 年之后政治风向一变再变, 考古学却相对比较稳定,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反知识分子的那几年里, 它也没有经历太多的磨难。

50 年代被新中国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夏鼐称做一个“黄金时期”的开端。新的院校、新的学生培养计划和新的发掘使考古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态势。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现了新的遗址, 其中包括陕西省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村落。到 60 年代中期, 这些发现连同其他一些发现都被归为“仰韶文化”, 为此对于中国的历史在理论上又有了新的认识(曾骥, 1990)。史前学家不能再假设只有黄河才是中国文明的惟一摇篮了;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广泛分布表明, 早期汉文化是以今天的整个中国为基地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阶段, 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也逐渐成为定制。在中科院新任院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支持下, 考古研究所带头搞起了利用考古学资料解释社会历史的工作(Olsen 1988: 3)。1952 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培养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① “金石学”一名的由来是: 古文字学研究的重点是青铜器和石碑上的铭刻文字。在云南, 1952 年至 1959 年一直沿用这个别称。

生，不几年，就出现了诸如安志敏和汪宁生等一批考古学人才和未来的学术带头人。^①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和民族学组所代表的人类学派系的分歧继续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在苏联的鼓励及其榜样作用下，“人类学”逐渐等同于体质人类学这一单一学科，^②在其庇护下，人类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1951年，过去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又改编成新成立的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两年后，它成了科学院直属的古脊椎动物室，杨钟健是第一任主任。

1957年，这个研究室成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下设3个室：低等脊椎动物室、高等脊椎动物室和古人类室。1960年，这个研究所扩编迁址，并开始使用现在的名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然而，这种设置并没有沿用苏联模式。苏联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是在古生物研究所里，与其他的古生物研究一同进行的。中国则将古脊椎动物研究单分出来，在南京的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里只进行古代无脊椎动物和古植物研究。^③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带头单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很早就成为研究的中心，造就了像贾兰坡这样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今天仍

① 安志敏师从裴文中，又受训于夏鼐，大学毕业后就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并长期担任该学科主要刊物《考古》和《考古学报》的编辑工作。汪宁生是云南民族学院人类学工作的轴心人物。

② 当时认为人类学由人类形态、人类起源和人类种族等内容组成（江应樑 1987：276）。

③ 中科院也有一个植物研究所，研究现代和古代植物的形态。该研究所有一个古植物实验室，但其研究重点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古植物实验室有所不同。

然在该研究所工作或教学。中大人类学系的第二任系主任冯家骏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现任副所长吴新智50年代都曾就读于该所，是吴汝康门下的研究生。这二人在到该研究所之前都在大连医学院学习和工作过。冯毕业后到广西一所医科大学任教，后来又去广州担任人类学系的领导职务，而吴则留在该研究所，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古人类学研究事业。

上海的复旦大学是早期另一个重要的中国古人类学中心的所在地。30年代，复旦大学这所名义上的天主教大学以其学生和教职员富于斗争的爱国热情而著称（Hayhoe 1988：52~53）。复旦大学解放前40多年里从来没有发展过体质人类学。但是，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要求将两个现有的体质人类学教学组转到复旦大学。随这两个教学组一同去复旦大学的学者是吴定良和刘咸。

吴定良是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随系一起调到了复旦大学。吴是皮尔逊（Karl Pearson）和莫兰（G. M. Moran）的学生，曾就读于他们的生物统计学学院，他按照解放前的方针领导该系的工作，将重点放在体质人类学上。另一位调到复旦大学的是刘咸，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是上海暨南大学体质人类学的带头人，他还从自己的学校带了一些人一同去复旦，^①在生物系建立起一个人类学教研组和一个人类学研究所。据复旦大学最著名的一位毕业生吴汝康讲，“和莫斯科大学一模一样。”（吴汝康1990）

在中国学术界，只有复旦大学生物系明确认为，无论

① 这些年里，刘咸对通过展览传播古人类学知识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1950年他担任了“从猿到人类展览会”筹备主任；1955年他又担任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主任（刘延寿和冯志毅1986：159）。

是哪种分支的人类学都属于人类学。50年代吴定良逝世后，人类学组60年代初成为人类学室，但它的重点仍然是解剖学、古人类学、统计学、人体测量学与地质学。每年招收20名左右学生，毕业生有些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或是博物馆，有的成为医生或教师。学生接受严格训练，被要求掌握古代及现代人类的体质特征；但没有几个单位可以用得上这类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专业的招生名额越来越少，因为学生毕业后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类学教学计划终于告一段落，但还保留了人类学室。现在，老教授们都不在，他们对体质人类学室的领导也随之结束，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从事实用的人体测量学。

院系调整对文化界解放前作为人类学中心的一些大学——燕京、清华、中山、厦门和云南大学——影响也不小。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燕京大学——在北京西北角燕京大学的校址上建起了一所比原校规模大一些的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北大是以文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而清华则砍掉了文科专业，成了一所纯工科大学。燕京大学新近成立的民族系和劳动系（它们都是由社会学系分出来的）也被取消；人员和资料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学生需要转学，因为大多数的学生已经在前一年转到了其他系。

燕京大学新成立的考古教学组是历史系的一个专业，它落户到了新建立的北大历史系。它是即将成为中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考古中心的核心；1957年，20多个学生被该系考古专业录取，到了1987年，他们中的一半人担任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高级领导职务并在该所从事研究。1983年，这个教研室扩大成为中国大学里第一个考古学系。

清华大学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也在 1952 年随着全国各地的另外一些同行们一起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① 吴泽霖、费孝通、胡庆钧（著名的彝族研究专家）和潘光旦与同事们一起加入到了这个学院。这个“新”学院的前身实际上是延安民族学院，该学院早在 1941 年起就为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前的那个学院已经彻底改变，由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取而代之（Grunfeld 1985：60）。

党长期以来都对民族问题显示出兴趣；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将对民族事务的兴趣化为了实际行动：政务院^② 提出要建立一所中央民族学院，下设专门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问题的研究部的议案^③（秋浦 1984：16）。周恩来本人“亲自批示立即着手筹建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个人交流；又见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4），1951 年 6 月 11 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成立（新华通讯社国内材料组 1982：339）。研究部于是年夏开始起步，不久就有（包括杨成志在内的）几个人加入，但是由于正在进行院系调整，大多数人直到 10 月才来中央民族学院报到。

费孝通最初是中南民族研究室的主任，后来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他为学者们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作了很多准备工作。1950 年政务院最初的指令是：所有大学和其他地方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人员都必须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秋浦 1984：16），这正是在费的帮助下才实现的。费不仅是学院的副院长，还是外国专家局的副局长和中央政府

① 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们除了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还有一些被下放到了由劳动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管辖的劳动干部学校，其中包括陈达、吴景超、袁方和全慰天。

② 该机构是 1954 年正式成立的国务院的前身。

③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有创见的评价，可参阅 Grunfeld 1985。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Sanchez and Wong 1974: 785）。他早期的著作，如《江村经济》谈论的都是革命前的中国对变革的需要，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位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者。

其他人也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了领导职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乌兰夫兼任学院院长，翁独健（来自燕京大学历史系）主持研究部的工作，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担任了各研究室的领导。来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任西南室主任，清华的潘光旦接替费成为中南民族室的负责人。翁独健也负责东北/内蒙古室的工作，而（与翁来自同一个系的）冯家升主持西北室的工作。陈永龄担任整个研究部的党支部书记；吴文藻 1953 年回到中国后也来到中央民族学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研究室的负责人。林耀华 1952 年之前任燕京大学新成立的民族学系的系主任，现在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西藏研究室的负责人。他与李有义、王静如和王辅仁一起，将燕京大学的声望带到了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①

由于这些中国民族学领域最优秀最活跃的人物都集中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这个学院自然成了国家民族研究、训练和理论发展的中心。^② 学院起初没有设系，只有干部培训部，1952 年创立了第一个系——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和维吾尔语）系。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前的几年里，迅速组建了一些新系（如，政治系，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系

① 甚至也没有忽略对这些一流学者的思想改造，也没有忘记让这些学者学习号称民族理论和实践指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 54）。

② 当然，并非所有的民族学家都调到北京。比如，田汝康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转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这一时期就呆在上海。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梁钊韬呆在广州，林惠祥留在厦门。

等),干训部也得到加强。现在干训部仍然是中央民族学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门,它培养从事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干部。

至于研究部,则继续从事基础性研究工作,同时也为民族学专业以外的学生开设中国民族学入门课程。^①由研究部承办,其下属的各个研究室调查少数民族现状,成立小组,搜集和编辑有关专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研究部有自己的刊物:《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

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历史系,开设民族学专业和一个民族学教研室,并设立了民族研究班培养民族工作人员。两年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分化,一部分成了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剩下的继续为中央民族学院自己的民族研究所工作。50年代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其他负责调查项目的国家机构都需要受过训练的民族工作者,它们让中央民族学院及其一系列的地方下属的研究所来完成培养民族工作者的任务,这样民族学才得以发展。

在这些年里,成立了11所这样的地方民族学院,都是按照中央民族学院的模式组建的(宗群1986:328)。其中之一的中南民院1951年成立于武汉,除了50年代中期有几年被暂时指定为中央民族学院的分院之外,它一直作为一所独立的学院存在至今。杨成志解放前在中大的3名研究生中的两名,容观复和刘孝愉1952年调到了中南民院的历史系^②,和岑家梧、严学窘等人共事。他们对武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支持没有白费心血,1982年中南

① 这门基础课程是“中国民族概况”,1956年在新的历史系开设了民族学专业之后,这门课改为“中国民族志”这个更有学术意味的名称。

② 第三位是张寿祺,还留在中大。

民院成立了一所民族研究所。吴泽霖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成了研究所的一名教员。1987年中南民族学院创立民族学系，有权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①

在南方的广州、厦门和昆明3个人类学中心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广州，解放前成立过差强人意的社会学系并有人类学科目的岭南大学为中大所兼并，正如燕京大学被北大兼并一样。解放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存在，其中一些爱好人类学的教员继续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民族志研究。陈序经和伍况麟研究“蛋家”的社会和历史，岑家梧的专长是苗族和海南少数民族。但是，总的来说，除了这些研究人员和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的“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岭南大学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该校也没有开设民族学或是人类学专业。

院系调整之后，中大的校址迁到岭南大学，并将岭南大学的教职员工吸收到了自己学校。陈序经和伍况麟进入新中大的历史系，但是他们一开始并不任课，只是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以掌握新观念。陈序经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不久就当上了新大学的副校长^②，岑家梧则成了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

然而，新中大却没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席之地，重组后这两门学科都遭到了禁止。大部分的教员都调到本校或本市别的系，有一些则走得更远。杨成志被调到北京（他先是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去中央民族学院负责研究部文物研究室的工作），梁钊韬和大多数其他的

① 容于1973年离开武汉去了中央民族学院，1981年才加入新生的中大人类学系。吴泽霖1949年以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和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呆过，还遭受过政治迫害。

② 1963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城郊成立，陈序经是第一任校长；1965年，他调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当副校长。

民族学家一道被调到了历史系。

中大的语言学很快就遭受了和北方的语言学同样的命运。起先，院系调整工作要求王力结束在岭南大学的兼职（他1947年在那里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回到中大，他成了新中大语言学系的系主任。然而，两年后的1954年，这个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王和其他几位中大的老师一起搬到了北京，成为北大扩编后的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兼汉语教研室主任（刘延寿和冯志毅，1986：50）；留在中大、有能力从事汉语研究的被安置在中文系。王力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北大的领导岗位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担任系副主任职务；到1986年逝世，他一直是教研室主任。和王一样，该系的其他人和一些老中大的语言学专业毕业生最后都成了中国语言学领域——无论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言领域——重要的领导人。

在厦门大学，解放初的变化之一是对史前学越来越重视；历史系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修“考古学概论”和“原始社会史”课程。1951年林惠祥提出了一个计划——在厦大重新建立人类学科学，他获准建立了一个“人类博物馆”。^①博物馆将指导一些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它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单位；所有的课程都由历史系来讲授。^②

林惠祥有一个发展厦大人类学的三步计划，博物馆的建立是第一步。1953年博物馆开馆，它是整个中华人民

① 事实上，这个博物馆的英文名称中使用了“人类学”。它的中文名称是“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将“人类”（humanity）和“人类学”（anthropology）作了区别。因为人类学当时正在受批判，厦大的有些人将人类学称作“资产阶级学科”，为谨慎起见，就避免在中文名称中出现“人类学”这一字眼。

② 与人类学关系最大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人类学概论、原始社会史、考古学概论和中国民族史。

共和国惟一一所专门的人类学博物馆（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513）。林希望接下来成立一个人类学研究所，最后成立一个人类学系。可是，院系调整打断了林的计划，直到 30 多年后，林的学生替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二和第三步，他的梦想才得以最终实现。

50 年代中，林惠祥不得不安于历史系的教学工作，他研究和写作的主题逐渐从可能引起争议的民族学转移到了风险较小的考古学方面。他确实也培养出了一批喜爱人类学的学生，但研究生所占的比例不大。例如，在 1956 年那一届研究生院招收的全部学生中，只有两名被指派到历史系跟随林教授学习。^① 这两名学生是考古学专业的叶文程和民族学专业的蒋炳钊，在 80 年代人类学系成立之后，他们二人都当上了系主任。该系未来的系主任陈国强是林的另一名学生，他成了博物馆的秘书；1958 年林惠祥去世，陈接任博物馆馆长。

在西南，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是主要的赞同人类学的中心，它们用别的名义作掩护，继续保持对人类学的支持。1939 年，在方国瑜的支持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解放前和解放后，这个研究室都是云南重要的“边疆问题”研究中心。1954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云南大学集中进行当地民族志的研究；由方国瑜主持，研究室更名为民族史研究室，后来扩大成民族史研究所（刘延寿和冯志毅 1986：42）。尽管经历了名称和行政上的变动，实际上重点还是放在中国西南民族上（译者按：这几个机构的名称与原引书所述不尽相符，但因英文

^① 按比例来算，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所有的学位和研究生专业都被取消了，到 1956 年，这 3 个系只招收了 10 名研究生；剩下的 8 个到了化学系和生物系。

版使用了汉语拼音，故按拼音译出)。

江应樑是老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另一位重要的研究人员，1948年从广州回到昆明之后，他再度到研究室工作，并在社会学系讲授傣族史、彝族史、中国民族史和各种民族学方面的课程。1953年的教育改革取消了社会学系，人类学和民族学也被取消；江去了历史系，主要教授民族史（1986：74～75）。杨堃也是研究室的活跃分子之一，他教原始社会史和民族社会历史研究。在昆明的其他地方，考古学迅速在云南省博物馆站稳了脚跟，这个博物馆至今仍是云南省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中心。^①

四川的华西大学解放后不久就将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安排到了社会学系。院系调整中，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社会学系被取消。冯汉骥解放前曾是一位献身四大学科人类学的研究者，也是人类学重要的代言人，从那时起他主要致力于在历史系教考古学。他的学生童恩正继承了他的人类学衣钵。80年代末，童正准备将历史系的考古学专业改成独立的考古学系，可是1989年春夏之交突然爆发的动乱使他的计划没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类学科学的命运经历了一个不稳定的过程——从受压制到获得支持再到被调整。解放后，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慢慢地被压缩了，直到院系调整的过程中，被彻底取消作为独立学科资格。民族学却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民族研究工作吸收了许多民族学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这些地方还成为很多语言学家的避风港。而考古人类学和古人类学却正好相反，它们赢得了官方的鼓励和支持，得以以独立的学科结构存在。因此，

^① 80年代末创办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单位：从博物馆分出去一个独立的文物考古研究所。

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一些年里，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还正式使用“人类学”这个名称：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的人类学教研室和厦门的人类博物馆（后者只是在英文名称中使用“人类学”罢了！）。

少数民族识别

在进行这些行政和体制改革的同时，民族学家还在忙于完成他们解放后最重要的任务。早在1950年，新政府就决定要改写以往令人遗憾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通过民族访问团，开始了与少数民族接触的进程。早期的工作暴露出了群体和民族状况的混乱，这些群体和民族都声称自己有各自独立的认同。调查者们通常无法确定这些群体是否仅仅是某个少数民族、汉族或是其他什么群体的支系。

1953年进行的解放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说有400多个少数民族，这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费孝通1980：94）。过去许多民族常常因为害怕遭受迫害而设法隐瞒自己的非汉族身份或血统，新政府有利少数民族的政策引起了观念上的转变。“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执行，逐步涌现出很多过去很少听到，甚至没有听到过的族名”（林耀华1990：143）。这些名称当中有一些实际上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叫法，而有一些实际上指的是汉族群体，根本不是少数民族（秋浦1984：15）。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为：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而且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权利，发展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林

耀华 1990: 143)

为此，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以查明情况（黄绍伦 1979: 82）。

从民族访问团时期开始，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就一直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新的民族识别计划使先前的这些工作都黯然失色。这是一项由党和政府发起的全国性的民族问题调查工作。新近重组的学术和研究机构立即响应国家的号召。事实上，1953～1956年间，这项工作从南方开始向北方发展，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其他人都参与到了其中。江应樑在云南工作，费孝通在贵州，而张寿祺则在海南。^①

要决定几百个想维护自己独立资格的群体的说法中哪些是“正当的”这一实际问题，就得应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来分析各种情况。早在三十年前，斯大林为年轻的苏联制定民族政策时就规定：想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应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地域。^② 这看来似乎简单易行，但中国的研究者不久就发现，其中的许多标准，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标准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情况（郝瑞 1989: 24）。研究者

① 组织了6个访问团，分别是东北和内蒙古访问团、甘肃和青海访问团、湘西访问团、广东访问团、云南访问团、贵州访问团（Shaw 1989: 43）。

② 参看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的《一个帝国的衰落：叛乱中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9），其中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作了很好的评述。这种承认极为重要，群体被判定具有这四个共同特征之后，就在共和国拥有了一席之地。一个群体的行政地位取决于“学术上”的承认，同时受该民族历史上的政治主权情况的影响。确定民族地位的关键时间框架不必看现在，而是看民族“形成的时间”。

他们没有抛弃斯大林的定义，也没有原封不动地应用它，而是决定灵活运用，用它来“对大多数中国民间分类中已经存在的、和学者们解放前曾著书提到过的民族特征加以确认或使其合法化”（郝瑞 1989：5）。

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学院前任副院长胡坦解释说，应用斯大林定义的问题在于，要足够准确地判定什么是属于“共同的”语言或经济基础。这项工作需要受过训练的专家，这就给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专家提供了机会。认为自己属于少数民族的群体必须提出申请，要求官方承认其地位（云南有 260 个群体这样做了），然后，“由林耀华带领的文化专家组，傅懋勳带领的语言专家组将调查这些申请是否合理”（郝瑞 1989：24）。据林耀华称，这些调查者始终都是通过了解被调查者实际的生活情况来开展工作的，他们尽量对被研究群体的经济、阶级状态、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历史发展阶段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林耀华 1990：144）。

在解释他们运用这种识别程序的理由时，林耀华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开展民族识别的科学工作，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各个族称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林耀华 1990：143）。林和其他学者坚持自己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需要一个多学科的方法作指导，其中必须包括语言学。林以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的 300 多万彝族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语言调查的重要性。这些人当中，有 100 多个群体要求承认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部族的资格。

通过各单位语言的比较分析，追溯在四省广大的区域内历史上各单位的迁徙变化，他们与其他不同民族交错杂处，从而各个单位社会经济发展上产生了不平衡

性，加上文化生活、风俗习俗和心理状态等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这些不同族称的单位，都是同一民族，即彝族。结果也得到广大彝族人民的同意，他们希望能以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身份出现。（林耀华 1990：144）

在附近的省份，语言学家严学窘从 1951 年起也一直在指导同样的研究工作。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研究组组长之后，严就负责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分类工作进行指导。当时对于黎族的分门别类的记录就收集了 4 大卷（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材料被烧毁），在广西又有几个群体最终被确认为民族——包括毛南族、仡佬族和京族。他们的报告科学合理，因此被接受了。这四个群体就此前进了一大步：从非官方范畴的“人”到了政府承认的“族”。

全国的工作完成后，国务院于 1956 年宣布，中国正式承认 51 个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总共有 52 个民族。此后的一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又使另几个民族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土家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在 60 年代初得到了承认（土家族是 1958 年被确认的——译者注），而云南的基诺族则是在最近的 1979 年才被政府承认的（林耀华 1990：144）。民族识别工作还在继续，克木、白马氏和夏尔巴仍然坚持要求承认自己是单一民族。

这项民族志工作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详细的民族志报告资料具有内在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确定了哪个群体是被国家承认的民族而哪一个不是。这项工作使得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参与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工作中，因此这些报告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起到了指导作用。调查工作（为有关当局）“查清了各少数民族的族别和人口分布特点，摸清

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民主改革提供了系统的科学依据”（林耀华 1990：145）。费孝通认为，这种工作是必要的，有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巴博德 1988：650）。

以云南为例。调查发现该省 22 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有的还存在奴隶制或农奴制。^①1955 至 1957 年间，搜集到的各个民族的资料帮助政府制定出了合理的民主改革的政策（林耀华 1990：145～146）。例如，如果某个群体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肯定没有必要进行土地改革；而针对那些还处在奴隶制或农奴制阶段的群体的政策就是，要剥夺奴隶主或地主的阶级权力，并对他们个人进行改造（林耀华 1990：146）。

中国的民族学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所从事的最有价值的集体工作之一（肖家成 1990：57）。在他们看来，如此准确而科学地确认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数量，这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因为即使是苏联也是经过很多困难和复杂的计算才统计出自己的民族数量。林耀华称，在 1979 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墨西哥和拉美的学者对他所做的有关中国经验的报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学者理应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因为“新中国民族学在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上的确做出了成绩，世界各国还没有这样做过，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在理论上提高，毫无疑问会引起世界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林耀华 1990：145）。

① 这些阶段的划分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单线社会进化公式：所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注定要经过的阶段首先是原始社会，接着依次要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亦见第 120 页。[此指原书页码，即在第 7 章第 3 节——译者注]

第七章 学习老大哥

俄国人来了

当革命的中国正在进行土改和实行新的民族政策的时候，苏联的思想、专家和输出物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对学术界来讲，这种“学会一边倒”意味着苏联模式完全取代了西方模式。一位民族学家回忆说：“50年代我们批判西方，追随苏联。但是就像我们早些时候学习西方一样，现在又囫圇吞枣地吸收了苏联的方法，而且不加批判地运用到自己的领域。”

中苏分裂30多年后再来看这种采纳苏联观点的可怜作法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是5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是中国惟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同盟国，世界上惟一个愿意帮助中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而且，苏联是惟一个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国家，中国的目标就是达到苏联的水平。假如不向这样一位“老大哥”学习，不是会蛮干吗？一位当时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沙博里（Sidney Shapiro）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长期以来）

对中国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学习苏联的经验。斯大林的著作和在斯大林督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是我们

所学课程的教科书。几百本苏联的书籍被译成了中文并被广泛阅读。知识分子谈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和一些现代的苏联作家。很多人都学习俄语。书店里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俄汉对照的初级读本，上演苏联的戏剧和轻歌剧。有一大批苏联电影，都配有技巧很高的汉语对白。广播里也都是苏联音乐。人们用汉语唱苏联歌曲。在中国许多大城市的舞台上演出苏联最优秀的艺术作品。（Shapiro 1979: 94）

同样的气氛感染了学术界的很多人，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受感染。俄语成为高年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至少要学习两年），英语的使用却受到限制。主要使用苏联的教科书，许多教员原封不动地照苏联教材授课（Thurston 1987: 59）。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在民族学和其他一些允许继续存在的人类学科学领域，苏联的影响越来越大（施正一 1981: 176）。

然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正在从几十年来一直遭受斯大林主义者猛烈攻击的学科中学到经验教训。譬如，20年代是苏联民族学的黄金时代，而到了30年代它已经失去光彩并开始遭到禁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些年里，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几乎完全停顿^①（Plotkin

^① 林耀华将苏联人偏爱“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而不是“民族学”（ethnology）做了这样的解释：苏联人认为民族学与民族志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学是学科的理论建构方面，而民族志“仅仅”是它的资料搜集部分。这是一个人为的划分；理论来自于具体事实，因此民族志资料应该占先。然而，中国一直在使用民族学这个名词。

and Howe 1985: 275)。从 1938 年到 1949 年，苏联流行教条主义的进化论，这使得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科学文化发展方面的讨论成了“内部辩论”(Plotkin and Howe 1985: 303)。几十年前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始人阿努钦(Dmitri Anuchin)却激发了学生对人类学更具体生动的想象，四大学科的人类学假设，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他一些人，如博格拉兹(Vladimir Bogoraz)和什顿博格(Lev Yakovlevich Shternberg)与博厄斯的私交都不错，他们也都热衷于整体论方法；苏联民族学派是由这些人他们的学生组成的，其喉舌《苏联民族志》是 50 年代中国资料室里收藏的主要刊物。

斯大林主义的高压手段还表现为：即使人类学家知道出现了重大错误，他们也必须保持缄默。例如，苏联北部的研究人员了解到 30 年代对驯鹿放牧者实行集体化肯定会带来一场灾难，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对此一言不发。^① 同样，50 年代反马尔主义运动(anti-Marrism)使得语言学家遭到逮捕或是受到恐吓。之后的许多年里，比较语言学一直被严加禁止。直到 50 年代末，苏联的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才开始复苏。^②

苏联模式最持久和深远的影响是在行政机构方面。大学和研究所都遵循苏联的管理方式，50 年代初的高教改革之后，中国的机构都按照苏联路线再造。和苏联一样，人类学科学也被分成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四支，分别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然而，

① 1988 年 1 月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对 Jovan Howe 的采访。

② 1991 年于莫斯科，对莫斯科国立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imenov 的采访。

中国的教育机构不完全是其苏联榜样的翻版；人类学科学分成了四个研究所，在组织结构上，并非所有的细节都与苏联一样。在苏联，物质文化史研究所^①（苏联考古学研究所的另一个名字）研究所有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当代；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如，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了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要分开来研究，旧石器时代属人类学研究的范畴，而新石器时代则属考古学范畴。

中国考古学家声称，考古学不属于一门自然科学，因为它将人类出现以前的时代和所有时代里与人类无关的自然物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此，考古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夏鼐 1990：63）。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分野就合情合理了。按照这种说法，旧石器时代人类进化的推动力无疑是生物学方面的，而新石器时代则开始转变成为由文化支配进化的时代。

苏联这个模式在结构上还有另一个特点。与考古学一样，民族学既然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苏联的民族学教学组就通常设在历史系；^②中国的大学也照此行事。而且，苏联的民族学院分国家、共和国和地区三级体系，中国于是也套用这一模式，发展了国家、省和地区三级

① 研究所里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不论方法论还是理论都相当贫乏；这些都是历史学的地盘，在这里考古学仅仅被看作一个分支。

② 在苏联，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突出地位要追溯到 30 年代，当时考古学和民族学被取消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院校里划归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据说考古学和民族学都反映各社会力量及其产物的情况，因此不能分开来单独研究。只有历史学才能提供整齐划一的知识（Plotkin and Howe 1985：274）。

民族学院制度。^①

苏联访问者

中国人类学科学界与苏联同行的联系多起来了；但被派到苏联去的中国学者的人数比到中国来的苏联学者要少。^② 苏联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出现意义重大，他们广泛地参与了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教育改革。1950 至 1952 年间，126 名苏联高级教育顾问来到中国，接着又陆续有更多的人到了中国。1269 名协助高等教育工作的人当中有 615 名是教师 (Orleans 1987: 188)，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

苏联顾问隶属于高教委，他们在那里协助进行发展理论、制定政策；更多的人被指派到了具体的大学里，在学校改革和教学工作（大多是专业科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参与所在系的基本计划的制订和课程设置，对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都提出建议，并参加授课、研究生教学和生产实践。(Orleans 1987: 187)

尽管有这么多苏联专家出现在中国大学和学院校园里，他们当中却没有几个人精通人类学科学。帮助中国发展人类学的苏联人中，大多数是民族学家。在所有的人类学学科中，只有民族学受西方影响最深，因此也最需要确

① 然而，在苏联，各共和国和地区级的学院对民俗的兴趣大于对民族学的兴趣。

②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反差是对的；一万名苏联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帮助制定了 150 多个关键性的建设完整的工厂的工业项目；而多达两万五千名中国人到苏联去求学和受训 (China Talk 1987b: 10)。

定新的导向。随着一、二十位苏联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一同到达中国的是一大批苏联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第一批是1955年到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去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但他们也去北京和各地其他的大学访问过。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专家列文科（V. F. Levinko）是先期到达中国的苏联人之一；他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并举办有关斯大林民族及语言问题研究方法的讲座。与其说这是民族学，还不如说它是马列主义，但它毕竟是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实践。

这些苏联的实践经验包括对中国正在进行和准备进行的民族学工作方面的有价值的经验。大约三十年前，苏联专家开始了自己的民族识别工作，他们经历过的许多问题与中国人遇到的一样。比如说，当中国人开始绘制自己的少数民族地图册的时候，就是从莫斯科民族学研究所^①和两名1956年派到中央民族学院传授苏联方法的专家那里寻求的帮助。

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来不是进行教学工作，而是充当顾问和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着东南亚（特别是缅甸）方面知识的民族学家斯特拉丹诺维奇（Grigori Grigorevich Stratanovich），1956年夏至1957年间来到中国，敦促完成一部多卷本世界民族志著作的东亚卷。其他的民族学家也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进行研究和培训，也有少数人

^① 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是主要的民族志研究中心。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有分部，而莫斯科分部的人行政地位更高，更接近权力中心。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历来就有宿怨，分部之间相应也产生了竞争。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研究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Plotkin and Howe 1985：258~259）。最近，该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50年代托尔斯托夫等人将莫斯科作为新的中心之前，圣彼得堡是民族学的中心。

只是作短暂停留。例如，民族学家阿留提诺夫（Sergei Arutiunov）1958年秋季去越南的红河三角洲进行田野工作前后都曾到中国作过几周的访问；在北京期间，他就正在进行的“大跃进”进行了讨论，并听了林耀华对一个苏联访问团作的有关中国民族划分的演讲。

所有到中国的苏联人类学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期担任莫斯科民族志研究所远东部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他是当今民族学界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老师、良师益友和训练人。当时他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室的负责人，被邀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室教研究生。切博克萨罗夫长期以来研究中国事物，3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从事对中国洗衣工的人体测量学研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此后的一些年里继续进行东亚研究。从1956年夏到达中国直到两年后离开中国，他教授了大量的课程，包括：世界民族志、民族志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研究等。授课过程中，他全面地讲述了民族学和民族志的历史，弘扬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用俄语讲课，金天明和李毅夫翻译。由于学生同时也在学习俄语，他到中国一年半以后讲课就不用翻译了。龚佩华现在是中山大学的一名民族学家，她记得“切博克萨罗夫不是任何个人的导师；大家只是听他的课。当时我们受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的影响相当大。我们选林的课学习美国和西方民族学，而切博克萨罗夫教我们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民族学”。

切博克萨罗夫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第一个研究生田野方法培训班。来自许多系和专业的学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系的学生和干部，参加了这些讲座。始于1956年的覆盖面极广的社会历史语言调查进行的那些年里，需要大量合格的民族志田野工作者；切博克萨洛夫的培训有助于填补这个空缺。当然，他不是孤军作战，中国教师也在

培训班教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志。

在切博克萨罗夫众多的学生当中有藏族专家李凤珍、苗族专家王慧琴和其他一些在各自单位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当代著名学者。尽管切博克萨罗夫 1958 年返回了祖国苏联，他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他和列文（Maxime Grigorevich Levin）、托尔斯托夫（Sergei Pavlovich Tolstov）共同编写的教材《普通民族学概论》第 1 卷由金天明和周为铮翻译成中文，并于 1960 年出版。^① 该书包括了从进化论理论到博厄斯派，从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到苏联民族学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在内的诸多内容，成了中国一代民族学学生的教材。不久，切博克萨罗夫和其他两位苏联汉学家克鲁阔夫（Mikhail V. Krukov）和索甫若诺夫（Mikhail V. Sofronov）一道出版了一本论中国民族学诸问题的书，囊括了他们的考古学、历史、语言学、考古测量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Andrianov 1980: 186）。

在语言学和民族语言研究方面，切博克萨罗夫的老合作者，莫斯科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索甫若诺夫称，50 年代苏联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很重大（Sofronov 1986）。索甫若诺夫本人 1955 年到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会见了包括王力在内的一流语言学家。1949 年前，中国学者主要致力于语文学研究而不是语言学研究，但索甫若诺夫注意到，到 50 年代中期，中国人的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想学习语言学了。

据索甫若诺夫说，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关于语言方面的文章的影响。精通了斯大林的著作之后，

^① 请注意，中译本将俄文原标题中的“etnografii（民族志）”译作“民族学”。

中国学者知道了如何将语言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科学区分开来，并开始将后者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但不是制度化的独立学科领域——来研究。但是毫不奇怪，中国的语言学家并不认为中国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和苏联合作以前，几乎算不上有什么语言学研究的成就。一位云南的民族学家对我说，至少是大学里的人认为苏联在语言文学领域的影响很弱，因为“在文学领域，还用得着他们来教我们？我们叫他们‘苏联老大哥’，可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听过他们中的一些专家的讲座，但我们绝没有成为他们的学生”。

这些访问专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来自莫斯科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尔裘琴科（Geroe Gerovich Serdiuchenko）及其妻子托塔耶娃（Todayeva Serdiuchenko）——她也是一名民族学家，是著名的《种族与文化》一书的作者。她是蒙古族人，后来加入了苏联国籍，是一名突厥语专家。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夫妇二人来访问中国。这两位语言学家在中国呆了近四年时间，教课并研究语言问题。他们一起访问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发展了约 14 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① 一位云南的民族学家回忆道：“谢尔裘琴科是一位每个人都要向他请教的专家，1957 年春天他到昆明来访问，呆了一个月，和我们许多人都成了朋友。一位同学甚至邀请他去参加他的婚礼。”在中央民族学院逗留期间，托塔耶娃对阿尔泰语教研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几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也访问过中国。其中

^① 据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人员称，许多年过去后，谢尔裘琴科协助创制的文字已经不再使用了，由汉族文字替代。他们举了广西壮族为例，据说比起 50 年代使用的文字来，他们现在用得更多的是汉字。

一位是著名的西伯利亚考古学家吉谢列夫（Sergei Vladimirovich Kiselev）。吉谢列夫从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社会科学院毕业后，于1951年成了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不久就获得了列宁奖章。1950年和1959年他两次访问中国。第二次访问中国是受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邀请，1959~1960学年他在该系讲学。然而，考古学家们都认为他的影响是最小的。

苏联古人类学家与其中国同行进行的最重要的合作项目是中苏古生物考察。这个项目是计划用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完成中亚考察团在20年代所进行的工作。新考察工作的前半部分是1959年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主要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区，而后半部分即苏联境内的考察工作则一直没能完成。

在此期间，两名苏联学者还访问了云南，被派到新成立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室工作。其他的苏联学术界人士也作为东亚考察团的一部分访问了云南，并搜集到一些灵长类动物的化石。他们是大规模的中苏合作调查放射作用对灵长类动物影响的项目的一部分。由于这类研究无疑具有军事的和科学的应用价值，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项灵长类学研究工作一直得到中央机构的支持。

50年代，除了学者和顾问之外，苏联留学生也来到中国。30年后，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们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苏联与东欧校友，其中包括著名的民族志学者列舍托夫（Alexander M. Reshetov）。在此期间，苏联汉学家克留科夫（Kriukov）也初次来到中国，作为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他在那里获得了一个考古学副博士学位。^①

① 中国采纳了苏联授中级学位的实践经验。

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个人也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在学生和年轻教员之间。谢尔裘琴科的翻译阮西湖成了他们夫妇俩的密友。克留科夫同样也与很多人保持着长期的友谊，甚至还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

中苏关系中还要数学生之间的关系最亲密；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许多苏联访问者抱怨说，要与中国同行建立亲密的关系真是太难了，“由于相互之间了解甚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保持着距离”（Price 1987：163）。缺乏亲密感的原因之一可能仅仅是因为大多数访问者在中国呆的时间太短。一般是一、两个月，对于那些被派到北京以外的城市或北方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莫斯科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制图组的负责人普契科夫（Pavel Ivanovich Puchkov）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国呆过；他指出了中苏学者之间保持距离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富裕而中国人清贫。我们有好的住房和食物，而我们的中国朋友、邻居和同事却没有。由于这种不平等，很自然就会关系紧张”（Puchkov 1991）。他还表示，直到1959年，中苏两国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

苏联的资料表明，除了派遣专家到中国外，还有1.1万中国人到苏联求学，其中大多数是本科生，这说明在联结中苏两国的纽带中，资金的投入是重要的一环（Orleans 1987：188）。模式是清楚的：到中国的苏联人大多数是“专家”，而到苏联的中国人中大多数是学生。人类学科学方面也普遍存在这种不均衡的倾向，但是中国派出去的学者和学生的人数相当少。例如，中国仅派出了一名古人类学的和几名考古学的学生。甚至在民族学领域，也只有三四年级学生被派到苏联。

民族学家、80年代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的阮西湖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

个。阮把到苏联去的人如此少的原因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学在中国刚刚成熟，所以学生人数有限，在这有限的一些人当中又只有很少几个会讲俄语。会讲俄语的几个人被选中派往苏联；因此谢尔裘琴科的翻译阮西湖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去莫斯科民族学研究所呆了几个月，而切博克萨罗夫的翻译金天明在自己的老师回国的时候陪着一起去了苏联。然而，金在民族学研究所进修两年的计划由于中苏分裂被迫中断。在与自己的老师兼朋友切博克萨罗夫道别的时候，他不可能想象他们二人直到20年后，即在这位苏联人1980年逝世前不久，才通过书信重新取得联系。

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和其他一些老学者和青年学者也在苏联作过短暂停留，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林耀华。1956年，林和其他的国际代表团一起被邀请参加全苏联民族学及考古学大会。林在会上作了“中国当前民族工作中的民族学任务”的报告，并因为这份报告和他在会上所做的工作而受到了很高的赞扬（林耀华1990：144）。

总的说来，苏联对华北的影响最大，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大多数会讲俄语的中国人都居住在华北，而且华北和东北还是中国大多数白俄族人的家乡。^①在人类学界，“北风”在北京和东北也刮得更猛，在那里有比南方的研究中心多得更多的人学习俄语、去苏联访问并与苏联人发展私人关系。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学生是北方人，他们从国外带着苏联的方法回到中国，正如几十年前吸收西方知识的学者（那次是南方人居多）带着西方的方法回到中国一样。

^① 随着50年代的消逝，旧俄人留在中国的越来越少，留下者大多数是经由日本移居来华的。

50年代初政府对苏联事物的热情对首都的影响比对边远省份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边远省份，美国和西方的影响经久不断，这是因为那里并没有受到与首都一样大的向苏联模式转变的压力。中国其他城市到苏联“老大哥”那里去访问的人要少一些（停留的时间也更短一些），因此受苏联“榜样”的影响也比北京和华北的省份要小一些。这种在取向上各自独立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长期以来对人类学科学的定义带有更多苏联的色彩，而南方则首先复苏了更加美国化的四大学科的人类学。

苏联思想

随着中苏两国人员大量互访，相应也带来了印刷品的泛滥。奥林斯评述说，苏联向中国大学提供新的教育资料的规模之大是无可比拟的，“1949至1955年间，中国出版了3000部苏联书籍，共发行2000万册”（Orleans 1987：189）。中国教科书的作者首先必须研究相应的苏联资料，列出将要写作教材的提纲，然后与苏联教师或同行讨论，最后这些教科书才能编写出版。同时还制定了大量的翻译计划，到1954年，有2700名大学教员可以翻译俄语。毫不奇怪，俄语已经成了最流行的外语，因为要想取得进步就少不了它（Orleans 1987：189）。

不久，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问题》就被译成了中文。从1955年开始，也有大批民族学书籍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世界人口统计》、《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民族》、《拉丁美洲的民族》和我们已经知道的《普通民族学概论》。苏联的刊物也出现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的各系，其中《苏联民族志》、《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与民族

学及人类学科学的关系最大。《历史问题》讨论民族界定和民族起源方面的问题，而《哲学问题》则载有关于少数民族形成的理论性文章。

苏联对中国的人类学科学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它教给了中国一个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的模式。由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那些认为民族学、考古学和其他的学科可以为新社会作出贡献的中国人能够从苏联看到，将这些学科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可能的。在如此强大的社会主义同盟国的情景中，中国人很自然会适应并采用许多苏联的方法。

中国学者知道，上一代苏联人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人类学科学从本质上讲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们可不可以被转化为进步的工具？50年代初中国杂志上出现的文章与苏联对民族志的抨击如出一辙，它煽动了人们对这个学科领域的反感情绪。直到50年代末，苏联亲民族志派的文章才被翻译成中文，而托卡列夫（Sergei Alexandrovich Tokarev）等倡导马克思主义民族志的学者的文章才得以发表。因此可以说，苏联关于民族志的争论四分之一世纪后又在中国舞台重新上演了。

苏联在民族学方面的影响比其他的人类学科学都要大——尽管当中苏友谊开花结果的时候，被斯大林理论束缚了手脚的苏联民族志刚刚开始恢复元气，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虽然受了多年的压制，影响中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理论家们仍然支持着自己的知识领域的观点，他们自己赞成跨学科的方法，认为应该综合理解用单一化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无法判断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些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毫无用处，他们也从马列主义的思想中受到了启迪。他们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这种批判地接受的态度吸引了中国学者，他们开始学习托尔斯托夫、柯斯文（M. O. Kosven）、托卡列夫以及上述切博克萨罗夫等苏联同行的思想和分析方法（金天明 1986a：410~411）。

托尔斯托夫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的思想却影响了中国人。他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苏联民族志学者、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1939年到1951年，他同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和该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1942年至1966年，他任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整个50年代，他还担任《苏联民族志》的编辑。他的著作的中译本说服了中国学者，他们不再浪费时间去为某个群体所处的特定的进化阶段争论不休，而是把精力集中在搜集准确的田野资料上（金天明 1986b：493；Plotkin and Howe 1985：281）。

然而，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化理论中的“阶段”概念在中国民族学思想中仍然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许多中国学者到今天还认为，发展出了原始社会这个概念是苏联民族学的最伟大的成就（林耀华 1986b：324；Plotkin and Howe 1985：257）。这个概念起源于19世纪进化论的思想，他们认为我们人类是从原始祖先向现代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在全球都是一样的，是分阶段进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分段法正好与他们对历史的分析一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原始社会是这种分段法中最低级的发展阶段，就该让考古学和民族志去揭示这个史前阶段的本来面目。然而，1937年，针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辩论受到了压制，只允许用斯大林的“五大阶段说”来作为这个问题的惟一解释（Howe 1987）。

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张锡彤将柯斯文的《原始

文化史纲》翻译成了中文，原始社会研究开始引入中国。“每个人都读过他的书，并受到了他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章的影响”，一位民族学家回忆说，“他写的东西也有民族理论方面的，这也影响过我们。他的《原始文化史纲》成了整个50、60年代的参考书，我们都试着将这本书和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的观点运用到自己的领域中。”厦门的林惠祥走得更远，他强调原始社会研究是人类学的精髓；在这个过程中，林惠祥明确地将人类学与社会学做了区分，而将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社会的研究（陈国强 1990a: 45）。许多民族学家一直保持着对柯斯文的尊重；林耀华对我讲，柯斯文的著作在抛弃民族优越感、描述简单社会方面作出了榜样。

50年代，托卡列夫发表了大量有关苏联民族志的论文，让中国学者可以阅读和汲取许多他后来在《苏联民族志的历史》中系统地介绍过的资料。作为一名大洋洲、澳大利亚和宗教史专家，托卡列夫全面地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民族志的历史、方法和哲学。许多中国人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

1957年，托尔斯托夫和列文、切博克萨罗夫一起写出了有影响力的《普通民族学概论》。至此，这三位“苏维埃民族志学派”的带头人将几套理论方法介绍到了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学说。这种学说假定存在有大量基本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是以放牧、攫取和农耕等各种形式的经济/生态组织为其存在基础的。此处的“经济”是广义的，不仅指传统的经济领域，还指环境、生态平衡和生产方式。这一基本上属于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被中国学者运用于中国；林耀华的一篇论文便是范

例，这篇论文是经过与切博克萨罗夫讨论后写成的。^①

这类合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毕竟正是切博克萨罗夫本人在中央民族学院停留的两年里阐述了这一理论。当时林和切博克萨罗夫建立起了“相当亲热与深厚的人类友谊”，因为林把切博克萨罗夫视作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民族志遗产的传播者（Arutiunov 1991）。据当时在那里一个学生说，学院里切博克萨罗夫的学生和其他的青年教授们同样也受了林和切博克萨罗夫所作出的中苏合作的榜样的感染；所有的中国研究人员都试着将经济文化类型的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田野工作报告中去。然而，假如不是因为中国人还看不到切博克萨罗夫著作的中文版，他们就不会把经济、生态和社会形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理解得太复杂。而当1960年切博克萨罗夫的著作终于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却正是中苏分裂开始的时候，这一理论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吸引力了。

这一时代介绍到中国的人类学写作方面的一大创新是“斯大林式”的学术论文写作方式，论文开头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然后才切入正题（参看 Plotkin and Howe 1985: 260）。有时候开头部分和结论部分也包括用黑体字引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巨著中的文字。到了60年代，这种带有政治性的学术倾向几乎成了强制性的。

这一时期理论文章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是重新批判性地评价资产阶级人类学。批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米德（Margaret Mead）、卡迪纳（Abram Kardiner）和本尼迪克特的心理人类学。这三个人遭批判的原因都在于错误地提出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源于个体的心理变化；这种对社会因果关

^① 原著最近重印的情况可参看林耀华，1984。

系理想主义的误解被认为是试图错误地用个人或个体的因果转换来解释社会的因果转换（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2）。

和在苏联一样，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在中国也被认为是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①，尽管这些作者本人是公开反对种族主义的。据称，他们的意识以及对“国民性”的文化研究中都认定不同的民族有优劣之分，这里面就隐含着种族主义的观点。米德主张美国模式，这似乎是宣称美国文化是在其他文化之上的，值得模仿。她的论断似乎是：这种优秀文化取决于某些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事物所固有的，而在美国文化中可以发现大量这类因素。它被认为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因此这个学术流派又被称作“心理种族主义学派”。这种民族优越感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2）。

正如早先已经提到过的，苏联在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民族识别和民族定义。在这一领域，理论领导的作用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列宁有关民族的著作选集来完成的。《选集》集中了这几位作者毕生的成果，而斯大林的《选集》是第一个在中国出版的；很显然，斯大林对民族的划分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影响最大。《选集》中收入了他 1913 年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初的系统阐述和 1929 年的修订版，名为《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文章中他清楚地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要想被称为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必须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

① 写这种分析文章的是 Pavel Kushner，一位理论民族志学者；Julia Aveekieva，博厄斯、Shternberg 和 Bogoraz 的学生，也是 Leslie White 的一位老熟人。

基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

尽管这篇文章是1951年首次发表的，可是直到过了两年《选集》出版之后，这个定义才在中国被广泛地引用和运用。然而，几乎是从一开始，中国人对他的这个定义就怀有疑问，并对它作出了改进，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有关民族定义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学者不久就发现，当他们5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自己的调查工作时，并不总是能够原封不动地运用斯大林的定义。中国学者灵活地运用斯大林的定义，他们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历史渊源、迁移的历史和各民族自身的意愿作为识别的标准（黄淑娉1988）。在这方面，苏联“模式”至少是一个参考点。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年之后《列宁全集》也面世了，民族工作者这才能够从更多的著作中去寻求民族问题的指导方针。

考古学在某些方面也是跟随苏联的范例，而有些方面却不是。一方面，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使考古学教研室和考古学课程和苏联一样可以在历史系落脚。而且，北京大学第一个实行考古集中授课，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回忆道：“在课程设置、编写教学大纲、讲义过程中曾参考莫斯科大学考古专业教学计划和一些重点课程教学大纲”（苏秉琦1990：69）。在苏联学习过的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回国后同样也按照苏联的教科书授课。

^① 中国民族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斯大林的定义是否科学——的新意见。与会的有些人认为他的定义基本上说来是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而另一些人认为他的定义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定义，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因此民族学家不能毫不批判地运用它。会上提交的部分论文发表于《民族研究》，1986（5）。

而另一方面，50年代中国考古学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对苏联的实践亦步亦趋。拿一件事来说吧，中国考古学界并没有将这一领域视作“物质文化史”。中国人认为，既然“考古学的目标是要重现古代人类历史，我们就必须明白，考古学包含了所有的方面，而不单单是物质文化”（夏鼐1990：63～64）。苏联学者最终也改变了自己极端的立场；1957年，他们将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更名为考古研究所（苏秉琦1990：69；夏鼐1990：64）。

《苏联考古学》（*Sovietskaya Arkeologia*）是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苏联考古学杂志。其他的考古学方面的苏联刊物有《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简报》（后来又用更名后的名称《考古研究所报告》）、《历史研究所报告》、《考古学与种族》和《苏联考古学资料研究》。尽管刊物的数量相对来讲比较大，但它们总的影响却是最小的。在民族学方面，很少有学者可以阅读原文资料，而每年只有极少的文章是译成中文出版的。

考古学家也认为这些刊物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就收集有丰富的资料以供发掘分析，因此不需要依赖苏联的指引。中国学术界认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历史学是一个有着两千年传统的领域，因此可以教给苏联同行们一些东西。“我们看苏联考古学家的著作，从中找不到一句有关中国的话”，一位云南的学者回忆道，“苏联没有一位考古学家来云南访问过；我们只是读过他们的一些书。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苏联考古学决没有可能影响我们。”

苏联在古人类学方面的影响也比较小。对中国古人类学产生过影响的苏联作品是罗金斯基（Ia. Ia. Roginski）和列文（Levin）的《人类学》，它1955年一问世就成了中国体质人类学家的参考书。《苏联人类学》杂志也有一

去海南岛，张寿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海南的工作分四个小组进行，其中三个小组被分派到三个县，第四个“一般情况”组在岛上巡回考察、全面了解情况，然后在一个特定地区作一个月左右的短期停留。负责整个海南组的组长也是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

笔者曾在广东民族学院对一些参加过海南社会历史调查的老同志作了采访，这使我更多地了解到这个跨越了两个研究阶段的调查是如何进行的。这些调查是岑家梧海南岛工作的一部分。第一轮是在1957年5、6月份进行的，十多名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成两个小组，调查重点分别放在海南的番阳和毛道地区。每个小组要挑选出该地区几个不同的村寨，对每个村寨都花上一、两周时间进行调查。当地干部被派到各个小组，他们每到一处干部们都要陪同前往。

研究人员们都住在一间木房子里，中间隔开、男女队员各住一边。他们用自带的炊具作饭。甚至连毯子、蚊帐、抗疟疾药、水瓶和睡衣裤都带去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讲当地语言（番阳讲黎族语，毛道讲苗族语），因此只得用普通话和当地干部或村干部交谈；而大多数的当地人根本就不懂普通话。

调查组的领导分配了研究课题，内容包括从农业生产到技术、社会结构和现代史方面的各种问题。要求研究人员在熟悉了指定研究地区的情况之后，还要在其他地方重复调查这些问题。虽然如此，许多田野工作者在同一次田野访问过程中也解决了大量不同的课题。如果可能的话，还鼓励调查者参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如要询问被调查群体的农业技术问题，田野工作者们就得在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同时，身体力行参加农业劳动。

第二年度的研究是在1958年7月到1959年3月间进

行的，当时全国上下正处在大跃进狂潮中，还是由原来的调查组来完成的。岑家梧、张寿祺和老调查组的研究人员重返田野再做调查，他们进入5个山区进行了80天的实地研究。当时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历史文献专业的学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和他们一道返回了番禺和毛道。新增加人员后各个小组就显得太大了（每个组10多人），因为一个组所有的人都呆在一个村子里；3个多星期后，这些小组发现有必要分开来完成研究任务。

每年的工作完成之后，完整的报告就送到了广州的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些年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出版了大量的著作，而在当时它们还属于内部资料，就连田野工作者们本人都不允许复印自己的田野笔记。然而，有些学者注意到，学者们通常并不遵守这些规定，他们保留了一些收集到的资料的副本供自己以后分析和出版。

当别的研究人员都回家或回单位以后，张寿祺自己接着又搞了8个月的黎族起源及其民族史、考古纪录、民间传说、民俗和语言的调查。这位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田野工作者直到1959年4月才回到广州。大多数人的步调都不是很快，例如其中在广东民族学院工作的那些人回忆说，调查组会对一个村庄进行3个月的研究，然后回到广州家中呆一段时间。直到1961年左右，每年两次田野工作是这些研究人员标准的工作定额。因此当有些人几年如一日地留在田野进行工作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就可以因此而少下乡，家庭生活也少受干扰。

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对这些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一是毛主席对民族学家所下的“抢救落后”的指示，二是两位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志学者费孝通和林耀华的一篇指导性文章。费和林合写了《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

务》，为社会历史调查组实现毛泽东的目标指明了道路（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2）。文章 1956 年首次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科学通报》上，1957 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对全国正在进行的民族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费和林“告诫说，要克服急躁情绪，建议全面搜集民族志资料，并一再要求确保获得的资料的效度（validity）”（黄绍伦 1979：87）。

工作由官方主办同时意味着调查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这对大多数田野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变化。参加调查组的许多人还记得他们对自己能够得到如此好的装备感到很吃惊：田野工作中居然还给配备照相机和雨衣。他们对自己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帮助也深感惊异，这与解放前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当地官员对田野工作者通常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扰乱他们的工作。

然而，官方主办的一大弊端是研究人员不能自己选择研究课题，因为他们是被分配去考察调查组想了解的情况。尽管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研究个人感兴趣的课题，但是研究人员很少能有空闲。所有的田野工作者主要的、也是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的任务便是整理当天记下的笔记，包括评述报导人的可信度、采访的环境和本人对所遇事物的评价。无论多么尽职，也只有极少数的研究人员能够毫不含糊地照章办事；一天工作下来他们实在是太疲倦了。

家务琐事也让研究人员分心。有时候一两个研究人员会被分配去与一户当地人家同住，但是至少是在研究工作开始的头两年里他们不能在这户人家开伙或是与他们一起用餐。相反，他们要去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集中做饭，这样才能避免给房东增添负担。

当时研究人员对翻译者和主要报导人的依赖性很强，这是在每个特定地区通常只作短暂停留的实际需要。一般

说来，一个调查组会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他们在一个乡选择两三个有代表性的村，然后在那里住上两、三个月、间或四个月。同时通过在全乡广泛搜集数据，他们将他们在各村的具体经历与该乡的一般情况作比较。在许多年里反复进行大规模的类似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尝试对一个复杂社会的民族情况做出一部整体论的民族志。

与田野工作同时展开的还有对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的实地讨论。参加讨论的通常还有在场的当地报导人，主要是担任少数民族领导职务的人。讨论会大约每两个月定期举行一次，每次讨论会开过之后通常一个研究阶段就告一段落了。民族志学者称，每当本地参与者不理解正在讨论的民族志观点、理论的和政治的观点或分析时，就会即席展开研讨会似的讨论，以使这些业余民族志工作者对此能有清楚的认识。然而，由于交通不便，使得一些相关方面人士常常不能出席讨论会。会议结束后，要派专人到北京去汇报会议要点和得出的结论。

田野工作项目本身的任务是组织收集资料，为写出三类报告作准备。其中两类相对来说简明扼要些。一类报告是“社会历史调查计划”，报告有哪些单位支持调查组的工作，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经费，以及各人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另一类是“社会历史调查预算”，统计调查组的支出。

最费时间的报告是“社会历史调查提纲”，它需要有详尽的问题，主题从婚姻、家庭结构到自然环境等，通常都是指定好的，但大多数人都自行设计合适的问题提纲。早期阶段，1956至1957年间，出自老学者，如吴泽霖、杨成志和杨堃等人之手的提纲侧重于生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唯物主义分析中的“上层建筑”），提纲中有很多关于“习俗”和信仰、婚礼和葬礼、对宇宙本质认识的宗

教思想以及人的道德与超自然现象等问题。^①

作为组织访谈用的问题清单，“提纲”不全是需要填充的表格。一位民族志学者给我看的一组1957年使用过的问题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 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何时到达这一地区？

2. (a) 你什么情况下使用这把（某一类）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它的？(b) 在你使用这些刀之前用哪类刀？（这个问题反映了对文化涵化的兴趣；问题中的刀是从汉族传过去的。）

3.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用牛拉车的？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跟谁学的？

4. 过去你们和汉人打架吗？你们怎么打他们的？常打吗？什么时候打？

5. 你们和本民族其他分支有过大的冲突或战争吗？

6. 30年代之前，头人们曾制止过战争吗？头人是怎样的一类人？

7. 你知道（神话中的）七个祖先为什么来这儿吗？这与他们的发源地有没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是一连串民俗方面的问题）

8. 你是否注意到过去的几十年里服饰方面有些什么变化？

9. 很久以前你们的人是怎么弄到盐的？你们怎么支付报酬的？

^① 因为强调了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中遭到猛烈的批判。见第9章。

民族志学者向 20 到 30 个人问这些特殊的问题，直到能够从足够多的、重复的相同回答中决定问题的答案。每个被访者的姓名、所属阶级或职业都被记录在案。

田野工作留下的财富

这些社会历史调查以比原计划快得多的速度得出了结论。到 1959 年，尽管有些地区还在继续收集资料，但大多数民族志学者已经转而进行编辑出版收集到的资料的工作了。对每个研究过的少数民族都写出分类报告，附有一份该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总结。整个 60 年代初大部分时间都在继续进行着这类工作（李有义 1980：52）。

当时计划共出三套丛书：第一套是经识别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第二套是少数民族简志；第三套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这些报告是从调查期间所写的成堆的田野报告中精炼出来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声称，收集到的资料已经出版的还不足一半。1987 年，约有 190 部书籍问世，还有 150 本著作也即将出版（林耀华 1990：147）。完成了 23 部纪录片，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原始资料尚待分析。^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多数的相关资料都无法接触，1979 年才恢复了这些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此后的几年里又出版了两种新书——一种是所有少数民族的综合卷，另一种是 55 个民族的语言报告；再加上先前的三类

^① 在 1990 年 1 月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被告知，不久外国人也可以购买这些影片。

出版物，一起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系列。^①这个项目是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指导下完成的。

中国组织这些资料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运用恩格斯/摩尔根/斯大林的历史阶段划分方法来对资料进行编排。林耀华声称，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再现了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直到封建社会的进化顺序（林耀华 1990：147），这种观点是用来分析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中心思想。杜荣坤和杨光海则称，“中国的 50 多个民族当时还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体现出一部“活生生的、完整的社会进化史”（杜荣坤和杨光海 1989：66~67）。

民族志学者们同时也可以利用民族志方面的影片来“保存这些有价值的历史民族学资料”，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杜荣坤和杨光海 1989：67）。拍摄了有关“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少数民族的纪录片（林耀华 1990：147）。民族学的迫切需要和政治正统思想恰好不谋而合，在这种前提下，社会历史研究者们到 60 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大部分影片的拍摄，但还有一部分直到 70 年代末才完成（杜荣坤和杨光海 1989：69；肖家成 1989：50）。

调查被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有效性，继而引申出中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调查的这种政治作用影响到了当时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陈伯达，他写道：

① 计划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一套 55 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一套 57 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一套 120 多卷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一套 100 多卷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导引卷名为《中国少数民族》，是单独的一本。

“进行这样的研究，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会继续引出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结论。”（引自黄绍伦1979：86）（译者按：原文见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载《红旗》，1959 [13]）然而，费孝通和林耀华担心有些研究工作者只是寻找那些符合先入之见的资料，因此，这两位学者“警告他们不要教条地应用马克思的图式”（黄绍伦1979：87）。

回顾一番就能看出，这些社会历史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成长。这些调查完成了100多部书籍，积累了几千万字的研究笔记和资料，锻炼出数百名研究人员（林耀华和金天明1980：52）。在人员方面，调查对参与者的职业生涯和专业方向的确立起了催化作用。50年代末受训的青年学生成了今天民族学和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带头人。他们与这些领域的长期联系产生于投身社会历史研究的年月，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经受锻炼激励学生们阅读更多材料，了解更多情况，学习更多知识。由于工作人员需要分析收集到的资料，为当地政府制订少数民族政策提供建议，那些曾经参加过调查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研究所、民族学院和高等教育部门寻找工作，在此后的岁月里继续探索民族志。

在此期间，与民族志有关的单位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全国规模的大调查的推动下，民院也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少数几所发展到了省区级的多所；从1956年开始，在云南、广东等省建立了新的民族学院。有人类学背景的大学，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强调民族志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大量省级和地方级民院也第一次获得了发展的原动力（林耀华1990：149；李修宏和周鹤鸣1988：346）。

然而，调查所遗留下来的财富不仅仅表现在它对民族学家和他们的机构产生的影响。黄淑娉认为，民族学家在此期间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淑娉 1990）。除了在早期少数民族识别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最重要的两个贡献是：

①弄清了各群体的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学家帮助分析了各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需求。汉族需要进行土改，但并非所有的群体都需要土改。10多个群体直接从原始共产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许多（民族）群体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来推动其进步，对于民族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些改革是能够以和平手段进行的。

②运用大量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是在 1965 年之前进行的，当时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

50 年代的调查赋予了参与者使命感，也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发挥。林耀华最近对这一时期旧话重提，他描述新社会追求的人道主义和公正的目标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新的公正感也在党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对林和其他人来说，革命使得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能够为社会作出充分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为了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迫切需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这时，进行民族识别并承认各民族的地位，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经济、文化，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后进的民族得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发展、共同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与在党的领导下，由各有关学科的工作者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分不开的，这其中也有民族学工作者的一份功劳。（林耀华 1990：142~143）

•

第四部

**“毛泽东化”的人类学
学科体系(1957~1978)**





第九章 以毛泽东化为中国化的标志

由于苏联模式遭到怀疑而在中国舞台淡出 (fade),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又已被社会摒弃, 从 50 年代末开始, 中国不得不坚持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新的独立道路的过程走了弯路, 在激进、仇外和极端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指导下对社会科学进行了调整。从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和次年的大跃进开始, 中国学术界卷入了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知识领域研究的“伟大工程”。凡是涉及到人类学科学, “毛泽东化”的学术体系就被视为是有中国特色的表现, 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确实是独一无二的。^①

反右派运动前夕的学科体系

50 年代中期, 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发展态势良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夏鼐经常把解放后的这段时间称做是一个黄金时代, 因为田野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 政府对考古发掘工作者的支持也加大了。这一时期许

^① 程等人对社会学也持这种观点 (Cheng and So 1983), 但阎鹏却强烈反对这种看法 (阎鹏 1990)。

多古人类遗址也在展开工作，其中包括周口店旧址（和新址）。^① 由于得到中央、省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真正成了全国性的工作。

随着 1956 年和 1957 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项目的进行，民族学和社会研究也在蓬勃发展。费孝通 1957 年写道，当时进行的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和工厂的社会调查事实上“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1979a: 33）。人们可以和费商榷社会调查究竟是否类似于社会人类学，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学术界取消多年以后，他们又要继续主动公开地运用它们了。

之所以可以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因为国家的政治气氛已经有所缓和。这种缓和在前一年表现为“百花齐放”，它引来了大量改进党、政府和社会工作的批评和建议（Spence 1990: 567~572）。许多知识分子趁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费是比较爱提批评意见的人之一，尽管他以雄辩的口才提出了重建社会学这一学科体系的意见，社会学还是没能走出受官方怀疑的阴影（黄绍伦 1979: 51~52）。

相比之下，民族学在短期内还受到过重视。1956 年起草的“全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特别提出要支持民族

① 大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50~1953 年间）中国盛传着这样的流言：著名的北京人化石被美国人偷走了。当日军袭击珍珠港和菲律宾导致美国参战时，为了防止日本报复，用船将化石运出中国。但到了海军那里，这批化石就失踪了。从 1941 年失踪的那天起，美国政府和各私人组织就矢口否认与之有关。一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受访者认为，谣言是由于一个东德人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见过化石碎片而引起的，他对裴文中说美国人的确控制着这批文物。文革后期，周恩来曾想平息这种谣言，但没有完全成功。现在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同意美国人否认自己曾经介入的说法。

学。国务院希望制订出各个学科的长期规划，明确在未来十年里发展该学科所需要做的工作。民族学家都集中精力拟定“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规划任务书”。民族学部分的规划主要是在林耀华、李有义、陈永龄和沈家驹等人的领导下制定的（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4；秋浦 1984：16）。

为制定计划，学者们参加了大量的会议，会上他们讨论在中国正确发展民族学需要做的工作。仍然需要翻译重要的外国著作，包括弗雷泽爵士的《金枝》以及威斯特马克、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米德的作品。十二年规划也提出了民族学的主要任务，如调查“少数民族识别方面的问题，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各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生活特征和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国科学院自己的规划要求开展类似的工作，但还指示要“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秋浦 1984：16）。

十二年规划还在民族学机构的设置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它的支持下，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所。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两个研究所都是从中央民族学院过去的研究部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有一部分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该部也是 1955 年刚成立的）。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迅速担负起了培养研究生的重要任务，并成为民族学理论建设中心（李达 1979：114；Mei 1986：10）。大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央民族学院在历史系成立了一个民族学组（林耀华任组长，陈永龄任副组长），讲授“民族学基础”、“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志”以及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史等相关的课程。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也设置了类似的课程（林耀华 1990：149；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4）。

林耀华和金天明声称，这一时期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自己发展出了有别于资产阶级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林耀华和金天明 1980：54）。不管这种说法确切与否，这种发展不久就被全力以赴投入社会历史调查中去的呼声湮没了。陈永龄放下手头的十二年规划的工作去部署新项目，而当时的要求如此急迫，其他人大多也被催促着完成大范围的计划制定。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到来，“民族学”本身也被取消了独立学科资格，完成“规划”的工作就永久性地结束了。^①

因此，反右派运动前的时期是人类学学科体系大发展的时期，有些人拿它与接下来的几十年相比，实实在在地称之为“黄金时代”。例如，在 1983 年的作品中，杨堃追忆了当时民族学是怎样得到来自社会主义中国最高权力者的支持的。（杨堃 1983：1~9）早在 28 年前的 1955 年，周恩来总理去印度尼西亚参加历史性的万隆会议，途中曾在昆明停留，在杨堃张若名夫妇的陪同下度过了 5 个小时。身为总理，周恩来先是以一名曾经留学法国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讲话，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未来最好的指南。然后他又代表党对一名党的同志讲话，他说民族学是一个重要的学科体系，需要许多研究人员为之付出劳动来帮助国家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总理对杨堃说：“我们希望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族学，这样的民族学能够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有了这样的革命性目标和来自上层的支持，像杨堃这样的民族学家一定以为自己作为民族学家

^① 这意味着某些项目，如《金枝》的翻译，要等到 30 年后才能完成。

前途是有保障的。

反右派运动和知识分子^①

不过，周总理拜访杨堃家的后一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它并没有增强民族学家的安全感。1956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指责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东欧开始改革行动，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尤其引人注目。紧随1954年东德动乱之后流行于社会主义世界的不满言行，预示着局势将要发生剧变。

毛泽东决定让人们将这种情绪发泄出来，也希望能藉此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陆定一（中宣部长）对允许在全国展开公开批评的自由政策表示赞成。在1956年4月发表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要求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新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一周以后，他更进一步要求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政策。随后的一个时期就对政治、艺术、宗教、文学、科学和学术研究展开了极为开放的大讨论（*China Talk* 1986：2～3；MacFarqihar 1974：48～51；黄绍伦 1979：50～51）。

起初的批评并不强烈。10月份布达佩斯发生了暴动之后，中国领导层再次提出开展公开批评的强烈要求。反应仍然很冷淡，直到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党的领导

^① 本书依照中国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英语要广。

人鼓励知识分子坦露心声；到1957年中，许多人都加入了提意见的行列。费孝通又一次走在了前头，他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费这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颇受周恩来的欢迎，他表示，这是惟一一篇有说服力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文章”（费孝通，引自巴博德1988:646；还可参看阿古什1980:244~248）。

抗议者们提出的意见各不相同，安妮·瑟斯顿归纳出其中最常见几个要点：没受过教育的党内高等教育部门的干部的讲话空洞冗长；政治集会和会议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共产党员表现得骄傲自大；有贪污和徇私舞弊现象；党的民主只是摆摆样子（Thurston 1987: 62~64）。有些人要求实行多党制，并且要求党让知识分子自己管理大学，而有些人，如费孝通等，则强调中国需要恢复社会科学，这样就可以用社会科学帮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有些人批评中国过于依赖苏联模式，而苏联顾问对中国的干涉确也有些过分。发表这类意见的人大多是1949年前在国外或是中国有欧美渊源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对他们而言，不必如此盲目地效仿苏联，也不必如此绝对地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他们也对被追学习苏联以及他们所认为的教育苏联化不满（Orleans 1987: 190~191; Thurston 1987: 64）。

如此广泛深入地对党的错误和弊端进行公开批评对党的领导触动很大。前一年秋季匈牙利的经历还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因此领导们等到全方位的剧变开始之后便对他们视之为国内敌人的那些人进行回击。由于还伴随着冷战对中国的孤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台湾国民党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不断挑衅，因此反右派运动应该被视做是在反击这些现实存在的侵犯威胁的革命背景下进行的。运动于

1957年夏季由领导层发起，来势凶猛，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年。

这不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自从新社会诞生之后，每隔两年就有一次运动，总共已经有3次了，通常是由学生和老师参加——但这是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揭露其“不堪一击的反动观点”^①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只能影响到这个国家本来就占少数的人——知识分子——当中的少数人（5%~10%），却是一次波及全国的痛苦的运动（Meisner 1977：167~200；Orleans 1987：191；Thurston 1987：72）。党不久也卷入了一场类似的整风工作，这项工作旨在去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右派分子”（Grunfeld 1985：63）。

50多万知识分子被卷入这场运动，数十万人被送去参加集中劳动，几百人被迫害致死。数十万人被划为右派，遭到惩罚，或是受到社会排斥、在单位里降级减薪，或是被下放劳动（*China Talk* 1986：3；*China Talk* 1987a：13；Thurston 1987：65）。到1957年年底，有指示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部“下到农村去”。

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工作人员都轮流去参加一至三年的体力劳动，因此所有的政府机构全系统的人员都缩减了三分之一。这些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下放命令是为了教育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才有尊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是希望把

① 这三次运动是：1951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3年的“五反”（反行贿受贿，反逃税，反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反泄漏国家经济机密）和1955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Spence 1990：536；Thurston 1987：61）。据学者们说，除了一小撮有政治嫌疑的教师外，整个系都要参加；一位云南学者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斗“城市资本家”。

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下放农村能够有助于将他们的技术应用于落后地区 (Shapiro 1979: 151~152)。

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思索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七年里，对教师采取的是半敌半友的态度，因为有些“专家”需要接受“红色政权”的控制。可以使用教师，但是“左”的领导不会允许这个历来享有特权、有影响力的群体阻挠社会的不断的思想和政治转化 (White 1981: 650)。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讨论了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当年春要求训练出更多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McGough 1979b: 12)。

然而，在“百花齐放”活动中，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说了当权者不爱听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教师们绝大多数来自富裕家庭，而他们批评的对象——党——则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 (黄绍伦 1979: 34)。最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外念过书，对外国理论和其他的外国事物很着迷；然而，新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在大学校园里，这导致了教书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积极分子两派之间争夺管理权的斗争。尽管毛泽东呼吁知识分子充实党的队伍，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多，因此党员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差距在早些年里显得很大。教师是脑力劳动者，是课堂里的领导，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而全国的社会重心一时间转向了体力劳动者，转向了从前课堂上的下级 (学生)，转向了农村居民 (White 1981: 650)。

一年前的1956年，周总理评价说，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有40%积极地拥戴党，40%的人支持党，但并不积极主动，10%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还有10%是彻底的反革命分子 (Thurston 1987:

62)。当1958年下半年运动冲击到行政部门和社会下层时，预先假定一般可以达到这种比例；所有的教育单位都有一个定额，员工中的5%~10%要被划定为右派。^①这种事先假定好定额后再进行挑选的做法，如果严格执行起来必有弊病，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Thurston 1987: 68~69）。

沙博里（Shapiro）认为，有些人确实是企图破坏革命和建设中的新社会的“右派”（这种说法也从经历了运动的许多人那里得到了证实），而人们也必须认识到“成千上万的人仅仅是发表了坦率的批评意见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于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就和‘反革命’一样了，这意味着他们会失去工作，至少是工资减少，社会名誉受损”（Shapiro 1979: 102）。许多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在2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案子得不到“平反”，因此几十年都生活在民权被剥夺的政治阴云之下。

因为是群众运动，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反右派运动。强制性地参加批斗会。“如果不参加，或者是敷衍塞责，你本人可能就会受到怀疑，”一位民族学家这样向我解释。每个人都被按左/中/右的政治方式分类，右派又分为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偏右分子”。奖励和惩处都是与一个人的类别紧密联系在一起。

学术批判

在所有这些当中，重新展开了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资

^① 当时在中山大学的人表示，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右派数量由省党委下达给学校党委。定额最低是教职员工人数的3%，最高是学生人数的10%。

产阶级的领域的批判；这一次甚至连民族学都被认为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这三个领域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用来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工具。但是对民族学的批判更深入，更具煽动性。有评价说，整个民族学学科体系——其理论、内容和方法论——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反动力量的污染如此之深，以至于它都无可救药了，这种说法无异于火上浇油。

今天的民族学家认为，当时的领导过于死抠教条。胡乔木就因为1957年批斗“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并宣称既然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不再需要社会学家，而遭到了批评。当时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康生在人们的印象中也是轻视社会科学及其同源学科体系的。康生极力向领导层中的亲苏派靠拢，他帮助在领导层中推广苏联经验，以使其成为中国仿效的榜样。甚至在50年代末中苏分裂过程中，苏联的榜样仍然对中国社会施加着影响。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民族学才经历了与苏联民族学的过去同样的命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苏联也思索过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民族学的问题。早在1929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就称“民族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代用品”。这些批评者认为，没有必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族学相结合，而只需要取消民族学就行了。尽管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普遍，但三年后，“废除派”有了足够的影响力，终于使得考古学和民族学被宣布为历史学的附属部分。这一举动敲响了民族学的丧钟，因为在这一公告发布后的几年里，田野工作和国内外的当代民族研究几乎完全停止了。民族学不久就遭到了彻底的禁止（Plotkin and Howe 1985：274~275；秋浦1984：17）。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也让持同样观点的“废除

派”占了主导地位，他们采取行动清除了中国的这门“伪科学”。

运动也使冲突公开化，造成了那些已经变得和苏联人关系密切、学习俄语、或许还去过苏联的人与那些仍然和苏联保持距离的人的分裂。当时冷落苏联引发了对右倾的指责，这又重演了解放前热衷于西方的历史。几乎每个30岁以上的人解放前都追随过西方的学术潮流，因此他们只有热情地转向苏联框架才能有效地挡住攻击。一位学者评价说，1949年前的一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中有90%的人在运动中被划为这类或那类右派分子；单是中央民族学院一处，右派分子名单中就有吴文藻、吴泽霖、潘光旦和费孝通。劳动学院的陈达，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汉、吴景超和赵承信也是被宣布为右派的社会学家。

亲苏派中有年轻学者，也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后一个群体中最突出的是林耀华、陈永龄、杨堃，还有许多他们的学生。这一派人当中也包括热衷于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努力地在行动的最前沿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彻底改造民族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些人（周星 1989：5~6）。许多人在当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包括林惠祥（1957年）和林耀华（1956年）等人在内的老一辈学者。

但是费孝通没有这样做。尽管他名义上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社会现象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很多人还是怀疑他的转变是否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在他还保持着对功能主义感兴趣的情况下。^① 费对苏联缺乏兴趣也是他招人怀疑的因素之一，再加上他与国外有着广泛的交游，这使他始

① 1989年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的家中，我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我问是否还能称他为“功能主义者”。他说：“我不反对。这只是个称呼。我是个追求知识的人，仅此而已”。

终是运动的目标。不久就出现了诸如题为《费孝通等人引进的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反动本质》和《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之类的文章。^①

这些文章列举费孝通的经历，作为他亲外国的证据，并表示他对帮助“从英美引入资产阶级的反动社会学理论”负有责任（李达 1979：137）。费孝通还因为指出集体化的行动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的数量和多样性，限制农村的发展而受到批判。^② 这些作者攻击他明显对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集体缺乏认同或热情，但这些批评都没有像他过去的朋友和同学林耀华施加给他的那样严重，林对费的批判简直达到了辱骂的程度。^③

在“阴险可恶的费孝通”一文中（见 McGough 1979a）（原载《工人日报》，1957年8月2日——译者注），林耀华指责费孝通试图暗中破坏革命，并企图制造匈牙利式的暴乱（Thurston 1987：567）。林耀华被树立为当年的模范党员，而费孝通则被抛入了政治炼狱。这两位从前的朋友和吴文藻的同门弟子合著的小册子《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再版时，费孝通的名字就被从扉页上略去了，直到1985年最近一次再版时才得以恢复。尽管是在如此令人心酸的情况下翻了脸，林和费还是继续居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相距不到100码，并设法保持着有一

① 关于这一时期费孝通的生活，详情可参看 McGough 1979a；巴博德 1988：646~650。

② 这是费长期以来（从40年代到80年代）指导农村地区恢复经济生活的思想基础。

③ 一位认识他俩的民族学家认为费孝通和林耀华从来也不是好朋友，有很多“矛盾”造成了他俩的分歧，比如他们中一个在英国念书，一个在美国；一个是江苏人，另一个是福建人；一个是清华培养出来的，另一个则毕业于燕京。

丝冷淡却也客客气气的个人关系。

中国的这段历史令许多民族学家感到十分尴尬。这不是他们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尤其不愿意见外国人对他们的种种表现作细致的分析。但是相互辱骂和背叛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的一部分，它对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现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连费孝通提起过去批判过他的人时都不无同情，因为他理解朋友和同事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得不批判他（巴博德 1988：647~648）。然而，费和林共同的朋友都想忘记自己过去同样的行为，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耻辱。

1957年林耀华还批判过自己的老师吴文藻。吴被划为右派，解除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的职务，被遣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并接受改造。到1959年12月，吴文藻成功地“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直等到1979年党才为他彻底平反（吴文藻 1986：92）。

吴文藻走后，林耀华接替他担任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的主任，陈永龄继续任副主任。这种职务的更迭意味深长，因为吴文藻代表着解放前较老的那一代学者。几年前的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曾自豪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将最著名的学者送到了他领导的学校，称作“北吴南杨”。当时吴文藻和杨成志被推举为老一代学者中最优秀的代表。^①

然而，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将这种说法变成了整人的武器；吴杨两人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和社会学”及其错误的重要代表。吴文藻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遭到批判，与此同时，杨成志在社会历史调查中的田野工作也受到了

^① 当然，这只是一己之见。其他人也可被列入“最优秀的”之列，包括不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杰出学者，如杨堃。

详细的审查，遭到了攻击。甚至连他的少数民族人体测量研究也遭到猛烈的抨击，因为他请求被调查者脱下部分衣物，这被指责为妄图侮辱少数民族的、不道德甚至是不正当的要求。连杨堃也没能逃脱遭批判的命运，尽管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都充满了热情，他仍然被宣布为右派。

当时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岑家梧在运动中也遭到了冲击。运动开始的时候，岑家梧作为解放前岭南大学的重要领导人物和苗族民族志专家，正在海南指导社会历史调查的研究人员。他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卷起铺盖回家。他过去在中大跟随黄文山、罗香林两位民族学家学习（这二人后来都逃离了中国），这被认为可能是他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根源。据说他抱怨过学校的工资与自己的高职位不相称，这也使他受到批判。他被迫在学校里接受劳动改造。

一位同样也遭到批判的学者叙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

我被批判犯有三大主要错误。第一是“个人主义”；我埋头研究，忽视了社会条件和身边的社会。第二是花了太多时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还把自己当作儒家学者。最后一点是，他们认为我研究英文著作应该受到批判。为此，我必须写出自我批评，再交给老师甚至是一些学生去当众批判。批判！实际上这更像是人们冲着你尖叫。人们先是对你进行调查，他们能够作出的最严厉的批判就是最好的！年轻人最爱批判长辈；是的，年过30的人主要是受30岁以下的人批判。被批得最重的后来就会被划成右派。

有不少人在青海阴暗的监狱里度过了数年时光。有些人被监禁长达几十年，直到1978年政治气氛宽松后才结束铁窗生涯，而有些人则被剥夺了教学或是从事研究的机会。另外一些人仍然可以回到自己的领域工作，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被剥夺了领导职务。甚至到了80年代，一旦“左倾”政治运动到来（比如1983年年底的反精神污染运动）——按照一位共产党书记的话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再次反右”的话，这些从前的“右派分子”就有可能重新成为靶子。

当时，大学正在进行另一项重要的调整，以求更接近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在苏联，长期采用的是党和学校行政共同领导的二元结构，这有助于确保党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尽管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已逐步取消各系的党支部，但这一新的结构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根发芽。

反右派运动前，党在各大学的权力范围很广但并不完备。解放后，共产党只是简单地代替了过去国民党在大学里的机构，但党员数量不多，组织也不得力。先是在大学重要的机构，如教务处或学生处设立了党支部，然后逐渐发展到其他部门。反右派运动后，各系的党支部由一个全校性的党委统一领导，这就加强了党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控制。党员身份通常并不公开，系里的许多非党员甚至不清楚学校的党委书记或系的党支部书记是谁。但是，运动后不久党员身份和党的结构变得比较公开化。

解放后的头几年里，党内甚至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或教员担任新设立的职位，只得让许多非学术界的干部坐到这些位子上，由此这就更埋下了党的积极分子与教员相互误解的种子。与政治重组相伴随的还有“‘揪出大学教员队伍中的白专分子’的运动”（Thurston 1987：73）。学生们也参与了运动，以帮助肃清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由

于教员有这么多的压力，师生关系自然就很冷淡，许多教员变得一蹶不振（Thurston 1987：73）。

每个领域和机构都经历了这样或那样不尽相同的政治运动。“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中，自然科学受政治的影响没社会科学那么大，”一位古人类学家对我讲。比如说，搞考古和古人类的人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反右派运动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尽管少数个人受了影响，运动期间他们单位这种事并不多见。

当然，对于民族学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这个领域被完全禁止，其拥护者只得改称自己为“原始社会史学家”、“民族志学者”或“民族研究工作者”。有时候这种名称的转换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但更名后，就可以开展同样的民族工作。例如，诸如民族学院之类的学校和机构继续教授内容和方法都属于民族学、但冠以不同名称的课程。

这一时期及其后继续进行着的广泛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本质上讲显然也是民族学的。尽管其正式称谓是“中国民族志”而非民族学（这是仿效苏联的实践），但工作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前进行的，搜集到几千万字的资料、写出了上百部民族历史、生活在少数民族中间开展田野工作，确实都应该被视为是民族学工作。因此，即使

有人说，从1957年以后民族学这门学科就被取消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正是在这个阶段里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当然也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采用某种行政手段，在某些大学里取消或禁止开设专门课程，甚至加上林

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也决不能够从整个社会中把这门学科的研究活动完全取消。（施正一 1981：177）

但是，民族学系和班都取消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教研室奉命更名为民族志教研室。不过，最后一个民族学研究生班继续维持到 1959 年，它参加了社会历史调查的全过程。虽然改变了叫法，中止了教研组的工作，然而特定专业还是能够以新的名称重新出现，特定的科目也可以简单地转换成“原始社会史”，几年后重新出现在修订过的历史系课程表里。因此，中央民族学院可以继续招收研究生（大约每年 6 名），但他们只能学习两门民族学课程：一门是民族史，一门是原始社会史。

大跃进时期的人类学

最初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派运动不久就被更迅猛、波及面更广的“左倾”潮流所湮没。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宣布了 15 年内工业生产赶超英国的“大跃进”政策（Thurston 1987：74）。这是当年竖起的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第二面红旗是在 1958 年秋季成立的“人民公社”，最后一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总路线”（30 年后一位研究人员立刻就回想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迅速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理想热情感染了整个国家。1958 年秋获得的大丰收似乎表明这种做法奏效了，整个国家欢呼着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些民族志工作者也报以同样的热情，和许多地方干部一样，他们也宣称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他们过于夸大

当时的实际成果，而忽视了某些方面反映出的困难。当时“厚今薄古”的口号也助长了这种缺乏远见的疏忽。这很快就影响到了在田野里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那些人。有一个人描述说：“不再让我们研究‘封建习俗’。这类研究被宣布为‘反动的追求’。”

1958年到1960年中国刮起新的政治风，宣布所有的分析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坚持这种观点，研究就必定是“反动的”。既然下了这种命令，就难怪一切人类学研究都会受新氛围的影响，常常会出现一位民族学院工作人员所描述的“对研究对象先作政治分析再进行研究”的倾向。由于提出要改变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所以连考古学都受到了影响（苏秉琦 1990：69），整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考古学性质的大辩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当时官方正式的批判瞄准了两类人，一类人认为考古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另一类人认为考古学更接近艺术。考古学被宣布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始终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这些戏剧性的因素自然科学和艺术是无法研究透彻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将考古学划归为自然科学或艺术，他实际上就是降低了阶级斗争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歪曲了考古学的目的——有助于分析阶级的出现。因此，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不是一次活跃的辩论。如果有人将考古学单纯地看作一门自然科学的话，那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但是我们必须竖起一个攻击的靶子；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干的。其实根本没有人真正把考古学看作一门艺术。”

这种强制性辩论的结果就是通过将某些论题或方法划

人禁忌之列从而削弱该领域。研究人员不能再探索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也很少有人有胆量研究考古遗址的艺术特性问题。多年后夏鼐还坚持认为，将考古学划归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再恰当不过的（夏鼐 1990：62~63）。

新的严肃的政治氛围也影响到国家的少数民族研究。从 1957 年起，少数民族政策本身最早发生变化。自从前一年在青海、甘肃和四川省的藏族中爆发了解放以来第一次严重的骚乱之后，政策重点转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而不是“大汉族主义”。^① 另一个转变是，无论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汉族地区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先前原本进展很缓慢的民主改革，这种做法破坏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团结（Grunfeld 1985：62~63）。

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历史调查先后受到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以及变化的民族政策的影响。所有的政治发展都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脱离了非经济、非物质方面的文化研究。调查的方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社会历史学家个人也受到批判。一些少数民族表示，民族学家有意选择诸如性病之类的内容来调查是为了使少数民族难堪。

像吴泽霖、杨堃和杨成志之类的学者遭到指责，说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收集上层建筑组织方面的琐碎资料，寻找一星半点的保存和遗留下来的习俗和信仰。他们忽视了对少数民族生活中经济和生态基础的研究，因此忽略了决定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关键性因素。这些人不是把时间

^① 民族语言学家表示，新的政策变更迅速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影响，现在一般不再会批判研究人员谈论少数民族生活的“落后”面，但会攻击他们把时间浪费在研究属于“封建残余”的语言上。

和精力用于研究国家真正需要了解的少数民族情况，而是研究其他玄妙的琐碎事物，因而破坏了调查。政府的目的是要弄清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本质，从而进行基本的社会改革；这些学者寻找研究课题时为什么不牢牢把握这一目标？^①

这类学者被指责为猎奇，从而使调查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路线。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因为它影射研究人员是在积极地阻挠边疆地区的革命进程。“人们还说‘猎奇’使少数民族成为汉族的笑柄，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因此破坏了民族团结。”^②

从此以后，传统的用人类学方法理解民族志的这条道路就充满了危险。人们很快就像惊弓之鸟一般避开了“上层建筑”研究，放弃了大部分的宗教、宗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研究，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和少数民族的“阶级状况”。一位民族志学者评价说，

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我们不能研究社会习俗……真令人遗憾，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被扣上过分强调上层建筑的罪名，因此只得通过劳动分工来加以避免，让一部分人研究上层建筑，一部分人研究经济基础。年轻人

① 有趣的是，当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始抵制用文化主义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而赞成强调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论公式时，巴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巴西强调文化问题的人也会被扣上“保守派”的帽子（Olive 1989：511）。

② 基辛指出，这种“猎奇”似乎是人类学的偏好，因为人类学家们似乎“倾向于，甚至沉迷于把种种文化描述为与我们的文化有极大差异、或彼此间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将部落文化视为独一无二的、奇特的意义系统——了解与我们自己截然不同的种种哲学和世界观”（Keesing 1985：162）。或许对 50 年代的田野工作者——西方民族志学者亦然——的大量指责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

可能会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

但是当时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20年里，民族学家——按照当时的说法，更确切的称呼是“民族工作者”——在自己的报告里不得不强调经济和阶级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指责他掩盖阶级斗争，企图误导读者得出没有必要搞阶级斗争的结论。这种批评使得那些不存在真正的阶级问题的领域——被研究的社会实际上实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的研究人员也表示需要阶级斗争。研究人员知道，站在夸大阶级问题的一边通常比坦率地报告自己发现的结果要安全些。^①

研究海南黎族的研究人员说这正是他们的遭遇。作为田野工作者，他们报告了黎族的土地公有制——合亩制，及其集体劳动体制。报告中也提到了村庄里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社会群体有什么严重问题，或是该地区发展的障碍。然而，一位民族学家回忆说，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发布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阶级斗争的方针政策，我们当时不得不听从指示。我们所做的政治化的分析比原本应该做的多得多。尽管我们并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阶级问题，但是又能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就夸大实际见到的问题。后来，该地区的发展表明我们最初的分析是准确的。

① 苏联的民族志学者在处理有关少数民族的敏感政治问题时早就遇到过同样的难题；许多苏联民族志学者经不住诱惑，去“了解并报导他们想当然得来的情况而不是真实的情况”。在苏联，研究上层建筑同样受到过怀疑；学者们假借“民俗研究”之名搞宗教研究，实质上使它避免了被取消的命运（Plotkin and Howe 1985：297）。

1958年刮遍全国的新的共产主义风还直接影响了社会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进行过程中，旧的调查者与受访者分开吃住的研究方法受到批判，被研究人员到群众中去的新方法所代替。政治积极分子送往农村的指导方针也被用作了调查者的田野工作方法；“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①口号的实施意味着被用来系统地搜集和纪录资料的时间更少了。汪宁生回忆说，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定期就会被他们工作地点附近的村庄的“经济任务”所打断，整个考古队都去地里收割庄稼或是帮助维修灌溉系统或播种栽插。

中国民族学家认为从1958年起收集到的资料与前期相比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②除此之外，原定四至七年时间完成社会历史调查的计划被当年“于（1958年）年底前完成调查”的要求打断了——只有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赶在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前完成民族简史和简志的编写及出版工作。遗憾的是，第一批开始工作的8个省区，只完成了1957年工作开始时选定课题的一部分（秋浦1984：17）。

制定出的新计划为1959年1至3月要求先写出初稿，到6月完成修改任务。资料要在是年夏季出版，向10月1日国庆节献礼。在一些地区，这种头脑发热的安排迫使一些小组放下手头的调查，开始著书出版，而大跃进使农村的情况迅速发生转变，使得这项任务复杂化。第二批增设

① 后来又加上了第四“同”——“同学习”。

②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至少不会因此就指责“三同政策”，但一位长期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评价说：“当时许多研究人员受到的批语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接近自己所研究的那些人。如果不像‘三同’政策所提倡的那样参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他们怎么可能做好田野工作？”

的8个省区的调查组（那里的工作是1958年才开始的）要承受双重压力，一边进行研究，一边着手编写有关发现情况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研究举步维艰。“按理，这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如按原计划进行，是可以取得远比现在业已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而这一损失现在是难以挽回的了”（秋浦1984：17）。

1958年后研究工作过度政治化的另一影响是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越来越多地套用被他人所证实的模型（molds）。在阶级关系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分期的学说方面都是如此。摩尔根的序列——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了规范，所有（民族）群体的研究都必须符合这一图式。直到80年代，中国学者才公开对这种正统学说提出挑战；直到那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还必须使用19世纪进化阶段论的陈词滥调。

普洛特金和豪讨论过30年代到50年代苏联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过程（Plotkin and Howe, 1985：281）。人们刻板地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套用每个（民族）群体的社会发展，竭力地从民族志资料中发现这些阶段的证据，这使田野工作带上了严重的倾向性。他们几乎总能找到自己寻找的证据，一位民族志学者甚至自创出一个部族，因为理论要求有这么一个部族。一位西伯利亚民族志学者后来承认“在教条的影响下，真相被随心所欲地玷污了”。普洛特金和豪也讨论过苏联研究人员为什么这么愿意运用这种划分方式：“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作用之一就是要确定一种简单明了的图解，一旦对某种现象或事件的‘正确’观点受到怀疑，‘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指导教师们，就可以用它来打消人们的疑虑。”（Plotkin and Howe, 1985：273）只需简单地将某个群体套用到这些类别中的

一个，研究者们就可以对那些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保证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至少可以发现必要的“党性”。

大跃进对高等教育工作也有直接影响。1958年以后的教育路线强调把特定的学科当作一门手艺来学习。研究生学习也在走下坡路，因为它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本科生从第一个学期开始就学习专业课，改变了原先让他们在前两个学年更广泛地选修课程的方式。^①在明显地摆脱了苏联模式之后，又实施了：在各层次迅速扩大招生人数，招收更多的工农学生，强调地方的积极性，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Orleans 1987：191）。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政策导致许多师生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一、两年的体力劳动；“帮助农民，了解劳动的价值，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位古人类学家用这种讥消的口吻来评价这一做法。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员许多星期和月份要花上一半天在地里劳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

结合反右派运动的政治行动教育学生要揭发老师，轻视建立在尊重年龄和学识基础上的传统师生关系，这也造成了令人寒心的师生关系恶化（Thurston 1987：61）。一位教师回忆说：“我们开始与学生拉开距离。他们会批评我们以帮助我们改造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人接受了这种改变，而另一些人产生了更深的抵触情绪。”

瑟斯顿认为，这种反应表明许多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地位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许多中国人个人来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个分水岭，人们不再天真，闪光的年代失去了光彩”（Thurston 1987：65~67）。她接着

^① 例如，中大历史系的学生在低年级时已经开始学习考古学专业课程，那时他们已经学完了必修课和大量的其他系的课程。

说，运动传递给学术界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要不惜任何代价严格无误地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批评或谴责”。这种信息必定要抑制人们开展社会调查的干劲。

回顾一下反右派运动，许多学者，特别是解放前受教育的学者，现在一致认为所有针对社会科学的批判都是不准确的。^① 还有一些人认为运动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只是歪曲了它的本意，对许多“右派分子”的做法也过分了些。有些人坚持认为对人类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进行反右批判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就很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秋浦 1984：16）。8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担任中大人类学系党总支书记的陈梓权 1987 年告诉我说，他认为当时的确有人反党反革命，但在 50 年代初，“国家建设得不错。没有必要那样反党。”但甚至连他都同意运动搞得过火了。他指出，政府迟迟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直到 1978 年平反昭雪时才弥补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过失。

对那些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来说，许多人认为，尽管党取消民族学和相关科学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本身受到了怀疑。但他们也承认党并没有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传统，因为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承认民族学的价值。当被问及现在是否害怕新的反右派运动时，一些人回答说不，他们并不害怕，因为政府已经承认自己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如果他们再

^① 我问费孝通，你认为 1957 年和 1958 年对你所作的指控是否有属实的地方，费孝通略一沉吟，说，“1957 年的批判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不能被批判。人们必须找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费孝通 1986）。

搞（这类运动），那又怎么样？我们以前已经经历过一切，有过那么多政治磨难，我们知道该如何应付。”

60年代初期“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大跃进迅速影响到全国。1957年和1958年的丰收之后，新的公社领导的错误管理和夸大成绩，再加上两年严重的天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遭受了洪水、干旱和虫害的袭击；农业产量严重下降，食品短缺，数百万人死于饥饿（Shapiro 1979: 177; Thurston 1987: 80~81）。

许多学者被下放到农村地区劳动几个月或几年，也亲身感受国家恶劣的条件。要求教师、干部和研究工作者都参加春播或秋收。另一些人表示，有些人只呆几周，但如果哪位学者在政治上受到了一点儿怀疑，他或她的劳动任务通常会延续至少几个月。

一位民族学家回忆说，他1960年期间被下放锻炼达10个月之久。要求他帮助农民劳动和进行自我改造。他在一个黎族村庄里居住了一年，是惟一一个下放到那里的外来人口。这不是有计划的研究；他只是和村民们一起劳作。通过劳动，他发现

我学会了他们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学到的比过去搞田野工作问问题的时候要多；通过参与和观察，一个人能够学到多得多的东西。例如，我只不过是简单地问一问交通，他们就要卷起裤腿告诉我如何过河。如果我问他们在汛期做什么，他们不能给我明确的答案。但住在那里之后，我看到他们（也

自己动手)如何用充气的葫芦帮助自己漂过或游过涨水的河流。像打猎之类的经常性的活动也是如此,我在那里居住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就能观察出来。我靠这样还能观察到儿子在私有财产继承方面的重要作用或是配偶关系的一般趋向。

尽管也有人意识到长期的实地生活带来的好处,但当时人们还是倾向于进行至多几个月的正规的田野研究。

1962年许多学者和学生发现自己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再次被送往农村。那时农村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眼前的问题是需要调查和纠正干部的错误行为。组成“工作组”开展调查,再次要求知识分子遵照“三同”的指示,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然而,回到离开已久的校园,那里和大跃进之前的时期相比有所倒退。这次很多中国人开始同意苏联对大跃进中高等教育改革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取缔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修改课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还大量增加用于体力劳动的时间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改革伴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多和相应的生源素质的降低。因此,60年代初,中国人又逐渐回到大跃进前受苏联影响的高等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以专业为基础。尽管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带来了一些波动,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模式通常还是能培养出合格人才的(Orleans 1987: 193)。

然而,课堂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民族学家称,由于反右派运动时他没有被批判为右派分子,所以运动结束后允许他恢复教学——但事情已经改变。现在的导师讲学生愿意听的和他们认为学生应该听的东西。例如,在这位民族学家的历史课上,学生们现在想听农民起义和过去反地主斗争方面的内容。当他结束一个话题的时候,学生可

能会说，“你还没讲完，”于是他同意多讲些他们想听的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因此我的课堂让学生控制了。你的课堂还受其他一些老师的控制，他们在你讲课时也坐在教室里听你讲些什么：他们是在学校工作的党员。因此，即使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也能控制历史课的内容。”

有时候事情发生变化仅仅是变回原样。由于民族学和民族史受到怀疑，云南大学民族史专业年轻的本科生1959~1960学年之后只得将专业换成通史。然而3年后，在杨堃的领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民族史研究室，替代历史系以前的教研室。尽管50年代末他们遭到批判，云南大学民族学方面的三位贤人——方国瑜、杨堃和江应樑还是继续主持自己学科的工作；他们改正错误的“好态度”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人类学科学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两次政治运动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古人类学领域的分散单位的工作并没造成严重影响。正相反，60年代初这一领域还有所发展：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成立了一个新的体质人类学工作单位。该博物馆成立于1956年，是在集中了解解放前上海的英、法两国博物馆藏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62年，在动物中心的基础上博物馆又增加了植物和古生物中心，同一年组建了人类学研究室，研究和展示古人类学课题。

博物馆扩展到古人类学领域，反映出过去十多年里全中国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解放以来，更新世及其人类遗存的研究持续发展。50年代及60年代初发掘出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Gigantopithecine*）化石，为全球古灵长类知识增加了重要的可资比照的框架。人类化石是许多古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不仅是周口店旧的北京人遗址的工作还在继续，全国各新地点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1963至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的田野工作中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后来的分析认为蓝田人属于北京人之前的早期直立人。其他直立人的发现充实了有关更新世中期分布在全中国的直立人方面的知识（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6~7）。

中国直到解放后才发现智人化石，其中早期的一个重要发现是1954年在陕西丁村。丁村人与现代人种有联系，“各种证据显示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和现代蒙古人之间的人类形态”（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8）。其他人类遗存发现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古人类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当代东亚人种与周口店等地发现的直立人化石确实有着直接的联系（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9）。^①

在同期的灵长类研究方面，大跃进后继续在云南发展一个新的灵长类研究点。那里的灵长类研究开始于1958年，几年里研究中心是在1961年新成立的“昆明脊椎动物区域分类研究室”。两年后这个研究室与北京生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合并，形成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到60年代初，该研究所50名研究人员中有20名参加了灵长类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和它的两个研究室：灵长类生物研究室和灵长类行为研究室都在不断发展，截止到1990年其研究人员增加到140人。

民族语言研究工作持续到60年代初。工作的中心同样还是50年代语言调查组所关注的问题，但这次调查的

① 这一结论与80年代西方对“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起源的推测不一致，西方人认为所有的现代人种都起源于东非祖先。在线粒体DNA研究基础上所做出的构拟暗示，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所有的非“东非直立人”种群没有存活下来的后代。但是到了1993年，对这种解释又提出质疑，致使有些人得出结论说，可能中国人的说法一直就是正确的。

是早先工作中忽略了或是当时粗略地一带而过的语言。早先调查中的一些点也需要再次澄清，因此调查队回过头去重新研究复杂的语言学问题，如像门巴族之类的操多种语言的民族或是那些语音共性的分界从未有过正式记录的多方言人群的语言情况（傅懋勣 1986 [应为 1986c——译者注]：572）。

这次还提出了一些专业的民族语言学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是学术辩论的焦点。人们讨论日常接触中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评述藏族书面语的口语化，对新语汇（特别是专有名词）的发展提供建议（傅懋勣 1986c：572）。受过语言学训练的学者们利用这次机会，一面完成对前 10 年调查语言的分析，一面编写语言学入门教材。在此期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的陈其光和马学良一起编写了《语言学概论》，但他们的著作直到 1981 年才得以出版。语言学的资格几乎完全被取消了，但语言学工作还在继续；研究者们可以私下研究语言学课题，但得不到外界的认可或支持。

民族学家同样也在探索全国性的社会历史调查所提出的问题。1958 年之后，他们的工作重点集中到编写少数民族民族简史和简志上，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有义 1980：52）。同时，中国民族学家帮助搜集整理并编写了《辞海》中涉及到民族问题的辞目。“民族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涉及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的内容上，在准备这些辞目的过程中他们针对民族学进行过多次畅所欲言的讨论（林耀华 1990：149）。

另外，在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举办过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专题讲座、讨论会和座谈会，其主题包括民族史，一些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民族学”、“民族”和“部族”等名词的定义等。

经过讨论，一些问题解决了，另一些问题仍有争议，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无论如何，这种座谈讨论在当时的确活跃了民族学科领域内的学术空气。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林耀华 1990：149）

除了感受到民族学在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黑暗岁月后重新焕发生机之外，1962年中国科学院两个从前各自独立的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合并成为一所新的、更大的民族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都是在语言调查和社会调查期间成立、领导调查工作的；几年后的合并表明它们在民族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致的。今天学者们评价说，当时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工作条件相当舒适，后来的条件简直无法与之相比。研究者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一间办公室只有两个人共用”。

当时最重要的两本民族学刊物是由这个民族研究所主办发行的。《民族研究》诞生于1958年，其后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学理论。另一本重要刊物是《民族问题译丛》，主要内容是从外国学术杂志上挑选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文章。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本杂志选择的内容主要还是苏联方面的（“80%~99%”，一位研究人员回忆说），它力图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民族学的最新动向。^①

尽管林耀华赞美过60年代初的知识氛围，连他自己

^①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两种刊物都暂时停止了发行。70年代末它们都重新面世，但这次《民族译丛》上刊登了大量世界各国的论文。

也勉强承认当时学者们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在198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1958~1966年期间与8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80年代的学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文化大革命以前学者们必须与同事们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发表文章，而且还要得到单位领导的正式批准。到了80年代就没有这种必要。

反右期间被揪出来批判的学者后来发现自己失去了像林耀华等人一样的出书的自由。1958年以后吴文藻写了很多报告，但发表得很少，即使发表也没有用他的真实姓名，甚至连笔名都没用。在没有政治危机的时候，吴文藻埋头学术研究，而1958至1978年间他的活动日程表向我们揭示了像他和费孝通之类政治上遭受怀疑的知识分子在被贬为政治贱民的情况下是如何适应的。吴文藻说1959至1966年间他与费孝通合作将社会历史调查期间收集到的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整理汇编成册；他写西方社会学报告，并推荐应该翻译的外国著作；编写词典，为国际关系系作边境民族问题顾问；与费孝通合作进行一个重要的帕米尔高原研究项目；还翻译书籍（如Linus Pauling的《不再要战争》[*No More War*]）以帮助外交部了解外国动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所有这些工作都被打断；经过这些年的混乱，大多数资料或遗失或毁坏，因此这些作品没有一部发表的（吴文藻1986：92）。费孝通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刘延寿和冯志毅1986：562；巴博德1988：650~651）。

对于费孝通的意见另一些研究人员有不同反应，他们表示尽管必须小心翼翼，但他们还是可以看民族学和民族志方面的外国书籍的。汪宁生讲，教职员工都可以从图书馆里借到这类外国书籍。他从林耀华和杨堃的家庭藏书里也读到过大量的这类书籍，涉猎的作品多种多

样，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皇家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汪宁生还把它用作田野工作指南。

在出版和阅读外国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还发现，同样也给田野研究划了一条细微的界限。我们已经了解到1958年农村迅速掀起反右派运动并竖起三面红旗之后，是如何宣称与“上层建筑”相关的课题对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不起作用，又是如何把一切重点都放在了解“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上的。然而，几年后政治气氛缓和，研究人员又能够研究宗教和其他一些不会招致猎奇、让少数民族难堪之类批评的课题。但是1963年，正当研究工作者们认为可以安全地返回田野的时候，风向又变了，毛泽东提醒研究工作者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调查再一次遭到反对，不止一个对宗教及相关问题研究感兴趣的民族学家为此感到沮丧。

然而，这些年里许多民族学工作还在进行中，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民族学家都引用主席的话为社会调查辩护：

毛主席说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7页）：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民族学家的确是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是两眼望天，而是细致地调查阶级和其他社会要素的情况并对其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林耀华和金天明1980：54）。

两次政治运动后，重点显然放在了马列主义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整个60年代初，学者们都在有组织地批判自己学科领域的西方作品。例如，1961年和1962年陈永

龄、林耀华等民族学家负责组织了一次针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大批判，名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考古界则为如何在各学科中为考古学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争论不休。而古人类学方面，又重新强调要将制造工具而不是两脚直立行走看作第一批真正人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民族学和民族语言学的重点仍然是50年代社会历史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整个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还允许一些研究人员从事此类研究。

临近文化大革命前，气氛越来越“左”，已经明确受到怀疑的领域如民族学和民族研究再次遭到抨击。秋浦说（1984：17），到1964年情况变得如此恶劣，以至于“民族学”一词竟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一些人否认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存在。这种观点在当年发表在云南《学术研究》杂志上的《对“民族学”的质疑》一文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从名义上讲，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学”；有西方的“民族学”，有苏联的“民族学”，有旧中国的“民族学”；实际上讲，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只有批判的问题，没有继承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学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

1964年“四清运动”开展到农村。政治化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项目迅

速结束，大多数研究者返回了城里的单位。^①现在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前十年接受教育和训练的那些人认为，他们的教育和训练都很扎实，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担任领导职务。接触西方和亲西方等“反动”行为可能玷污过革命前老一辈学者的声誉，但年轻的学者没有过这种经历，因此他们能够乐观地面对未来。

① 但是有些研究人员“四清”运动期间被下放到农村。一位参加过这次运动的民族学家回忆说，他注意到被派驻的村里的一户水上人家；他设法和这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就能够暗中进行民族志的观察。他也作了笔记，而且十分小心，没让人发现并向上汇报。

焦点之五 梁钊韬和新中国(1949~1964)

解放后15年里席卷中国的变革潮流一浪接一浪，这种浪潮也影响到梁钊韬和中山大学其他的人类学家。虽然受的是美国式教育，梁钊韬却不乏强烈的爱国心和献身新中国、发展有中国特色人类学的敬业精神。不久，他的知识、人格和政治基础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新时代开始的那天起，他所作的抉择将会影响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和事业。

和许多“爱国”学者一样，梁钊韬没有选择逃往香港或国外，而是留在广州。一次我找他谈论50年代初期的情况，中间休息的一刻，梁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放初期支撑他的精神所在。他突然倾身向前，又喷出一口烟——他总是烟不离手——然后对我说：“我本来可以在美国作研究，我本来可以出国，但我不想放弃自己的责任。我怎么能走呢？如果缺了我教的这些课，就不会有人类学班。我不能将学生和自己的责任置之不顾。我知道如果去了香港，我的哥哥们会让我生活得很好的。”

让梁钊韬感到如此迫切需要留下的原因之一是，1949年秋天红色军队进入广州时许多老教员离开了人类学系。当人类学系解散，许多教员和课程都转到别的系和单位之后，梁钊韬还在为人类学课程能在新的学术单位中占有一

席之地而努力。当时，经过1953年的院系调整，杨成志被派往北京，而梁则留在广州。由于老师的离去，将传统发扬光大的重任便落到梁的肩上。

已经转到历史系的两门课程是中国考古学概论和原始社会史。后来，在1957年年初，该系又增设了一门梁教的课程——“人种与民族学”。当时本科还没有分专业，历史系所有的学生都泛泛地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因此系里大多数学生都修梁钊韬的这三门课。

在早期转变的岁月中，梁钊韬与邓泽民结为连理。邓泽民的父亲是一名美以美公会的牧师，江西人，母亲是南京人。邓泽民在南昌葆灵女书院（Baldwin School）读完小学和中学（她在那里学习基督教和良好的礼仪），后来来到福州念福建协和大学。一度在闽东的莆田中学任教，之后，邓泽民于1947年报考中大研究生院。200名考生中只选录出4名，邓成为这仅有的4名之一，与张寿祺一起进入历史系学习。

出于对人类学和世界史的爱好的，她于1947年进入梁所在的系。当1948年她家道中落之后——在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许多城市中产阶级都遭遇了这种情况——她被迫辍学，到一所中学教了两年英语。1950年4月，她重返中大学习西方史，两年后毕业，以一篇名为《论中美关系》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1952年11月11日，邓泽民嫁给自己的教授之一梁钊韬，时年27岁。“他是位英俊的年轻人，相当英俊。他穿着得体，总穿正统的套装。但他很爱笑。他还有位慈祥的母亲，待我也很好。”一年以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梁乐。

解放初期，梁钊韬继续自己的民族学研究。梁参加了1951年的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的黎族、苗族地区和

粤北的瑶族地区。他还参与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所从事的研究与他1952年夏天在海南岛为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差不多。有了这些经历，再加上不懈的研究，梁开始发表有关海南黎族和苗族的论文（陈梓权1989：398）。

早期的田野工作经历影响了梁钊韬。“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对我说，当时党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深深感染着他。他认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尤其是区域自治政策。这激励他开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在此时期，他第一次读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5年他加入进步知识分子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其代表出席了省政协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陈梓权1989：398）。

不过，梁钊韬没有向我提起，对他也产生过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杨成志在那一时期的经历。由于解放前与国民党和外国有牵连，杨成志在政治上已经受到怀疑，梁不得不注意到异端的思想 and 行为会带来怎样的问题。无论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很明显，当50年代风起云涌，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都强调马列主义的重要性的时候，梁钊韬也开始因为倡导马克思主义而受人注目。30年后，梁钊韬继续坚持这一路线，反复向我和他的学生、同事们强调将本质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和分析力融汇到人类学与民族学中的必要性。

梁钊韬力争将更多的民族学和考古学内容纳入系和学校的教学中。“这是我毕生的计划：在中大重建综合的人类学。第一步是我们在1956年成立一个考古教研室”。这一步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当年省文化局和历史系共同安排进行一次广东省文物普查，这是全国性文物普查工作的

一部分。^① 田野工作首先在粤东的汕头地区展开，1957年系里的普查队员派往海南岛，那里新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一度曾要求三年级学生参加约两个月的发掘工作，他们需要奠定更牢固的考古学基础，因此历史系才得以成立新的教研室。

1958年有了重大发现，当时在广州以西发现了西樵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粤北的马坝遗址也出土了人骨化石。梁钊韬回忆说，是他第一个辨认出马坝古人类，并让另一个参与发掘的单位——广东省博物馆——立即把这个遗址转交给北京中科院更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去研究。马坝人头盖骨是解放后发现的第一个重要的古人类化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华南最早的古人类，他们生活的年代为距今13万年前。因此它被视做了解中国人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化的重要环节（陈梓权 1989：398）。另外，该系还投入两年多精力帮助邻省广西的文化局进行类似的发掘工作，只不过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发现。

可见，考古教研室是有明确的考古学目标的，但是由于梁钊韬是教研室领导，他坚持将民族学纳入课程设置和研究计划。在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痕迹。除了从原人类学系转过来、1953年起在历史系讲授的考古学概论课外，还有原始社会方面的课程。院系调整后第一次开设的“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纲要”包括——用梁钊韬的话说——“人类起源，新旧石器阶段，以及包括马恩在内的所有当代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但我也加入了一点马克思主义，

^① 为了展示发掘出的部分文物，中山大学还设立了一个原始社会史陈列室，时间也是在1956年，梁钊韬负责展品的组织和分类工作（陈梓权 1989：398）。

讨论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论断和他的社会进化阶段理论。”

到了1955年，苏联的影响使梁对这一主要课程作了些调整。名称稍作改动，成为“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学纲要”，因此连“人类学”一词在历史系的课程表中也消失了。梁钊韬继续讨论西方理论，“尽管这次压缩了一点儿”，但他又加入了新的介绍苏联理论和理论家的资料。梁对柯斯文的作品情有独钟：“我对他的书了解得不少”。在改头换面后的课上，梁不再谈论人种起源，但继续讨论人类起源。然而，这种课程上的平衡不久就给他招来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头两次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反右派运动”——对梁钊韬的影响都不大。尽管他的家庭被划为资本家，但他父亲一直倡导实业救国，因此这个家庭被宣布为“民族资本家”。1956年和1957年鼓励人们公开发表对社会体制和领导的批评意见。当其他人受到鼓励在学校的墙上大贴大字报之际，梁钊韬大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一位中大当时的教员回忆说，当反右派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对当时发表的许多批评意见都表示赞同：

批评是好的——我一直钦佩一位教授，直到运动期间我发现了他的一些问题——但给人扣上“右派”帽子太过激了。更糟糕的是无限期地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在中大，人们害怕去拜访朋友，因为你不知道谁会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历史系30名学生当中有3名被宣布为“右派”。我参加了1957年初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批斗会。巧的是，这3个人以前都对抗过系党支部。他们3个也是在文革时期遇到问题最多的3个，其中有人还因为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招来杀身之祸。

尽管历史系里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董每戡（应为中文系戏曲史专家——译者注）受到全校点名批判，但是刚刚在历史系站稳脚跟的考古教研室没有一名教授或教师被划为右派。

次年初，大跃进运动高涨。1958年初夏，校园里也染上了全国性的狂热，学生和教职员一齐参加“灭四害”运动。学校领导希望中大有自己的“大跃进”，因此派学生和其他人员到北京等地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

这年秋季重新开始讨论为什么某些人会成为右派分子，并公开批判这些罪犯的个人主义。按照其政治态度和专业水平将人划分为白专、红专或中间分子。这一轮批判比前一年的来势更凶猛，这一次梁钊韬没能幸免，他也成了斗争对象。他讲授“原始社会”课招来了指责，被指控为贩卖西方人类学，而1949年以后他对课程所作的改动都不过是装装门面罢了。他被宣布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梁钊韬认为这不过是因为“他们需要替我找个罪名，因此由于我在课堂上讲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们就拿这个作托辞。我确实受到过批判，但还不算太糟糕”。

同时，梁钊韬还由于没有及时向“老大哥”学习而受到惩罚。批评他只在自己的“原始社会”课中加入极小部分的苏联理论，这表明他过分热衷于在讲课中保留西方理论和观点。于是问题随之而来：所有这一切是否表明梁钊韬是个右派分子呢？

有人称他为“反动分子”，这种叫法与右派分子比较接近；另一些人认为他只是“摇白旗”（也就是忽视政治，只是自私地集中精力搞自己的工作）。一些年后，在和我讨论的时候，梁钊韬指出，事实上党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他；他拒绝接受所有在当时提出的不恰当的个人批评意见。那么他是不是对当年辱骂过他的人怀恨在心呢？

“1957年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些可批判的东西，所以我并不因为学生批判过我而怪罪他们。无论如何，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政治上的错误。党自己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当时正在发展人类学，必须倾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不是‘人民的敌人’；我们只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大家共同来批判有可能解决我们的分歧。”

后来在1958年的秋季学期，大跃进运动进一步深入农村地区，中大和其他大学的师生被下放到农村帮助秋收，并改造他们对为自己的餐桌生产食物的农民的看法。大多数中大师生到了附近的东莞县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梁钊韬这年秋季耗费了三个月时间种庄稼、出席会议，参加学习小组和自我批评会。

生活很困难，条件十分艰苦。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儿，我的后背也老爱疼。吃的主要是甘蔗。但这段时间的农村生活也有些好处。我现在知道住在乡下需要些什么；我亲眼目睹了粮食是如何来之不易，也加深了对农民的了解。我们劳动起来也摸不着头脑，我们想用烧荒火耕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率——尽管不太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们估计这样或许可以帮助提高土地的肥效，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负责照料的那块地什么东西也没长出来。所以说，尽管我们知识分子会因此而更加同情农民，但整个政策是错误的；要想推动社会主义进程，这样做是不行的。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必须逐步提高。

当梁钊韬返回中大后，再次当上考古教研室主任，但这次“原始社会”课程有了更本质的变化。1958年后这门课就只叫“原始社会史”；一切与民族学或人类学有关的内

容统统被取消。取消了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话题。保留有关人类起源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讨论，改动后的课程理论上要遵照苏联路线。此后一些年里课程进一步发展，由于轻视理论而提倡详细的田野工作报告，重点更多地放到了民族志方面。从1958年起，梁钊韬也对批评作出回应，他在课堂上用对等的汉语词汇替代英语专有名词。然而，坚持使用本土化的人类学词汇并没有妨碍梁钊韬在家里和图书馆里阅读英语资料。

1962年，梁钊韬的地位和权威得到恢复，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掌管系里原始社会史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工作，这个专业的研究方向是“民族考古”。^①从1953年到1962年，没有考古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生，这么一来，当年录取的3名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可以同时选择考古学和民族学作为研究方向。^②对梁钊韬来说，这是他实现在中大重建四大学科人类学计划的第二步；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联合意味着人类学的幽灵能够在历史系的摇篮里发育成长。

为了帮助加速实现这一进程，梁钊韬培养了一批能够对他有所帮助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然后让他们到人类学系工作。于是，民族学家陈启新——他80年代中期成为人类学系的副系主任——进入该系，他是原始社会史专业首批录取的3名学生之一，后来留校任教。李松生是1956年录取的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生，四年后从该系毕业直接进入考古教研室担任梁钊韬原始社会课程的助教。80年代初，李松生成为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的两名副系主任之一。

① 进入80年代，梁钊韬和张寿祺都想在中国学术界建立起这种跨学科的方法，当时正在争论对这个名词的使用是否恰当，而且一时间它在中国的刊物上占有了极大的篇幅。参看梁钊韬和张寿祺，1990。文中他们陈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② 历史系还有其他的研究生专业，包括古代史和东南亚史等。

原始社会和民族考古并重就成为梁在人类学正式遭禁后漫长的几十年里在中大培养整体论的四大学科人类学人才的手段。称之为“原始社会”不仅给梁钊韬而且给其他许多人（包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提供了一条继续从事民族学研究和写作的途径——但其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在这个惟一能被官方接受的人类学著作只有摩尔根 1877 年写的《古代社会》的时代，需要与恩格斯/摩尔根的社会进化阶段构架保持一致，人们的分析自然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许多民族学家认为有必要使当代民族符合这一基本原理。这样他们就能马上证实马克思主义和他们自己的民族学田野工作的正确性（证明恩格斯是正确的！）。这一时期，梁钊韬始终认为原始社会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历史，这种理解对于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建立真正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梁钊韬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称这个学科为“民族考古”，这也反映出他这种解决令人恼火的政治和学术问题的方法颇具实效。作为一名被环境所迫从事考古学的民族学家，梁自然会倾向于寻求一条能兼事这两个领域研究的途径。由于少数民族研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赞许，梁相信这个领域最适合运用综合了民族学和考古学这两大人类学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因此我们发现“民族考古”的方法是在研究少数民族时最常用的方法。^①

① 50 年代和 60 年代，梁钊韬与他从前的学生、同事张寿祺一起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美国也有人正在和他们从事同样的研究；1956 年 Maxine Kleindienst 和 Patty Jo Watson 在 *Anthropology Today* (5: 75~78)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行动考古学：对一个现存社区的考古学探究”（Action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Inventory of a Living Community）。梁钊韬和张寿祺直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看到这篇论文。

60年代初，梁钊韬着手一项长达数年的云南民族族际关系研究，从而更新了他的田野工作。从1963年12月至1964年5月，他带领一个5人考察队到云南西部去研究佤族、怒族、傈僳族、景颇族、傣族和拉祜族。梁钊韬起初是想到更偏僻的地方去研究永宁地区的纳西族，但当地政府拒绝了他，认为48岁的他年龄太大，无法经受住那里简陋落后的条件。

考察队的日程安排很紧张，在一个地点作一至两周的访问后就不辞辛劳地赶往下一个地点。5个人各人研究一个特定的课题，如亲属制度或家庭关系等；当时收集到的资料几十年后还能为他们服务，文革结束后，这些资料最终得到分析和出版。梁钊韬在他们调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两本重要的报告，一本是《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另一本是《滇西民族原始社会调查资料》。梁钊韬还利用这次机会锻炼自己的4名下属（3名研究生和1名助教）以人类学的方式开展调查，让他们对当地居民的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几方面的特征作综合研究（integrated study）。和他一同前往的4个人当中，有3个（陈启新、李松生和杨鹤书）20年后都成了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的领导。

到这个时候，梁钊韬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为更加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他1964年为《学术研究》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有所反映。他一开篇就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启发，认识到种族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之间的联系：

毛主席去年8月8日发表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具有

正确的和重大的指导意义的文件。在学习了这个文件之后，体会到它对我们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工作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去年12月26日，周扬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讲话，提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对我国与世界的现状的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要在学术界树立批评精神，在学术战线上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读过这篇文章之后，进一步认识到种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我们应把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种族主义理论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之一。（梁钊韬1964：46。译者按：以下所引梁钊韬话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标出页码）

这篇文章当时具体抨击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错误。它批评了19世纪的人类学证明殖民地民族从生物学方面来看劣于欧洲民族的错误观点，特别否定了达尔文和魏敦瑞（顾文误作Levy-Bruhl [雷布儒]，今据梁原文改——译者注）的这种推测。它还驳斥有些人的主张，这些人坚持人类各“人种”之间存在着无法根除的深刻差别，这种差别取决于他们是由南方古猿还是由尼安德特人演变而来的。

梁钊韬的文章接下来更广泛地抨击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种族理论。对于后者，他将功能主义、文化人格学派以及博厄斯派也归为自己批判的对象。他嘲笑马林诺斯基和其他功能主义者置殖民社会体系的起因或背景于不顾，

而企图制造出“现代主义”来维护殖民主义的现状。本尼迪克特及其文化人格学派也因其简化论方针而遭到诋毁，博厄斯及其“美国历史文化心理学派”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两大学派被视为殖民行为的产物，因为它们在孤立地运用心理因素理解文化发展的时候同样也忽略了历史发展的法则。

梁钊韬其实也认识到博厄斯派对纳粹和其他人的种族主义提出过强烈的批判，但他声称它们用大国沙文主义替代种族主义，以美国派生出的“文化模式”为基础，主张世界各民族和文化应该朝着这个模式发展。他举赫斯科维茨 1948 年的《人及其作品》(Man and His Works) 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赫斯科维茨在书中为“黑鬼”的文化移入和同化辩护。梁钊韬认为赫斯科维茨的错误在于，在需要对更根本的基本种族主义体系进行重新组织的情况下，他仅仅主张社会变革。他接着说：“美国文化和心理学民族学派，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为美国反动的两面政策服务的，它的危害性比之旧种族主义更具有欺骗性。”

他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话和他对人类学科学工作者的指示作为文章的结尾：

毛主席指出：“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这是真理。一切资产阶级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理论，都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斗争在学术战线上的反映，……（毛主席的）《声明》也给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工作一条明确的方向，必须在学术战线上与种族主义的谬论作斗争。

梁钊韬的这篇文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所代表

的不仅是梁钊韬的主要思想和作品，也代表了其他许多人当时的思想和写作形式。和许多其他的学术论文一样，这种文章开头和结尾都要引用一段材料，其来源在思想上应该是无懈可击的，文章的主体部分至少在实质性内容上要与权威的警句紧密地结合起来。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读这篇文章，惊异地发现梁钊韬早在当时就提出了许多目前在“人类学与他者（the others）”的讨论中西方人提出的对人类学理论及惯例的批评意见。还值得注意的是梁钊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大大方方地使用“人类学”和“民族学”这种名词，这也是他不懈地坚持中国自己的人类学，以及他 50 年代末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一个小小的证据。

然而，邓泽民对她丈夫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的印象稍有不同。对她来说，这仍然是她事业上的伴侣的黄金时期：当时他极受尊重；社会活动丰富，体力充沛，思维活跃；是他所在系的领导。在家里他们过得也不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儿子梁津于 1956 年出世；到 60 年代初，梁钊韬夫妇请了两名住家的佣工帮助管家和照看孩子。

邓泽民还记得她的丈夫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着热心公益的精神——他不想利用事业或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她回忆说，有一天保姆把他们的小女孩带到了梁钊韬的办公室。据说，当这位 3 岁孩子要一张画画的纸时，梁钊韬回答说：“不行，这不是我们家的，它属于人民！”当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时，不让自己的妻子随行，因为这样做不对。“你会相信我从未去过北京吗？”她问道，“尽管我丈夫一年要去三次。”

第十章 人类学学科的解体 ——文化大革命

中国政治道路的下一个转折极大地破坏了梁钊韬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和学术生活。对知识分子来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比反右派运动还要严重，因为它持续时间更长，涉及到的人更多，它的暴力和迫害所达到的程度简直超乎人的想象。一开始是在1965年借批判文学作品之名不公开地打击反对派，到第二年，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烈，引发了整个社会长达三年的革命的大动荡。尽管到1969年，中国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有所恢复，但是

(文化大革命)这个思想过激，迫害成风，总体管理混乱和处在极端无政府状态下的时期延续达十年之久，1976年秋，它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捕而宣告结束，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社会。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派萧条景象。(Thurston 1987: xix)

有些中国人(如林耀华)却进一步表示，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华国锋被免职、党正式接受支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后才结束(林耀华，个人交流)。

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对象

1965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姚文元的一篇攻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Spence 1990：601）。不久，文艺批评逐步升级成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到1966年5月底，吴晗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都被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就在同一个月里，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一份大字报，号召学生们起来批判全国各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学校停课，揪出了一些斗争对象，宣布他们为“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主席派出工作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积极分子小组）到各大学，让成年人和党的领导去防止学生造反（Thurston 1987：xvi，93）。

这年6月，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号召清除所有反对毛主席的人，这就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都踊跃参加清查他们当中的“反革命”的活动，大中学校开始关闭，最初在北京，然后蔓延到整个国家。由于党在校园里派驻工作组，因此“这个时期充满动荡、暴力和恐怖——然而，这种动荡是被牢牢地控制着的”（Thurston 1987：xiv）。

1966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文化大革命推到一个更极端的阶段，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者之外，党员也成了革命的对象（Goldman 1981：135）。这是党自1949年掌权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我削弱（self-emasculatation），刘少奇本人也遭到贬黜。是年夏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毛泽东戴上了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红袖章，至此他将革命的指挥棒交到了学生手上。

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暴力行为日渐增涨，全国主要城市和大部分地区都转向各个派系之间的武斗，中国徘徊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的边缘（Spence 1990：605）。1967年1月可能是激进潮流的一次高潮，2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派进全国的许多单位都没能使这种势头有丝毫减弱。整个中国被混乱所统治，9月逐渐达到了顶峰，工作组被派去控制学生的无节制的行为，秩序开始恢复（Spence 1990：607~612）。

迫于军队和工作组的双重压力，甚至连嚣张一时的红卫兵都开始受到攻击和控制。红卫兵的队伍一度曾壮大到2000万人，1968年到1970年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加入到500至600万城市青年的队伍中，被送到农村去“推动革命，向农民学习”。到1975年，这个数目增大到不下于1200万（Chesnaux 1979：189~190；Spence 1990：607~612）。

各院校的教员去参加“五七干校”，这些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也和知识青年一样到了农村。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膨胀的危险，党长期以来运用下放政策将城市干部派到农村，希望通过到农村体验生活增进各领导阶层之间的交流，使上层领导了解基层的意见。通过这种方法，党从理论上获得了更民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White 1983：45）。

文革期间，将城市干部送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增加了他们实践的机会。1969年（应为1968年——译者注）5月7日，下达命令让政府工作人员离开城市，是年年底，许多单位实际上已经将全部人员都迁往农村的临时干校。毛泽东最初设想让一些人轮流去干校，一次呆几个月，到后来许多单位全部迁走，很多人一呆就是几年（Shapiro 1979：234）。设置这些体力劳动场所的

目的，是想通过让城市居民了解体力劳动的光荣和艰巨，来改造知识分子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倾向。在这些劳动场所，“接受‘政治再教育’要占去一天里的绝大多数时间。由军人或农民来为他们讲课——前者在受教育程度上显然要低于自己的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也常常不如他们”（Thurston 1987: xviii）。

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很清楚地显示出瑟斯顿对于知识分子被迫去听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他们的农民讲课的同情。和这一时期大多数的西方作者一样，她并不赞同文革期间革命分子或政治积极分子的目标。在乐黛云和韦克曼（Carole Wakeman）的《走进暴风雨》（*To the Storm*）一书中，作者乐黛云叙述了她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是如何——

因为受过教育而遭到无穷无尽的羞辱。关于他们的罪名，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因袭了儒家传统的清高，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享受过西方文化的成果。由于在本书叙述的几十年里他们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乐黛云等人不得不抛弃一切，从贝多芬的录音带，司汤达的《红与黑》到对孟子的格言——“仁者无敌”——的信仰。（1985: 11）

知识分子确实遭受过这种迫害——的确，施瓦茨描述说，由于被扣上“人民的敌人”的帽子，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比中国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所受的磨难都要多——同时，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熟悉外国文化，甚至是能够阅读英文都会使一个人受到怀疑，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也有人令人信服地提出这样的主张，说不必对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进行批判，只需对他们进行合理准确的批评

(Schwarz 1986: 66)。

例如，后来被称作“极左分子”的那些人有一种观点，强调潜在的教育机能失调，因为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科技和经济管理上，从而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和新的知识分子贵族 (Tang 1983: 63)。许多学生确实感觉到自己的老师真正所代表的是一个认为自己“高于”体力劳动者的阶级。弗兰肯伯格认为，社会的其他群体对知识分子传统的特权地位确实怀着这样的不满情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降低这个高贵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虽然残忍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Frankenberg 1986: 506~507)。在他看来，当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似乎成了农民或是更糟糕的什么人”时，这些“过去处在掌握自己和他人命运的位置上”的知识分子会变得“极为苦恼”，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他的这种看法决不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带来的极大恐怖会因为知识分子的傲慢而合理化。绝非如此。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滋长着不合情理的反知识分子情绪，这远远超出对知识分子阶级的客观批评作出的反应。反知识分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臭老九”一词上，作为对知识分子的蔑称，这个称呼在文革期间十分流行。

和文化大革命同等的反响或经历是任何一次社会性群众运动都没有过的，它的影响波及方圆近千万公里的数百万人。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遭受痛苦，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同样地，有些人还不够年龄，以哪种形式都不能参与运动，另外一些人与极左分子结盟并支持他们的活动，而有些人则搞得太离谱，他们自己就充当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

例如，1986年一位年近40的民族学家对我说，他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但在停课後仍然坚持自学。“从

1966年到1970年，你上不上课都没有关系，只要坚持到底就能毕业。”1966年，他参加了全国青年的大串连，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红卫兵和政治积极分子一起免费旅游，“交流革命经验”，他到过远离自己（位于沿海地区）家乡的新疆、内蒙、宁夏和云南。“但是，就算是当上红卫兵，我还是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地区我就设法去了解他们。这实际上激发了我对民族研究的兴趣。”串连结束回到家以后，他转而参加1967年在自己大学里爆发的武斗，并被指派为一个派系的头目。

1968年和1969年军队进驻他所在的学校后，他成为斗批改活动的积极分子，与以往的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相比，这次活动更有纪律性，旨在批判“不良倾向”。小组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代替武斗，成为与修正主义、黑典型和黑苗子作斗争的主要方式，他们都存在着将资本主义带回中国的危险。从那时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一直学习俄语和历史。1978年他通过全国高考，成为一名真正的民族史专业的学生，因此，他作为红卫兵到西部旅行时被激发起来的对民族研究的兴趣能够继续得到满足。

“取消”民族学

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在党的关怀领导下，我们的民族工作不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继续前进时，林彪、“四人帮”之流给国家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像其他领域一样，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领域，也遭到严重的摧残、破坏。林彪、“四人帮”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否定民族工作，破坏民族团结，大搞民族分裂，扼杀民族研究工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民族研究工作停顿了，机构瘫痪

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散失了，许多地方的研究队伍解散了，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尤其是他们在民族问题方面制造了许多谬论，在思想、理论上造成了混乱，给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恶果。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马列主义民族学研究，污蔑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加以全盘否定，全面扼杀，使“民族学”这门学科在我国被完全取消了，许多民族学家和研究工作者遭受打击摧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幸存下来的研究者们也连“民族学”这个名词都不敢提了。

这是1957年的模范党员林耀华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严厉的公开指责，它证实了那些年民族学家和他们的领域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对于民族学所受到的攻击，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它著名的民族学中心——中央民族学院感受得那么深切。

从1966到1971年，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完全停止，一些正在努力之中的民族学工作，如历史系的民族学教研室一旦被“扼杀”——林耀华的比喻——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在这些年里，民族学被宣布为黑牌子，是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科学，因此应该予以取缔。理由是马列主义没有民族学，因此为什么中国要有呢？当时有些人甚至批评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民族学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根本算不上伟大。过去早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首次提出的对民族学的批评又卷土重来：民族学家们猎奇，如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想藉此使少数民族问题复杂化，从而有意破坏民族团结；民族学家集中精力研究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因此他们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解释失真。

一位当时刚刚从研究生毕业十年的学者回忆道，当文化大革命蔓延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时候，受伤害最深的是老学者，许多人被关了禁闭。这是在派性斗争的三年时间里。大多数单位模仿党中央的两大派系分成两派。她记得：

在北京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里分天派和地派。各派对当时的大问题——即中国沿哪条道路走更革命——的意见各不相同。我是地派。被监禁的人不能公开参加任一派，但是林耀华也遭到监禁，但他私底下是个天派。

在位于中央民族学院校园内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事态的变化更为野蛮，人们——天派与地派之间——动了真家伙，用石头和棍棒（但没有用枪）打了起来。

对青年人来说，这就是革命。但年长的人并不这么肯定。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园，一个月后，这样的宣传队延伸到首都各高校（新华通讯社国内材料组1982：134）。不久，中央民族学院的大多数人，老老少少都感觉到这种频繁的斗争毫无意义，到1968年底，所有人都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紧张和敌对。军队进驻校园，成立管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后，形势开始转向平静。然而，不久以后人们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去湖北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大多数人一呆就是两三年。

首都之外的地方，气氛也好不了多少。在云南大学，民族学的三位带头人方国瑜、江应樑和杨堃都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甚至在从干校返回大学校园后境况也没有好转。在这三个人当中，方国瑜的问题最少，因为他运用毛

泽东的理论写了许多书^①——对此还有些争议。而据说杨堃遭了很多罪，不再允许他授课，而是分配他到系资料室当一个小管理员，于是他决定离开云大到北京去。

由于民族政策专家都遭到监禁，或是正在忙于派性斗争，而与少数民族关系最紧密的学科体系——民族学和民族语言学——被“取消”，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共产党内赞成少数民族被汉文化同化，并且迅速向社会主义这个统一标准转变的那一派会掌握民族政策的决定权。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红卫兵的斗争目标是支持稳扎稳打政策的汉族干部、没有“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的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增多（包括从上海下放到新疆的“知识青年”），汉族干部替代了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服饰和发型——受到强烈冲击（Grunfeld 1985：64）。

民族学家到今天还可以详述那个黑暗时期文化上（有些是物质上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他们时而羞愧，时而愤怒地讲述当时的情况：强制性汉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里禁用少数民族语言，用普通话代替^②；强迫回族等穆斯林吃禁忌食物，或是让他们身上挂着猪内脏沿街游行并说自己的饮食禁忌是迷信行为。红卫兵甚至不让人们唱民歌，因为“它们是旧文化”。少数民族社会的经济也被迫发生改变，通常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主义者的信条是“以粮为纲”，少数民族地区就得种植小麦等其他谷物，但那里的生态条件并不适合这些作物的生长；毫

① 例如《云南民族史》和《西南历史地理》。

② “但事实上”，一位受访者接着解释说，“当时人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更不用说外语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普通话就是一门外语”。

不奇怪这会带来食品短缺。在讲述了几条这样的奇闻轶事后，一位民族志学者开玩笑地说，文革的领导“没学过人类学”，所以对这些事情不是很明白。

有时候民族学院的人被派到少数民族当中搞宣传工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但即使是这种时候也会犯错。负面影响最严重的时期是被有些人称作“红色高潮”的1966至1968年。但也有研究人员怀疑说它的破坏作用是长期形成的。“怎么可能在一年时间里仅凭青年人的冲击就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呢？”一位当时在海南岛工作的研究人员反问我，“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就连美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想改变海南人的文化，可苦心经营了一个世纪也没能使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生太大的改变。”到1969年或1970年，最苛刻的政策开始趋向缓和，到1971年，反宗教运动总算停止（Grunfeld 1985：65）。

冲 击

至于个人，民族学家可能是人类学科学领域最担惊受怕的，因为他们的整个学科都被认为是有缺陷的、腐朽透顶。被批得最厉害的是费孝通、吴文藻和吴泽霖。自从1957年挂上“牌子”后，他们三个就成为显著的目标。费孝通和他的故交林耀华都因前些年的过失而遭到批判，包括他们在1951年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中“破坏民族团结”的所谓错误领导。他俩都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对费孝通的批判要更加苛刻。^①

^① 关于费孝通在这个时期遭受的折磨和痛苦，参看巴博德（1988：651~654）。

但是从某些方面看来，林耀华则是更大的斗争目标。他是只“活老虎”，而费孝通是只“死老虎”，因此林的失势更具戏剧性。1966年9月，他从农村回到北京，还没到住所就被拦截了，马上被“戴了高帽子”。他被宣布为“国民党的走狗”，因为抗战时期他曾从事边政工作。而早已经置身旋涡中心的费孝通此时还劝他的朋友们不要绝望、不要自杀；他知道知识分子不是文革的主要目标，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忍受住这一轮痛苦的考验。

红卫兵还指控吴文藻是“祖师爷”。作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他派人到全中国散布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这是相当反动的。因此他的“后辈”（学生）也一并受到抨击。在南方，杨堃遭到严厉的批判。他的曾留学法国的妻子也因受到批判而自杀（杨夫人张若名是在1958年自杀的——译者注）。无独有偶，早在反右派运动期间就遭到过批判的著名学者岑家梧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长达两年的批斗使他不堪忍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得不到正当的医疗，潘光旦也被红卫兵折磨致死。在昆明，江应樑被宣布为“牛鬼蛇神”，在以后的8年里几经波折。而在成都，民族学家童恩正（和他的父母一起）蹲了三年“牛棚”，罪名包括有亲属在香港和海外。在武汉，语言人类学家严学窘——用他自己的话说——同样“没能避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麻烦”，因为他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

其他不太著名的人，文革期间同样也“没能避免麻烦”。任何对现状不满的表示，哪怕是轻微的，都会使一个人成为下一次公开批判的目标。一位中大的教员1966年底随随便便地对同事大声评论说，学生的大字报批评中大党委和遭到全面声讨的北大党委一样坏，那是言过其实。校园里立刻就张贴出大字报对他提出尖锐批评。是他

的同事告发了他或张贴了这份大字报？他不得而知。“这些大字报通常不署名，或者至少不用真实姓名。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匿名批评或是在背后批评你。”

批评你的人还记得你在前几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从中寻找你思想不纯的证据。因此，在“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中整过人的那些人都避免了被划成右派，有的还被表彰为积极分子，而没有参加运动的则在文革期间被提出来作为他们对党和革命态度冷淡的证据（Thurston 1987: 71）。

红卫兵及其支持者所做的不仅是破坏工作和伤人。“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民族学家评述道，“他们还不给你学术资料——你的书籍和论文。他们只是批判你的思想。第二个阶段他们就开始抨击你的材料。”在这个混乱和狂热地反对知识分子的时期，大学和研究机构收藏的大量研究材料也遭到冲击。“图书管理员和图书爱好者个人常常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红卫兵要销毁的书籍”，常常连卡片目录都被毁掉（Thurston 1987: 101）。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疯狂的破坏竟是尾随着一个学术成果史无前例地丰富的时期而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

中国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例如，从1950年到1965年出版了约36.8万部书，包括大量对学者们有重要意义的资料。文革期间，官方和个人收藏的资料文献及其研究和出版所经受的磨难与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相比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Feuerwerker 1987: 5）

许多人眼看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收集到的资料被四处搜查的红卫兵抄走或是毁坏。红卫兵没收了中央民族学

院陈永龄所有的资料，包括他有关嘉戎人的论文。这篇论文1950年曾被译成英文，但一直没有发表，它从此就永远地消失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和江应樑等人的田野工作笔记及著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位大学的民族志工作者对我说，红卫兵实行的是“打砸抢”政策：打人，砸东西和抢材料。她对我讲述了红卫兵是如何到她家里，然后井井有条地将她所有的笔记、卡片和田野工作材料堆放在一起带走的：

我的血都为之凝固：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拿走你的笔记就像撕你的心一样。他们都是坏人。在你自己的单位就有人拿走你的资料，你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不久以后我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就偷走装书的书橱；他们用斧子砸开我上了锁的柜子，把书全都偷走。这些人也是学者，当时的策略是利用一群人打击另一群人——直到现在，要我看他们一眼都很困难。我现在两手空空——他们把我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拿走了。这是非常令人心酸的事情。可能是出于妒忌，也可能他们真认为你的政治思想不好。不管怎样，他们让你一无所有。

考虑到中国教育单位的人员流动性有限，这位女士到今天还要和20年前反对过她的人相处，这种经历也并不罕见。

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老学者认为，派性斗争带来的痛苦迟迟无法消除，因为人们总记着那些残酷的日子。“人们不谈论它，但他们心里这样想着，他们记得谁支持过自己、谁反对过自己。但今天他们认为那些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人们被迫批判别人是由错误的极左政策造成的。”民

族学家黄淑娉在文革结束多年后说，当时作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她的办公室里就任用了一位在“文革”中当红卫兵、曾抄过她家的人为秘书。

在城市另一端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描述说文革像“十二级台风”袭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让他们在它强大的气流中晕头转向。“今天说这个人是‘反动权威’，明天宣布那个人是‘牛鬼蛇神’，特别是一些和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难免受到牵连”（贾兰坡1984：2）。这直接触及到贾兰坡，因为作为周口店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和外国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而且近期他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催促下完成了近5万字的书稿，详细叙述了发掘的全过程和其中的一些轶事。贾兰坡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口店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我当时已料到这场烈火终究要烧到自己的头上，因此，我写的那部分稿子成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大石。我在稿子里，既提到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又谈到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这样写在当时是“犯罪”的，一旦被查出来，就难免要吃苦头。怎么办？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下决心把它偷偷付之一炬。我每向炉火中投掷一页原稿，心里就感到一阵绞痛，但是，在当时也只好这样做了。^①（贾兰坡1984：2）

^① 几年后，贾兰坡重新与黄慰文合著了回忆录（贾兰坡和黄慰文1984）。计划在美国发行英文版。[英文版199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注]

并不是贾兰坡一个人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同样被迫毁掉自己的图书和艺术收藏品（Spence 1990：606）。

尽管有人声称文革与教育改革有关，但是很显然——像一位民族学家说的那样——“运动触及到的是人而不是学术问题”，因此才会提出在人们的资料没收、错误被提出来之后如何从政治上改造他们的问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放”到五七干校。每位学者都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年他或她在哪里干过体力活。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有人下放了仅仅一两年，而其他的许多人在农村呆过三四年。但是从农村回去后也不一定能从事学术工作。一位民族学家当过两年农场工人，然后被分配到工厂的车间呆了一年后才回到课堂上。语言学家胡坦在中央民族学院湖北干校劳动了两年，1970年返回校园，1971年才继续开始任教；广东民族学院现任院长与湖北土家族农民一起生活过两年，所以想办法在极不理想的条件下偷偷摸摸地搞“参与观察”。然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广东民族学院的一位研究工作者告诉我说，他在农场工作两年之后并没有返回学术界，而是被分到高明县征收房地产税。他以后十年的工作与他所受的职业训练完全没有关系。直到1980年他才设法调到一个民族学的单位。

干校的条件通常都很简陋。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回忆起他们在湖北五七干校的生活，都说那里住房极为拥挤，吃得也很差。更糟糕的是被监禁在那里的许多人，特别是老学者们，遭受的心灵上的创伤。两三年的劳动改造长期给人以压力，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对那些著名学者来说，这种压力始终都存在。

林耀华夫妇，还有吴文藻及其妻子、著名作家谢冰心一起呆在干校。他们和其他老学者必须在地里干体力活，

还得接受对他们的批判。批斗会是事先计划好的，宣传队选出三四个批判对象，具体批判他们的工作。这些批斗会最经常的情况是针对各单位资格老一些的成员。年轻些的能躲过一些，一年可能才会有一、两次批斗会是针对他们的，而最年轻的则能完全躲过遭批斗的命运。

一位在湖北的干校呆过两年零九个月的学者回忆说：“如果轮到你，你就眼看着人们为批斗你作准备。他们不和你说话，只是对你怒目而视。不会事先通知你下次批斗会是不是要批斗你，但你通常能猜出来。”另一位学者坚持说：“这些批斗会真吓人，但不久你就会习惯了。”然后他又不无讽刺地补充道：“如果它们真是学校，那么用来对人进行再教育的方法就是‘吆喝人去学习’！”

这位干校的老学员还记得各个年龄层的人对这些经历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反应。

那些60岁以上的老学者并不对折磨他们的人提出什么疑问。然而40来岁的中年学者就不会轻易受到恫吓；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公平的。这些学者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与老学者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旧社会的污染。年轻些的学者认为这类事情不应该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对待知识分子显然是错误的，太左，很多人也敢这样说。

与民族学家和其他民族事务工作者这些近乎完全混乱的传奇故事相比，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其他人类学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在极左时期的经历相对要平和些。与反右派运动一样，自然科学没有受到与社会学同等的影 响，不论单位还是研究者个人都躲过了批斗，受到的伤害也要小些。因此，这些年里许多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机构继续工

作——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工作，它们也是70年代政治有所降温的时候首批恢复工作的机构。

据古人类学家张镇洪说，尽管文革期间周口店博物馆和中国所有其他的博物馆一样被关闭了，但它在1972年第一个重新开放。而且，周口店遗址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1967年张镇洪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停课以后，他就去了周口店，在那里他以学徒的身份向中国古人类学界的宗师：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和周明镇学习。在那个麻烦重重的时代，这些老师急于将自己的方法和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张镇洪在周口店呆了四年，汲取了他们古人类学的智慧。

其他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遗址的工作也在继续，特别是那些保持低调的地方。一项关键性的工作就是要保护文物不让红卫兵抢走：上海自然博物馆现任馆长深感骄傲地说，由于工作人员保护得力，使该馆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同样地，据一位参与过70年代初汉墓发掘的考古学家说“文革期间考古实际上并未间断。但是我们特别注意保护发现的珍贵文物，这样它们才没遭到文革‘卑鄙’分子的破坏。”总的说来，考古学受混乱状态的影响要小些，工作继续进行，步伐常常很快，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去斗”，一位北京的考古学家回忆说。1966年到1969年间，出版工作确实中断了，但新的考古发掘和发现还在继续（张光直1977：134）。奥尔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犯下的暴行大多针对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因为考古学和文献证据显示出这些过去的社会是如何符合或背离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Olsen 1988：3）。因此，尽管在某些地方某个阶段考古学完全中断长达6年之久，但其

他地方的考古学却蓬勃发展。^①

文革的大部分时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也都在继续，但正如前面提及的贾兰坡的回忆录中所述，它的生活与研究都与往常不一样了。从1966年夏起，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完全中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所有的单位一样陷入了内讧的泥沼，到后来，政治会议接二连三，许多工作人员上班有时去有时不去，研究和训练逐渐受到影响。然而，红卫兵对那里的冲击据说并不太厉害，因为大多数的红卫兵都是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而不是青年学生。一位研究人员对我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这里的红卫兵更斯文些，我们用更文明的方式解决事情。例如，当轮到批斗研究所所长杨钟健的时候，我们开了个群众大会控诉他，然后他又回到办公室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年长，很受尊重，因此没有一个人打他。贾兰坡也没挨打，而对待吴汝康要粗鲁些。小型研究所都是这种情况：人们彼此间都很熟悉，很少会打对方。每个人都认识其余的人，他们意识到政治运动结束后，他们还会共事。

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领域的一些资深学者也被单独点名揪出来批判，经历了一些磨难。安志敏和裴文中存在“历史问题”——追溯到30年代末和40年代，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们还继续在那里工作。他们本人没有替日本人干过事，但他们继续在日占区逗留是否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爱国

^① 例如在昆明，文革期间云南大学斗争激烈，1966年到1972年，出土文物的复原和研究也中止了。

立场呢？贾兰坡被宣布为“反动权威”，从1966年起被监禁在家长达五年之久。在家中，贾兰坡继续工作，包括偷偷与黄慰文合著另外一部周口店发掘史^①，然而，这个版本严格地限制在古人类学纪录范围内，避而不谈挖掘工作的社会背景。其他受控诉与反控诉的直接影响小一些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领域，到1967和1968年，恢复了一些工作项目，例如，派小组到1965年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的云南省元谋县，继续那里的工作。

在昆明动物研究所，尽管大多数灵长类的研究工作中断了，但并非所有的这类工作都中止了。始于1963年的长臂猿研究以及大多数猿猴分类和解剖研究都被嘲笑为“无用的”，但有关辐射对金丝猴的影响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因为这项工作牵涉到国防和核武器计划，因此他们的研究比思想问题更为重要。

无产阶级教育

尽管又耗了十年时间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潮水才完全退尽，但是1970年左右高潮已经过去。70年代初，前些年停办的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所都开始重新打开大门，以前的一些活动也有所恢复。然而，这一次要密切监视从五七干校回来的那些人，以确保所有教育和学术单位的无产阶级正气。

整个教育体系根本的变化包括缩短完成全部正规教育所需的时间。新规定的学制要求小学和中学各五年，接着到农村、工厂或军队工作两至三年。想要进一步深造的人

^① 1975年用英语发表，题为 *The Cave Home of Peking Man*（《北京人之家》），北京：外文出版社。

需在其工作单位的同事或领导的推荐下才可以报考大学。最终活跃于考古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系或教研室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当时正在博物馆或文化局工作，或正在地方上从事考古发掘（Howells 1977：161）。

据佩珀说，当时主要由这些单位的领导来决定谁能去上大学（Pepper 1984：2）。不举办全国性的考试，只需通过写文章来测试学生。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经历和家庭出身比严格的学术成绩重要得多。当推荐要占用单位的大学分配名额时，对出身不好的那些人往往不予考虑。这种政治化的录取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干部官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Pepper 1984：2~3）。而且，被选出来的人当中没有几个是有精英背景的知识青年；但既然他们通常是按指令从农村挑选出来的，因此正式档案中称他们是“农民学生”（Unger 1982：286）。

当时大学只招收工农兵学员；一旦被录取，这些入学者要接受三年的教育，这与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学生都有着显著的区别。被称作“学员”而不是“学生”，这些新式的本科生会公开对老师的授课内容和方法提出批评。他们的口号“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反映出他们将革命目标带到了校园。政治显然支配着一切，当时规定必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学员参加大量体力劳动，禁止本科生结婚，也极力反对男女生谈恋爱。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室被严加看守；要求进入外文图书室的人会有被称作“洋文化奴隶”的危险（Shapiro 1979：259）。

混乱状态后的前几年里，旧的专业和学系都没能恢复。例如，当时仍然严格禁止教授考古学。云南大学一位考古学家回忆说，1972年恢复教学的时候，“我们教什么都要听领导的。我被告知不能教考古学，（相反，）必须教

古代史。”70年代初有人认为教育“惟一的专业”就是向“走资派”进攻(Shapiro 1979: 259);而大学按照更宽的范围来划定组织,比如厦门大学就成立了“艺术和历史研究室”(Arts and History Sections)。陈国强在闽西农村呆了两年后第一次回厦大,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式的学术单位。

伴随着校园里新的政治觉悟的是大学管理的“红色化”。系和学校都由革命委员会来管事,同时由与之并行的党委或党支部决定政策方向。系里的革委会形成“革命领导小组”,由干部、老师和1968年8月25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后进入全国各级院校的工宣队的代表组成(新华通讯社国内材料组1982: 135)。“小组”以维持学校的政治气氛为己任;他们通过执行“斗批改”来达到这一目的。直到1976年这个机构才失去对大学生生活的控制权,到1978年这些委员会才正式取消。为了使学生的革命热情常盛不衰,“工农兵学员”每年要花6至8个月时间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

到1972年,博物馆和体质人类学中心的公众形象有所提高。周口店首当其冲,当年就开放了一个新的陈列厅(Chia 1985: 1 [当为贾兰坡1975: 1——译者注]),昆明动物研究所恢复了长臂猿研究,上海自然博物馆也随着一次陈列展的举办而重新开放。“从猿到人”展览包括了从20多个城市收集来的资料,在该博物馆开辟出一个长期性的体质人类学展区。1974年该博物馆组织了一次古人类学巡回展览,馆内举办的展览会告一段落。

70年代研究工作也重振旗鼓。大量的考古学断代技术得到发展和应用,包括放射性碳素断代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氨基酸外消旋断代(amino acid racemization)和热释光法等(Olsen 1988: 4)。单是1972年一年,

在陕西省窑头沟就发现近百件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山西省许家窑遗址（10000多件石器和人类化石）、周口店和陕西省大荔早期智人遗址都有新的重大发现。南方很少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但在四川富林和贵州省的猫猫洞和硝灰洞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吴汝康和林圣龙 1985：11~13）。

毫不奇怪，民族学复苏的过程更为谨慎。到70年代初，以往的民族学家从干校返回原单位，但只允许他们从事翻译工作，将外交部等政府机构指定的外国著作译成中文。然而，到1973年和1974年，由于研究所和大学慢慢地恢复工作，也逐渐允许学者们恢复一些教学和研究工作。吴文藻讲，他回到中央民族学院，被分配到编译组，到了那儿，立即分配给他和其他人（包括林耀华）翻译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后半部的任务。这个组还翻译过其他的外国著作，编写过几卷反映帕米尔高原地理、人文和风俗的书，并恢复了大量文革前的工作（吴文藻 1986：93）。其他人翻译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等人的著作（秋浦 1984：17）。

秋浦也告诉我们，这些年民族志研究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甚至还制作出几部纪录片（秋浦 1984：17）。然而，由于“四人帮”反对民族学和社会学，在70年代的某些阶段，这类研究不能在大范围内进行。它完全依赖于最上层来发展。

例如，1971年，随着经常受到称颂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领导的反革命集团的颠覆，邓小平摆脱了文革的磨难，回来整顿恶化的社会和经济局面（林耀华，个人交流）。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人暂时官复原职，工作重点

又转移到“现代化”上。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年就同意民族工作者恢复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民族学家对我讲，邓小平的盟友胡乔木亲自向学者们转达了邓小平和周恩来对他们工作的支持，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获准恢复调查。在得到高层领导的保证后，民族学家恢复田野工作的信心倍增，有些人1974年和1975年就重新开始开展田野工作。

在这个暂时的政治解冻期，与民族和民族学有关的单位开始复苏。中央民族学院1972年春季重新敞开大门，但是个别学系经过了更长的时间才恢复工作。然而，此时仍然不能招生，因此教员们并没有坐等复课，而是着手成立研究所。1975年，少数人获得批准后到新近复兴的历史系（林耀华任系主任）去教课，而大多数人仍然留在民族研究所担任专职研究人员。幸运的是，混乱时期学校的学术资料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曾派专人去保护图书馆的藏书），因此可以马上就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少数民族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的强制性同化政策逐渐让位给50年代初的更加多元化的政策，甚至连70年代的诸多政治运动都没能改变这一政策方向（Grunfeld 1985：66）。周恩来支持这种缓和的趋势，但到那时，他这个国家和学术的支持者已经非常虚弱了。1974年春，由于患癌症，他终于住进医院，从那时起，激进派（反民族学派）“四人帮”的权力更大了。受访者对我说，当时提出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授意发起的、针对“新儒”周恩来的一次运动。历史学及其相近的领域在劫难逃，也受到牵连；它们再次被扣上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民族学田野工作遭到禁止。到1975至1976年的冬天，气氛变得更加冷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受到批判，被迫辞职。当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

同年4月邓小平失势后，激进派的地位似乎是稳如泰山了。

对学术界人士和所有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政治统帅一切”，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研究中渗透着政治思想。1975年宪法的第十二条规定，“科研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张光直1977：132）。比如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应该忠诚于他们的“学系”，而应该忠于“为人民服务 and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真相……将关注历史作为一项指令而不是要求是一个传统……它只是被现政府所采用，而不是被它创造出来的”（Keightley 1977：132）。博物馆及其展品是中国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人们也可以提出异议说，每个社会都是如此），它们按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摩尔根的社会发展图式来布置展品，再现他早就定义好的从原始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顺序。张光直同样也表示（1977：132），既然考古学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中国的考古学家便坚持这一发展顺序的合理性。中国陈列的古人类学展品同样也遵循正统学说，解释说人类的产生是以工具制造，而不是双脚直立行走为前提的，以支持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论断。

因此，70年代强调的就是政治、实践及应用。由于理论问题脱离平常百姓的生活，因而不受青睐；要求学术体系向更实用的方向发展。一名语言学家回忆说：“70年代仍然在搞文化大革命。老一套还在，照样有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每样事物都要实用。我们可以训练人，但理论发展不多；我们自己不能从事研究或开展学术活动。”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的，因此资深的考古学家要花大量时间写通俗小册子、杂志文章和博物馆陈列柜标签，以把他们的学科带到人民中间。他们还参加麦收和

其他体力劳动，以缩短受过教育的人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张光直 1977：132）。

70年代初，学术刊物在消声匿迹了近十年之后又重新面世。在讨论这一时期的时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副所长戏剧性地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两期古人类学杂志《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指指第10卷第1期和它的出版日期：1966年2月。“那么下一期呢？”他反问道。“你自己看：第11卷第1期，1973年3月才面世。我们错失了7个可以出学术成果的年头。”中国的所有学术期刊都存在着同样的出版时间上的间隔。

而且，这些复兴的刊物的编辑作者们都小心翼翼，不敢反对正统的政治思想。学术论文不仅沿袭前一时期的作法，用粗体字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引用部分开始用红色粗体字印刷。学者们想要出版自己的作品就得学会为毛泽东唱赞歌。下面一段话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从1975年出版的贾兰坡的 *Cave Home of Peking Man*（《北京人之家》）“引言”中选出来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正在勤奋工作，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他们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以及实验室研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以完成毛主席的期望，他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第52页）

然而，70年代起发表的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它们几乎都是集体著作。尽管在前言或作品的其他部分会提到个人的姓名，但扉页上只列出单位。文化大革命前，人

们还有可能将自己的姓名列在作者一栏，但到了那时，集体著作超过了个人作品。从1966年到1978年，只有集体著作问世。^①有时候，会列出所有作者的姓名，最著名的作者的名字放在最前面；这能够稍稍改变一下集体著书的规则。

但是，这个政治化的、压制知识分子的时代即将寿终正寝。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几周之后激进派的领导被推翻。局势急转直下：次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1977年10月21日，全国恢复了统一高考制度；同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正式恢复了社会科学的合法地位。

政治遗留问题

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经常会听到人们公开谈论文化革命“失去的十年”。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是损失了两个十年。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害怕提出批评、提出问题或是提出异议。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切断了中国学术界与外界的联系，先是与西方，然后是与苏联，然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整个世界。一位民族学家归纳她的感受时说“总是有太多的政治运动。先说西方是资产阶级，然后说苏联是修正主义，然后‘四人帮’说我们不能学习任何外国的东西；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个非常苦涩的时代。”

在这“失去的二十年”里，极端毛泽东思想化正是人类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就

^① 1978年政策放宽后，又能够以个人名义发表作品。文稿也不一定要先经单位通过再送交出版社。

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今天会立即拒绝进一步本土化。但是对于整个中国学术界，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人类学科学界，那就是：除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或是中国人的惧外症之外，这些学科体系还能不能有另外一种合理的中国版本呢？

焦点之六 梁钊韬：下放和平反

人类学界的人民之敌

文革开始前夕的 1965 年，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已经发展到中等规模。除了梁钊韬——当时他是副教授和教研室主任——另外还有一名讲师、两名助教和三名研究生。该教研室是拥有 50 多名教职员的历史系诸多教研室之一。

当时，胡风发表批判意见（译者按：Hu Feng 当为吴晗之误，此处指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狂轰乱炸开始了。1966 年初学校已经停课，要求每个人都去“闹革命”！批斗拉开序幕，先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人，然后范围渐渐扩大。不久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受到怀疑；因此除了与政治有关的各系，许多专业实际上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政治就是一切”的口号渗透到一切活动当中。甚至连教师和学者都不需要了，因为学生可以自己教自己，教师和学者应该去参加体力劳动。只要给予学生适当的政治锻炼，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想压力越来越大，不久，中山大学也逐渐陷入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的无政府状态。学校不再招收新生，也不再分配工作。1966到1969年这三年间，惟一还在正常发挥作用的部门是维修厂（基本上只是供水供电）和自助餐厅。红卫兵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学校。每月工资100元以上的降到60到80元。人们对被视为“右派分子”的那些学者毫不留情，穷追不放。和全国上下其他各个单位一样，中大“红旗”与“东风”两派之间的战斗使学校遭受严重破坏。梁钊韬支持中大的多数派——“红旗”派（Vogel 1969: 330）。一位经历过多次战斗的老手回忆说，这一派最初是两派中更“厉害”、更激进的一派。

1967年夏季，中大成为广东学生红卫兵的一个重要的司令部（Vogel 1969: 334）。瑟斯顿称，这段时间，中山大学的红卫兵先是烧了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西方经典著作，然后是所有没有明确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最后他们将图书馆烧成一片废墟（Thurston 1987: 101）。但是当时在场的中大教员后来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说法肯定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我还用过该图书馆文革前就收藏的解放前的中西文资料。同样地，旧图书馆当时可能并未被烧成废墟，因为大楼现在仍然矗立在那里，人类学系就在这楼里办公。至少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听到的有关文革的恐怖故事似乎是添油加醋的。^①

然而，哪怕不作夸张，事实也的确是够恐怖的。红卫

^① Thurston 关于文革的另一段有些夸大的不太可靠的叙述也与中山大学有关。她称“在中山大学，没被派往农村的师生一觉醒来发现历史系所有的资深教员都被杀害了，吊在学校大门边上的一行树上”（1987: 133）。中大当时的教员，包括历史系的成员，再次发誓说绝对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指出，如果这是真的，梁钊韬80年代就不可能活跃地和我谈天了。

兵在校园里无处不到，其势力也深入到历史系，那里频频召开毛泽东思想研讨会。1967年到1968年初，对梁钊韬等人的批判更加猛烈，该系的一位教员，东南亚史专家郭威白因被批斗而自杀。1968年初，梁钊韬成为红卫兵关注的焦点，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学生到梁钊韬家，把他拽到女研究生宿舍的一个房间里，他在那里被严加看管监禁将近一个月。他成为调查对象，红卫兵调查他的历史，调查他与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团伙的联系。其他的教员关在别的房间里，所有人都受到学生的审讯，他们会寻找这些叙述中不一致的地方。梁钊韬对我说：

我矢口否认他们所说的反人民的罪行。我非常乐观；我不怕死。我批评过林彪，说他太老了，不能胜任领导职务。^①因为这个，再加上其他的“罪行”，我被连打带踢。他们到我家，搜我的书和资料寻找“秘密文件”，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过多地毁坏我的家具，只是把我的学术资料弄得一团糟就心满意足了。

主要是一、二年级的本科生批斗我。他们与我的关系不密切，大多数没有听过我的课；这和三年级学生不同，后者普遍都对我很好。当时用卑鄙的手段对付过我的人当中有一些现在还在中山大学，但我不因为这个记恨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参与运动。但

^① 梁钊韬的朋友们称，他是在放映一部歌颂毛主席的电影时发表对林彪的这番言论的。有一处演毛泽东在冬天里的一幕，他站在那里连外套都没穿，而林彪却穿了件厚大衣。梁钊韬评论说，这位接班人似乎很虚弱，结果让人偷听到，暗中报告了系里的红卫兵。

是，最坏的那些人大多已经不在这儿了。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怕与老师亲近，而且还躲着他们。我认为造成文革十年师生关系冷淡的罪魁祸首是江青、林彪和“四人帮”。

梁钊韬的妻子邓泽民认为，梁那段时间陷入麻烦，除了他的反林言论，还因为他发表过意见，为刘少奇主席和广东省省长陶铸辩护。^①其实，撇开他们所声称的什么意见或情况，梁钊韬被当作靶子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在旧社会阅历丰富，特别是他与国民党和外国的关系。

调查结束后不久，梁钊韬就被送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20日到1972年10月，他度过了四年多此类“学校”生活。他砌砖墙、搬重货、赶牛车，也干其他的重体力活。历史系和（中山）大学的大多数人，但不是全部，先是被送到乐昌附近的坪石，然后到了粤北的英德。像这样的集体下放并集体返回原校在广东颇具代表性^②，但在其他地方，如广西等，情况就不一样，那里都是单独下放，因此想要把人员重新集结起来就要麻烦得多。

破例没有被执行下乡命令的只有少数十来个老幼病弱者。梁钊韬所在的历史系，助教中有两人不必去；其中一个红卫兵，他参与决定了下乡的人选，也参加了在研究生宿舍对梁钊韬的审问。这位梁钊韬从前的学生现在已经40来岁，仍然在人类学系当助教，早上见到自己从前的

①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梁夫人肯定地告诉我，尽管当时对她丈夫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没有做任何反党反国的事。我们的党是正确的，但党内个别成员可能做得不对。”

② 除了上山下乡，省文革的领导还决定广东省需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多于10个，从60年代初该省设立的50多个一下子回落到大跃进前的7个（李修宏和周鹤鸣1988：3~5）。

对手时，他也绝不会忘了问候一声。

坪石是两个干校中条件较差的一个。水和不多的食物都要翻过一个陡峭的山坡才能挑到他们的营地。在这个临近湖南的山区，2000多名中大员工自己盖房，自己种吃的，渐渐地能够不靠他人来维持生活。像梁钊韬这样的政治贱民被隔离起来，不像其他人一年还可以回去一两次探望在广州的家人。

坪石的条件实在是太糟糕了，于是1969年“干校”迁到英德。尽管还是有人鄙视梁钊韬，但这次允许他和系里其他成员住在一起。日渐消瘦的梁钊韬默默地种着庄稼，等待着自由的到来。

重振考古学

1972年梁钊韬离开英德，将他的干校劳动生活远远地抛在身后。由于指控梁的罪名之一是他有毁谤林彪的言论，在林彪死后遭到唾骂之时，就要重新看待梁的这一政治错误。在庆祝建国23周年之际，梁得到平反，并被释放回到中大。

尽管梁钊韬本人经历了干校的艰苦生活之后身体状态相对不错^①，但并非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顺利熬过了这些岁月。他走后母亲逝世，他的两个孩子都因为是“牛鬼蛇神”的子女而受到辱骂。他的儿子梁津遭到阶级成分好的年轻人毒打，又被中山大学附中开除。他只得转到一所郊

^① 但是，他的妻子怪罪干部“监狱”[“五七干校”]破坏了她丈夫的健康。

区学校，那里的人不知道他父亲是个重罪犯。^① 梁津的姐姐到一家工厂上班来养活自己，但不久她就患了严重的白血病。父亲获释后不到一年她就病逝了。

梁钊韬虽然回到了大学，但学校的作用已不完全是教育机构。早在1970年，中山大学就再次招收了一批学生（约280个），以后几年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学校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权力集中在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手里。革委会由老革命干部、学生及教工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一名工人宣传队队员和一名人民解放军宣传队队员。^② 校长办公室连同旧的管理机构被取消，但旧的学校党委和系党支部还依旧未动。学校革委会的头头是个老兵，还兼校党委书记。这位校领导自己从未上过大学，因此，在一个到处都是知识分子的大学里，要想始终受到全校的尊敬实非易事，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红色”时代也办不到。

当梁钊韬返回中大的时候，这位大学的领导通知他应该马上准备为本科生开考古课。考古课是这个学科体系复兴的第一步；1966年以前，该系有一个考古教研室（梁从1956年起任该教研室主任）和一个考古学方向。梁钊韬对我说，重新开设考古学课程的原动力来自北京，来自国家文物局，学校非常乐于为北京服务。1973年起中大开设这类课程，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系的课程安排中

① 十年后他到美国去留学，获得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更名为梁吉姆，以纪念佐治亚州大平原的骄傲杰米·卡特。在获得另一个博士学位（化学博士）之后，他去一家林业产品公司工作。

② 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为了在派性斗争混乱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些秩序，人民解放军宣传队1967年就到了中山大学校园里，他们站在“东风”派一边，使“红旗”派很快黯然失色。一个工宣队也进驻学校，对中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专制领导，并派代表到各个系。中大革委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军队手中。

逐渐增加了考古和史前史的比重，连民族学都打着民族考古的幌子从后门溜了进来。此后不久，又增设了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复兴过程还在继续，到这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系里设置了一个考古专业。教育部长批准了中大设立这一专业的要求，因为国家急需受过训练的考古工作者，但当时除了西北大学和北京大学外，很少有这样的培训基地。

梁钊韬的初衷是有计划地发展起一个独立的考古学系，不过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这样一个系耗资巨大。一个完善的考古学系所需的实验室和其他设施的建设资金可能会有些问题，梁不敢保证中大会批准这类项目。成立一个考古学系可能也会遇到学校的阻挠，因为校方难以替更多考古专业的本科生毕业生安排合适的工作。

几年后梁钊韬决定，如果能获准将民族学作为一个专业，如果他能够物色到合适的人员，那么，成立一个下设考古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的人类学系是更好的策略。毕竟梁本人最初就是教人类学的，如果政治和学术条件好的话，他还能够重操旧业。如果除考古学外又增设民族学，那么四大学科中就占了两个，民族考古的双翼相应地能够为新系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同时，学生必须接受新的考古学专业教育。第一个工农兵学员考古班紧随上年入学的学生于1973年9月进入中大校园康乐园。这个班有25名学员，——家庭出身几乎全是农民，大多数是贫农，1975年的第二届仅有15个学员。这两个班都要进行三年的学习，经历都差不多。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要占用学员们相当多的时间，那些花“太多时间”学习大量非政治科目的学生可能会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白专”（分子）。尽管梁钊韬回学校后不久就想恢复田野工作，但直到1975年他才有机会

这样做，当时他带着73届学生到广西合浦县参加一个汉墓的发掘工作，藉此来引他们入门。

这个“被改造过的”学者与有政治觉悟（至少是政治敏感度）的工农兵学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热情。梁钊韬回忆说，尽管我是他们的老师，但在那个年代，“老师没有任何权利。就连我的生命都是由别人来控制的。但我一直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所有的老师都得提防自己的学生，以前的工农兵学员回忆说，他们在历史系可以公开批评老师的授课内容或教学方法。在中大，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有时候我们的批判相当激烈，但一般情况下不是这样。我们很少开针对某个人的批斗会——主要是针对抽象的对象，如“资产阶级道路”或是那些想搞“右倾翻案”的。我们没有公开批判梁钊韬，但我们中的有些人批判过（另一位考古教师）教学态度不够认真。

对梁钊韬来说，这个阶段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恶劣的一批，因为“他们依靠的是政治，而不是学问。他们是文革中的红卫兵，排斥知识分子”。即使如此，在另一次采访中梁钊韬还是愉快地回忆起他在广西与“学员们”共度的三个月时光，并自豪地表示，他以后十多年里与他们中的三个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不断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以及反复地回到阶级斗争的主题——令梁钊韬战战兢兢。刚刚结束4年多的干校生活，他不想再拿自己才赢得的自由去冒险，因此尽量避免受到批评。他集中精力搞行政工作，不敢动笔为学术刊物撰稿。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后“四人帮”被逮捕，政治气氛迅速好转。校方开始更严格地考核工农兵学员；1977年到1978年间，许多当时还在上学的工农兵学员必须要选辅修课。同时宣布，那些已经毕业的需要进行“回炉”，许多人回去上课考试。如果考试及格，他们可以留校成为中大的员工。如果考试不及格，他们就被分配到别处去工作。

佩珀称，教师们后来认为这些工农兵教师不仅受的训练不正规，而且政治上也不可靠（Pepper 1982：163）。系里有意减小他们的作用，留用了新的毕业生。到1986年，还能见到有三个工农兵教师在中大人类学系工作，到1991年，只有两个73届和75届的毕业生还在任职，其中只有一名在教课。

1978年，校园里的工农兵学员不得不让路给经过考试录取的新生。这年3月，第一批得益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高考的新生进入中大。按规定有四年的学习时间，（历史系）这11名学生中学毕业后一般都当过知识青年，在农村呆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过去的学生要大。有些人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生活过，因此，和抗日战争时期被迫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民族学家一样，他们对民族学也产生了兴趣。

在知识功底和合格程度上，新一批学生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师兄师姐，1978年春夏，这两类不同政治路线下的学术产物之间情势有些紧张。^①“工农兵学员或许并不想与我们接触，或者是认为中大是所工农兵大学”，一位78届的老生这样评述。“无论如何，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不多。


^① 据 Unger 说，这种紧张情势在全国都很常见（Unger 1982：293）。

我们认为他们是一场不光彩的政治运动的遗产——因此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我们进校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毕业走了。”

梁钊韬满腔热忱地欢迎新生和新局面的到来。他重新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章，1979年，他的名字出现在学术刊物上，这是近15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他与陈启新合著的一篇论文，报道了60年代初他们一起在云南进行的田野工作的情况。不久，这两位同行开始编写教材《中国民族学概论》。带着一个经受过历史考验的人的自信，梁钊韬开始着手他在中山大学重建人类学系的计划。

第五部

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
中国模式？



第十一章 外国人类学 又回来了吗？

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四人帮”时代的终结和中断的社会科学的解放。经过了20年的沉寂之后，到7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上新的轨道，学术气氛也有所升温。对于人类学科学来说，它们的新生促使学者们再次思考有关模式、对象和本土化的老问题。其学科体系经历过先西方，再苏联，继而毛泽东化的诸模式之后，新型的改革又将会如何决定这些学科的发展呢？

这一时期改革的指导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并不是从解放后的任何时期演化而来的。党的解放工作进展得很谨慎，这从当时的口号“统而不死；放而不乱”中有所体现。然而，到了80年代初，争取更大的言论与研究自由的倾向更加明显，因此1983年唐臻（音译）才能够写道：“现在中国各领域所有专家的社会地位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也要大得多”（Tang 1983: 63）。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1979年被派去领导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2月，他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这年年底他进入政治局，与几年

前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样 (Halpern 1988: 218), 这标志着社会科学重新出现在国家生活的中心 (Tang 1983: 61)。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感觉到 80 年代会是最近这 30 年里的最佳时期,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党认识到我们的价值, 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并号召我们帮助解决问题。”

在恢复信任的过程中, 早些时候有过一个警告性的暗示, 那就是 1983 年底的“反精神污染”运动, 它旨在抵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负面影响。最积极地提倡与西方接触的那些人感到威胁最大, 因为他们曾极力主张开展的活动可能将外界的“不良”影响带到中国。一些地方官员解释说, 精神污染包括从“烫发和时装乃至业余时间过度享乐”在内的所有事物 (Rosen 1984: 36), 这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界的冲击并不太大。大多数人只需要写一些交待自己如何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材料。运动持续时间不长, 因此对许多人来说, 它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或目标。在最高领导层中, 胡乔木支持邓小平为推动这场运动所作的努力, 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则反对这场运动。

既然国家领导人之间有意见分歧, 这场运动历时如此短暂也就不足为奇了。保守派的对策如此软弱无力, 再加上还在对外开放, 因此新树立起来的开放的信心日益增强。很多人认为, 回顾过去的 30 年, “只能公平地说, 党走过了很长一段道路才从它的左倾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当然,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 它已经成为一个更宽容, 更自信的执政党” (China Talk 1987a: 13)。广东民族学院的院长表示:

现在与外国接触的最大障碍是财政方面的。就算是和

50年代（引者按：即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前）相比，现在思想方面也还是少了些控制，多了些自由。当时我们只能学习苏联，而不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国家。

1986年可能是近些年来最为开放的一年；到了这时，学者们逐渐习惯了自由地发表意见，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属于禁区之列的课题。然而，这年12月，学生要求“民主”的示威行动和其他的政治变革触犯了“左派”，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反对这些行动。1987年初“鼓励恢复更正统的作法。邓小平认识到，到1986年底之前给了知识分子太多的自由，这样对党不利”（*China Talk* 1987a: 14）。反自由化的举措表明，党可能要放慢经济改革的步伐，废止放松政治约束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它们画个问号。几年后，它们果真遭受了这种粗暴的待遇。

然而，80年代的开放给渴望接触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再次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的社会科学模式接触的可能性。许多人类学科学领域的中国人一再向我表示，他们深信美国学术模式再次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公开尊重，因为美国应该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中心。随着80年代再次对西方和美国事物的开放，美国人类学模式将迅速回到中国并在中国学术舞台上亮相。不过，它会是主角还是配角呢？

久违之后

直到80年代初，西方学者才首次访问中国的学术中心，而中国学者也是首次出访外国。尽管在10年改革之

前实际上已经有所接触（如，1973年的“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到访，1975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安排的古人类学家访华^①），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时断时续的接触为更经常性的联系所取代，同时每年都有一位外国学者访问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所）。^② 在1984~1985学年度，衣阿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来厦大讲学并到农村开展田野调查，^③ 华琛夫妇（James L. Watson和Ruby Watson，当时都就职于匹兹堡大学）在中山大学举办了有关家族组织和经济人类学的讲座。笔者1986年整整一年都在中山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教本科生和研究生，而来自夏威夷大学的索尔海姆（Wilhelm Solheim II）1987年到厦大讲了一个月的东南亚史前史。到了90年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着手与斯坦福大学的武雅士（Arthur Wolf）合作开展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研究项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则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参加香港的考古发掘。

80年代末，几乎不间断地有渴望亲眼目睹中国最新人类学中心的西方学者来中国作短期访问。有时候，接待单位对访问学者在访问期间发表的看法并不十分满意；例如，宾福德（Lewis Binford）坦率地对北京猿人的用火技术提出质疑，激怒了许多中国人；一位美国民族志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提出忠告，要他们超越马克思主义的

① 见 Howells and Tsuchitani 1977。

② 值得注意的是，除开改革阶段刚开始的时候 Stephen Mosher 被驱逐出广东，这一点基本属实。Mosher 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被指控在农村从事研究期间干了各种不负责任的与自己的本职无关的活动，为此他被斯坦福大学取消博士生资格。这在一段时间内给外国人类学家的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的反面事例对中西交往没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③ 黄树民对当时中国人类学及社会科学的评价，请参阅，黄树民，1986。

教条，也被那里的许多人认为是冒犯。

80年代初最激动人心的访问之一是弗思（Raymond Firth）首次访华。黄淑娉亲眼目睹了这位受人称颂的英国学者与他同样才华横溢的中国同行及友人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和林耀华重逢的场面。黄回忆说，“他们对这次特殊的联欢会都感到非常兴奋，这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极其感人。那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一刻，我们都为自己的老师感到高兴”（黄淑娉 1992）。

这些人类学系的中国学人也纷纷出国。中大人类学建系的当年就派人去香港，不久中大和厦大也都派师生到西方去学习。同时，中国的民族学中心也都忙于与外国接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称，1979~1985年期间，来自12个国家的36名学者访问了该研究所，同时研究所也派出数量相当的学者到14个国家去举办讲座、开展研究或出席国际会议。该研究所组织了在北京举行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种族隔离问题国际讨论会”。它还组织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机构的合作项目。中央民族学院同样也开始接待外国客人，拟定合作交流方案，同时安排像陈永龄这样的知名学者出国。在经过半个世纪的中断后，1983年和1988年，中国代表再次出席了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和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大会。

中国考古学家同样也参加了1986年初在丹佛举行的美国考古学会年会，中国方面有这么多学者参加美国考古学界的会议这还是第一次（《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1986：1，2）。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林耀华和吴汝康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考古学大会，而早在几年前（由张光直热心地从中牵线搭桥）设在北大的、中国惟一的考古学系就与

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建立了联系，交换教员和合作进行实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些年同样也与外国建立了联系，这体现在交换学术资料，互访和交流思想上。中国古人类学界和灵长类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在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上露面，昆明的灵长类研究专家与外国同行合作进行中国与印度 Mulatta 猴的比较研究。

外国人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会议上。在人类学领域，中大开风气之先。有 6 个非中国人出席了中大 1984 年举行的国际会议。此后，中国的人类学团体的会议几乎都要邀请几名外国友人参加。随着 1989 年 12 月至 1990 年 1 月在北京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大会的召开，国际合作也迈出了新步伐。这次大会在温纳-格林人类学研究基金会的赞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由中美联合主席共同计划和组织^①（陈国强 1990b：13；周大鸣 1992：138~139）。

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出国访问，安排起来都相当困难。由于财力有限，再加上极难弄到外币，系里和研究所里的学者们只得依靠有关的上级领导。1986 年，一份提案送到了教育部，要求为一个出席 1988 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联合代表团提供经费。这个提案遭到否决，尽管有些中国代表，如吴汝康和汪宁生等最终得以参加会议，但他们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经费的。

对许多学者来说，出国的机会不仅仅意味着有机会从事研究和会见外国同行。从很多方面来讲，出了国的学者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阮西湖和都市人类学领域的老前辈索撒尔（Aidan Southall）担任大会主席，厦大的陈国强和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任副主席。

(和学生)和那些与香港有联系的人是一样的：这两种身份都表明他们是新一代华侨，能够为呆在中国的家人积累外资（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财富，如商品、知识和技术等）。而且，许多人还盘算着和过去几年的华侨一样，指望“短期停留”的时间能比原来计划的要长些。

当这种“延期逗留”发生后，他们通常会遭到反控回国去。除非是由海外的亲属私人提供担保（这种可能性更多地仅对南方人而言），出国都要求出具一定数量的可选择的担保人名单，这样一个人就不得不列出大量的政治资本。学者国内同单位或外单位的有地位的担保人都会起作用；这些人公开支持学者的工作，这加重了其申请的分量。但是，如果一旦某个学者到了国外决定不回国了，国内的人就会怀疑担保人的明智性，或是和这个人一起呆在国外的那些人的可靠性。为什么他们不能说服这名学者回到自己的祖国呢？支持这种“背叛”的外国学者会受到注意，可能从此就会被疏远。

同与西方的学术联系一样重要、从长远来看可能甚至更具影响力的是，80年代留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十年里中国的领导人认为，留学对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长期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提供其所需的技术（CEN 1987：17）。派出国去的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80年代中期约有一半，此后略有减少）出国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是去美国（CEN 1986：4，5；Halpern 1988：226）。

80年代中期，社会学以“能够解决问题”这一专业形象出现，因而受到青睐，但相对来说，成千上万出国的人当中却很少有人类学科学领域的。尽管如此，人类学科学界还是达成了共识，认为如果有机会就应该派学生出

国；很少有人会关注这种出国潮会有什么潜在的负面后果。正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位副系主任 1986 年所说的那样：

系里的人并不担心学生出国去会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也有优点和缺点；例如，我们必须提高系里的学术标准；我们的学生必须了解更多的异文化以进行系统的跨文化比较。这是我们目前的弱点之一，留学可以帮助纠正这一弱点。

系里相信，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接受并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是爱国的马列主义者。然而，我们必须让他们接触外国事物，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些东西都被称做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让他们接触到各种思想流派和各个国家的方法。大多数人是能够正确评价这些事物，会回到中国的。只有少数人会背叛自己的国家，投靠国民党和台湾。但既然这只是极少数，我们就不害怕，我们会继续派人甚至派更多的人出国去。不光是中年学者，特别还要考虑到青年学者。系里决定继续坚持这一指导方向。你是否能为我们的青年学者安排些机会呢？

在中大自己的人类学系里，最早一批出国的学生来自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本科的前工农兵学员。他们 11 个人于 1982 年毕业，其中的大多数都争取到了刚刚才来临的留学机会。入选的关键是通过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研究生考试。临毕业前的 11 月份，他们参加了考试。考试由五个部分组成：政治、英语、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前两门是各个学科凡是想要成为研究生的人统一都要考的

科目，后三门的试题是由中大历史系和人类学系提供的。全国所有想成为国内外的人类学研究生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五门考试，但由于中大是惟一一所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并重的本科教学的大学，所以它的学生有明显的优势赢得分配给人类学的四个留学指标。

在所有的学科中，特别是英语，得分最高者将被选拔出国。人类学专业只有两个人合乎这一标准；一个不久就去美国学习文化人类学，另一个则去法国学习考古学。一年后又找到一个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他占用了剩下的两个人类学指标中的一个，去日本东京学习体质人类学。这三个人在登上出国的飞机之前都接受过语言集训。以后的几年里也有一些年轻教员继他们之后到了国外，但其中有些人没有回国，因此系里对待出国培训计划的态度就更加谨慎了。

那些没有被选派去留学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学习博士生课程。这种选拔过程保证了最优秀的学生能够出国，而“二流”的学生留下来攻读中国的博士学位。这对提高“土博士”的声誉并没有什么帮助，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厦大的两名研究生会对我说：“洋博士比土博士香。”^①但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1986年中国还没有一个人类学博士，而中国仅有一个人类学博士生导师梁钊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986年将第一个人类学士博士学位授予了藏族学生格勒。此后的几年里又有几名学者被任命为博士

^① 但是，国家领导人似乎意识到需要改进中国博士生教学的工作；1987年他们要求到1990年中国要授10000个博士学位，与1978年的“零”相比，这是个惊人的提高（CEN 1987：18）。汉学家华琛（J. Watson）也推测说，假如有外国文凭的人再次成为政治嫌疑分子，那么中国学位确实能够很好地为这些学位获得者服务（个人交流）。

生导师。这才表明，并非所有的一流学生都得出国受训。实际上，考虑到1989年夏天后重新组成的政府强调只允许更资深的学者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和接受培训，土博士和洋博士数量的重新平衡还是有望实现的。^①

北大的考古学家也设法保证让一部分学生能够出国接受训练；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名学生被派往联邦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但并非所有的师生都相信这种与外界的接触不用冒风险。1986年年中，一位考古学家对我说：“中大人类学系有位领导不能和他的同事一样肯定，学生在国外能够区分出西方人类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他和系里的党支部书记都认为，有些学生‘盲目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最好的。’”如果对有些在国内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尚且如此，那么出了国的学生不就更有可能不加批判地为西方唱赞歌吗？

在外国接受训练的学生对所受的外国影响情有独钟，乃是他们将外国标准社会主义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台湾的社会学家叶启政将世界体系的理论应用于全球学术界，他写道，这些第三世界的留学生想借“教育现代化”的名义将外国的教育方式移植到本国社会之中（叶启政1985：255）。他告诉我们，当一名台湾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尤指获有博士学位者）留学回来后，每个人都问：“（你）学了些什么新的东西？”潜意识里，西方的“新”就是代表进步，也就是好的，应该“学习”、即照搬的（叶启政

^① 不过这个重新平衡还得等上几年。从1987年梁钊韬逝世后，这一领域就没有了博士生导师。没有导师，就没有博士生培养计划、没有博士研究生。或许1993年的下一届博士生导师遴选能够产生一、两名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到那时，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就又可以出国去受训了，还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逗留，接受台湾民族学家陈其南的指导。

1985: 256)。

这些学生还可以融入自己的社会，但在国外的这些年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术的“意识模式”，潜意识里他们的“文化消费品味”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汲取了中心社会的文化，回到中国后，他们被期许为主导本国社会变迁的中心分子。他们成为“传统”或“保守主义”的破坏者。因此，叶启政归纳说，边陲社会（第三世界）很难逃避中心社会的模式和欣赏标准（1985: 254, 255）。因此，不管愿意与否，留学都成为西化和传播西方模式的渠道。

费孝通也曾对这种训练对中国学生有多大的实际价值表示过怀疑：

他们离开中国……在国外的绝大部分时间只是花在掌握语言上……我肯定他们甚至都没有消化教给他们的知识。因此回国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基本上是很肤浅的。他们带回来新行话、新术语，并将这些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这看起来令人兴奋，可能还会吸引和取悦学生，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新颖。（巴博德 1988: 660）

除了海峡两岸的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直接受到外国影响外，还有西方出版物的间接影响。80年代在中国想看到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出版物要容易得多了^①，同时，人们一拥而上，翻译出版流行的西方人类学教材和经典著作。各省和大学的出版社对推动这一进程起了特别大的作

^① 但是，学校严重缺乏外国专业杂志方面的藏书。据研究人员们称，现在获取这类杂志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政治方面而是财务方面，大多数学术单位的外币来源有限（黄树民 1986: 4）。

用，它们出版了中文版的人类学作品，内容从科达克(Conrad Kottak)和基辛(Roger Keesing)的文化人类学入门教材到一整套介绍西方人类学分支(如都市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等)的丛书。近些年又重印了解放前发行的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等学者的外国人类学著作的中文版。台湾省学人的引介也推进了在中国传播西方理论的进程。但是1990年宣布限制出版和印刷的数量，使得这股大潮的势头有所减弱。^①

外国资料相对泛滥带来的影响从80年代起面世的大量引用西方、中国和苏联作品的学术论文中可略见一斑。^②80年代中，人类学科学领域的学生明显渴望学习和吸收西方理论，他们反复要求外国访问教员运用外国教材并就当前的理论论述举办讲座。某外教1986年看过一个较为典型的研究生班的笔记，其中大量抄录了40年代到70年代的外国教材的内容。而且，许多笔记是用英文记的，从拉伯克(John Lubbock)、哈里斯(Marvin Harris)、奥姆斯(Bryan Ormes)到宾福德和本尼迪克特，书名、作者、特殊段落和引言也都是英文的。^③

尽管也作过努力使人类学科学界的这些人熟悉非中国化的安排，但是他们对修改课程设置的抵触情绪更大。例

① 有关1981年至1991年间重印、编写或翻译的国内外著作的详细回顾，可参阅周大鸣，1992：139~140。

② 刘克甫(Kriukov)是一名俄罗斯民族学家，他在中俄关系中断30年后重建了与中国同行的联系，其作品——特别是那些批判斯大林有关民族方面的著作的作品——重新为中国人所引用。

③ 在被当作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典型遭禁一段时期以后，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又重新面世了。相比之下，她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她可能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类学家——在中国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其实，米德的作品在80年代后期也有汉译本在北京、杭州等地出版。——译者注]

如，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热衷于重印许多外国大学人类学系的课程表（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甚至是清华大学30年代到40年代的人类学班的课程表），从那时起，《通讯》就一直坚持印发由外国人类学家所写的或是与他们有关的信息，藉此来加强自己与外国的联系。1986年北大考古学系的系主任严文明表示，他们系有介绍苏联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课程，也有介绍中国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课程，但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西方考古学课程。当然，这类材料还是通过大量的课程传播给了学生，但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考古学理论或方法的影响。严文明指出了想发展这类课程（其中包括一门“西方文明的起源”）的愿望。

吴汝康和林圣龙等人清楚地意识到过去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有过这样的陈述：“中国古人类学界目前的状况是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吴汝康和林圣龙1985：4）。这代表了更开放地看待西方的观点。这种言论在外国人听来无关痛痒，但早在十年前这样说在中国就会有遭到政治报复的危险。

西方人类学再次来到中国

西方模式解放前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现在它又再度来临，让我们将它在这两个时期的不同经历作个直接的比较。首先，两个时期的第一阶段都是以合作将西方学者的作品译成中文和中外学者学术互访的高潮为标志的。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再次出现是在80年代。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入第二个阶段，重点转移到中国人类学科学的制度化上，以西方机构为模式建立了学系和研究所。不过也有人表示，尽管四大学科的人类学

在南方的大学中心重新出现显然就代表了这类现象，但实际上这第二个阶段在中国并没有重演。

解放前的第三个阶段是外国模式在中国舞台上的应用。在30、40年代这主要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开展社区研究和将外国理论如功能学派的分析法应用于中国的情景中。通过比较发现，目前在中国很少有研究项目或分析与西方模式有着直接的渊源。或许在中国完成的惟一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人类学工作就是访问西方人类学工作者本人（和他们的研究生助手）。考古实验分析和考古发掘的合作项目已经在着手进行，这需要与文化人类学家和其他人一起工作；这种合作最终可能会成为外国人类学方法的传播渠道。但是直到90年代初，无论是开展研究工作、提出理论分析，还是发表学术论文，人们都难以发现西方广泛的影响。

普世性科学还是民族国家科学

如果没有按照西方形象重塑中国人类学，那么我们能否认它就是中国的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自30年代吴文藻就这一学科进行写作和教学以来，人类学科学的中国化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尤其是在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界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并非只有中国人提出过本土化，因为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或应该存在）普世性的社会科学学科，不论它们处在哪个国度，本质上（理论、方法、内容和组织）都是一样的？这些学者问道，我们是否不该指望各国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这些学科（理论、方法、内容和组织）的翻版呢？

见，他曾就这一话题写过文章（Zhao, 1985）。他明确表示，需要将社会科学中国化后才能使它们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应该仿效西方依赖电脑和数量化而削弱人文因素的作法，这不适合中国国情。同样，更严格地运用西方的比较方法能够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中获益，但必须保证所比较的方法确实有可比性。例如，不能简单化地提倡将从一个小地区的成功中总结出来的发展模式应用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样做不科学。^① 1987年在西雅图的一次采访中，这位赵先生拓展了这一观点，他对我说：

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环境，你不能指望它适合中国今天的情况。我们的研究人员应该调查西方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结构的，但只有通过做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才能够了解在中国该如何去做社会科学，如何使它中国化。西方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的不一样，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必须与西方不一样。

强调创造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这意味着对这些学科体系的西方版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假设提出质疑。考古学家安志敏指出，人类学在美国按整体论的方法发展是因为美国的关键在美洲印第安人；人类学家试图在他们即将消失之际重建美国本土文化，因此学者们当然就得依赖考古学和语言来支持他们的民族志观察。因而，仅仅因为美国白人想要更有效地操纵“红番”，

^① 在这里，赵先生似乎是反对中国大陆直接照搬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中国人就同样应该发展美国式的四大学科的方法吗？不，安志敏说，中国的回答是，要由中国的条件来决定（安志敏 1986）。

人们否认了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科学结构）的普世性，支持这一观点的是近 40 年间中国一直在大力鼓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假设，即社会科学的“阶级观”。这个既合理又荒唐、从社会的角度讲又是正确和科学的观点认为，所有学科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会反映提出这些知识的人的观点、倾向和个人爱好。在阶级社会，社会科学因而也就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

许多学科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因为这些学科都掌握在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手里。民族学自然存在着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谁利用它，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黄淑婷 1990：162～163）

在中国，这样的批评长期以来一直在败坏人类学科学的声誉；人们认为，人类学起源于美国和西方，是不光彩的“资产阶级的人类学”，因此这类学科从根本上会损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由于西方人类学历史上有污点，它对中国就没有太大价值。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类学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学习西方当代的理论和方法，评价它们的工作要留给后人去做。为了弥补人类学遭受冷遇的这几十年的损失，这些学科首先必须要

做的只是“赶上”世界其他国家。^①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看法不正确；我们在任何阶段都不能放弃批判地评价。这些人批评亲西方的人“盲目崇拜西方”，并坚持在中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外国理论和资料极有可能包含着“不健康的”影响，必须继续堵住这些“精神污染”的源头。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同于叶启政所提出的第三世界和中国台湾的普遍状况。叶启政曾写道，一个边陲社会的学者能否在本土学术圈受到同行和学生的尊重，跟不跟得上中心学术的发展潮流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他说，边陲学者承受着来自同行和学生的双重压力，他们必须掌握中心社会的西方学术思潮，这样才算是走在时代的尖端^②（叶启政 1985：257）。但是，在中国存在不止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或模式；除了倾向于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一派，至少还有激烈地批判或怀疑西方知识的另外一派。

许多中立的观察家将这两个对立的群体称作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赞成尽可能迅速和广泛地吸收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因为他们认为，这并非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知识，而是吸收了目前人类学科学全球化的宗旨。对他们而言，只有一种人类学或民族学或考古学，而这一普世性学科在西方的发展恰好最迅速也最广泛。对保守派来说则正好相反，这种假设根本就是漏洞的；没有普世性的

① Halpern 称，实际上中央领导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是赞成中国社会学家所进行的“西化”的方法的（Halpern 1988：226）。

② 世界体系理论是通过政治经济的多棱镜来折射国际舞台，在这个多棱镜下，根据财富、权力和特权分配情况，历史上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被看作是世界大都会的“中心”或“核心”地区，从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被看作是边缘地区。

科学——正如每个社会的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阶级观一样，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带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吸收西方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普世性两个问题总是互相联系的——各派都同时支持或反对它们——这种关联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不矛盾的。

但亲西方派提倡外国模式比起保守派拒绝这种模式来要谨慎得多。正统观念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因此改革派常常不得不淡化或掩饰他们对西方方法的热情。例如，在国外学习的学生知道，和解放前的留学生不一样，他们回国后不能只是鹦鹉学舌般地复述外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他们和其他改革派一样，对过分强调西方影响或是指责他们和方励之一样赞成“全盘西化”的问题很敏感。他们很小心不谈及西方模式或影响，只是表示，西方人类学仅仅被作为“一个参照点”，他们接触外界不是为了接受其影响而是将它作为“联系”的媒介。

用词上的小心翼翼发展成了广泛利用对西方的公式化批判来保护改革派免遭保守派的政治批判。在公开场合，改革派只谈论发展马列主义人类学的必要性，避而不谈中国人人类学西化的要求。正如一位老学者在一次讨论中西人类学现状的公开会议之后对我透露的那样：

事实上，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还很多。但在公开场合，我得批判西方，我得说西方理论发展得不完善，缺乏牢固的唯物主义基础。我并不真的这样认为。这是政治形势的需要，有口号说我们“必须先批判西方然后才能学习西方”。因此，在赞扬西方人类学之前我得说出它的消极的东西。否则会批评我被西方人洗了脑。在这里我们的自由有限，因此，发展社会学和

人类学必须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往前蹭。^①

相反地，有些保守派却采取极端的仇外立场，他们躲避一切西方人类学的东西，认为它们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污染已经无可救药。普洛特金和豪描绘过苏联的与之相类似的一群人：

最好将其描述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占据着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级学术职位和管理职位。这些人自以为是真理学说的捍卫者，他们最关心的是苏维埃科学的思想“纯洁性”。这些人为党所信任，可能还认为他们对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异端或非苏维埃的行为负有责任（Plotkin and Howe 1985：258）。

但在中国没有多少学者属于这样一个抵制派。大多数人在应用西方人类学的问题上持更中庸的立场。大多数人与他们的同行叶启政一样，关注下述问题：

在学术发展方面，文化统制的渗透是如何使边陲社会更加依赖中心社会的。对边陲社会而言，最有诱惑力但也最束缚手脚的发展就是几乎完全将中心社会的诸文化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边陲社会对中心社会中出现的事物亦步亦趋。（叶启政 1985：247）

① 前苏联的学者们也被要求批判地对待西方理论，有时候要求他们写文章批判西方理论的弱点。对于这种要求，有些人的反应是“热情，甚至把它当作了一项事业；而有人却很反感”（Plotkin and Howe 1985：260）。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避免对他们的西方“资产阶级”同行进行这种攻击。

中国共产党常常担心，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西化会隐含“精神污染”的危险，在这里，中国台湾学者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回答。

早在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后来又在“六四”风波之后）直接指责方励之等人提倡“全盘西化”之前，中国报纸就有文章批判学者有这种轻率言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称：“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对学习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新东西感兴趣，通常对调查西方思想形成的背景缺乏兴趣。他们努力地赶超据说是目前最好的东西，结果却往往以被最好的东西所迷惑而告终”（1986年8月13日，第4版）。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同意这种批评。

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出国的经历对他们都影响深远，这种访问也极大地加深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影响居然能使保守派“开窍”。某单位的一名副头儿对我说，去美国7天的旅行改变了他的看法，因为现在他认为美国有很多可以让中国学习的东西，包括学术界内外的工作效率。

其他出国的人也会深受触动——那里的人类学系研究课题广泛，发展充分，极受尊重。访问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学者在讨论中这样公开评论那里的人类学的系统化训练：综合的、训练基础宽泛的人类学，以四大学科为重点，也包括语言学 and 心理学。“中国肯定不应该照搬美国的人类学”，他慎重地归纳说，“但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范例。甚至连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要比中国发达。那里的校园生活也更加活跃，人们尽情地争论和交谈，而且还有大量的电影可看。”

一位改革派羡慕美国人类学家总是能发展新的研究和

应用方向：“一旦有什么东西行不通了，美国人就会寻找新的。这种敢于接受新思想的态度是现代化所必需的，这是美国的长处。”还有一些人指出，美国学生思想开放，他们不怕和自己的老师辩论，老师还鼓励他们发表反对意见，这使得一位中国访问者对与自己同行的人建议说：“我们必须提高我们年轻一代的创造力。”

改革派还坚持认为，他们强烈支持西方方法与中国人人类学相结合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相信建立民族国家的学科体系的想法并不适合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在讨论留学的影响时，他们争论说，“学生出国去研究和学习新理论、新知识——这会是不好的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美国，这个学科体系都是同一门科学，那为什么不学习最先进的呢？”改革派提倡西方方法，并不是因为这些方法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研究生在外国也从他们的西方导师那里接受了有关学科领域普世性（universality）的假说，这些导师自己预先假定全球人类学只存在一种模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模式。一名在美国攻读民族考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对我说，没有必要让人类学中国化，因为“科学不应该有民族特性。当然中国的人类学在内容上应该注重中国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门特殊的科学。”

但有些保守的学者指出，即使是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学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的万能读本。西方有大量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学派；不单单只有一个美国社会学或法国社会学，而是有很多种。那么，大谈只有一门独一无二的西方社会学或人类学就太脱离现实，更不用说是全球一致的学科了。各国都有自己的学科，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科能够充当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

我在中山大学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位说道：

有些人因为我不愿意完全接受西方人类学而批评我保守。这些人认为西方人类学是普世性的人类学，因此它的标准应该为所有人所接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西方社会科学的目标、对象和精神与中国的不一样。西方思想通常带有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成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类人类学作为我们的标准呢？

正如这名研究生的言谈话语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里对中国化和应用西方模式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分歧。梁钊韬称他的方法为“中国派”，因为他坚持保持中国人类学的民族性，特别是它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梁钊韬批评另一些想仿效西方资产阶级人类学的人只强调“整体论”而忽视了物质因素在文化因果关系中的首要地位。

鉴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和向西方开放的作法，系里的反对派认为自己是“改革派”。其支持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发展独立的人类学。“除了马列主义，中国的人类学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中国其他的学科体系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以有什么如此特别？中国以外的其他人类学家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一个好挖苦的年轻人同情改革派，他甚至推测说“梁钊韬反对外国人类学”，因为大多数亲西方的改革派都会为自己拥有英语资料而沾沾自喜，而梁钊韬却不！

梁本人反驳说，他不反对外国人类学——毕竟他自己的学科模式就是承袭美国人的。在自己系里梁钊韬还得为

自己太爱批评外国人类学而辩护，这实在是个讽刺，因为外界都批评他太亲西方，“太亲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学科学界许多北方学者对所有南方学者的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见，而梁钊韬仅仅是因为有着保守派所不喜欢的学习外国的倾向就遭到了指责。但是，针对梁及其继任者领导的人类学系也有些保守的、具体的批评，批评该系在中国的情景中不合适地仿效美国四大学科的人类学，批评系里所有课程都以西方理论为基础，还批评它把所有出国留学的研究生都派送到西方国家。

系里很多人不同意这种极不友善的评价，梁钊韬的辩护者指出，尽管他赞成与西方接触，但他也相信，对外国材料进行生动有力的批判和评价就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精神污染）。例如，到访的外国人在系里举办讲座之后，系里会开会对他们所讲的内容进行批判和评价。梁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与外国人接触，但要抵制其不良影响。梁特别担心接触西方会使研究生受到唯心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的符号方法和认知方法会困扰中国学生，使他们轻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的唯物主义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差异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它们反映出曾流行一时的学术模式的影响迟迟无法消除。因此，现在提倡更多地借鉴西方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解放前受的教育，当时西方的人类学科学模式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些领域的第一代学者中还健在的那些人大多数都保持着对西方的忠诚，第二代学者，即40年代受教育的那一代学者中也有相当大数量的人是这样。然而，1949年以后，第二代（间或第一代）学者中有一部分改变自己的理论范式及学术范式，转向了苏联式版本的学科体系。

50、60年代受教育的第三代学者无疑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这些人最忠实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也最反对接触苏联以外的外国思想。保守派大部分是由这些学者组成的，他们与目前的第四代学者形成对照，这一代学者只是被动的马列主义者，而对西方思想有积极的兴趣。正是这年轻的一代在受西方吸引的同时也知道自己还需要正统观念；尽管年轻一代在方向上已存在分歧，但他们对西方模式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相互交融还充满希望。每一代都是不同的一派，都反映出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早期外国模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各派当中西方模式与苏联模式是直接对立的。

这种反差是值得深思的。从体制上来讲，很显然确实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两种结构——受苏联影响的北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南方。当50年代初人类学被取消的时候，北方体制里人类学科学的苏联模式取代了西方模式，但在南方和其他地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苏联的影响要弱一些；因此产生了一个“人类学真空”，这就为80年代人类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联系到1989年6月以后中国重新重视意识形态，重新建立中苏（后来是中俄）关系等现实情况，苏联/俄罗斯模式能东山再起吗？中国领导人一再重申，中国既不会照搬西方的、也不会照搬苏联的现代化模式（*China Talk* 1987b: 11），中国近来的对外开放也使俄罗斯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学者不可能再次对中国的人类学科学产生大的影响。但是，尽管旧的苏联模式不可能重新赢得它35年前那样牢不可破的宗主地位，新成立的独联体的思想观点（和人员）肯定会逐渐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语言学、社会学和民族志专家率先访问中国，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旧的中苏关系复苏的可能性。^①

当他们来到中国，谁和他们交谈？不奇怪，大部分是40来岁、在俄罗斯或苏联受教育，现在能够恢复俄语口语水平的那些中国人。先是就派中国学生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会谈拉开了序幕。^②但气氛明显很冷淡，当许多中国人谈到重新恢复与前苏联的联系时，其保守的观点通常会令苏联人不屑一顾。这种观点预示着不会有太多的相互影响。现在俄罗斯又被看作是潜在的“后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污染源，这两个前盟友恢复关系的进程可能仍然会相当缓慢。

上述两派的另一个分界线与取得博士学位的地点有关。那些有外国博士学位的——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还是1979年以后的——倾向于支持改革和亲西方派，而有中国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则多属于“中国派”，反对普世性人类学的概念。在中国受教育的人中有一部分也对改革派的所有中国人类学家都需要接受外国训练的建议持反对态度：“这些人是否当真说学生和学者如果不出国就不能真正了解人类学？”在人类学界领导位置上的许多人认为，这种接触和学习外国人类学的要求对他们是一种间接的侮

① 但是，当一些苏联专家重返中国后，他们过去的熟人可能都认不出他们来了。

② 1990年少数中国学生开始重新在苏联露面，他们发现苏联的多元化和开放正搞得热火朝天。他们看到，当代苏联民族志学者认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再合适不过的学习对象，民族史、符号学和民族社会学都是热门话题。莫斯科大学的阿努钦很久以前就将人类学的四大学科介绍到苏联，但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这个转变太西方化了。总的来说，民族志仍然被看作是与考古学和人类进化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新出现的俄罗斯“模式”定义的人类学严格地放置在历史学中，并由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三个分支学科组成。

辱，因为提这种要求是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明显不如西方。

一名年轻教员也回忆说，他注意到 80 年代初留过学的人和没留过学的人之间有类似的对比。当时在正式重建民族学的辩论中，1949 年以前和 1978 年以后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都提倡恢复民族学，而解放后在本国受训练的那些人坚持没必要再多建一个学科，现有的民族史领域就足够了。每一方都表现坚定的立场并认同于自己的教育社会化体系和标准。

放在更开阔的视野里来看，人类学科学领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困扰了中国人几乎一个世纪的问题的一种反映。从 20 世纪初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对待西方、如何改革中国文化的问题。像胡适那样的激进的改革派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现代化毫无用处，因此要求索性完全走西方的道路。另一些人的想法要更折衷些，他们试图引进西方技术，而完整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还有一些人举当代新加坡和日本为例，认为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现代化，因此是有用的。最后也有些人认为，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次文化复兴，重新诠释和借鉴外国能够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在辩论中国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家各有各的见解。亲西方派里的一些极端分子要求全盘西化，而一些同样极端的保守派拒绝所有来自西方的影响。这两派和中立派当中还有更折衷的方法，即试图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外国来激发中国人类学的活力。但他们对采借来的东西的本质又产生了争执。人们实际上如何才能使人类学中国化呢？

第十二章 人类学中国化

本土化

中国并非惟一个努力创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民族国家。这实际上代表了第三世界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在不单纯照抄西方（欧美）样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① 对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是将他们的学科体系中真正普世性的或“科学”的内容与仅仅是该学科在特殊的时间地点下运用时所浸染的文化惯例或假设区分开来的问题。这正是个切中要害的问题：人们如何把一个学科体系本土化？

按照法希姆（Hussein Fahim）的定义，本土化人类学是指由本地人来从事人类学（Fahim 1984：ix）；同时他还假设存在一种普世的、一元的、能够跨文化运用的人类学体系。这种意见赞成本土的人类学家在研究和服务中使人类学与自己的民族或社会相关联，并引导人类学成为“一门为提高各地的人道状况服务的、敏感而富有同情心

^① 随着苏联及其盟国（第二世界）的解体，许多人对继续使用“第三世界”一词提出质疑。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选择方案，我认为这个词仍然可以简洁地指代世界上从前的殖民地国家或受支配的国家。

的科学”，从而推动他们学科的发展（Bacdayan 1984：711）。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同样都强调第三世界的人类学要为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服务。^①

其他第三世界的学者强调各自历史传统中本地人类学的早期经历。因而，印度社会科学委员会（Indian Social Science Council）前主席、印度著名人类学家玛旦（T. N. Madan）自傲地表示，印度本土人类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至少 1500 年前。玛旦在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87 年的波士顿会议上发言时也讲到，印度人类学家必须要正视自己国家中的西方人类学研究传统，以破除西方民族中心论的假设和曲解。因此，印度似乎在法希姆几年前开辟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人们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家实际运用人类学，而且还批评外国方法和理论中不恰当的偏见。

另一个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中国的台湾省。随着 40 年代末诸多学者和机构从大陆转移到这个岛屿省份，革命前的中国流行的许多学术范式也越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但别的学术传统却早在它们之前就已来到岛上，因为日本统治这个岛屿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开展研究。日本考古学家进行研究揭示台湾史前诸文化之间以及与外部文化的关系（臧振华 1989：160），而诸如鸟居龙藏、移川子之藏、鹿野忠雄和濑川孝吉等民族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土著文化，还作了大量有关“日本帝国政府”统治下的汉人风俗习惯的报告（陈奇禄 1989：6）。

^① 《亚洲研究》上发表的杰弗瑞（Patricia Jeffery）的书评称，这一论证方法是几位巴基斯坦作者在一本关于巴基斯坦人类学的书中提出的，见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1：234~235（1984）。

战后的头几十年里，美国历史特殊论的方法在中国台湾的民族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日本人和中国人一直都在探索能与此美国范式相抗衡的研究策略（黄应贵 1983：109）。这一外国影响在 50、60 年代得到了支持，在“失去”中国大陆这一人类学研究点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将台湾省作为新的田野研究点^①，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到美国去攻读高级学位。甚至在 1965 年台湾省主要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仍然保持着亲外国的倾向。^②

然而，台湾省学者近来开始对这种学术状况提出严肃的质疑。1980 年民族学研究所台北召开了一次“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讨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及该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叶启政，1985：247）。叶启政指出，台湾省大学生所用的教科书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以外，都是外国的，特别是美国的；甚至指定参考书也以英文为多。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下，中心似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就连翻译也保持着以美国为中心的特点；台湾省的社会学教科书依赖于直接翻译的美国教材，几乎很少采用中国社会（包含台湾）的实际资料（叶启政，1985：255）。同样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萧新煌提出，有必要纠正错将美国社会学当作世界社会学的错误；他为台湾社会学

①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像马丁（Emily Ahern）、孔迈隆（Myron Cohen）、戴瑙玛（Norma Diamond）、Morton Fried、葛伯纳夫妇（Bernard and Rita Gallin）、葛希芝（Hill Gates）、Susan Greenhalgh、郝瑞（Stevan Harrell）、David Jordan、Lydia Kung、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商高仁（Steven Sangren）和武雅士夫妇（Arthur and Marjorie Wolf）这样的“台湾问题专家”，他们的文章对汉学和人类学都作出了许多贡献。

② 如果论学术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类学似乎由日本帝国的模式转向美国模式。

对这一学科的全球主流一直缺乏理论影响而感到惋惜（萧新煌 1985：277）。萧的同事叶启政则表示，缺乏影响并不奇怪，因为像台湾省这样的世界边陲社会，其学术体系在世界学术界也处在边陲位置（叶启政 1985：247）。

这种边缘的学科体系不幸也正是由于自身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但这些学术体系并没有被忽略，它们居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下，并受其左右，成为确定政治地位、发展经济的工具。因此，叶启政认为，边陲社会的学术体系注定有依赖性。“因此，边陲社会很难发展出一种本应为一个试图转变其边陲性的社会所需要的发明创造的动量”（叶启政 1985：247）。于是，受支配的边陲社会的学术部门很少能作出理论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马列主义为基础

80年代与苏联重新接触使得中国学者又要面对一种苏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党极大地放松了对学术界的控制，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检验理论范式的惟一标准。1991年8月的最后一周有消息传来，说就连苏联共产党都被下令取缔了。而中国在1989年夏季之后加强了思想控制，这两个国家曾经骄傲地共同迈向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现在则朝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分道扬镳。

考虑到苏联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够对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起作用呢？如果马克思主义被驱逐出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依旧是社会主义世界人类学的显著特色呢？事实上，有鉴于一度曾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已迅速崩溃，我们不得不问，是否真的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是或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提出这个问题的次数远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多得多。就在西方主流人类学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诸多理论流派之一后（尽管它也曾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地位低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对此都还一直不是那么肯定。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许多人坚持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学科或是理论姿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是一种矛盾修饰法（oxymoron）。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官方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建立人类学的学者必须争辩道，马克思主义确实能够与人类学或民族学和谐统一。请看一下黄淑娉1981年是如何就这一话题提出辩护的：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经济学、法学一样。……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曾经利用这门学科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服务，……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民族学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封建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经过改造可以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民族学也不能例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民族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研究，完全可以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黄淑娉，1990：162~163）

中山大学的青年研究工作者李安民将这一辩论往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人类学不仅能够用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性，而且其思维方式还和黑格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一样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李安民1990）。

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同样可以用来区分 1949 年以前的人类学和当代的“无产阶级人类学”。中国学者批评以前的人类学中国化的尝试,说它缺乏对旧社会及其资产阶级理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金天明和龙平平 1986:30)。因此尽管吴文藻的中国化的努力是大家公认的,但却也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吴文藻本人也写道,他留过学,受过那么深的外国影响,因此被资产阶级的理论所蒙蔽(吴文藻 1986:85)。由于不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错误的理论假设,他过分偏爱西方理论,因此不能摆脱其束缚,形成真正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学科学理论基础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上就连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都不存在分歧。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类学学者都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确实在自己的作品里引述马克思主义的神明 (pantheon)。他们中有一些无疑是走一走政治形式,而有一些在作这种宣告时则相当虔诚。正如穆迪 (Peter Moody) 提醒我们的,中国的“改革派”不一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人士;实际上他们本人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Moody 1987: 393)。^①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今天的大多数人类学家至少有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种陈述也说明不了太多问

① 普洛特金和豪告诉我们,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社会科学家也“一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苏联公民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特别是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西方的怀疑论者会怀疑他们这种话是否出自真心……但苏联学者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确实根据的。最重要的是,按照官方的解释,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大部分苏联学者所熟悉的惟一的哲学”(Plotkin and Howe 1985: 257~258)。因此,即使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很少有人认真地对它的基础表示过怀疑。

题，因为通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很多条。普洛特金和豪同样告诫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苏联民族学的特征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因为 80 年代的许多工作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涉猎过的范畴和领域（Plotkin and Howe 1985：258）。这同样也是中国人类学的事实，因为即使是在中国，也没有把马克思或摩尔根所写的每句话都视作至理名言。各派人士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有学者认为只需要进行较少的修改或翻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

有一派提出一个观点说，要继续承认 19 世纪摩尔根进化图式的有效性。摩尔根学派在年纪较大的学者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比较年轻的学者更乐于接受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了苏联学者谢苗诺夫批判摩尔根的文章，很多人都读过它。1989 年年初，四川大学的童恩正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本非摩尔根学派、非马列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但有些人，如中山大学的龚佩华，立刻反驳谢苗诺夫和童恩正的批评，斗志昂扬地为摩尔根的亲属制图式辩护。如果考虑到有关摩尔根的进化论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那么对民族学正统观念的盛行也就不会感到惊诧了。一名学者评述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将自己的材料纳入摩尔根进化论的框架。”

与此同时，他们也引介了其他方法并就此进行过讨论。但不允许形成新的学派：马列主义必须是所有理论讨论的基石。很多人认为这种思想控制是硬给中国人类学套上了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够脱掉的紧箍咒。对人类学领域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来说，马列主义的教条强迫他们过分集中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发表，而被认定为与“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事物有关的研究却被从主流出版物中扫地出门。

改革派和保守派存在分歧的另一个领域是他们对1957~1966年这段时期的不同分析。对有些中国人来说，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学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末期被正式取消、从中国生活中消失的时期。持这种立场的大多数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持更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更有可能是“改革派”。而比较赞成马克思主义、更有可能成为“保守派”的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这十年是有争议的十年，因为这时马列主义的民族学正处在形成阶段；而取消的，照他们的说法，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

试举施正一1981年的一段评述为例。施正一注意到，有些人表示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系并取消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作法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以假定民族学被取消为前提的。施正一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还没有一套现成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教材，资产阶级民族学那一套课程又不能继续使用，取消它是正确的。但这不等于取消了民族学这门科学，实际上随着各民族地区的解放，为了斗争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人民解放军和各部门各单位在开展各种社会调查中，也对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这种调查，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社会学的调查。所以，应该认为新中国民族学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应当追溯到这个时期。（施正一1981：175~176）

因此，施正一还颇有些令人信服地争辩说，诸如民族学之类的社会科学在形成完全不同的体系之前需要清除其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如我们早就提到过的，林耀华是赞同

这一观点的。

“文化大革命”连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一起砸烂了，因此，只有在“文革”最终宣告结束之后，才可能重新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科学相结合的问题。一位宗教学家在1987年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关键在于(1)将经济因素当作决定社会文化起因的关键的、但并非唯一的因素；(2)认识到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3)探索人类社会辩证的发展进程。这些实际上只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一般指导方针。在某大学人类学系进行的一次讨论中，对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的指责也透露了同样坦率的解释，当时那里的教员对我说，既然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么，如果人类学能够提高日常生活水准，它就有助于发展马列主义（“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影子！）。他们解释说，马列主义决不仅仅是几个专家的著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如果人类学能够有助于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它就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帮助发展马列主义。

这些人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而且据我判断也是正确的，重振雄风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实而不是破坏中国的人类学。过去命令中国的人类学家只能研究经济基础而要避免上层建筑，这是个错误政策。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类学家不能有助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意识形态是以什么方式来伪装并掩饰经济关系的现实，质疑意识形态是否导致以及如何导致受支配者与支配他们的人分享种种意义”（Keesing 1987：166）。中国人类学家需要探索当前全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思想趋势并积极地加入这场辩论，从而使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重新焕发生机。党不应该害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解社会

现象的体系带入 21 世纪。

中国人类学的“特色”

遵照人们常常念叨的、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人类学科学家们也受到激励，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他们自己也曾多次探讨：除了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还有什么是中国人类学体系所共有的特征呢？《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从 80 年代中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和会议也开始集中精力寻求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

在中国，通常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的人类学工作者几乎只研究他们自己的民族。考虑到严格的经费限制（有时也有政治限制），研究者们只得满足于单一的国内民族研究。^① 不过，近来有些国内的以及远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中国研究人员对其东道国的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进行了短期研究。^②

当然，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人类学领域的界定本身缺乏共识。已经复兴的各人类学中心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在中国语境中界定人类学。梁钊韬教授领导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认为，这一学科体系就是将四大学科融汇贯通，这种界定是美国人所熟悉的。而陈国强教授领导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则坚持，人类学主要由两个分支学科组成，即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绝不能真正纳

① 林耀华认为这是此领域主要的弱点，但他希望中国的研究最终能够走出国门；他认为，由于许多东南亚民族都与中国人有着渊源联系，东南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人进行田野工作的场所（个人交流）。

② 例如，可参阅阮西湖（1987）。

人人类学体系；考古学和语言学可以辅助人类学调查，但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学科。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定义上的不同，这两个人类学系和新生的云南大学人类学中心有一点还是达成了一致，即强调将人类学完全放到历史学的范围内。对很多人来说，历史学是人类学体系内的第五个领域或平行的学科，从史前时代一直延伸到最近的一个世纪。他们也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历史学为重点。

学者们还认为，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和众多的民族，这也是中国人类学的另一个特色。丰富的考古纪录，日益深入的古生物学发现和这个国家民族、语言及地区极大的多样性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足以潜心钻研几十年的资料和数据。一些民族学家说，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与在美洲土著中从事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同样的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他们宣称，受到身边的“他者”的影响使他们能够相对轻松而又全面地检验理论假设。

最后一点，中国人类学家认为，强调应用研究是他们领域的重要特征。正如一名青年教师所说的，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学者也运用人类学为群众服务，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这么做。然而在中国，我们明确的目标就是：保持群众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其他教师叙述这一点的的方式稍有不同，他们强调，人类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来改善国民性，或是通过根除“落后思想”来提高“精神文明”水平。一名教师认为，人类学应该用来帮助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所有这些任务和目标都假设，人类学的目标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人类学科学家经常得到政治机构的有力支持。早在 50 年代，在开展社会历史调查、举办早期博物馆陈列展和应用

人体测量学为日常生产设计服务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支持就给了人类学家极大的帮助，他们将此视为自己领域的优势之一。不过，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官方支持的弊端。他们在感谢政府拨款的同时也了解到，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优先权常常取决于别人的意志，而不是自己的意愿。

学科体系中国化：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学理论和经验，并用它们来研究中国的民族，以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我们才能为民族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不想照搬西方的理论或经验，但我们想把它们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用的成分——技术、方法和理论。渐渐地我们就会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并加以应用；藉此中国人就会对整个人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陈永龄，个人交流）

在这段话里，现居中央民族学院的陈永龄教授（他有时也与子女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解释了中国化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他的民族学领域。但人类学的其他学科体系又怎么样呢？它们是否能够——或有必要——中国化呢？今天这些领域的专家很少有人这样认为。尽管所有学科体系都存在“阶级性”这一假设在1978年以前还起作用，但到了80年代初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自然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没有阶级性的（Tang 1983: 66）。这一观念的改变对古人类学的影响比对其他人类学科学都要大，因为它的关键性单位，如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无论是按照行政管理还是按学术

领域划分，都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因此古人类学家们认为中国化对他们而言算不上一个问题；古人类学、灵长类学和生物人类学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民族多样性”的普世性科学。

古人类学家们极少关注自己领域的本土化问题，某人说，他们对“吸收国外新事物，与西方科学家进行交流”更感兴趣。重要的外国影响还是来自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旧石器研究和美国的古生物学工作。在古人类学领域，受美国教育的前辈学者吴汝康继续与美国人密切合作，而这些领域里苏联人的工作继续遭到贬低，大多数情况下不受重视。

无论解放前后，考古学传统上都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部分（Olsen 1988：4），它更多地面临着这样的呼声：即使不中国化，至少也要在思想意识上提高警惕性。张光直和吉德玮（David N. Keightley）向我们讲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在中国思想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但80年代就不再强调这一点了。到80年代末，无论是考古学的“阶级性”还是考古学的中国化都不再是中国考古学家们争论的话题（张光直 1977：130～131；Keightley 1977：124～128）。

尽管这些变化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完全忽略社会背景及其对理论生成（theory-generation）影响的危险。考古学家重建了文化生活方式，因此专注于理解人类变化的动力；他们也更清楚自身的文化生活方式及其对考古学的影响。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提醒我们，考古学往往脱离它所根植的社会土壤，因此“考古学史局限在本专业的小圈子里，通常只是叙述人们的冒险经历或想法……它们无法检验使考古学作为一个探索领域而存在的历史条件、考古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权力的重要性”（Patterson 1986：7）。中国考古学要想避免

复制不适合本国条件的外国人类学假设、方法论和想法，这种检验是必需的。

一些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从 1949 年以来，特别是 1979 年以来，考古有了很大的进步：发现了 700 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应用诸如碳 14 和热释光法等现代断代技术，并大量运用新的分析技术。他们推断中国考古学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安志敏 1988：754）。奥尔森（John W. Olsen）告诉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在方法、理论和机构方面确实都有别于西方同行（Olsen 1988）。中国公布的原始数据比西方要多得多，不过，他的论点是：

从其具有界定社会确切发展阶段的能力方面能够对考古学材料做最好的理解，这一论点使对考古学记录的类型学的描述方式得以保留……最重要的是，要求考古专业的学生们所学的课程原则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作为其未来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方针。这种二元的考古学训练方法——一方面强调年代学、类型学、历史学和发掘方法，另一方面强调明确限定的解释框架——与西方所理解的考古学技巧的获取有所不同。（Olsen 1988：5~6）

中国考古学家近来接触到西方方法，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方法作了修正。1990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家到香港去发掘位于南丫岛上的一处遗址，他们发现，——用发掘负责人商志禛的话说，

我们的考古学——我们还在遵循夏鼐的老一套——不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了解曾经在这个遗址里居住过的人们的生活。我们的分类和纪年表太

简单化了。我们要学会使用更西方化的——更现代的——技术，如“新考古学”的技术等。

但是，即使商志譚教授也不愿意说他现在所从事的考古学和西方的完全相同。“我们的‘新考古学’，”他对我说，“是新的中国考古学。”

至于民族学领域，中国化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老问题，它可以追溯到30年代吴文藻所作的努力，他想通过利用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来实现中国化。^①但是，金天明和龙平平提醒我们，吴文藻1944年以后渐渐放弃了中国化的努力，当时他本人已不再从事研究了（金天明和龙平平1986：32）。考虑到历史的时代局限性（“国民党统治走向衰落”的时代），有人表示，吴文藻的中国化工作也只能到此为止。

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或社会科学是否需要中国化，还是说它们本身就是普世性的科学？一些学者坚持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中国化，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它不是苏联的、西方的或中国的，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大多数人赞同“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他们坚持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用林耀华的话说就是“中国式的民族学”（个人交流）。

今天的民族学家总的来说都同意50年代的批评意见：解放前的学者对外国人告诉他们的东西不加鉴别地过分吸

① 甚至是现在，当问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问题时也有学者指出，——按吴文藻的说法——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资深学者，不需要依赖外国人”，一位地理学家这样对我说。

收和鼓吹。他们也同意 50 年代对待苏联影响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呢？秋浦建议他的同行只学习外国人好的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不但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学各个学派要作具体分析，就是同一学派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也应作具体分析。对于各个学派的每一学者或每一著作作出评价，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分析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总之，通过分析批判，我们要抛弃那些糟粕，吸收对我们有用的成分”（秋浦 1984：17）。

当我问林耀华，考虑到中国民族学家先是采用西方模式，然后是苏联模式，90 年代他们会仿效哪种外国模式时，他笑着回答：“我们取这两者最好的部分，然后发展自己的模式。”他接着解释说，中国人再也不会单纯地照搬外国模式了。强调学科体系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与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密不可分的。

再度毛泽东化？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六四风波”以后意识形态指导方针重新成为强调的重点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新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没完没了的学习会，对公开的异己分子施加压力并将改革派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些似乎是在仿效早期——从反右派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派的作法。和以前这两次运动一样，一些人类学家也卷入了 1989 年 6 月 4 日前后的事件中。[以下节略 19 行——译者]

社会科学再次受到了怀疑，某些学科体系——最突出的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成为压制的对象。再次禁

止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触，新规定限制出国到更资深的学者门下学习（Petracca 1990：16）。到1990年初，这种压力稍稍减轻，但东欧及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使1991年秋思想控制又得强化。

党作为绝对的权力中心重新出现在单位里，党委书记及其盟军更加齐心协力地纠正思想污染的苗头或想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及共青团的支部书记1991年初向我解释1989年以前的错误：

在政治教育上我们太松懈。学生进行推理的基础太过主观。他们不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改革的十年取得的，因此我们的政策就是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到他们家乡的所在地，让他们与农民对话，问一问他们北京的示威对国家是不是有用。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中国的群众反对他们，而且并非所有的干部都腐败，也并非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停滞不前。

这些思想工作者接下来告诉我学生申请入党的人数增多了。80年代末，平均四十来人的毕业班学生中党员人数越来越少，86届（1990年毕业）到了极点，没有一个人党的。从1989年起，学生会的工作开始取得成效，党开始准备接收新成员，有些还是二、三年级的学生。

尽管思想控制再次成为重点，与外界的联系还是没有中断，即使现在更难获准出国参加会议或是逗留更长时间，人类学科学家还是保持着与外国同行的联系。在过去几年里，外国出版物的订阅工作并未取消，国内及国际上与外国人的项目合作还在继续，而且私人交往及电子邮件往来也依然不断。如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再次成为指导思想的话，它的方法也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般疯狂激烈，其

方式要巧妙得多。

中国化了的中国人人类学

尽管 1989 年以后公开的学术辩论减少,但中国人人类学还是按照与 1989 年以前的类型大致相同的路线发展。若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过去几年特别强调注重学科里中国自己的东西,而来自国外的影响则稍有减弱。因此,此刻正是评估人类学科学中国化进行到何种程度的好时机。

联想到过去 40 多年里人类学科学适应中国生活的表现,显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国化了。理论上、方法上和组织结构上它们发展出了自己的新路子,其中有许多与世界其他的人类学中心有相当大的差异;学科本土化还需要些什么呢?还没有人宣称中国的人类学科学已经达到了世界学术成就的顶峰,或是不再需要批评或自我批评。中国人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它存在某种严重缺陷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应该抹杀中国人的成就,在极不理想的条件下,他们挽救并支持发展了近十种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西方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中国这位“他者”对待这些学科的做法。但是没关系。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人人类学家站起来了,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类学科学。^①

^① 但是,有些学者比其他人更难接受中国人人类学在各方面都发展得相当好的说法。许烺光告诉我,他认为无论是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内地都还没有使人类学中国化。“台湾人类学是一种繁琐的模式。他们只是报告说这个庙里有多少的神祇,有这么许多人去了庙里,他们在市场上买了什么什么东西。这种长篇累牍的报告和《美国人类学家》如出一辙;论文太长,大部分都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和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大多数台湾人类学家实际上只在搞初级的民族志,而不是民族学。中国大陆的人类学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我高度欣赏的东西”。

第十三章 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

中国人类学家自己在看待人类学时十分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历史在他们所阐述的人类学中的确也很重要。过去十年里中国人类学科学领域发生的很多事只有放回到某些关键的地区类型或历史类型的框架中才能被理解。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1949 年以前的情况。与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当时北方主要的人类学中心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南方主要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厦门的厦门大学 and 昆明的云南大学。接下来受苏联影响，50 年代教育界进行院系调整，致使人类学被取消，在学术界消声匿迹达 30 年之久。在北京，人类学的地位已被一种新体制完全取代了，该体制逐渐建立起一种学者—刊物—学科三位一体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re），并在几十年里不断发展壮大。在南方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大学和研究所完全排斥人类学科学家；而在北方，（民族学、考古学、民族语言研究和古人类学领域）这种新发展缺乏深厚的根基，这些地区仍旧留有——虽说不是全部，但也是大量的——人类学的发展空间。

伴随着 80 年代和煦的春风，人类学得以首先在南方重新出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解放前它在这些中心曾有着十分深厚的基础，而且也一直很少有能与之相抗衡的结构。时隔 40 年后，南方当年的人类学中心能够

复兴，但在北方，中断的年月给人类学带来了太多的变化，已经找不到它发展的空间，人类学的姊妹学科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学术地盘和组织领地。可见，只有在老一辈的人类学家还健在，并且没有产生与之匹敌的、制度化了的诸学科填补其空缺的那些地方，人类学才能实实在在地复兴。

中国历史留给人类学的另一宗遗产源于更大的政治文化背景，那就是普遍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某些理论、思想或人物的倾向。这一倾向对中国有害无益，因为它（以一种相当不科学的、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夸大个人和政策的优缺点，使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平添了几分狂躁。在人类学科学中，先是告诉中国学者西方的都是好的（解放前），然后又说西方的都是坏的、而苏联的都是好的（50年代），接着又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坏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80年代，太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再次认为，凡是西方有的都是好的，这意味着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东西——从“民主”、时尚到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应该照搬的。但是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他们“全盘西化”的要求（如某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认为提出了这种要求）都不能被当作严肃的提议。在所有社会科学家中，中国人类学家会首先从自己特殊的有利角度发出警告，说需要有选择地采纳并适应新的文化事项。

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进程也必须按照这种审慎的、有计划的方法去继续。有些外国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确实能够适用于中国舞台，能够有助于研究和重建中国社会；但很显然另外一些方法论或世界观就不能。社会科学和其他任何知识体系一样，是扎根于文化土壤并反映文化历史模式的。宗教学家赵先生注意到，西方发展社会科学，用它来处理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的有所不同，因此西方

社会科学的取向 (orientation) 自然也不同于中国。

西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西方的关键性主题，但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在中国这个关键性主题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必须发展为自己的问题服务的方法论和研究途径并探索中国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学习西方，但这种学习是有局限的。(Zhao, 个人交流)^①

中国人类学家（特别是民族学家）能够有效地借鉴西方的一个方面是，近来出现的对人类学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尽管中国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思索他们的学科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他们也该思考一下这种批判是否同样也适用于他们对待自己身边的“他者”——少数民族——的方法。美国人类学家默里 (Stephen O. Murray) 评价说，汉族人类学家基本上没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他们的“应用”人类学首先是应用于帮助“原始人”接受汉族文明的同化，“这与西方文明中的殖民人类学家想对愚昧的‘野蛮人’所做的显然有同样的目的” (个人交流)。^②

至于中国人类学对全球人类学所能作出的贡献，一个方面显然是其探索人类学模式的独特经历。中国是学术建制受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对这二者都相当了解。中国人利用这些经验建设

① 赵先生如果得知近来西方人类学家和其他人要“解构”他们从前的社会科学基础，无疑会感到非常高兴。

② 我确信，中国的人类学家会叫着嚷着反对这种对比；在这里我提出这一点是要在中国人与他们的外国同行之间开始卓有成效的对话。

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它既是种种外来因素的混合，又是本国传统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然而，在何种程度上中国能够继续发展他们自己的体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还注意到，正如民族学家陈永龄告诫我们的：“各国人类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这种贡献越多，世界人类学就会结出更多的硕果。”各国首先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然后才能为全球学科网络作贡献，因此只有从本土的实践中才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贡献。

对中国人类学来说，这意味着更彻底地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民生活。人类学在一个国家有可能得到广泛应用，其原因在于：首先，它特殊的方法论（注重定性更甚于定量，注重民族与民族的互动更甚于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学者、党和政府了解社会情况实际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其次，文化的概念有助于引导变迁的过程。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应该站在引导文化变迁工作的最前沿，因为他们所精通的知识对于重新塑造长期存在的文化模式的工作会有所帮助。人类学长期研究文化变迁以及文化对变迁的抗拒，因此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能够帮助进行此类社会改造工作。民族学家一直在少数民族中间从事有关的工作；现在已经到了将自己的服务范围拓展到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时候了。

总的来说，变革中国的努力必须包括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城市化、家庭联系纽带的变化、人口和生命周期的转变、民族冲突和宗教复兴都是值得调查的人类学课题；但是只有采取一种跨文化的、整体论的观点看待这些社会问题，中国人才能从中受益。正如中国学者自己认识到的，人类学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现代化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例如，黄淑娉

1990; 黄新美 1990)。

中国人类学还有望在另外几个方面对世界人类学作出贡献。在第三世界,有些人类学想要改变单纯照搬西方学科模式的方法,中国能够对这种趋势增添强大的推动力。叶启政谈到边陲社会的学者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学术作品以英文撰写,发表在中心学术体系中的权威专业杂志上,而把次等的文章以本国文字写作投给本土的专业杂志,因此赋予中心刊物一种国际品味和似乎具有普世性的错觉。这种“普遍取向”(universalism)是一种“迷思”(myth)。他说,因为他们的专栏中重复得更多的是“西方最好”的心态(叶启政 1985: 256)。^①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员,中国接受并发展了对西方及其学科体系的这种强烈批判,这可能有助于它避免再次被纳入外国的发展轨道,同时也有助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心世界的刊物、理论和范式保持一种更苛刻的姿态。

不过,从长远角度考虑,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只有对全球人类学潮流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才能摆脱对中心世界的依赖性。通过开放自己丰富多彩的文物、民族、风土和文化,接受全球理论的检验,中国也能对全球人类学界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与外国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交锋,并在不同的异民族背景下加以应用,中国人类学将会有助于全球对话的多样化。“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需要汲取新经验,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能够成为这种经验的丰富源

^① 金提醒我们,这种“普遍主义”并没有扩展到基础教科书中,“在涉及到非西方人类学家的思想时它一般都讳莫如深”。金还想知道,“一般的西方人类学家是真愿意忍受不同思想的存在,还是希望向非西方人类学家学习”(Kim 1990: 197)。

泉” (Zhao, 1985: 231)。

中国也能用自己的田野工作经验丰富全球人类学的知识库。菲利普·萨尔茨曼 (Philip Salzman) 曾反复提到西方人类学家那种“孤独的闯荡者”在“寂寞地探索”对人类学启蒙所起到的作用的问题 (Salzman 1989a, 1989b), 同时也对合作研究的效果表示怀疑。萨尔茨曼把这种人类学方法论的发展与西方人类学早期出现的历史条件及其后的制度化联结在一起。然而, 并非所有的人类学都有必要以这样一种寂寞的方式进行。中国学者创造出了足以与这种孤独的冒险者的方式相匹敌的田野工作风格。萨尔茨曼用赞同的语气谈到的, 这种“组队研究、集体写作和联名发表”的方式是中国的田野工作这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准则 (Salzman 1989b)。

中国的研究者自己也认为, 这是他们学科的一大优势。^① 在一次与云南民族学家的讨论中, 他们强调组成多学科调查组具有智力的优势, 同时还能利用许多单位为调查组服务, 从而使小单位也能参与研究工作。这种方法也是培养大量不同学科的学生、确保老学者能有机会将自己的技艺传给后代的一种不错的途径。

这确实是中国人类学家的主要优势。无论是作为民族学家, 还是考古学家或民族语言学家, 他们在大学本科所接受的田野训练一般都比西方人在整个本科加研究生教育阶段受到的同类训练多得多。中国人类学系二、三年级的学生要到实地锻炼 6 至 8 周, 同时在大学四年的其他时间里, 还不时有短期的在田野停留的机会。在这些田野访问期间, 他们能系统地实地应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

^① 但一些中国研究者担心削减项目预算意味着将来这样组队进行的田野工作有可能会减少。

体质人类学的方法。

一旦当上教员后，这些训练就显出了成效，他们能够、也经常开展多学科的田野探索。中国人类学家运用的是包括三至四个分支学科的整体论方法，他们习惯于发表集体创作的学术报告。尽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地位混乱和名声扫地之后，学科的重建存在种种问题，但是被培养成了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等各行专家的人类学系的教员们还是以同系教员的身份团结在一起，出版了显然是属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可以学习的一项技巧（参阅 Salzman 1989a）。

中国采用这种组队研究的方法，也是想尝试达到另外一种曾令西方学者困惑的人类学目标。典型的做法是，一个队在一个乡挑选出一、两个村作代表，到选出来的村里去居住两、三个月，有时候是四个月。每位研究人员攻一个课题或一个研究领域。田野工作结束后他们会将这些村和乡与其他地区的乡或村从总体上作个比较。如果是和另一些这样的队一道开展大规模的工作而且持续了很多年，那将会是对一个复杂社会或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进行民族志研究的一种尝试。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方法直接针对战后西方人类学所面临的难题，即如何避免轻率地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社会研究等量齐观，同时又避免了萨尔茨曼批评的那种过分追求细节的和表意的民族志（overparticularistic and ideographic ethnography）（Salzman 1989a）。这种组队研究的方法尽量减少任何特殊的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意见对资料的影响，或许这可以给那些断言民族志具有虚构性质的解构主义者们一剂良药（Appell 1989）。

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田野工作者与地方官员和当地人的亲密关系。中国学者称，所有的人类学科学田野研究都要依靠政府引荐，要得到被

观察和研究的当地民众的支持。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必须款待地方干部，同时还要保证当地农民和其他人愿意与他们合作。为了做到后一点，他们必须有意识地减少造成他们与当地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地位差别。这些学者把这样接近“人民”和依赖干部看作是件让人忧喜参半的好事。一方面，密切的联系确保了热诚的合作；另一方面，获得的资料质量良莠不齐，而且非专业人士可能提供偏狭的解释。有时候很难判定报告人的资料是出于自愿提供的还是出于无可奈何、是准确的还是歪曲的。

中国人类学最后一个方面的贡献就是从这种有意地与研究对象的密切接触中产生的。中国强调知识的应用要有益于社会^①，这意味着中国的应用人类学会继续引导这一学科的发展。^② 过去体质人类学家帮助设计头盔、服装和车座，民族语言学家为少数民族设计新文字，而民族学家教干部们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按这样的思路，中国人类学将以这些应用研究为航标，继续扮演为人类服务的“人道科学”的角色；大家相信，这样它就能在全球的应用领域作出有价值的贡献。^③

既然中国发展了自己的人类学，其他非西方、非“中心”的国家也发展了自己的人类学，那么这整个的多元化过程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全球人类学呢？难道不存在普世性的人类学科学吗？或许确实有些共同元素普遍地渗透到

-
- ① 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有益于社会”是由掌权者来定义的。
- ② 这一点与西方的不同，在西方应用人类学一直在争取赢得学术的合法性，尽管美国和其他人多年来一直在“应用”他们的洞察力。
- ③ 由于长期强调人类学科学的应用性，所以在被告知美国倾向于将应用人类学看做第五个分支学科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感到很迷惑。“另外四个分支学科不是已经在应用了吗？”他们问道，“为什么还要单独提应用呢？”

了我在这里称作“人类学科学”的领域当中，它们是：(1) 跨文化的观点，(2) 对长时段研究的强调，以及(3) 重视田野工作的方法论。^① 简言之，“人类学科学”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宽广，并且它的方法论特别注重对定性资料的搜集。^②

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从人类学科学反映国家状况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正是在斗志昂扬地为自由和真正自治而战。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能清楚地反映中国社会，实现这一点不仅要借助它自身的分析工具，而且还要详细了解它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因为学科史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它能够揭示颇多社会问题。因此，人类学能够再次——按克拉克洪的话说——为一个民族竖起一面镜子，这一次是为中国人，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真实形象。

① 特林吉特语 (Tligit) 专家 Laura Klein 帮助我按照这些线索理清了思路 (个人交流)。

② 不过，对这些一般的指导方针，在有些分支领域或相关领域适应起来游刃有余，而有些则稍逊一筹。高斯明 (Walter Goldschmidt) 曾经指出，当时美国古典民族学才刚刚出道不久，因此只能满足这三个标准中的两个 (个人交流)。

焦点之七

梁钊韬：墓志铭

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梁钊韬教授由于胆囊癌而变得越来越虚弱，他夏季入院，于当年12月2日去世。从1981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看他的身体始终都很虚弱，但我们最后一次分手的时候，即他生命中最后一年的元月，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进一步恶化。他妻子和其他人认为，是他在坪石等地几年艰苦的劳改营生活搞坏了他的身体。那样繁重的劳动确实足以拖垮人的身体，但那些年里梁钊韬的精神从未被打垮过。他返回校园和家中开始重建工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类学梦想。

但是在困境中要取得这样的成就实非易事。他的妻子邓泽民回忆起他工作狂似的生活方式：

晚饭后我总愿意和他一块儿去散步。但他却很少有这种想法。我得把他给拽出去。然后，我们刚刚走了几分钟他就冒出一个想法，就想马上回家去！当时他工作到午夜或更晚。我起床告诉他该睡觉了，但他不听！“你睡吧。我在工作，”他对我说。然后只要我俩都醒着，我就给说去他弄点儿吃的。“不，不，”他回答说：“你自己去睡！”

对工作的痴迷使他养成了一些个人的习惯。他从不锻炼，还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觉得烟能有助于他思考”，梁太太对我说）。他从没接受过体检，他妻子认为，假如他不这么固执的话，或许可以早点发现自己得了癌症，说不定还不会那么快病逝。她叹了口气，伤心地说：“甚至住进医院治疗后他都没有戒烟。”

梁钊韬是个复杂的人，在公众面前他表现出极不相同的两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广州以外的人而言，梁代表了美国的人类学方法；而同时在系里他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倡导者而闻名。尽管直到逝世前几个月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但梁坚持学生的研究中应该包括这种理论框架，他很乐意批判美国的“资产阶级人类学”，在他眼中它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他强调意识形态，相应地回避应用人类学，偏爱更传统的学术主题，这反映出梁应有的政治敏感性。但在政治性中有一方面梁是绝对不会口下留情的。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终生都在为国家效力；没人会怀疑他号召中国人人类学完全为中国人民服务时的诚心。

作为一个领域的先驱者，梁先生的确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梁的身边聚集了几辈人中涌现出来的一群愿意献身的学生，他们曾经、并且仍然在将梁钊韬的人类学科学本土化的讯息带给后继者。通过开展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工作，梁展示给人们如何成为一名四大学科的人类学家。但对有些学生和同事来说，梁高高在上的强硬方式使他们大为恼火，有人开始不满，开始挑衅。到80年代他就不能控制这个系了。1985年梁钊韬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开始感到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够实现所有的设想。他也开始怨恨那些认为他以著作形式发表的学术成果不属于一流水平的人。

这对一个年近 70 的学者来说或许不足为奇。毕竟是因为梁本人坚强的意志才使中山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得以继续，也使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类学复兴方案得以实施。并非每件事（或每个人）都符合他的计划，而他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一门心思地搞研究和出版，他对此感到失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失望来源于他最伟大的成就这又有些矛盾。到 80 年代中后期，人类学不能再是某个人私人的计划、希望或梦想。它已经制度化了，与全国和国际接轨，有几十名教职员工参与其日常运作，提供工作场所的单位也越来越多。它现在在中国很有前途——为此，中国和世界感谢梁钊韬作为全球人类学事业的严格的前辈之一所做的努力。

跋

梁钊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行了一个仪式，宣布建立梁钊韬教授纪念基金。每年有四笔200元的奖学金要授予有资格得到它的学生。这笔基金是梁夫人本人捐献的，她将学校在她丈夫逝世时发放的一万元抚恤金捐了出来。她后来对我说：“让学生用这笔钱，在中国继续从事人类学。”

1991年5月，人类学系庆祝它的十岁生日。庆祝活动中宣布即将出版一部纪念梁钊韬教授的文集。1991年11月出版的这本《梁钊韬与人类学》是认识梁钊韬的那些人——从他的老师杨成志到他的同事吴汝康、庄益群、陈梓权、黄淑娉、黄新美、宋长栋、曾骥、顾定国、龚佩华和他的学生曾昭璇、容观复、张寿祺、陈启新、杨鹤书、格勒、乔晓勤、陈华、李秀国、李安民、麻国庆和麦英豪——共同的心血。

至于梁夫人，丈夫逝世后不久她就准备接受儿子梁津的请求，去亚特兰大和他一起生活。1990年5月2日，她将梁钊韬所有的藏书捐献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1992年期间开始计划去美国和儿子共同生活。不过，她在离开中国之前第一次游览了北京——她盼望着当年能和丈夫同行的这趟旅行竟然盼了如此之久！

参考文献

Ahn, Boon-jung, 1975. "Adjustme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ir Ideological Legacy, 1959 ~ 1962" ("大跃进中的调整及其思想遗产") 载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 ed. C. Johnson, pp. 257 ~ 3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ndrianov, B. V., A. A. Zubov and M. V. Kriukov, 1980. "Nikolai Nikolaievich Cheboksarov (1907 ~ 1980)" ("尼·尼·切博克萨洛夫 [1907~1980]"), 《苏联民族志》4: 185~188。

安志敏, 1986。采访。北京, 11月。

——1988.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eolithic China."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Current Anthropology* (《现代人类学》), 29: 5: 753~759.

Appell, G. N., 1989. "Facts, fiction, Fads, and Follies: But Where Is the Evidence?" (事实, 杜撰, 奇想和蠢行; 但证据何在?)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美国人类学家》) 91: 1: 195~198.

Arkush, R. David (阿古什), 1981.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董天民的汉文节译本《费孝通传》, 时事出版社, 1985年——译

者注]

Arutiunov, Sergei, 1991. 采访。莫斯科, 9月。

Austerlitz, Robert, 1989. "F. K. Li (1902 ~ 1987)" ("李方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55: 4: 468 ~ 471.

Bacdayan, Albert S., 1984. Book review of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人类学》一书书评"), ed. Hussein Fahi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 3: 709 ~ 711.

鲍尔汉主编, 1986。“中国民族史大事年表·1950年代”,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623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Barrett, Richard A., 1989. "Paradoxical Anthropology of Leslie White" ("莱斯利·怀特自相矛盾的人类学"),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986 ~ 999.

卞僧慧, 1986。“四五十年前我国一个大学人类学系的课程设置”, 《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 115期, 4~9页。

Briton, Daniel Garrison, 1892. *Anthropology: As a Science and a Branch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为一门科学和美国大学教育一个分支的人类学》), Philadelphia, Reprinted in "Anthropology as a Science—in 1892",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人类学通讯》) December 1990: 3.

Chang, Kwang-Chih (张光直), 1977. "Public Archaeology in China" ("中国的公众考古学"), 载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人类学》), ed. W. W. Howells and P. J. Tsuchitani, pp. 130 ~ 139.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hao Weipang (赵卫邦), 1979 [orig. 1958].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the Functionalist Social Anthropology Imported by Fei Hsiao-t'ung and Others." ("费孝通等输入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反动实质") In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费孝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ed. J. P. McGough, pp. 98~112.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 1958年第3~4期——译者注]

Chen Chi-lu (陈奇禄),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过去四十年里台湾人类学的发展")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Accomplishments and Prospects* (《台湾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展望》), ed. Kuang-chou Li (李光周) et al., pp. 1~14. 台北：台湾国立大学人类学系。

陈国强, 1985a.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人类学研究》(试刊号), 1~2页。

——1985b. "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 《人类学研究》(试刊号), 9~16页。

——1986. "林惠祥",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249页,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a. "The Chinese People Need Anthropology" ("我国人民需要人类学"). 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 ed. G. Guldin, pp. 42~55.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 1~10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译者注]

——1990b. "建设中国人类学", 陈国强主编：《建设

中国人人类学》，1~16页，上海：三联书店。

陈国强和林嘉煌，1988。《高山族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

陈映璜，1918。《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陈永龄和王晓义，1981。“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261~29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陈梓权，1989。“梁钊韬”，载《现代已故史学家》，397~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Cheng, L. C., and Alvin So. 1983. “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PRC: Towar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an Sociology”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学的重建”),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社会学年评》), 9.

Chesnaux, Jean, 1979.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76)》),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Chiao Chien (乔健), 1987a. “Radcliffe-Brown in China”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 *Anthropology Today* (《今日人类学》), 3: 2 (April).

——1987b. “A Note on the Yao Programm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Departments” (“关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瑶族研究计划的一点说明”), *Hong Kong Anthropology Bulletin* (June) 1: 7~8.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1986. “Intellectuals Go on a Learning Crusade” (“知识分子继续开展学习运动”), p. 4. August 13.

Chinese Educational Newsletter (CEN) (《中国教育通讯》), 1986. “Executive Summary: 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中美教育交流的总结

(1978~1984)”), *CEN* (《中国教育通讯》) 14: 1: 4~8.

——1987. “交流新闻”。*CEN* (《中国教育通讯》) 15: 3/4: 17~18。

China Talk (《中国谈》), 1986. “China’s Cultural Quandary” (“中国的文化窘境”), XI: 3/4: 1~12.

——1987a. “China’s Political Perplexity” (“中国的政治困惑”), XII: 1/2: 1~15.

——1987b. “Bordering on the Possible? Improved Sino-Soviet Relations” (“改善中苏关系近乎可能?”), XII: 3: 1~16.

《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 115期, 1986年4月1日。

Chu, David S. K., ed. and trans., 1983. *Sociolog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79~1983* (《当代中国社会与社会学(1979~1983)》),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VI: 1~2. Armonk, NY: M. E. Sharpe.

Clausen, Edwin G., 1988. “The Eagle’s Shadow: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al Influence, 1900~1927” (“鹰之庇荫: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教育的影响, 1900~1927”), *Asian Profile* 16: 414~440. October.

——1989. “From Under the Eagle’s Wing: The Growing Challenge to US Educational Influence in China, 1920~1928” (“养虎成患: 美国在华的教育影响逐渐经受挑战, 1920~1928”), 载 *Roads to Freedom: The Struggle Against Dependence in the developing Third World* (《自由之路: 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依赖性斗争》), ed. E. Clausen and J. Bermingham, pp. 3~34. Aldershot: Gower Publishing.

丁邦新, 1985。“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台湾) 7: 8: 1~8。

——1988。“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Dr. Fang Kuei Li” (“李方桂博士的学术贡献”),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国语言学学报》) 16: 167~172。

杜荣坤和杨光海, 1989。“The Development of Video Show Ethnology in China” (“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发展”), 载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d.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 (乔健和王富文编:《中国的族群性与族群》), pp. 65~74. Special issue of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Hong Kong).

Dwyer-Schick, Susan Adair, 1979.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and Folklore Research in America, 1988~1940* [原文如此]” (《美国民俗学会与美国的民俗研究》),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恩格斯, 1972 [orig.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 of Lewis H. Morgan*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d. Eleanor Leacoc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Fahim, Hussein, ed. 1984.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人类学》), Chapel Hill,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费孝通,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江村经济》),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有戴可景的汉译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年——译者注]

——1979 [orig. 1947]。“The Growth of Chinese Sociology” (“中国社会学的成长”), In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费孝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ed. J. McGough, pp. 19~31. Armonk, NY: M. E. Sharpe.

——1979a [orig. 1957]。 “A Few Words on Sociology” (“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载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费孝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ed. J. McGough, pp. 19~31.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文汇报》1957年2月20日——译者注]

——1980。“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期，94~107页。

——1986，采访。北京，11月。

——1989，采访。北京，12月。

费孝通和张之毅，1945。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冯友兰，1989。“Beijing University: A History” (“北京大学的一段历史”)， *Chinese Education* (《中国教育》) (Winter 1988~1989) XXI: 4: 77~93.

Feurewerker, Albert, 1987. “New Written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 (“中国研究的新书面材料”)， *China Exchange Newsletter* (《中国交流通讯》), 15: 3/4: 5.

Frankenberg, Ronald J., 1986. “Comments” (“评论”)， *Current Anthropology* (《现代人类学》), 27: 5: 506~507.

Freeman, L. G. Jr., 1977.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古人类学)，载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人类学》), ed. W.

W. Howells and P. J. Tsuchitani, pp. 79~113. Washington D. C.: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riedman, Edward, 1986. Book review of Frederick C.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评 Frederick C. Teiwes 的《中国的领导、立法与冲突：从感召权威毛泽东到后继者的政治》”), Armonk, NY: M. E. Sharpe,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 4: 825~826.

傅懋绩, 1986a. “李方桂”,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240 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b. “中国民族语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554~557 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c.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571~572 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Developments i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Nationality Languages in the Thirty-five Years Since Our Nation Was Founded” (“我国成立 35 年来民族语言科学研究的发展”), 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 对学科的界定》), ed. Gregory E. Guldin, pp. 177~188.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民族语文》, 1984 (5) ——译者注]

高清海主编, 1985. “五爱教育”, 《精神文明辞典》, 71~72 页,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Gipouloux, Francois, 1986.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agitation ouvri'ere et crise du mod'le sovi'tique en China, 1956~1957* (《工厂里的百花齐放: 中国工人骚乱与苏联模式的危机, 1956~1957》),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

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Goldman, Merle, 1981. *China's Intellectuals : Advice and Dissent* (《中国的知识分子: 建议与意见》),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unfeld, A. Tom, 1985. "In Search of Equal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Han" ("寻求平等: 中国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汉族的关系"),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7: 1: 54~67.

Halpern, Nina, 1988. "Social Scientists as Policy Advisors in Post-Mao China: Explaining the Pattern of Advice" ("社会科学家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担任政策顾问"),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 /20: 215~240.

Harrell, Stevan (郝瑞), 1989.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彝族史的历史"),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March.

Hayhoe, Ruth, 1988. "A Chinese Catholic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中华民国高等教育的中国天主教哲学"), *Tripod* 48: 49~60.

广东省高教局, 1986. 《中国广东省高等教育机构》, 香港: 宏文图书公司。

Howe, Jovan, 1987. 采访。西雅图, 3月。

——1988. 采访。西雅图, 1月。

Howells, W. W. and P. J. Tsuchitani, ed., 1977. "Appendices B and C" ("附录 B 和附录 C"), 载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人类学》), pp. 151~163.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萧新煌, 1985. "再论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台湾的社会学家说”，《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277~29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许烺光，1944。“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中国的社会学研究”），*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4: 1~4: 12~26.

——1949.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祖荫下》），London: Routledge.

——1990。采访，洛杉矶新奥尔良，12月。

胡起望，1981。“蔡元培和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251~26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胡坦，1986a。“马学良”，《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264~26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b。中央民族学院的采访。北京，11月。胡坦教授时为该院副院长。

黄树民，1983。“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mphases in China”（“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及研究重点”），未发表的报告。

——1986。“Revitalizing Social Sciences in Mainland China”（“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复兴”），*Asian Review* (Spring): 4~8.

黄淑娉，1983。写给笔者的信。

——1990。“Developing Ethnology in Our Country Is W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Needs”（“在我国发展民族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ed. Gregory E. Guldin, pp. 162~173.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84~9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年——译者注]

——1992。采访。美国，华盛顿州塔科玛 (Tacoma)，7月。

黄新美，1990。“The Impact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on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体质人类学对建设‘两个文明’的作用”)。载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ed. Gregory E. Guldin, pp. 114~120.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84(2)——译者注]

黄应贵，1983。“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台湾)，55期，105~146页。

贾兰坡，1975。《The Cave Home of Peking Man》(《北京人之家》)，北京：外文出版社。

贾兰坡和黄慰文，1984。《周口店发掘纪》，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蒋炳钊，1987。“文化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学”，载《人类学研究(续集)》，275~2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应樑，1981。“民族学在云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236~25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6。“江应樑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69~7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金天明，1986a。“苏维埃学派”，《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410~41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b。“托尔斯托夫”，《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439~44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金天明和龙平平, 1986。“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2期, 28~33页。

Keesing, Roger M., 1987. “Anthropology as Interpretive Quest” (“探索解释的人类学”),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2: 161~176.

Keightley, David N., 1977.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考古学与历史学”), In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人类学》), ed. W. W. Howells and P. J. Tsuchitani, pp. 123~129.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Kim, Choong Soon, 1990. “The Role of the Non-Western Anthropologist Reconsidered: Illusion versus Reality” (“重新思考非西方人类学家的角色地位: 错觉与现实”), *Current Anthropology* 31: 2: 196~198.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学革命的结构》),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 Polla, Randy, 1987. “Introduction to Li Fang-kuei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李方桂口述史集·导言”),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李安民, 1990。“论人类学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山大学学报》, 4期, 78~86页。

李方桂, 1940。《龙州土语》,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李绍明, 1986。《民族学》,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李达, 1979 [orig. 1957]。 “Criticizing Fei Hsiao-t'ung's Comprador Sociology” (“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载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

tellectual (《费孝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ed. J. P. McGough, pp. 113 ~ 142.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哲学研究》, 1957 (5)]

李修宏和周鹤鸣, 1988。《广东高等教育 (1949~1986)》,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有义, 1980。“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 《民族研究》, 1期, 48~56页。

梁钊韬, 1964。“人类学, 考古学, 民族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学术研究》(社会科学版)(广东), 6期, 46~51页。

——1989。《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梁钊韬和张寿祺, 1990。“On ‘Ethnoarchaeology’” (“论‘民族考古学’”), 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 对学科的界定》), ed. Gregory E. Guldin, pp. 91~107.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 1983 (4) ——译者注]。

梁柱, 1988。“北京大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和进行时期”, 萧超然主编: 《北京大学校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惠祥, 1935。《文化人类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林耀华, 1947。《凉山夷家》,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 (《金翅》),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大陆汉译本《金翼》, 庄孔韶、林宗成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年——译者注]

——1984。“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民族研究论文集》, 第三卷, 1~9页,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86a。采访。北京，11月。

——1986b。“民族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21~32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New China's Ethnology: Research and Prospects”（“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ed. Gregory E. Guldin, pp. 141~161.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民族研究》，1981（2）——译者注]

林耀华和金天明，1980。“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民族研究》，2期，50~57页。

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1984。“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研究论文集》，第三卷，10~5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刘延寿和冯志毅编，1986。《中国社会科学家词典——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龙平平，1988。“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191~207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罗致平，1986。“杨成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488~48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Lutz, Jessie G., 1988.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Retrospective”（“基督教教育在中国”），*Tripod* 48: 28~48.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I: 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II: 大跃进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有汉译本, 魏海生、艾平等译, 求实出版社, 1989、1990年——译者注]

毛泽东, 192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31。《兴国调查》。

Mark, Lindy Li, 1987. “Li Fang-Kuei” (“李方桂”)。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人类学通讯》) 28.

McGough, James P., 1979a.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费孝通: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79b. “Introduction” (“引言”), 载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费孝通: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ed. James P. McGough, pp. 1~18.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Mei Yi, 1986.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社会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China Exchange Newsletter* (《中国交流通讯》) 14: 1: 9~13.

Meisner, Maurice, 1977.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毛泽东的中国》), New York: Free Press.

Merton, Robert, 1986.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New York: Free Press.

莫润先, 1986。“吉谢列夫”,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220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Moody, Peter R. Jr., 1987. Book Review of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 (“《中国的当权派知识分子》一书书评”) ed.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Ar-

monk, NY: M. E. Sharp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2: 392~394.

Murray, Stephen, 1990. 致笔者的信。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40.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ists. Section II: Eastern Hemisphere* (民族研究委员会(编)《国际人类学家词典》, 第二部分: 东半球),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liven, Ruben George, 1989. "Anthropology and Brazilian Society." ("人类学与巴西社会"), *Current Anthropology* 30: 4: 510~514.

Olsen, John W., 1988.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Today" ("中国当前的考古学实践"), *China Exchange News* 16: 2: 2~6.

Orleans, Leo A., 1987. "Soviet Influence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In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世界》), ed.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pp. 184~198. Armonk, NY: M. E. Sharpe.

Osgood, Cornelius, 1963.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旧中国的农村生活》), New York: Ronald Press.

Pasternak, Burton (巴博德), 1988. "A Conversation with Fei Xiaotong." ("与费孝通一席谈"), *Current Anthropology* (《现代人类学》) 29: 4: 637~662. [汉译文参见巴博德: "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 载费孝通: 《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 195~246页,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译者注]

Patterson, Thomas C., 1986. "The Last 60 Years: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ist Archa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过去的六十年：美国走向美国式考古学的社会史”),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8: 1: 7~26.

Pepper, Suzanne, 1982. “China’s Universities: New Experiments i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A Research Report” (“中国的大学：社会主义民族与行政改革的新实验”),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 8: 2: 147~204.

——1984.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 - 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Research Report* (《中国的大学：毛泽东之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etracca, Mark P., 1990. “Beyond Tiananmen Square: Tragedy and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天安门题外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剧与教育”),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23: 13~20.

Petzold, Matthias, 1980. “Introduction” (“引言”), In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XII*: 3: 3~8 (spring).

Pimenov, Vladimir Vladimirovich, 1991. 采访。苏联，莫斯科，9月。

Plotkin, Vladimir and Jovan E. Howe, 1985. “The Unknown Tradit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Soviet Ethnography” (“未知的传统：苏联民族志的持续与创新”),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辩证人类学》), 9: 257~312.

Price, Ronald, 1987. “Convergence or Copying: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融汇还是照搬：中国与苏联”), In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世界：文化转移研究》), ed.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pp. 158~183. Armonk, NY: M. E. Sharpe.

Puckkov, Parel Ivanovich, 1991. 采访。苏联，莫斯科，9月。

秋浦，1984。“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研究》，5期，11~23页。

容观夏，1986。采访。广州。春季至秋季。

Rosen, Stanley, 1984. “Prosperity, Privat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繁荣，丧失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Mach.

——1985. Book review of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Research Report* (“评《中国的大学：毛泽东之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by Suzanne Peppe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V: 4: 817~818 (August).

Rossi, Alice S., ed. 1985.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of a Delegation Visit, February-March, 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代表团访华报告》).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华盛顿特区：国家学院出版社。[其中人类学部分的汉译文参见《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印，1985年——译者注]

Rozman, Gilbert, 1987a.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ism in China: The Social Sciences at a Crossroads” (“中国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十字路口上的社会科学”),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 54: 4: 631~662.

——1987b. 与笔者的讨论。波士顿，3月。

阮西湖，1987。《澳大利亚民族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Salzman, Philip Carl, 1989a. “The Failure of Solitary Fieldwork” (“寂寞的田野工作的失败”),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人类学通讯》) 30: 4: 28, 26.

——1989b. “The Lone Stranger and the Solitary Quest” (“孤独的陌生人与寂寞的探索”),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人类学通讯》) 30: 5: 44, 16.

Sanchez, A. R., and S. L. Wong, 1974. “On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 Anthropologist’” (评“采访中国人类学家”), *China Quarterly* (《中国季刊》) 60: 775~790.

Schlosser, Max, 1903. “Die fossilen Säugetiere Chinas nebst einer Odontographie der recenten Antilopen” (“中国的哺乳动物化石：附论现代羚羊齿形图谱”), *Abhandlunge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unich). Band 22: 1: 45~50.

Schur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 2nd edi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warz, Vera, 1986. “The Intellectual as Survivor Witness”, review essay of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y 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 (“一名大难不死的知识分子的自述”，评乐黛

云等著《走进暴风雨：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的历险》），*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8: 4: 60~66.

Shapiro, Sidney (沙博里), 1979.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有中文节译本，程应瑞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译者注]

Shaw, Jason (肖家成), 1989. "Current Trends of Ethnology" ("当前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趋势"), *In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中国的族群性与族群》), ed.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 pp. 41~64. Special issue of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Hong Kong).

施正一, 1981. "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 第1辑, 169~180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Sofronov, Mikhail V., 1986. 采访。广州, 11月。

Solheim, II, Wilhelm G., 1986. 采访。广州, 7月。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迁) 1990.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探索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苏秉琦, 1990. "New Issues in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 *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 对学科的界定》), ed. Gregory E. Guldin, pp. 68~72.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译者注]

孙本文, 1956. "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新建设》, 11期。

孙学悟, 1916. "人类学之概略", 《科学》, 2卷, 4期。

Tang Tsou. 1983. "Back from the Brink of Revolutionary 'Feudal' Totalitarianism" (从革命的“封建”极权主义的边缘回来),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ed. V. Nee and D. Mozingo, pp. 53 ~ 8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Robert, 1981. *China's Intellectual Dilemma: Politics and University Enrollment, 1949~1978* (《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德日进和桑志华, 1924.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 ("华北的旧石器"),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中国地质学会志》) 3: 1: 45~50.

Teiwes, Frederick C., 1988.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毛泽东和他的副官们"),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1~80.

Thurston, Anne F., 1987.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人民的敌人: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sang, Cheng-hwa (臧振华),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aiwan" ("台湾历史考古学的新观察").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Accomplishments and Prospects* (《台湾地区的人类学研究: 成就及展望》), ed. Kuang-chou Li et al., pp. 159~172.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毛泽东

统治下的教育：地方学校的班级与竞争（1960~198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gel, Ezra,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王恩庆和李毅夫，1986。“施密特”，《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9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Wang Kang (王康)，1981。“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 XIII: 3: 3~19 (Spring).

王同惠（费孝通编），1936。《花蓝瑶社会组织》，上海：商务印书馆。

White, Gordon, 1981. *Party and Professionals: The Political Role of Teac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党与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3. “The Postrevolutionary Chinese State” (“革命后的中国国家”)，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ed. V. Nee and D. Mozingo, pp. 27~5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ong Siulun (黄绍伦)，1979.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与社会主义》)，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吴汝康，1982。“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1979” (“中国的古人类学，1949~1979”)，*Current Anthropology* 23: 5: 473~477.

——1986。采访。广州，12月。

——1990。采访。北京，1月。

吴汝康和林圣龙，1985。“Chinese Paleoanthropolog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中国古人类学：回顾与展望”），In *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ed. Wu Rukang and John W. Olsen, pp. 1~27.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吴文藻，1935。“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民族学研究集刊》，1期，123，124页。

——1986。“吴文藻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77~9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夏鼐，1990。“What Is Archaeology?”（“什么是考古学？”），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ed. Gregory E. Guldin, pp. 59~67.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考古》，1984（10）——译者注]。

萧超然，1988。“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萧超然主编：《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华通讯社国内材料组编，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1949~1980）》，1版，北京：新中国出版社。

阎鹏，1990。“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学研究》，6期，12~22页。

杨成志，1986。采访。北京，11月。

杨成志和田晓岫，1986。“杨成志博士生平简述”。《海丰文史》，1~10页，海丰：广东省海丰县政府。

杨堃，1983。“回忆周恩来总理对我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教诲”，杨堃：《民族与民族学》，1~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懋春，1945。 *A Chinese Village : Taitou , Shantung Province*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村》)，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叶启政，1985。“边陲性与学术发展——再论社会科学中国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247~26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Yuan Jihui (袁辑辉)，1983。“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ology Department at Fudan University Branch Campus, Shanghai” (“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的成立与发展”)，In *Sociolog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1979~1983* (《当代中国社会与社会学(1979~1983)》)，ed. and trans. , David S. K. Chu, pp. 18~27.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VI: 1~2. Armonk, NY: M. E. Sharpe.

Yue Daiyun (乐黛云) and Carolyn Wakeman, 1985.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走进暴风雨：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的历险》)，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曾骥，1990。“Characteristics and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of Neolithic Cultures in China”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序列”)，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ed. Gregory E. Guldin, pp. 73~90.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3(1)——译者注]

张森水，1990。“Paleolithic Research in China, 1980~1984: Commemorating the Fif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First Homo Erectus Skull” (“中国旧石

器时代研究(1980~1984):纪念第一个直立人头盖骨发现55周年”), In *Anthropology in China :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 ed. Gregory E. Guldin, pp. 127~138. Armonk, NY: M. E. Sharpe. [原载《人类学学报》1984(4)——译者注]

张寿祺, 1992。“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 《社会科学战线》, 3期, 319~327页。

Zhao, F. 1985。“社会科学中国化问题管见”,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 223~232页,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Zhao, F. 1987。采访。西雅图, 2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 1991。《梁钊韬与人类学》,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周大鸣, 1985。“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 《中山大学学报》, 1期, 132~144页。

——1992。“中国人类学重建十年: 回顾与展望”, 《社会科学战线》, 2期, 137~145。

周天度, 1984。《蔡元培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周星, 1989。“杨堃先生的学术成就”, 未刊稿。

庄益群, 1991。“梁钊韬教授生平业绩”, 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梁钊韬与人类学》, 1~16页,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宗群, 1986。“民族学院”,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328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译后记

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顾定国 (G. E. Guldin) 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 1977 年), 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1994) 是在运用大量第一手访谈材料并结合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写就的。顾博士曾在中山大学当过一年访问学者, 与我们这些中大学生混得熟极; 而梁钊韬等人类学系的老师则更是他田野工作的重要对象。可以说, 中山大学乃是顾先生撷取材料、写作中国人类学史的一个主要的田野调查点; 同时, 也正是中大使得他由“老外”变成了“老顾”, 俨然“内群体” (We-group) 的一员。由于身份、视角以及写作手法等诸多方面的特殊, 使得这本局外人撰写的中国学术史著作让我们这些被写者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尽管此书并非尽善尽美, 可毕竟是本难得的佳作。作为同行, 译者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类学家、更多的中国人借助这面文化镜子来反观自我。现经业内有关专家的推荐和邀请, 我们勉力应承, 将此书译出, 以期对深入探讨中国人类学史、振兴中国的人类学,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于就我自己来讲, 阅读顾著除了有专业方面的收获之外, 同时也让我对梁钊韬先生——书中的焦点人物、我的导师——加深了解, 对我在中山大学的

读书生活再作一番寻梦式回忆。

作者顾定国博士得知译书一事后非常高兴，慨然允诺授予中文版权，特地写了“中文版前言”，并与我们书信往返，商讨解决翻译中的一些疑点，坦诚地相互切磋学问。对此，我们谨表感谢。原著思路开阔，涉猎的史料甚为丰富——包括中外文献、口述史料和照片，表现手法也颇为新颖；加之文笔诙谐，还不时穿插一些生动的人物和场景描述，令人读来饶有兴趣。不过也正是如此，无形中平添了译述的难度。需要一提的是，可能是因为老顾使用的材料不少得自于个人访谈，回忆和口述与通常见到的文献材料相比显得不够准确，如一些机构的名称以及这些名称的历史变化等；另外，对于一些汉文文章表述的意思，经过引用者根据自己理解后的英文转述，在我们读来似乎又觉难以反映原作的精神，“回译”工作甚感困惑。译文中我们除对难断之词附上原文之外，还斗胆添进一些“译者注”，但愿不致成为“蛇足”。译者眼高手低，常有力不从心之感，疏漏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批评指教。

我的老师黄淑娉教授当年曾接替先师梁钊韬指导我的学业，现在又欣然提笔为本书赐序，不啻使译本生辉增色，更是对我们的无形鞭策。

遗憾的是，梁师母邓泽民老师（1925~1999）已经谢世，无缘分享中译本出版的喜悦了。

本书的翻译主要是由周燕女士和我合作完成的，书后的“参考书目”由林春女士翻译，同窗纳日碧力戈博士译出“作者中文版前言”，张海洋博士帮助校阅了绝大部分章节。原书本是为海外人士了解中国人类学而作，在翻译中我们考虑到译本对象已为中国内地读者，因此，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并征得作者同意，做了少量必要的文字删节；中文版还删去了原版中的地图和索引；对原著照片也有所

取舍。

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就有关难题多方求教，在此要特别感谢张公瑾、杨甲荣、李光谟、黄慰文、郭卫东、麻国庆、丁元竹、王建民、刘兰兮、黄仕忠等师友的大力襄助。北京图书馆的胡谦女士不厌其烦，数度帮助查借资料，在此一并申谢。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译事的支持和责任编辑罗琳女士的有效合作，使得译本能够在历经周折后迅速呈现于海内读者面前。

胡鸿保

2000年1月30日

于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寓所